

# 传教士韩宁镐 与近代中国



(德) 赫尔曼·费希尔  
——著  
(奥) 雷立柏  
——编译

Aug

us

Hermann  
Fischer

Gold  
Fischer

开放的中国允许我们重新看待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因此我们不要再对他们抱有偏见了。不少神父是为了拯救中国而毫无保留地以投入精神来华的。韩宁镐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我们今天以批评性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热情的话，我们也可以透过他们的眼睛重新思考一个慢慢开始变化的中国。

——顾彬（德国著名汉学家）

一些正直的学者、作者让我们逐步知道了真相，知道了柏格里、苏慧廉、戴德生……这些热爱中国、为中国人舍命的外国人，他们的人数很多，感人的故事更多——这本书展示的韩宁镐，24岁离别德国的亲朋家人时说：“再见吧，在中国，或者在天国！”翻译这本书的雷立柏，20岁出头来中国后，据我所知，只回奥地利老家看过父母一次！他们的生命，是为中国人而活，我们不应该读一读这些书，想一想这些事吗？

——何光沪（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的近代史扑朔迷离，这本来自西人一手材料的传记，让人常有惊喜。义和团期间暴毙街头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中国的史书里是个死有余辜的人，但在韩宁镐为他作的悼词里，你才明白他的家世、生命道路及捐躯的意义；作为驻扎山东五十三年多的传教士，韩宁镐详细记录了他与当时的衍圣公孔令贻的交往，在西人的眼里，孔是“中国教皇”。这些材料，中国史书中绝不会有，这也是今天要寻找并发掘这些当时生活在中国的西人的价值及意义。

——沈迦（《寻找·苏慧廉》作者）

上架建议：历史·传记

ISBN 978-7-5133-1896-9



9 787513 318969 >

定价：52.00 元



近代中国  
教士韩宁镐

# Augustin Henninghaus

53 Jahre Missionar und Missionsbischof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教士韩宁镐与近代中国 / (德) 费希尔 (Fischer, H.) 著; (奥) 雷立柏 (Leeb, L.) 编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133-1896-9

I. ①传… II. ①费… ②雷… III. ①韩宁镐 (1862 ~ 1939) —传记 IV. ① B979.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7331 号

---

## 传教士韩宁镐与近代中国

(德) 赫尔曼·费希尔 (Fischer, H.) 著; (奥) 雷立柏 (Leeb, L.) 编译

策划编辑: 刘丽华

特约编辑: 向珂

责任编辑: 黄珊珊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60mm × 970mm 1/16

印张: 26.5

字数: 250千字

版次: 2015年10月第一版 2015年10月第一次印制

书号: ISBN 978-7-5133-1896-9

定价: 52.00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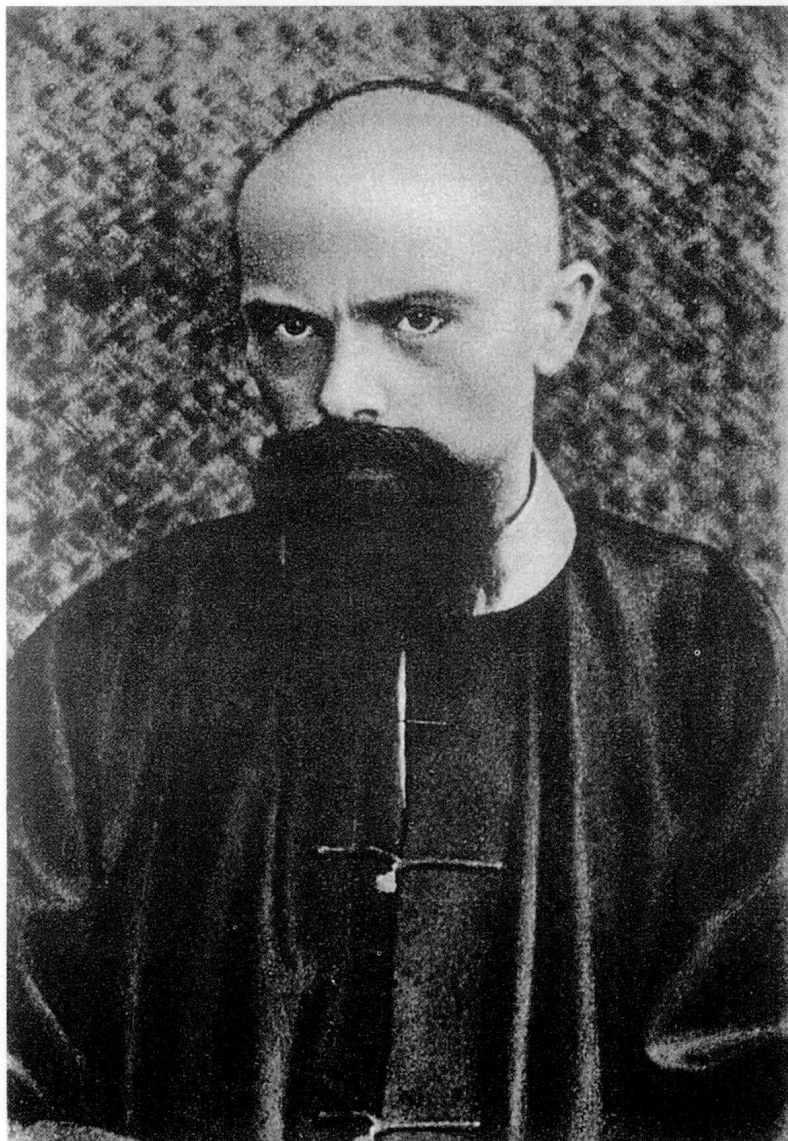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1. 24 岁时的韩宁镐



2. 年轻时的韩宁镐，前剃头，后留辫子





3. 安治泰主教



4. 1904 年福若瑟神父给山东修士讲避静。前排左起第一人为福若瑟、第二人为韩宁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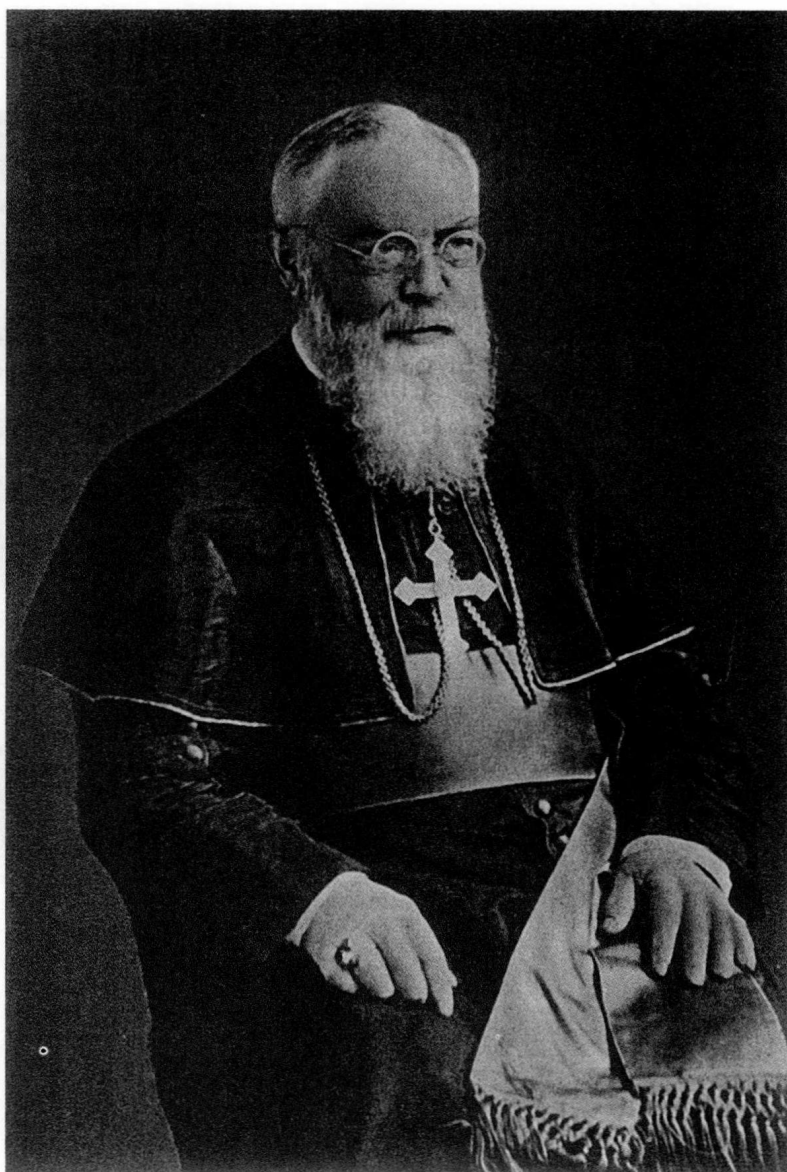




5. 1908 年与兖州官员合影，后排中间站立者为韩宁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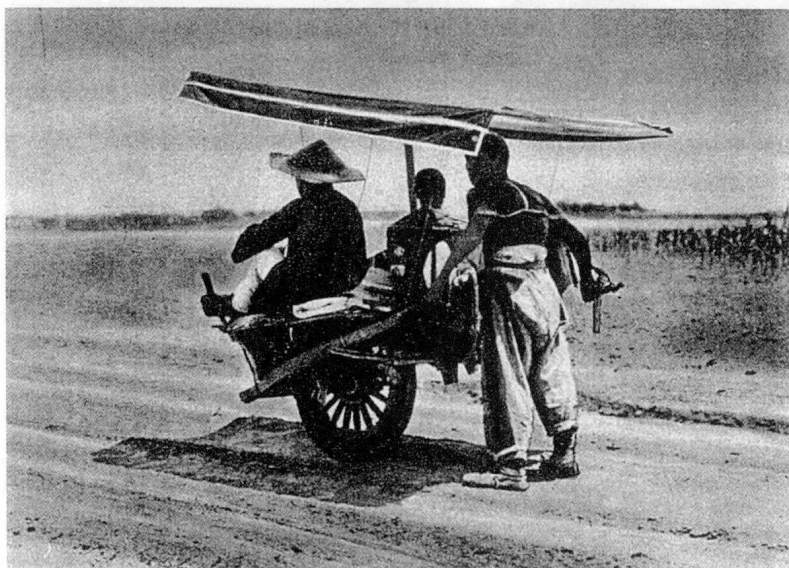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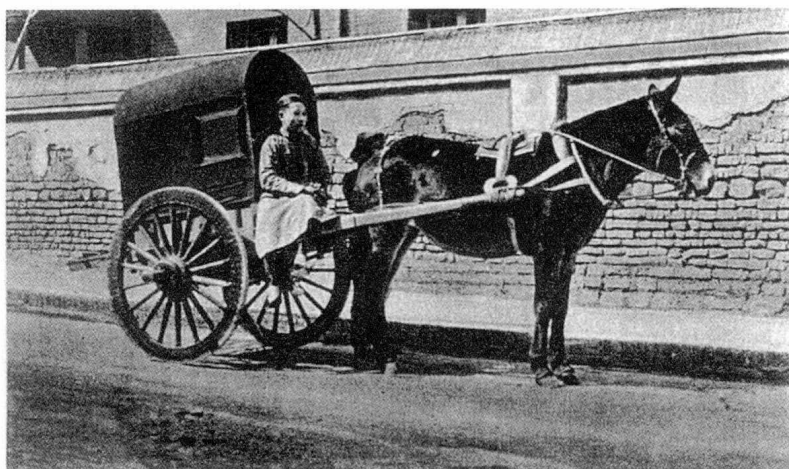
6. 60 岁时的韩宁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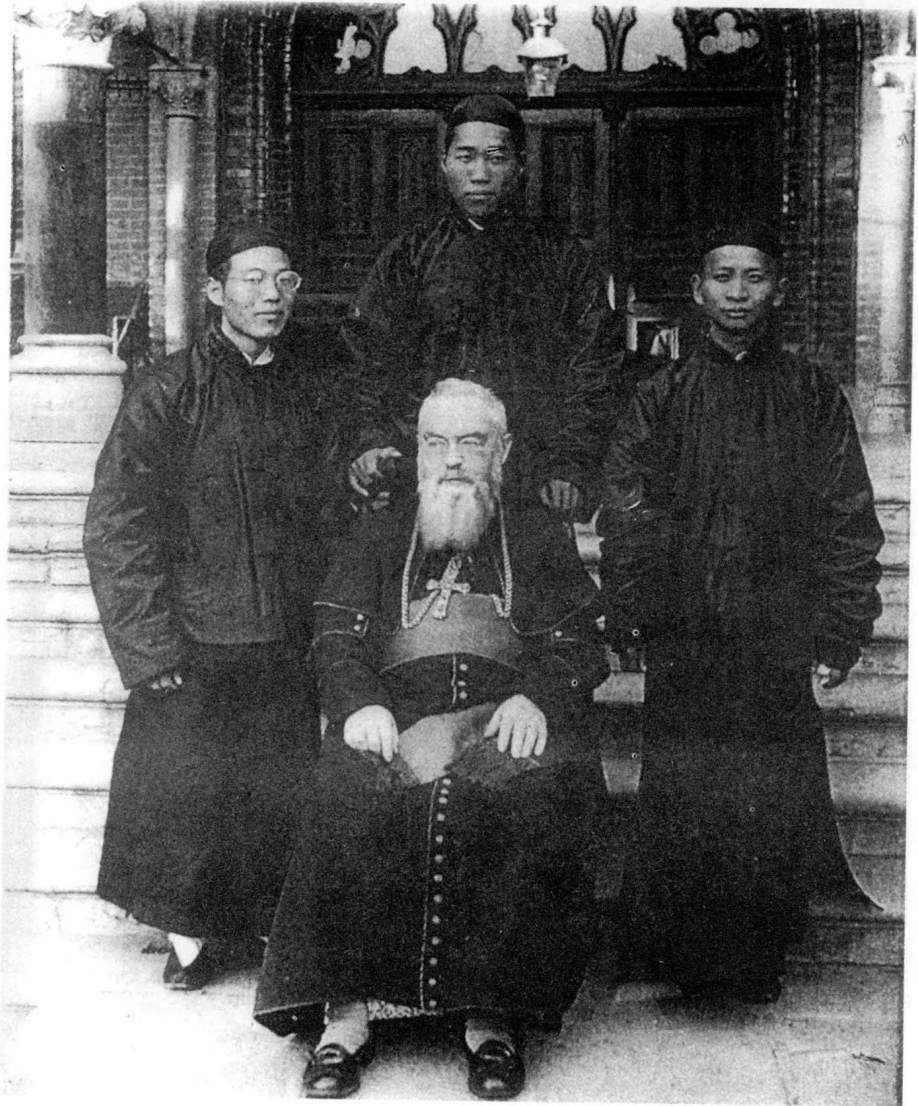


7. 传教士使用的交通工具——马车

8. 传教士使用的交通工具——独轮车



9. 1925 年韩宁镐与新司铎



## 译者序

自马可·波罗和利玛窦的时代以来，从欧洲和美国来华的旅行家和传教士很多，关于他们的著作也很多。然而，这些书大多仅仅从外在描述那些外国人在中国的行动，无法使读者深入了解这些人的性格、思想、感受、忧虑、希望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判断。因此，那些来华的西方人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仍然是一个“谜”。

客观的历史研究需要面对这些问题：19、20世纪来华并长期在中国活动的“洋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来华有什么动机？他们在国外受了怎样的教育？他们如何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他们如何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他们如何接受或拒绝中国文化？他们自己在什么程度上成为“中国人”？他们如何看待在清朝末年发生的种种转变和改革？他们在中国要完成什么事业？他们有什么目标？……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分析这些来华外国人的内心思想和感受，需要了解他们的梦想。在他们的梦想中可能有很多主观因素，甚至于带有民族优越感、宗教优越感、文化优越感等局限性，但也许也包含着文化交流精神、奉献精神和平等博爱的精神。

由于各种沟通障碍的存在和具体的历史条件的限制，19世纪末的清朝官员和人民群众无法全面理解那些来华的商人、汉学家与传教士，很多时候感觉他们是侵略者或过于主动进入中国的人，只好叫他们“洋人”、“洋鬼子”或“大毛子”。当时部分中国人排斥外国人，而在帝国主义的时代，这种排外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在19世纪中叶西方人以武

力打开了中国这道封闭帝国的大门。清末时期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最盛行的时代，但中国的封闭状态在1895年后才被打破。当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国留学，回国后他们传播关于外国的新知识。晚清中国改革派和革命派人士，比如梁启超、马相伯、袁世凯、孙中山和吴雷川等人，比较欢迎外国人的到来，并试图与他们合作。他们认为中国可以利用外国的仪器、技术、医学、教育制度、哲学思想或政治制度来改进中国人的生活条件。另外，在华的外国人也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和一种文化桥梁，他们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尤其是那些在中国生活过很长时间的传教士，他们经常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有深入的了解或独到的分析。这部传记所介绍的德国传教士韩宁镐（Henninghaus）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因为他曾在山东生活了五十多年。

关于奥古斯丁·韩宁镐的传记弥补了一个空白，因为它详细描述了一个来华的西方人的内心世界和他的“梦想”。这部传记参考了很多第一手资料，即年轻的韩宁镐写给父母的信、老年的韩宁镐写的回忆等，这样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到19世纪末从欧洲来华的传教士的心灵和精神状态。借此，我们能更全面地理解他们在中国的行动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态度。阅读这部传记的人会深入到年轻的韩宁镐的心理发展过程，了解到年轻的传教士的朝气、期望、失败与成就，还有中年人的忧虑和老主教的感叹。这是一部很特殊的“心灵史”。

原著的作者是赫尔曼·费希尔（Hermann Fischer），此书1940年在德国出版，书名为《奥古斯丁·韩宁镐：传教士和主教53年》（*Augustin Henninghaus, 53 Jahre Missionar und Missionsbischof*），书中还有数张照片。作者描述了这个德国传教士的家庭和童年时期、学校教育、来华的过程、在山东的早期工作、中年韩宁镐的成就、老年的情况以及别人对他



的评价。书中的文献多半来自于韩宁镐亲手写的书信、报告或德文著作。因此，这部传记提供了很多资料，让我们得以了解这位传教士的心灵、动机、希望、担忧和恐惧。当然，这些文献包含很多主观因素，也表现了19世纪西方人在思想上的局限性。韩宁镐关于中国文化和当时社会的一些评价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但部分看法很有洞察力，眼光敏锐。他毕竟不是一个“外行人”，而是在中国农村生活了很多年，亲眼目睹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许多改革和社会变化。韩宁镐从一个改革者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他经常谈论中国“外教人的旧文化”（Heidentum），并认为需要在很多方面“超越”或“战胜”这种“旧文化”。孙中山和那些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学者当时可能怀着类似的思想，他们可能会赞成韩宁镐的部分说法，但今天的人们则可能感觉到不舒服，因为我们觉得外国人不应该评估或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另外，韩宁镐也并没有感觉到，德国人1897年占领胶州湾是一种不正当的侵略行为，他没有谴责德国政府的行动，他和当时大多数西方人一样接受了殖民主义的基本原则：海外的殖民地对双方都有好处。这也说明当时传教士的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们认为，英国人在香港有港口，德国人在青岛有港口，这是无可厚非的，甚至是天经地义的，因为这些会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在另一方面，21世纪的人也许很难理解当时的外国传教士的心态和在中国的种种体验，尤其是中国内地村民对外国人的态度，比如，韩宁镐觉得农村人非常欢迎他：

我去了欧洲很多地方，一年多后再次来到我的传教区山东。德国诗人说：“虽然外国很漂亮，但它总不会变成自己的家乡。”我在这里把这个意思倒过来说：“虽然欧洲很漂亮，但它总不会变成

我的家乡。”的确，虽然我也很珍视在欧洲的祖国和那里的文化水平，但最后还是要说，我们的生命属于中国，我们的工作就在这块土地扎下了根，我的家乡就在这里。虽然中国的外教人一直说我们是“洋鬼子”并看不起我们，我们还是会感觉到，这里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的中国基督徒感觉到，我们之间有深厚的情意。他们不再视传教士为外国人，因为他成为他们的精神导师。他们以孩子般的喜乐和尊敬欢迎传教士来到他们中间。无论这些中国人是否很穷、有没有接受过教育、有没有文化，无论他们是否穿着破旧的衣服或住在可怜的土屋中，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他们是我们所关爱的，我们的生命属于他们。

这是47岁的韩宁镐说的话，当时他已经在山东生活了20多年。

奥古斯丁·韩宁镐是一位德国传教士，是西方人，但在山东的漫长岁月使他一步步变成一个中国化的人，他学习汉语、汉字（他曾编写过一部《德汉词典》），学习山东文人的礼节，学习品尝农村的食物，学习坐独轮车和骑马，学习穿中国式的衣服，还学习如何对付农村的强盗。在他的书信中，他多次赞美中国农村的生活、人民的俭朴和勤劳、中国信徒的虔诚和热忱。这一切都反映了他的切身体验、信仰和理想。他一生接触了无数的中国人，包括清朝末年的高级官员和农村的贫民。他来中国的目的不是传播德国文化或德语，也不是让中国的农村走向西方式的“现代化”，而是传播基督信仰。然而，他也多次反省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新文化的传入和传教士在这方面应该起的作用。他敏锐地观察到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的种种社会变化。在那个时代，西方走向中国，而中国同时也走向西方。对传教士和中国的基督徒来说，信仰成为一座超越东西方的桥梁，

在共同的信仰内他们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朋友”和“同事”。

从21世纪的角度来看，不同文明之间的相遇和不同宗教之间的交流都是以“平等对话”和“平等交流”的模式进行的，但对19、20世纪之交的西方人来说，这种“平等对话”的模式并不存在。从韩宁镐的信中可以了解到，他那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外教的旧文化”，在他看来这是“黑暗”和“不文明”的代名词。虽然如此，韩宁镐认为儒家传统也包含一些宝贵的道德价值，所以他也曾主动到曲阜去拜访孔子的后裔孔令贻（参见本书的附录）。

传教士们认为他们的使命是拯救尽可能多的中国灵魂，使他们远离迷信和无知。那些传教士不安于现状，他们是教育者、改革者、组织者、推动者，而为了协助基督信仰在中国的传播，他们认为一切办法都是好的，甚至也支持西方列强施加给清廷的政治压力。1900年的政治转变也使山东的官员在态度上对传教士有很大的转变，所以教会的发展与当时的帝国主义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些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就像孙中山和梁启超跟外国势力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那些改革者的最终目标是振兴中华。而当时的外国传教士，包括韩宁镐在内，也想按照自己的梦想建立中国社会。他们认为传播信仰会帮助中国，而为达到这个目标，他们试图利用科学知识、现代技术、文化修养以及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等各种方式。比如，安治泰主教（Anzer）曾要求清廷调走那位仇视教会的山东巡抚毓贤。今天看来，这是天主教当时利用帝国主义势力给清廷施加政治压力，是教会不正当地干涉政治。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安主教当时仅仅是在利用他的影响力来保护在山东的德国传教士。他很“成功”，因为清廷将毓贤调任山西，将袁世凯派到山东，所以在1900年的山东没有一个德国人被杀，但毓贤在太原积极逮捕和处死他认为是可恶侵略者的传教士。

我翻译这部传记的目的不是谴责外国传教士的帝国主义思想或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合作，也不是批评那些排外的清朝官员的封闭思想和愚昧。我的目的是提供更多历史资料，以进一步澄清当时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我想我们没有资格提出很多批评，因为如果我们生活在19世纪的德国，我们也许会有安治泰那样的思想；而如果我们出生在19世纪的中国，我们也许会有毓贤（或袁世凯）那样的态度。翻译这部传记是为了让今天的中国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当时外国传教士的心态和思想，他们的信仰和道德，他们的“中国梦”。

韩宁镐的传记只是一个人的生活经验，但德国的传教修会“圣言会”在清末和民国时代前后派遣了五百多名德国人来华传教，部分人在这本书中也被提到。为了提供更客观的历史资料，我在附录中罗列了一些人的小传，这也许会对研究山东近代史有一定的价值。

希望中国读者通过这部传记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西方传教士来华的初衷、他们在华的经历、他们的贡献以及他们思想的局限性。

雷立柏

2013年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林园



# 目 录

译者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准备时期	
第一节 父母之家	5
第二节 上学时期	16
第三节 传教的召唤	26
第二章 传教士韩宁镐	
第一节 到中国	45
第二节 传教学徒时期	63
第三节 巡行传教士	80
第四节 担任管理工作	94
第五节 恩宠的日子	108
第六节 回到传教前线	117
第七节 在青岛	138

### 第三章 韩宁镐主教

第一节 主教职杖和主教帽子	161
第二节 托给他的葡萄园	180
第三节 对同工的照顾	194
第四节 牧灵者	217
第五节 慈善精神	241
第六节 创办学校	258
第七节 印刷事业、撰写书籍、科学研究	275
第八节 返欧之旅	287
第九节 喜乐的时日	305
第十节 苦路	316

### 第四章 到达朝圣的目的地

第一节 他的人格	339
第二节 在上主内获得成全	370
第三节 最后的思考	380
附录一：韩宁镐主教在兖州大堂祝圣的山东司铎	384
附录二：韩宁镐主教的著作	390
附录三：韩宁镐与孔子传人的相遇	395

# 前 言

奥古斯丁·韩宁镐

担任传教区的主教32年

在海外当传教士53年

做司铎54年

享年77岁

纵观奥古斯丁·韩宁镐一生的旅程，无一不传奇，这或许是由于在他的生活中出现过很多困境和挑战吧。

在中国传教期间，他积累了宝贵而丰富的经验。其间，中国这一伟大国度被迫放弃了其封闭的状态，改变几千年的政治和生活模式，并在持续不断的内乱、革命和各种严重的震荡中寻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然而，比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更有意义的是这4亿人的精神过渡。

奥古斯丁·韩宁镐经历并积极参与了这一“狂飙时期”。他很早就意识到，这个伟大民族的转变时期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也意识到，这个新时期也会给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带来一些新的工作和任务。韩宁镐早就察觉到这个责任，同时也明确表达过这个观点。

从韩宁镐手握主教权杖开始，出于职责，以及在内心里，他都深深感到他负有这种责任。在其任主教的32年间，他始终以那种强大而充沛的精力和毫无保留的投入精神，面对着中国转变时期的各种思想潮流和一个崇

高的目标而耕耘：他与其他的天主教传教士一起，想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基督信仰——他们认为这个信仰在种种动荡中将会成为一座神圣的灯塔。

在这些努力之下，传教的工作也有所收获。在这个时期中，天主教的传教工作确实获得了迅速的进展，如同天上的酵母深深地渗入到中国民众之中。

这本书旨在讲述韩宁镐这位传教士主教的生活和工作。不过，主要目的还不在于此。

比作品更重要的是作品的创造者。我们应该发现韩宁镐这个人，发现这位司铎、修会会士和主教。他在他生活的“坎坷体育场”中面对一切困境；他要争取真正的心灵文化（*herzenskultur*）和真正的灵性修养（*seelenadel*）；他是一个基督徒，但同时也是擅于安排生活的人。我们在此将要看到的是：他通过生活中的黑暗与死亡而达到了基督徒完满的白日与光明。此一传记也意在表达：我们人所能思考的最佳对象仍然是一位具有高尚品德的人。

这部传记的资料来源是：韩宁镐给圣言会总部写的许多信件，韩宁镐给安治泰主教写的信，给福若瑟（P. Joseph Freinademetz）会长写的信，给个别传教士和他亲友们写的信；还有他的“年度报告”——三十多年里他向传教事业的恩人写过这些“年度报告”；他写的关于福若瑟的书《圣言会福若瑟神父》——其中包含丰富的思想；他在各种杂志和报纸中发表的小文章以及各种“回忆”——这些是他的一些传教士和传教修女在他去世后书写整理的。总而言之，借着这些资料作者有幸可以让英雄的传主自己发言。本书文字多半是韩宁镐自己的原话。

我在此由衷地感谢那些送给我“回忆”或赠与我韩宁镐书信的人们。

赫尔曼·费希尔



## 第一章 准备时期



## 第一节 父母之家

“正如一嘟噜葡萄反映出土壤和葡萄树的特征和质量，每一个人的故乡和家庭背景也必然会陶冶他的性格。一个人离不开他的根基，其成长亦不能脱离根基的滋养。为此，我们首先应了解这个人的生活背景，才能更多地理解他的人格品德。任何一个人的传记皆该由家庭背景而开始。一个生活在基督徒家庭中的人是幸福的，上天会赐予他很大的恩惠：在年少的时候，他受到慈母和严父的呵护，同时也备受宗教和信仰生活的辅助熏陶，他的成长得到了更多的滋润和温暖。”

韩宁镐用这几句话来作为他的《圣言会福若瑟神父》<sup>i</sup>一书的开头，来描写那位在华传教的田园内最有贡献、最忠贞的同工——福若瑟神父。<sup>ii</sup>韩宁镐这样说也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因为对他本人来说也完全是这样。上主给予他善良的父母，使他在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家庭、一个活跃的天主教的堂区以及一个具有基督精神的学校里长大。因此，这个年轻人拥有很好的“土壤”来发挥他的精神生命。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环境，这样也有助

---

i 译者注：《圣言会福若瑟神父》（*P. Joseph Freinademetz SVD, Sein Leben und Wirken*），共635页，1926年兖州第2版，第1版出版于1920年。汉译本见路遥主编《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德译文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12页。

ii 译者注：福若瑟，1852年生于Südtirol（奥匈帝国，其出生地从1918年后归于意大利），1875年被祝圣为司铎，1878年去斯泰尔并加入圣言会，1879年被派往传教，先到香港，1882年4月到山东坡里庄（阳谷地区），曾在王庄、汶上、菏泽、单县、曹县、鱼台、蒙阴、郯城、济宁、青岛、兖州等地传教和开教，1901年任圣言会中华省会长，1908年1月28日因患伤寒症而死于戴家庄（济宁北郊）。他爱天主，爱人，被视为模范传教士，2003年被宣告为“圣人”。

于我们理解那位传教士刚强的性格以及那坚定的信仰。

门登 (Menden) —— 韩宁镐的出生地 —— 位于德国藻厄兰 (Sauerland, 即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的西北部, 在肥沃的赫内流域 (Hoennetal), 围绕在它周围的森林更是非人工能雕琢出的自然奇景。此外, 门登的历史亦是很悠久, 其中亦不乏极其惨烈的历史悲剧: “三十年战争”<sup>i</sup> 带来了苦难; 由于疯狂的“巫婆热”,<sup>ii</sup> “在这里有一百多个无辜的人受害; “三十年战争”后有一千名居民因鼠疫而死; 可怕的火灾三次毁灭了这个城市; 法国路易十四世曾企图占领德国某些地区, 与法国的战争也带来了痛苦和不安。但是, 坚强的门登居民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建立起了城市和城市的塔楼, 并在每次破坏后迅速地恢复了贸易和工业。<sup>iii</sup>

在奥古斯丁的孩提时期, 门登是一个安静的乡镇, 未受鲁尔地区 (Ruhr) 刚刚起步的工业化的影响。这个工业化过程后来也使得许多外地人在门登定居。

当时, 门登大多数人都是在当地居住已久的市民, 也有着良好的经济基础。他们几乎都是天主教徒, 且一直保持着纯正的宗教信仰。从此堂区内走出过许多司铎和修道圣召, 这也是此间宗教生活异常丰富的一种证据。当韩宁镐主教于1930年最后一次回故乡时, 他与二十位司铎合影, 而

---

i 译者注: 三十年战争, 即发生于1618—1648年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国际战争。

ii 译者注: 在1450年到1700年的欧洲, 有“认为女人能成为巫婆并陷害他人”的迷信, 即所谓的“巫婆热” (Hexenwahn或witch craze)。许多地区的人都染上这种集体的疯狂, 他们将所发生的不幸事件都归罪于“巫婆”的扰乱并想“揭露”、惩罚甚至处死“巫婆”们。学者认为, 从柏拉图哲学到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转变带来了“巫婆热”的可能性, 因为亚里士多德否认自然的、无关好坏的神秘力量。最后被处死的“巫婆”在英国是于1684年, 在美国于1692年, 在苏格兰于1727年, 在法国于1745年以及在德国于1775年。“巫婆热”是“替死鬼”或“替罪羊”的社会现象, 而这个现象在现代社会的反犹太人主义或压迫少数派人士的运动中依然在发生。

iii *Beitraege zur Heimatkunde des Hoennetals*, Menden 1935, Nr. 1, p. 13—15.

这二十个司铎都是门登人。门登的天主教徒每年在圣周五举行一次纪念耶稣苦难的游行活动。周围地区很多人也会参与此圣周五的苦难游行，当时这个游行的传统已经有两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

韩宁镐的父母来自韩宁镐 (Henninghaus) 和施拉梅 (Schramme) 两个家族，而这两个家族两百多年前就已经定居在门登。根据克兰茨博士 (Dr. Gisbert Kranz) 编写的关于门登历史的著作，施拉梅家族于17世纪时就居住在门登。韩宁镐家族在1759年第一次出现在城市的税务名单上，但有一位“韩宁镐局长”早在1583年时就曾在威斯特法伦 (Westfalen) 政府任职。

有一次家人问韩宁镐关于前辈的事，他写道：“我们是传统的威斯特法伦人。在克兰茨博士的书中我发现，我们的祖先早就属于门登的中产阶级。现在，韩宁镐这个名字几乎失踪了。我在门登地方志中也没有找到另一个姓韩宁镐的人。不过，最近我听安东涅蒂蒙席 (Msgr. Antonietti) ——他是北京宗座代表的秘书——说，在他的故乡乌迪内 (Udine, Friaul) 有一个韩宁镐家庭，他们创办了一家啤酒厂。这个家庭必定是很久以前搬到意大利去的。在我们的祖先当中好像没有在社会中有影响的人，但我希望，他们的名字都记载在生命书<sup>i</sup>上。帕德博恩 (Paderborn) 的主教卡斯帕·德若贝 (Kaspar Drobe) 是我母亲的表哥。我母亲的一个弟弟在淘金热时期<sup>ii</sup>去了美国，但他后来失踪了。有一次，我以为在内布拉斯加州 (Nebraska, 美国) 找到了这个家庭，但当我进一步

---

i 译者注：“生命书”或译“生命册”，是上主“记录”人的书，见《圣经·默示录》Rev 3: 5; 17: 18; 20: 12; 20: 15。意思是说，韩宁镐主教希望，他的祖先都在上主那里，都获得了永生。

ii 译者注：19世纪有几次“淘金热”，许多欧洲人去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希望能发现金矿。



追问时，却没有结果。

“这都是些陈旧的、模糊不清的回忆。人越老，对过去的一切事就越有兴趣。最近，遗传学发现了家族和遗传的重要性。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好几年我都在思考父母和孩子的神秘关系。我多次想，下一辈与上一辈的相似性真是非常奇妙。实际上，这个规律统治着整个生命领域。如果一个人更深入地认识自己，他就能发现自己身上带有父母的特性。因此，我们必须感谢上主，他给予我们好的、善良的父母。”<sup>i</sup>

是的，奥古斯丁·韩宁镛的一切性格特征都证明，他来自古老的威斯特法伦家族。红土地区和藻厄兰人的特性也呈现在他身上。正如《十三椴树》（*Dreizehnlinden*）的作者向威斯特法伦人这样描述撒克逊人：“他们很坚强，也爱学习，他们强硬而诚恳——正如你们这样的人；他们也似你们山中的铁，你们森林中的橡树。”

韩宁镛继承了这个民族的优点，但同时也继承了他们那种不顾及别人感受的耿直以及时常在不经意中所流露出的不易于交往的严肃个性。他性格中的优点非常多，比如，思想的纯洁和坚定不移的心态，还有那似白云出岫般的真诚、忠实、可靠、勤奋、责任感、朴素和对传统的尊敬——最重要的是具有热切的天主教信仰和来自内在源泉的精神生活。

他们堂区的本堂神父有一次指着韩宁镛家族的人说：“属于这个家族的人甚至在骨子里都体现出天主教的精神。”

这是韩宁镛主教从他的祖先，特别是从他的父母那儿所获得的遗产。如上所述，他为此感谢上主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他的父亲古斯塔夫·韩宁镛（Gustav Henninghaus）生于1819年。他是一名铁匠和钳工，28岁时

---

i 见1933年9月24日的信。

成家并在伊塞隆（Iserlohn）附近工作。他曾去门登，在那里认识了玛利亚·卡塔利纳·施拉梅（Maria Katharina Schramme），即菲利普·施拉梅（Philipp Schramme）的女儿。这是一个不寻常的选择。

施拉梅的家庭很不幸。在结婚后两年，其父母相继去世，十个孩子——大部分年龄仍幼小——在父母的坟墓前流泪。玛利亚·卡塔利纳是老大，她要为九个弟弟妹妹充当父母，必须管理家庭，照顾家产，同时又要管理家族企业。可想而知她要肩负的责任是多么重大！

对古斯塔夫·韩宁镐来说，与这个家族建立婚姻关系并接纳如此大的家庭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这几乎等于娶一个拥有九个孩子的寡妇为妻。当然，古斯塔夫可以继承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这一点也许会有些吸引力。但他也意识到了自己将要承担的责任是多么的重大。他的儿子奥古斯丁曾回忆：“我还知道，当父亲去拜访他的新娘卡塔利纳时，她正在念《玫瑰经》。从89岁的老梅尔曼（Mellmann）女士——她是我们母亲的一位表姐——对于此次拜访所提供的信息可以得知其父母相识的细节，那并不算是太浪漫的相遇。”<sup>i</sup>

这两个年轻人于1847年建立起了相守一生的婚姻契约。上主也祝福了他们，所以他们能很勇敢地面对种种困难，除了教育妻子的九个弟弟妹妹，还养活了四个亲生的孩子。新创立的钳工厂发展良好。韩宁镐师傅很精通自己的专业，他有时候雇用十几个工人。钳工厂的特产是车轮和马具，他将这些马具卖给更大的公司。他们乐于工作，在锤子和锉子的响声中，还附和工人的口哨声和孩子的歌声。

韩宁镐的妈妈每天要照顾二十多个大人和孩子，使他们都能吃饱饭。

---

i 见1933年9月24日的信。所提到的梅尔曼女士后来活到99岁。

他们还陆续添置家产并购置了一些田地。韩宁镐的父亲特别喜爱自己在赫内河岸开拓的田园。每逢休假的时候，韩宁镐的父亲总爱去园子里劳作，他满怀爱意地去浇灌、培植园子里的花草树木。每当孩子们来到园子里时，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在这里，他们不仅能看到美丽的花花草草，还能吃到爸爸亲手种植的甘甜的水果。

家庭中的宗教气氛很浓厚，夫妻两人是孩子们最好的榜样。笔者曾请71岁的韩宁镐主教写他少年时代的回忆。在回忆的开头有这样的话：“上主给我所安排得多么好，我总不能表达足够的感谢。他赐予我优秀的父母。我父亲的信仰很坚定，他非常虔诚、谨慎、公平，并乐于工作，直到晚年仍坚持劳动，他对上主的神圣事业始终具有很大的热忱。在德国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sup>1</sup>时期，他以真正的热情站在了主教和司铎们的一边。他曾与一些天主教徒一起去探访将面临审判的康拉德·马丁（Konrad Martin）主教。我父亲经常积极参加各种选举活动。那时，我必须帮忙散发选票。他自始至终都很乐意参加教会的各项活动，比如担负传递奉献袋的任务，一做就是几十年之久。虽然这项任务并不起眼，但他以此为荣。在教会的游行礼仪中，他与我的卡斯帕·格拉斯（Kaspar Grahs）一起抬着华盖——格拉斯有两个兄弟，其中一位是司铎，另一个是雕塑家。

“父亲每天都会去参加弥撒。在主日（星期日）和节日的时候，他会去参加所有的弥撒和祈祷聚会。在此之外，我在家庭中还必须向大家朗读《格费尼》（*Goffine*），这是一本解经的书。父亲多次很兴奋地谈论神父

---

i 译者注：“文化斗争”指德国1872—1887年间政府和天主教会在学校管理权和教会任命权等方面的斗争。

所讲的道理。在全家的晚祷中，所有人都必须参与。父亲跪在前面，并领导我们共同祈祷；我们则在后面跟着他应答。他的举止显示出对上主虔诚的敬畏。他整个生活都是如此真实和诚恳！父亲虽然俭朴，但并不吝啬。他从不坐第四等级的火车座位（在那时候火车还有四等座），而坐第三等座位。他认为，这符合他的阶层和地位。他的服装很得体，特别是在主日的时候。他从不拖延债务。邻居们都很尊敬他，但他没有很多朋友，因为他选择的朋友只是几个与自己比较相似的人，而这些大多是亲戚。

“父亲是一个模范天主教徒！他真正在内心爱慕圣教会，而当他谈论教会和信仰的问题时，有时候越谈越投入。

“母亲则是一位谨慎的家庭主妇，也有着坚定的信仰，但她的信仰不像父亲那样表露在外。我的姨母索菲（Sophie）——我母亲最小的妹妹——称我母亲为‘圣女’，因为母亲为她的弟弟和妹妹们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

“母亲虽然非常俭朴，但又很慷慨和慈悲。在圣诞节的时候，她会派我去，向穷人们送一些礼物。在别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慈善活动。住在附近乡镇的一位老先生直到今天都很感谢我母亲，因为在他小时候境遇很不好，母亲会经常看顾他，会经常请他来我们家，并让他睡我的床（如果我在外面）。他结婚时，母亲帮他准备了婚宴。有一次我去欧洲时，这位老先生出于感恩之心将2000马克捐给了我的修道院。对这些平素俭朴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壮举！

“然而，母亲身体羸弱，患有多种疾病，比如慢性胃病。在我去中国的头两年里，我很少写信给父母，这让我非常懊悔。母亲也许也因此感到

---

i 译者注：“第四等座位”是当时最高级的座位，第一等则是最低级的座位。

难过。两年后，她就离世了，因此我也再没有机会弥补我的遗憾了。

“上主让我在这样俭朴、信仰深厚的家庭长大，我何以为报，何以感谢？”

这是韩宁镐主教关于他父母的叙述。

上主恩赐这对夫妻四个孩子。他们首先孕育了两个女孩：伊丽莎白（Elisabeth，生于1848年9月22日）与索菲（Sophie，生于1852年7月26日）；接着又有两个男孩儿诞生：弗朗茨（Franz，生于1856年4月1日）与奥古斯丁（Augustin，生于1862年9月11日）。在他的《回忆录》中，韩宁镐主教描述了他的家庭教育：“我们接受了一个严格的，但仍然充满爱的教育。我们没有被娇惯，没有被宠坏，教育很简单，而我们的食品、饮料、衣服都很朴素。父母谨慎监督我们的游戏，不让我们随便出去玩。他们也不允许任何不必要的开支。当我们不听话时，也会挨打，大多是妈妈打的；如果犯了大错，爸爸也会打我们。孩子们很早就被派去参与家里和农田的种种劳动。在上学的时候，我还必须参与一种使人变得谦逊的工作，比如我必须每天给波格尔（Poggel）老师送牛奶，也必须去肉铺找一些不要了的边角料给我们养的猪。这类工作抑制了我的骄傲，使我变得更加谦逊。”

最大的女儿伊丽莎白与面包匠弗朗茨·巴特（Franz Bathe）结了婚，他们生了十个孩子，其中一个儿子若瑟（Joseph）选择了教会中的工作，当了一名司铎，毕业后成了教师。另一个儿子罗伯特（Robert）当了小学老师。一个女儿毕业后通过了高等教育教师的考试。这大概是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庭。韩宁镐也多次提醒他的姐姐，说他们的幸福来自上天。他这样写信给她和她的丈夫：“仁慈的上主格外降福你们，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你们应当每天由衷地感谢他。如果一个人像我一样到处看到教



外人那种分裂、不和睦的家庭生活，他便会懂得珍惜救世主带给人类如此宝贵的精神财富，即基督教家庭的幸福。今天我刚刚有机会比较深入地了解了—一个典型的教外人的家庭，而我所发现的事实真让我感到恐惧。再加上，这里是中国，而中国的家庭是所有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基础。”<sup>i</sup>

韩宁镐神父给这个姐姐写的信是最多的。她也小心地保存着这些信，当我写这个传记时，她送给我121封韩宁镐主教写的信。

第二个姐姐索菲与门登的鞋匠奥古斯特·舒尔特（August Schulte）结了婚。但不幸的是，姐姐刚刚30岁时就去世了（1882年），三个孩子失去了母爱。对她的丈夫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这时，韩宁镐的老父亲照顾了这一家人。然而，天主助佑奥古斯特，一年后他遇到了一个能干的妇女，当了孩子们的继母。在华传教的韩宁镐也感谢她，因为她悉心照顾姐姐留下来的孩子们。

弗朗茨·韩宁镐是家中的老三，他成了钳工并继承了父亲的企业。不幸的是，一场严重的疾病于1891年夺去了他年仅35岁的生命。更不幸的是，他年轻的妻子和三个婴儿失去了一家之主，企业失去了掌门人。对于72岁的老父亲来说，这是最大的痛苦——他的妻子三年前也已去世。他必须请别人来接管自己的钳厂。

现在我们就谈谈奥古斯丁·韩宁镐——他是最小的孩子，是小弟弟。我们将详细叙述他的人生经历。这本小书将讲述他的故事，他是上主拣选的人。也许当他还没有准备好时，他已经历了他的“大马士革时刻”。<sup>ii</sup>灵魂的拯救者们将他从世俗的计划中提拔出来，改变了他的意向并

---

i 见1893年11月21日写的信。

ii 译者注：大马士革（叙利亚的首都）是圣保禄皈依基督教的地方（见《圣经·宗徒大事录》第9章）。“大马士革时刻”意味着皈依上主的时刻。

召唤他参与神圣的传教工作。基督的恩典也在他身上再现了传统的伟大奇迹，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使徒。他在传教阵线上工作了50年，争取天国的扩张和不死灵魂的拯救。在他的指导下，好几万人离开了黑暗与死亡，走向精神生命、基督信仰和教会团体。

韩宁镐的工作并没有因为他的逝世而停止。在他的精神指引下，许多传教士延续着他未完成的事业。他服务于中国30年，培养了许多中国司铎。这些后续者们沿着韩宁镐所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行着。

奥古斯丁·韩宁镐在1862年9月11日晚上8点出生时，显得非常弱小。家人担心他不会活到第二天早上。所以，虽然已经很晚了，家人们还是把他带到教堂为他举行了洗礼。后来，韩宁镐告诉我们：“我小的时候只是一个卑微的小男孩，胆小怕事，但如果有人挑衅我，我会生气，也会做坏事。”<sup>i</sup>

他的头发是火红的——这红色的头发<sup>ii</sup>俨然成为他的十字架，直到他的头发变成灰色。很多孩子因他的红头发而逗他、嘲笑他。他很是生气，又觉得自己是一个可笑、卑贱的人。

在他家附近有一个老铁匠铺，这是蒂格斯（Tigges）师傅的作坊，对小奥古斯丁来说，这是个具有吸引力的地方。他常去那里，观望火花散落四方。他有时候会靠近铁匠的砧，阻碍了师傅的工作，师傅当然会不客气地赶走他，大声叫：“小狐狸，走开！”啊呀，那个人总是叫他“小狐狸”！<sup>iii</sup>尽管这样，他们俩还是好朋友。当奥古斯丁·韩宁镐22年后第一次

---

i 见《回忆录》。这是韩宁镐主教于1933年写的关于自己和家人的回忆。

ii 译者注：在西方“红色的头发”是很少见的。

iii 译者注：狐狸的毛是红色的，所以小奥古斯丁被称为“小狐狸”。在西方传统中，狐狸是“狡猾”的化身。

从中国回家时，他笑着以一句“小狐狸，走开”去迎接老蒂格斯师傅。

小韩宁镐自幼体质较为羸弱，又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与上面的哥哥相差六岁，所以父母对他的要求不那么严格。在这么美好的家庭里成长，他的孩提时期应该非常快乐，父母、姐姐和哥哥也许有点娇惯他，使得有些坏习惯如同“杂草”，不知不觉在小韩宁镐身上生根、发芽。因此，在韩宁镐的学生时代，他不得不与这些“杂草”作斗争。

## 第二节 上学时期

韩宁镐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记得刚踏入学校的时候，面对种种困难的考验，虽然当时的我还很小，不是太懂事，但随着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很快就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在学习方面没有问题，很快就能懂得老师所讲的道理，从来都是最好的学生之一。但是，当时的我在内心和宗教上还很封闭。还记得，有一次在教堂里念领圣体的经文——这还是在首次领圣体之前，那时，我就清楚地领会到了经文里所包含的深奥思想，并以认真严肃的姿态做了我人生中第一次告解圣事和内心的省察。

“小学时代我所经历的三位导师，有的比较宽容，也有的较为严格，但他们无疑都是治学严谨的人。其中，还有一位老师教会了我弹钢琴。有时他生病不能来上课，就由我代替他给别的孩子教授钢琴课。但是，有一次我意外地看到他图书室里有很多我比较感兴趣的书，于是我经常偷偷地跑去看他图书室中的书，而没有去代课。所以后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上他的钢琴课——因为不好意思。

“我的本堂司铎勒佩尔神父（Roepel，1904年去世）是一名杰出、明智且非常虔诚的司铎，他也是老戈克尔（Gockel）主教的朋友，他在牧灵工作方面堪称典范。”

该社区的教会生活很是活跃。学校的老师们所教授的宗教课程也备受人们重视。在这里，教会、学校和家庭，俨然成为一个完美的结合，共同表达着信仰的完整价值。正是这种完美的结合在成长中的孩子们心中建立

起了坚定的基督信仰基础。

在门登地区，人们也通过“基督苦难日”的游行礼，表达对这位受苦基督的爱慕。这个典礼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游行活动，还有着对背着十字架的基督的崇高敬礼。礼仪中，一名男子身着犹太式的外衣，头戴荆冠，背一个又重又大的木架走上罗登山（Rodenberg）。成百上千个信徒陪同着他，他们祈祷着或唱着一些传统的苦难歌。然后，这个人又背着十字架从山上走下来，这时会有另外一个人接过沉重的十字架，再次走上同样的路，而一批新的人也会陪伴着他上去。这样，门登的十字架游行礼从圣周四晚上七点一直持续到圣周六早上六点，每一个小时里都会有人背着十字架上山又下山。每年都有超过一百个男人自愿背十字架上山。然而，由于人数太多，他们不得不抽签来决定谁能背此十字架。

纪念基督受难的这种特殊敬礼留给了人们很深的印象。它是一种强有力的见证，唤起了人们对被钉于十字架上的耶稣的爱，基督的信徒们也因这个礼仪，而更能习得忍耐和痛苦中的坚韧。此外，在路边的七个地点还设有圣像“基督七次跌倒”，罗登山上的小圣堂中的画像也描述着耶稣的苦路。

“背十字架”仪式在这个堂区已有两百五十多年的传统了。时至今日它依然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这也表明该堂区宗教信仰的虔诚和魅力一如往昔。韩宁镐主教曾多次强调，人们在痛苦和考验中必须有耐心和勇气。可以想见他说这些话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因他每年看到那一个又一个默默背着沉重十字架的“基督”而有感而发的。

韩宁镐在《回忆录》中继续写道：“由于我父亲的请求，我被允许比我同级的伙伴们早一年接受了圣体圣事，就是在1875年的耶稣升天瞻礼。父亲这样要求是因为‘文化斗争’越来越厉害，他大概担心司铎们可

能很快就会被禁止教授宗教课，所以安排我提前去学习准备初领圣体的课程。我本人也很愿意。意外的是，当我首次领圣体时，圣饼贴在我的上腭上，所以我不得不将一个指头插入嘴里。这当然是不得已的事，所以也不是罪，但是我仍然有点担心这是一个重大的过失。而且，在当天我还说了一句小小的不老实的话，因此，我惴惴不安、垂头丧气，心里也是相当郁闷。于是，我跪在家里的台阶上，发了一个誓言说，当我在犯下罪过时，我将会立刻寻求告解圣事。所以，那天我也同样需要去告解。在当天晚上的祈祷聚会中，我去找了本堂司铎，并和神父一起从更衣室走向告解亭。当时周围的人很多，所以这个行为无疑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这些人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以为我在领圣体时犯了罪。后来我还因一些男孩子的嘲笑而感到不舒服。这样，首次领圣体的日子对我而言竟成了不安和忧愁的一天。”

13岁的小韩宁镐进入了“实科中学”<sup>i</sup>——该校后来成为一所正式的高中。当韩宁镐向父亲提出继续上学的要求时，父亲若有所思地打量着他这个“小狐狸”并拒绝说：“你不应该让我的马克变少。”然而，这并没有成为最后的决定，因为妈妈为此向爸爸求了情，还有他小学的老师也帮着韩宁镐，说他这种弱小的身体反正不能进行正式的体力劳动。就这样，韩宁镐先生去找了实科中学的校长克斯特（Koester）<sup>ii</sup>先生——这是一位很好的司铎，也是一名优秀的教师。他们谈论的结果是，韩宁镐被允许继续上学。他当然很兴奋，因为这是一个新的人生阶段的开始。

在学校的所有教师当中，波格尔（Poggel）老师对奥古斯丁·韩宁镐

---

i 译者注：实科中学即着重教授自然科学和现代语言的学校。德国19世纪的教育制度非常重视古代语言，尤其是拉丁语。

ii 他后来在波鸿（Bochum）当修道院院长。



日后的发展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韩宁镐也一辈子感激波格尔老师。这里是他自己的回忆：

“波格尔老师是一位信仰虔诚且很有威严的人，也是一位极具幽默感的老师，对我特别友好。不久之后，他就让我跳过六年级的班并加入他的班。第二年，我又因他的安排而跳过一个班。为了使这种‘快速教育’成为可能，我在正式课程以外还在他的家里继续接受强化训练。他每天还要为他的儿子弗朗茨（Franz）和我讲一小时的古希腊文，并叫我们做练习。因此，我的钢琴学习也得以继续进行。这样，我仅仅用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整个实科中学的课程。

“毕业后，波格尔老师说，我应该与他的儿子弗朗茨继续在他的家里学习。这样我们就可以与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后来在帕德博恩当圣经学教授的亨利（Heinrich），共同参加高中毕业考试（Abitur）。

“这个想法很好，但没有得以实现。因为当时我们这两个男孩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缺乏对自我的掌控能力。因此我们并没有认真而深入地去学习荷马（Homer）、<sup>i</sup>拉丁语的古典著作，研究数学、三角学、立体几何学，等等（因为我当时一直觉得读书很容易，所以我从来不需要去努力苦读）。我们很懒惰，经常闲聊或去外面跑来跑去，就这样浪费了很多时间。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不得不说，波格尔老师对我们太好、太相信我们了。当他的儿子亨利在假期给我们上课时，我们确实认真学习了几个星期，但是他一走，我们就又变得无所谓了。当然，我们并没有去做什么坏事或不道德的事，

---

i 译者注：荷马（Homer）是最著名的古希腊诗人。他的著作是用希腊文写的，有相当的难度。韩宁镐能阅读荷马意味着他的希腊语水平很高。譬如说，《圣经·新约》的希腊文版本比荷马史诗容易多了。

但我们也没有去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也许生活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场游戏。渐渐地我也就这样，逐渐失去了奋斗精神。

“其实，在不久之后，我就意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并开始认真读书，不多时我就成了一个典型的‘读书迷’和‘书虫’。第一次让我着迷的书是一本童话故事书，是在我生病时，姑姑带给我的一部童话故事，从这一部开始我就喜欢上了阅读，并开始阅读我所能找到的任何书籍，如阿尔班·施托尔茨（Alban Stolz）的故事、圣人的传记、卡特利纳·埃梅里克（Katharina Emmerich）<sup>i</sup>的作品等，但也看了许多没有多大用处的书。就这样，家里的书渐渐地多起来。同时我也成为‘博罗毛斯协会’（Borromaeusverein）<sup>ii</sup>的成员，这个协会中所有的书籍，我都能从本地的图书室里借到。另外，我阅读一切我能找到的东西，其中也有一些不健康的。这些不健康的思想让我变得很肤浅，进而对认真的工作也就不感兴趣了。

“这几年间在波格尔老师家中我所学到的是：一种比较高级的、精神性的生活方式，还有对高雅音乐的欣赏能力以及对真正宗教家庭生活的重视。”

我们对韩宁镐关于他小学和中学时期的生活还要作一些补充。我们应该注意到，他的《回忆录》是在1933年“年度避静”（Jahresexerzitionen）的影响下写的，而他当时看到更多的是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没有强调他在那几年中所获得的益处和进步。但是，我在此仍然摘录他对自己的悲观判

---

i 译者注：阿尔班·施托尔茨（1808—1883年）和卡特利纳·埃梅里克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具有宗教信仰的作者。施托尔茨曾是德国大学教授，并写了许多具有信仰色彩的小说。

ii 博罗毛斯协会是一个1844年在德国创立的天主教协会，其目标是提高信徒的文化水平，在各地建立小型的图书室，将优秀书籍送给有需要的人。

断，因为通过如此坦白的自我剖析，能最清楚地揭示出他的性格特点。

生活在韩宁镐周围的人给他作出了比较乐观的评价。他的同学曾这样说：“奥古斯丁·韩宁镐会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因为他能和朋友们一起‘分享所有、享受所无’，并与人为善。”当别的男孩子开玩笑或捉弄别人时，他想到自己的某些原则，他从不会忘记这些原则的限制，然而，别同学却没有那么明显的自我界限。放假时，他多次去姨妈索菲的家——位于拉姆斯贝克（Ramsbeck）附近的安德里斯贝格（Andreasberg），姨妈家的几个儿子都与韩宁镐年龄相仿。他有时也会住在他大姐伊丽莎白家。韩宁镐每次一到亲戚家，首先就会去看他们家的书架或书柜，寻觅新的书籍，因为对他来说，找到一本扣人心弦的书，才是最大的享受。此外，他也非常喜爱与人交谈，与表哥们一起玩耍。他们都很欢迎他。

波格尔老师的女儿们晚年时还记得在那两年间几乎每天都去他们家的那个可爱的小男孩儿——奥古斯丁·韩宁镐，就好像他们是他们家庭中的一员似的。她们说，他的举止优雅大方，且与她们的哥哥弗朗茨友谊很深。另外，她们的父亲总是表扬韩宁镐。她们也觉得父亲决不会向一个不好的学生表示如此的兴趣和爱护——波格尔对奥古斯丁·韩宁镐格外器重。

波格尔老师对小韩宁镐这种如父亲般的照顾和无私的付出帮助这个青年度过了他最关键的时期。波格尔老师通过教学和每天的交往逐渐地显出他对韩宁镐的亲切关怀。另外，奥古斯丁·韩宁镐自己的家庭背景也为他提供了一种扎实的道德基础。只是，韩宁镐的家人和亲戚们好像并没有意识到应该花费一些精力放在他的学习和人格成长上。因为他们并没有发现，那个本来具有才华的青年在学校里并没有认真地努力学习，甚至游手好闲，懒懒散散。韩宁镐的好友弗朗茨·波格尔也是这样。好在波格尔老师却意识到这个危险，并向这两个男孩子施加适当的压力——他要求很多。

韩宁镐主教在60年后将那时期的学习称为“懒散和浪费时光”，但我们却不能对这种严格的判断信以为真。韩宁镐没有以正规的四年学制来完成“实科中学”的教育计划，而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毕业了；再加上，他每天都与波格尔老师学习古希腊语，还一周练习几次钢琴——可想而知，如果韩宁镐对自己如此的付出都称之为“轻松的、玩耍般的学习”，那么对他来说，一切学习活动都只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游戏。但是，他那两年学习的成就证明，他实际上是下了相当大的功夫。

后来的两年进修也是这样。波格尔老师早已用这个私下进修的办法成功地让大儿子亨利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他第二个儿子弗朗茨——韩宁镐的同学——也同样通过了这个考试。因此，他的教育方法肯定很成功。假使老波格尔在教学方面真的有一些严重缺陷的话，那亨利·波格尔无疑会发现并纠正它，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认真严谨的神学家，并且他每次放假时都会替他的父亲承担这两个青年的家庭教育工作。

还值得一提的是波格尔老师家的音乐。波格尔老师非常爱好音乐，并且自己也经常参加音乐演奏。他的孩子们也继承了这种爱好，经常在家里演奏。奥古斯丁·韩宁镐当然也参与了这些演奏，甚至还在其中找到了乐趣。他说，他那个时候才懂得如何去欣赏优雅的音乐。亨利·波格尔——后来任帕德博恩修道院的教授并研究新约解释学——也特别喜爱音乐。在“文化斗争”时期亨利·波格尔在英国进行研究时，在牛津（Oxford）大学结识了后来成为枢机主教的纽曼（John Henry Newman）博士，<sup>1</sup>并成为他的朋友。亨利·波格尔和纽曼一起合奏演出过，此后他们也长期保持着

---

i 译者注：纽曼（1801—1890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内部牛津运动领袖，后改奉天主教（1845年），教宗利奥十三世（Leo XIII）任其为天主教枢机主教（1879年），著有《论教会的先知职责》、《大学宣道集》等。

书信往来。

奥古斯丁·韩宁镐对这位为人严谨且认真的神学家亨利·波格尔有着发自内心的敬佩。几十年后，韩宁镐曾有一次从中国给亨利写信说：“您当时（学生时代）是刻苦学习、才华横溢的模范学生，而我们俩——弗朗茨和我——都是相当懒惰的淘气鬼。”<sup>i</sup>

在波格尔家中所体会的经验、教训和接触到的榜样对奥古斯丁·韩宁镐都起着良好的教育作用，对其人格养成更是一种成长和升华。这也许是波格尔老师对少年韩宁镐的最大贡献。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韩宁镐受到了这位在教养和信仰方面都如此崇高的人的影响，这一定深深促进了他的人格成熟以及精神的陶冶。韩宁镐自己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并承认了这一点。从那些在中国写给老师的信中，他也表达过这个意思；他一开始每年给波格尔老师写一次信，一直到1905年为止。在信中他都是用最亲切的言辞，感觉就像父子间亲切的感情交流，对韩宁镐这样有点孤僻和硬骨头气质的威斯特法伦人来说，这是非常罕见的。

他称波格尔老师为他的“最宝贵的老师和恩人”，是他如“父亲般的朋友”。他说他“孝顺地”求他的宽恕，“因为我以前辜负您的好意太多；我那时多次违背了应该追求的理想”。40岁的韩宁镐还用过这样的言辞来结束一封信：“我以最热切的孝爱拥抱您，并做您充满感恩之情的孩子。”他说，那些能推动着他去欧洲旅游的理由是“我81岁的老父亲和与您的见面”。他又写道：“我希望，在度假的日子里能收到您的来信。您不知道我因此会感到多么的喜乐！”他还说：“我前一辈的人已经相继离世，我感到有些孤独。但是，我更应感谢上主，因为我还有您，我亲爱的

---

i 见1904年9月27日的信。

老师，您始终以父亲般的爱照顾我。我希望我还能有很长一段时间得享您的这份友爱！我这次很仔细地观察了您的笔迹，您的笔迹还很坚实，您的手好像依然具有那股青春的气力。”

韩宁镐称波格尔夫人为“我的好妈妈”和“令人难忘的母亲般的恩人”。韩宁镐在写给波格尔老师的信中曾提到：“您关于您家人的每一句话，我都很感兴趣。当我在您那里时，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我们将来在天堂还会遇见。”当奥古斯丁·韩宁镐刚升任主教时，他曾在给波格尔老师的信中写道：“这封信是孝敬的问候；我多次思念您……我现在好像走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而回顾过去的时期。我很清楚地忆起一些过去的经验和事件，很清楚地看到一些人，包括我的老朋友、老师和同学。但在那些人当中，我首先回想起的是您那如父亲般的面孔，以及它所散发出的仁慈和亲切的爱护。我记得，您从小学就提拔了我，让我有上学的机会，让我住在您自己的家里，以至于让我感到我是您的孩子；您忍受了这个小淘气鬼，也降福给我，产生了司铎圣召的萌芽。每当我在放假时从斯泰尔（Steyl）回家时，我的喜乐就是与您相见！当我被派遣离开故乡启程去中国时，与您的告别使我非常痛苦。您当时的眼泪也使我看到了您的真情。已经过去19年了，回忆往昔，隔着半辈子的时光，但我依然觉得，一切好像就发生在昨天。”<sup>i</sup>

这些深情之言表明，奥古斯丁·韩宁镐与他的老师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一辈子不能忘记这位老师给予他的印象，而这位教育家不仅训练了他的理智，还培养了他的心灵。

奥古斯丁·韩宁镐说，波格尔老师也曾降福给他，产生了司铎圣召的

---

i 见1881年、1882年、1895年、1900年、1904年、1905年的书信。

萌芽。我们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但他好像是在波格尔家里首次产生了当神父的念头。这应是最早的暗示，而在此之前他都没有提到过要成为一名司铎。如果真是这样，天主教的传教事业或许应该感谢波格尔老师。假如没有他和上主的安排，就不会有一名在华传教53年的韩宁镐主教。



### 第三节 传教的召唤

“我圣召的恩典！”韩宁镐主教这样开始他在《回忆录》中对自己圣召的回忆，“上主召唤我的方式是奇特的，更是奇迹般的：他从粪土中举扬穷苦的人，叫他与贵族人共席，与本国的王侯同位。<sup>i</sup>

“直到1879年春天，我都很少考虑我以后要做什么工作。某些时候我想我会当一名老师。最初我想我将来要当一名小学老师，后来我又觉得，当一名高等学校的教师更好。我曾经好几次幻想过这种地位的优点。当时的我认为，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都可以去进修而获得学位。总之，我的意向是世俗的成就。

“偶尔我还是突然会想到去当司铎，尤其是当我和同学一起干一些坏事时，我也曾对他们说过：‘假如我们仍然有当神父的圣召，怎么办？’我明确知道，父亲很渴望我当司铎，但我拒绝了这个想法。有一次，母亲告诉我说，当父亲提到我的学费时，他曾叹息说：‘啊呀，但愿以后这个孩子能成为一名司铎，那该多好啊！’但我却对妈妈说：‘我根本就不想当神父。’在我的记忆中就是这样。

“突然——在1879年的狂欢节——我产生了这样的念头：‘你应该成为一名司铎。’这个想法的来源可能是我曾与母亲谈论疾病和死亡的问题吧，那时我刚刚有一个朋友突然病逝。当神父的念头紧紧地抓住了我。

---

<sup>i</sup> 译者注：原文是拉丁文，是《圣经》的名言。见《圣经·圣咏》Ps 113: 7。

开始还以为是自己想象力的游戏在作祟，但后来才发现这显然是上主的召喚——他忽然开始引导我。我真实地感觉到，好像有一个绳索般的东西在牵引着我。

“几天后我去找我们的老本堂司铎勒佩尔神父，并向他讲述了我内心的想法。他鼓励我多祈祷，并且说：‘我们这些老人现在快要退休（那是在文化斗争时期），所以需要有新的人上来！’

“但是，我的疑虑尚未消除，当然还有对自己未来浪漫生活的憧憬。所以，我照常生活，尽量地去淡化自己的内心世界，只是，那要当司铎的想法依旧紧紧地扣住我的心灵。巧合的是，恰恰就在这时我受到了一些同学的不良影响，参与了一些不光彩的事。事后我更加感觉到：‘我必须离开这些活动，甚至必须离开这个世界，不然我会堕落！’实际上，我已经踏上了堕落的道路。所以我开始做更多的祈祷，看更多信仰方面的书和灵修书，但仍然无法摆脱对世俗生活的种种兴趣。

“去哪里？去哪里培养我的圣召？我想去国外，因为由于‘文化斗争’的影响，所有德国修道院均被迫关闭。

“有一天，一个朋友告诉我，方济各修会在美国的特恩托波里斯（Tentopolis）创立了一所修道院，他们会接收和培训年轻人。我想这也许是一个机会，于是就想要给他们写信。但是这一计划却被父亲发现了，父亲对我说：‘不可以！我不会让你去那么遥远的地方！’

“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来自斯泰尔<sup>i</sup>的一位修士到了我们家，他是来推销圣言会的月刊的。在那一天，我第一次听到了‘斯泰尔’这个名字。我父亲订阅了他们的《上主之城》（*Stadt Gottes*）杂志，它的开本当

---

i 译者注：斯泰尔村位于荷兰，但靠近德国边界，是“圣言会”传教修会的发源地，因此在德语地区“圣言会”被称“斯泰尔传教会”（*Steyler Missionare*）。

时还特别大，后来才变小一些。当我看到这本杂志时，我发现在一个角落有个广告，说，斯泰尔也接收将要当传教士的青年，一年的住宿费和学费是500马克。我马上想到：这是我的机会！过了几天，我和一位同学——若瑟·哈勒曼（Joseph Hallermann），他后来在苏门答腊（Sumatra）当编辑——谈话时，我提到斯泰尔，而他告诉我说，他也在《天使通讯》（*Schutzengelblatt*）中看到过关于斯泰尔的消息。

“我瞒着父母，直接向《天使通讯》的发行者多瑙沃尔特的‘路德威希·奥尔叔叔’（Onkel Ludwig Auer in Donauwörth）<sup>i</sup>写信说，我要去斯泰尔。我没有等到他的回信，于是几天后我又主动给斯泰尔的院长写信，请他接受我。如果没有记错，我当时在信中说我早就有当传教士的想法，而我父亲也大概能付出500元住宿费。我们虽然不富有，但也不穷。过了一段时间，他回信说让我寄给他我的毕业证书和其他的资料。

“如上所述，我没有通知父母就写了申请书。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如此独立地采取行动。我就感觉到，我是‘被牵引的’，虽然我的宗教信仰和道德生活在当时并不符合上主的恩宠，甚至还违背了他。在信中我写道自己早就想当传教士，这一点就与事实不符。在此之前，我没有或很少考虑过到海外传教的可能性。早一些的时候，当传教士的可能性根本就超出了我的思想范围，而且在当时也根本没有‘传教士’。直到有一位同学对我说，他的表哥是司铎，并去了美国工作，那时我才认为，这是一件伟大的事。再有就是通过《上主之城》这个传教杂志，去传教的想法也进入了我的头脑。

“过了几天——正是收割的时期——我跟随父亲一起去田地里工作。

---

i 译者注：多瑙沃尔特在德国南部，属巴伐利亚州。

那时，我告诉了他关于我申请的事。但是，父亲并没有同意我的计划，特别是不同意我去那些很遥远的地方。而且他也认为500元的住宿费太高。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他终于说道，如果住宿费能降低到300元，他就会同意。

“这样，我重新写信给斯泰尔，有赖上主的降福，这次我被接纳。斯泰尔修院通知我在10月份加入。

“就这样决定了一切，也是上主的恩典。我一直不明白上主为什么召唤一个像我这样可怜的人当他的使者、参与他的神圣事业！”

韩宁镐的亲戚在这里补充了一些报告，他们说，韩宁镐给斯泰尔写的第一封信的回信是他父亲收到的。因此，父亲早就知道了儿子的计划，同时也感到很惊讶。但他并没有去找韩宁镐谈话，反而带着信去拜访了本堂司铎罗佩和波格尔老师。结果他们都认为，奥古斯丁·韩宁镐有司铎和传教士的圣召，这应该是真实的，他们也劝韩宁镐的父亲不要拒绝儿子的请求。父亲什么也没有说，只等韩宁镐自己将此事告知父母。

1879年10月11日是韩宁镐进入斯泰尔的日子。

对奥古斯丁·韩宁镐来说，这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他怎么适应新的环境呢？

他自己简单地说道：“父亲亲自带我去了斯泰尔。他在芬罗（Venlo）<sup>i</sup>租了一辆车，我们就这样进入了斯泰尔。尊敬的院长阿诺尔德·扬森（Arnold Janssen）<sup>ii</sup>神父出来迎接我们。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给我的第

---

i 译者注：芬罗是斯泰尔附近的小城市。

ii 译者注：阿诺尔德·扬森（或译杨森，1837—1909年），德国人，圣言会和圣神婢女传教会（圣神会）的创始人，2003年被宣告为圣人（Saint）。

一印象。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位如此刚强无欲和严肃的人。修院的其他司铎也同样给我很深的印象：若望·扬森（Johannes Janssen）、赫尔曼·韦格纳（Hermann Wegener）、伯恩哈德·艾肯伯克（Bernhard Eikenbrock）。<sup>i</sup>那时，传教修道院还很小，第一座修院大楼也正在建设之中。”

韩宁镐非常喜欢传教修道院的地理位置：“传教修院就位于美丽的马斯河（die Maas）边。马斯河是一条平静、宽阔的河流，它紧靠着修院周围的草原地带，而在修院外面还有一排古老的栗子树。”

对奥古斯丁·韩宁镐来说，他必须彻底改变先前的生活习惯。那位“刚强无欲和严肃的”院长神父以自己的精神陶冶了整个修院。各方面的纪律都很严格，祈祷的时间也很长，青年修道生们不仅要在严格的监督下学习，还要努力工作，比如做家务或在菜园中劳动，有时他们还必须在修院的小印刷厂帮忙，共同印刷或装订扬森神父出版的杂志和挂历。

在韩宁镐的一生中这还是第一次体验到一个时间表的约束和无情的节奏——这个时间表管理每一刻钟的工作。韩宁镐以前像一匹毫无羁绊的小野马，但现在他感觉到自己被系上了缰绳。那个没有约束、自由玩耍的学生岁月已成往昔，韩宁镐现在必须适应与一批全新的、陌生的人一起生活。这些人都有着同样的目标，他们也全心全意地投入于这个目标。韩宁镐逐渐地适应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如果他想家或留恋故乡，我们不会觉得奇怪。实际上，在那些他最早给家人写的信中，我们看到一些抱怨的话。然而，四个星期后，这一切就改变了，他显出了自己的英雄气质。他写道：“亲爱的爸爸妈妈，按照你

---

<sup>i</sup> 译者注：这三个司铎是圣言会创始时期和早期发展的核心人物。1879年春天，这个小团体已经派遣第一批传教士到海外，安治泰和福若瑟在那一年到达香港。

们的期望和要求，我每两个星期会给你们写一封信。首先说说我的身体状况，因为你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感谢上主，我很好，身体健康！曾经有几天头痛，应该是水土不服造成的，不用担心，因为这一切都过去了。值得感谢的是，在上次的避静里，我放下了所有的抱怨。

“告诉你们，在这里能培养缄默的习惯！在四天的避静中，我们必须保持缄默，一句话也不能说。所有的人低着头，不看别人，也不说话。避静导师告诉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明天就将死去，你们会怎么样。<sup>i</sup> 我们不断地去做默想。默想、祈祷和神修课轮流进行。一位救主会的神父（redemptoristenpater）<sup>ii</sup> 指导了这次避静。在避静结束的时候，我们都做了一次总告解（generalbeichte）。<sup>iii</sup>我们通常在每一个主日和节日上都会去做告解和领圣体圣事。

“我都没有感觉到早上很早起床是一个负担。在这一点上，你们不要担心！不过，这也真是一件令人感到自豪的事：当大多数人还懒惰地躺在床上时，我们已经站在上主的祭坛上并奉献赞颂之祭。

“中途离开这个修院的修道生好像也不少。我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两个人离开了，一个想进入耶稣会，另一个要入本笃会。修道院并不会阻碍人们自由离开这个团体。在此我很担心出境的事，所以请你们为我在市长那里办理这件事。<sup>iv</sup>

---

i 译者注：韩宁镛参加了所谓的exerzitzen（英语译为retreat或spiritual exercises，汉语通常译为“避静”）。这是反省和祈祷的日子（通常一年一次），在其中，人们有机会反省过去、现在和未来、生活与死亡等人生大事，假设自己很快将面对死亡。这是一种反思方式，能给人新的活力和坚定的意向。

ii 译者注：救主会是1732年在意大利成立的天主教修会，其原来的目标是在穷人中传教。

iii 译者注：“总告解”是回顾自身整个生活而宣告自己的罪并获得全面赦免的告解。

iv 译者注：“出境的事”好像指韩宁镛从德国到荷兰的“出境”。斯泰尔修道院位于荷兰。

“你们说会在下个复活节来这里看我。你们一定要兑现这个诺言啊！我现在就已经感到非常高兴了，因为我将要看到你们！可以的话我会想一个办法，让你们能有更多的机会和我在一起。从父亲第一次送我来这里至今，我们已经分离很长时间了。要是我启程前往中国，我就根本看不到你们了。所以你们现在必须尽量多来看我。我现在不再需要削土豆了，因为我目前在印刷厂的装订室工作。不过，这也有一个困难：当别人舒服地去睡觉时，我还必须在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六继续装订挂历，直到晚上十点或十点半。

“我希望你们的身体都好好的。可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多多休息吧！冬天快要来了，我每天晚上想象着自己在你们中间，就像我们以前围绕着桌子看书一样。热切爱着你们的儿子奥古斯丁·韩宁镐送给你们千万个问候！”<sup>i</sup>

这位年轻的修道生很快地适应了新的环境，也越来越深入地掌握了其圣召的精神，也更加意识到圣召的魅力。三个月后，他给姐姐伊丽莎白写信道：“我对这个新的身份感到很满意，我很幸福，这大概是表明上主召唤我来这里的最确切的记号。我不会抱怨，我现在几乎不知道什么是抱怨了！”<sup>ii</sup>

两年后，他给波格尔老师的信中更是全面地叙述了这一感受：“就我在这里的情况而言，一句话，我感到很幸福。是上主以他的无限仁慈召唤我来到这个地方。在这里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全身心地致力于哲学与神学

---

i 见1879年11月4日的信。（译者注：信中已经提到去中国的想法，因为当时在修院的人都很关心1879年去中国的两名会士的事。）

ii 见1880年1月20日的信。

的研究，并且在复活节的时候通过了结业考试。我很喜爱这种学习，课程都用拉丁语讲授。另外，这里的高级进修一般是五年时间，但因为我们的传教修院迫切需要新的司铎，我们也许会早一点毕业吧。但对于我来说，我就不知道是否也会快一点，因为我还太年轻，尚不能被祝圣为神父。我希望，敬爱的主会帮助我达成我的崇高目标。”<sup>i</sup>

回顾生活在斯泰尔的日子，韩宁镐在《回忆录》中写道：“1880年的复活节是我皈依过程中的恩宠之日。那一年在各方面而言都是一个恩宠的时期，当时我全心转向了天主。1880年秋天的避静——这是一位耶稣会会士引导的避静——深深地感动了我。在斯泰尔的前两三年大概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因为那时我才真正醒悟并意识到上主的临在。”

“在修道院中所接受的种种培育，对我的成长都具有良好的（*segensreich*）<sup>ii</sup>影响。”奥古斯丁·韩宁镐首先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来完成他的高中课程，随后又开始听哲学与神学的课。他的那一班只有九个学生。最好的学生被认为是若瑟·韦伯（Joseph Weber）——他后来成为西里西亚地区（今属波兰）尼撒的“圣十字架”传教修院（*Missionshaus Heiligkreuz bei Neisse in Schlesien*）的第一位院长。他比韩宁镐大两岁。第二名是韩宁镐。他这样描述在斯泰尔的上学阶段：

“那时大家真正怀着一种追求崇高目标的精神、纯正的信仰、兄弟般的友谊和安贫乐道的态度。除了院长扬森神父、赫尔曼·韦格纳和阿贝尔博士（Dr. Abel），当时还有一些教区司铎教书。阿贝尔博士在罗马的耶稣

---

i 见1882年2月份的信。

ii 译者注：原文的*segensreich*意为“具有丰富的祝福”。



会学院 (Germanicum) 和额我略大学 (Gregoriana) 完成了他的哲学和神学研究, 但他尚未被祝圣为司铎。学生们最喜欢的老师是彼得·许尔 (Peter Hüls), 因为他的讲演在语言和内容方面都很精彩——他后来在明斯特 (Münster) 任牧灵神学教授。他教的是教会历史和圣经解释学。一开始, 他用法语教我们教会历史——为了强化我们的法语能力, 但因为课程的内容因语言障碍受影响, 我们就放弃了法语, 不再用其作为教学语言。”

奥古斯丁·韩宁镐的同学告诉我们, 当他在斯泰尔上学时, 院长扬森神父想改变韩宁镐的举止, 因为年轻的韩宁镐走路姿势不够庄重。他首先口头上劝勉韩宁镐改进他的姿势, 但没有效果, 所以, 他命令韩宁镐必须在休息和散步时背后横戴一根能穿过两只胳膊的棍棒。这当然引起了同学们的嘲笑。但是, 他的同学, 后来与他一起在华传教的勒泽神父 (P. Roeser) 不得不说: “这也没有多少效果; 虽然今天他是主教, 但仍旧走路摇摇摆摆, 就像以前一样。”<sup>i</sup>

在晋铎的前一年, 修道生们必须通过一段初学时期。因为那时候, 在斯泰尔的人还没有宣发圣愿。不过, 原来的“宗徒学院” (Apostolische Schule) 现在要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修会 (Ordensgesellschaft) 了。<sup>ii</sup> 不过, 这种初学开始时也相当有局限性, 它只意味着有更多祈祷、礼仪、苦修方面的讲演, 还有特定经文的讲解以及每周的讲道练习。创始人扬森神

---

i 见1935年3月10日的信。译者注: 勒泽 (Peter Roeser, 1862—1944年), 德国人, 1889年赴华, 在山东 (莒县、王庄、蒙阴、金乡等地) 传教, 1903年后在兖州教书、写作, 著有十余部神学著作, 譬如《古经详解》6卷 (兖州, 1926年)。在兖州去世。

ii 译者注: 这都是教会法律中的术语。扬森神父的“传教修道院”本来只能是一个“宗徒学校”, 因为他建立一个修会组织的计划尚未获得罗马教廷的批准。不过, 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 罗马教廷一步一步地承认圣言会的会规, 而成员因此能有“初学” (Noviziat) 并正式宣发圣愿 (Gelübde)。

父想通过这些讲道的训练引导学生们自由地演讲。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一周两次给同一个学生演讲的题目，而这个学生需要在一个半小时之后开始自由地谈论该题目。当然，学生们经常会由于紧张而无法完成任务。

修院整个教学和精神生活的灵魂人物当然是它的创始人阿诺尔德·扬森神父，他是真正的教育者。他通过许多宗教活动、退省、演讲和他个人的榜样作用深深地影响着这个小小的传教修院团体。他的气质和处事风格也是很独特的，能影响每一个与他相处的人。当然，有的人认为他太严肃、太刻板，教导别人太多。但是，那些比较有上进心的学生很快就感觉到，扬森神父是一位真正有灵性生命的人；他们意识到，他能给予别人很多精神上的价值，他的教训和指导方法中也有很多独创的元素，他没有一味模仿别人的陈旧方法，而是以其自身的严谨教育为基础，对修道生们进行信仰 and 知识方面的强化。

1884年的复活节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转变。斯泰尔修道院的创始人阿诺尔德·扬森指定两位神学修士韦伯与韩宁镐出任讲师。因此，他们将被派去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Innsbruck）<sup>i</sup>大学进修自然科学。他们主修的学科是地质学。在离开之前，韦伯于1884年3月29日被祝圣司铎，而韩宁镐则成为五品（Subdiakon）。

他们住在因斯布鲁克的天主教工人宿舍。韦伯神父每天早上在对面的教堂举行弥撒，而韩宁镐为他当辅祭员。当韦伯神父于1933年3月20日去世时，韩宁镐曾回忆起他们俩在当时的生活经历。<sup>ii</sup>

第一个问题是饮食问题。他们是德国北部的人，不能适应奥地利人的

---

i 译者注：因斯布鲁克位于奥地利西部。

ii 见《斯泰尔史册》（*Steyler Chronik*），1933年10月。

早餐，因为奥地利人习惯早上只喝一杯咖啡，吃一小块面包或一个牛角面包。所以，他们上午很快会觉得饿，两个人也因此变得很瘦。当耶稣会的诺尔丁神父（P. Noldin）——当时任学院的神师——第一次看到他们时，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弱不禁风的人真的要当传教士吗？”

在这种“饥荒”时期中，韩宁镐还是有办法的。他给家人写信，请他们寄一些食品过来。他很快就收到了一包食物：真正的威斯特法伦火腿、香肠、面包、黄油。穿着司铎长袍的韦伯和韩宁镐一起去海关取这个包裹时，韩宁镐感到很羞愧，因为他们俩被要求打开这个包裹。然而奥古斯丁·韩宁镐的同学韦伯很自然地拿出一些食品并向海关人员解释说，这些食物对他们俩是多么重要。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吃一顿饱饭了。

同时他们也通知了在斯泰尔的导师，说明在因斯布鲁克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也许他们希望导师会给他们一些资助。但扬森神父却这样回信说：“你们不应该这样！当我在罗马读书时，我大多靠我自己的努力。你们也要这样。你们取消晚餐吧，因为确实太贵了。”当时韩宁镐感到很不好意思，但是韦伯神父很快告诉他们的东道主，这是他们长上的旨意，所以不要准备晚餐了。从那时起，他们就自己找一点吃的，继续过着拮据的生活。

按照规定，他们主修地质学，在此之外还需学习实验物理学和化学。他们渴望着增加自己的知识，所以他们也“偷听”别的系院的课程——新来的学生都有这个习惯。他们特别喜欢去神学系，还在那里认识了几位优秀的耶稣会学者，比如胡尔特（Hurter）、斯登特茹波（Stentrup）、格里萨尔（Grisar）、容曼（Jungmann）等。

他们最主要的老师是皮希勒（Pichler），他是一位相当有名的诗人，

还做过蒂罗尔 (Tirol)<sup>i</sup> 自由派的领袖。他无疑是一位有着丰富的精神财富的大人物,年轻时也接受过天主教的教育,但后来陷入自由主义的思想。在当时的因斯布鲁克,自由主义是一种时尚。不过,皮希勒也不反对天主教的思想。他是一位朴素、诚恳的人,不太重视外貌,所以他的表现和举止有农民的风格——韩宁镐称之为“天才式的邈邈”。

在他的学院中只有三个学生:一名耶稣会会士和他们两个从斯泰尔来的修道生。因为那名耶稣会会士经常不在,老师更多地照顾了他们两位。除了上课,他还带他们一起去爬山。他们每个月上山一两次,有时候也去南蒂罗尔 (Südtirol),还在山区里生活几天,每次收获都很丰富。皮希勒很自由地和他们谈话,分享他的知识,与他们一起讨论诗和地质学。

不久,他们就成了朋友。皮希勒也多次谈及宗教信仰的问题,为接近这两个青年朋友的思想领域,他如此表达了自己的友谊并放下他那自由主义的观点。在数次的郊游中,他的幽默也带给了他们极大的乐趣。有一次他对一位和他们在同一家饭店里吃饭的将军说,教宗大概很快会给他发一次奖,感谢他培养教会的神学修生,并锻炼他们成为优秀的地质学家。

在一次郊游中,他们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陌生人。他对宗教作出了极大的贬低,韦伯神父严厉地反驳了那个人。皮希勒教授因此感到很不好意思;他后来告诉他们说,这个陌生人是一所高等学校的校长。但是,耿直的韦伯神父并不惧怕一名校长,而韩宁镐也因这种勇气而感到喜悦和自豪。

在斯泰尔的会长也不反对这些参观旅游。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发出命令说,他们必须乘坐三等车厢。他们原来想,由于和教授在一起应该坐二

---

i 译者注:蒂罗尔是奥地利的一个省,省会即是因斯布鲁克。

等车厢，因为他们需要陪同他们的老师，况且他们的学生票是半价的。怎么办？他们想，如果在火车上不陪同他们的老师是很不礼貌的。不过，他们还是要服从他们的长上。再一次去爬山的时候，韩宁镐鼓起勇气告诉了皮希勒老师关于他们长上的命令。皮希勒只说：“哎，这也很好，因为我更喜欢坐三等车厢。”他们发现，原来老师就是因为顾及他们两个是圣职人员才选择乘坐了二等车厢。这样，双方因彼此的顾虑都笑了起来。

斯泰尔的创始人在别的方面同样给他的修道生们作了仔细的规定：他们必须很认真地进行他们的祈祷，正如在斯泰尔一样；他们必须穿长袍，而他们连外套都没有，只有在爬山时，他们才被允许穿短袍；他们还必须作详细的经济报告。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会长在六个月后就叫他们离开了因斯布鲁克，去往波恩继续他们的研究。皮希勒老师非常不舍得他这两个朋友离开，他几次表示他不同意这个决定。韩宁镐后来从中国写给他一封信，皮希勒非常高兴，并热切地回了信。

在搬到波恩之前，他们俩都在斯泰尔度假。韩宁镐还记起了当时发生的一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微不足道的事。在神学修道生们共同的阅览室中有《威斯特法伦时报》（*Westfaelischer Merkur*），但有一天这份报纸不见了。他们问班长，班长说，韦格纳导师禁止学生读这份报纸。

对学生们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而正如年轻人经常做的那样，他们也马上开会讨论这个问题。这个会议的结果是，他们要派六个代表——整个班总共才有九个人——去韦格纳导师那里，要求他改变这一决定。在这六个人中也包括韦伯和韩宁镐。

当六个修道生一起进入韦格纳老师狭小的房间时，韦格纳导师感到很

惊讶。他问：“你们要做什么？”韦伯说（大概语气有点不客气）：“导师先生，我们来的目的是请您不要太苛刻地限制我们的精神食粮！”“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看我们的《威斯特法伦时报》！”此后他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而韩宁镐也参与了激烈的辩论，但他们的导师还是以冷静态度坚持着他的禁令并拒绝他们的要求。晚上，在晚祷之后，韦格纳还特别与韩宁镐交谈：“你听吧，你们今天对我表现得太不尊重了——大家一起来谴责我！”韩宁镐当然要尽量消除这种不好的印象。他说：“不要这样想，导师先生！来了那么多人，只是为了表达一点：这份报纸对我们很重要！”然而，韦格纳说：“你应该好好想一想，圣阿类思（Aloysius）<sup>i</sup>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会这样做吗？”韩宁镐感到有些羞愧。

韦伯和韩宁镐在接下来的一个学期住在波恩。他们租了一栋房子，需要自己准备早饭和晚饭。他们在当地的方济各修女会的学生餐厅吃午餐。他们的主修课还是地质学和矿物学。另外，他们还学习化学，并在实验室里进行实验。

在那里，他们同样必须穿着黑袍上学，而且在冬天也没有外套。当然，这两个“黑人”在自然科学专业的学生当中非常引人注目，也会引起一些人的讽刺或批评。每当韦伯遇到这些批评时，他会直截了当地进行反驳。有一天他们两个又去了泊波尔斯多夫（Poppelsdorf）的农业大学（波恩大学的分校）。在他们后面有两个学生谈论说：“这些僧侣们为什么还要学习化学呢？”另一个人回答：“他们在这里学习‘行奇迹’！”在前

---

i 译者注：圣阿类思（类思）指意大利圣人Aloysius Gonzaga（1568—1591），他虽然是贵族，但放弃了他的特权，去照顾病人，1591年在罗马照顾黑死病患者，自己也牺牲了。他也很关心学生，所以1729年被宣告为“学生的主保圣人。”

面行走的他们这两个“僧侣”听到这话就不由自主地大笑起来。

在实验室中，这两个神职人员当然更引人注目。过了几天，副教授对他们说：“我们这里的习惯是，每一个学期选定两个学生任这一班的‘警察’，负责室内的秩序。你们两位被选中了。你们同意吗？”他们回答：“当然了！”

其他的学生可能在内心讽刺或嘲笑他们，但他们既然当了“警察”，所以也将严格管理他们的职责范围内的事。每当身材不高的韦伯神父进门时——他的面孔很严肃并具有高昂的“哲学家”的头颅——人们都不敢吭声或讽刺他。他们不得不尊重这两个人，还逐渐成为他们的朋友。

在那个时期，韩宁镐向他的姐姐伊丽莎白写信道：“你从邮局印章就能看到，我目前在莱茵河流域的‘文艺灵感城市’，已经有四个星期了。与我在一起的人是韦伯先生和一位辅理修士——他要学习医学护理。我们住在一起，也是相当舒适，但不如在斯泰尔。我们没有很多社交活动，但还是比在因斯布鲁克多。主日，我一般都在主教座堂当辅祭员（我是五品修士），而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在孤儿院的教堂中弹风琴。你瞧，人就这样获得了地位和尊严！另外，我们的头衔‘传教士’和我们的长袍也使人们很尊敬我们——我们似乎是很有威望的人！愿上主原谅我的自大！但是，我们生活在那些淘气的学生当中，也难免受了一点传染。”<sup>i</sup>

原来的计划是，韩宁镐将要在这学期末接受晋铎圣事，此后继续在大学读书。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那时（1885年春天），中国山东南界地区传教事业的奠基人——若

---

<sup>i</sup> 见1884年11月15日的信。

望·洗者·安治泰神父 (Johann Baptist Anzer) 正好来欧洲，在斯泰尔的传教修道院也作了汇报。安治泰将于1886年1月被祝圣为传教区的主教，而他也很坚决地要求阿诺尔德·扬森神父介绍给他一些传教士。这样，他们选择了韩宁镐，而他的同学韦伯则开始在斯泰尔神学院教书。奥古斯丁·韩宁镐于1885年3月21日在罗尔门德 (Roermond) 被祝圣六品 (执事)，又于1885年5月30日被祝圣为司铎。因为不能马上启程去中国，他先在斯泰尔的高中任教了几个月。

---

i 译者注：安治泰神父 (1851—1903年)，德国人，自1875年起与扬森神父合作，1876年祝圣司铎，1879年到香港，1881年到山东，任鲁南地区管理人，建立圣言会在山东的传教事业，1885年回德国，1886年升主教，同年回华，建立与保护鲁南地区教会。于1899年9月要求李鸿章将山东总督毓贤调到别处，于1899年11月赴欧洲，1900年10月回中国，1900年12月几次与袁世凯进行谈判，为教会受的损失争得了赔偿，并在兖州、济宁、菏泽等地继续建立教会和大教堂，1903年死在罗马。安治泰个性刚强，有时候会引起矛盾，但很受中国官员的尊敬，具有威望，也获得了高级官位。他利用一切关系来建立教会，对山东南界地区教会的发展颇有贡献。





## 第二章 传教士韩宁镐



## 第一节 到中国

奥古斯丁·韩宁镐很快告诉了他的父母关于自己的新使命，即被派往中国去传教。因为家里没有回信，所以韩宁镐担心父母是否因这消息而太伤心了。因此，韩宁镐就给他大姐伊丽莎白写信：“我必须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但也许你们已经从门登那里听到了——修道院的长上派遣我今年年底即去中国传教。你们认为怎么样！这是一个突然的决定！这里的人也都很惊讶。在几个星期以前，谁都不会想到我会去中国传教。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主的神圣旨意也引导着我的长上。我很乐意接受这个决定和派遣。因为我修会的长上曾经提到过，他们对我有另一种安排，所以我已经放弃了去外国传教的想法。但现在我感到很有希望，在中国正有一份受上主祝福的工作等待着我的来临，上主要我去那里，这肯定是一个巨大的恩典。这是一种幸福，而蒙受这个恩典的人不多。当然——我也不隐瞒这一点——我将要面对很大的牺牲。但是这又怎样呢？十字架的圣木，就是通往来世永福的桥梁，是通往天堂的道路。因此，我一点也不犹豫。耶稣不会放弃他的仆人，哪怕是一个如此卑微的仆人。

“所以，我可爱的姐姐，请不要悲伤，你应该感到快乐，因为我堪受如此大的恩典。我担心父母会因这个消息而感到不安。这个消息确实来得太突然。但是，我希望，天主会给我们的父母很大的力量，使他们以谦逊的心态作出这种牺牲。当然，这种牺牲也包括痛苦，但降福往往在牺牲之中。我很希望父亲能给我回信，然而，他这次回信那么慢，让我感到不安……

“我写上面的话已经是几天前了，现在又有很多工作。今天我收到了家里的信。我感谢上主，因为从信中我能看出，父亲已经接受了这个新决定。在我走之前，我一定还要去看你们一次，可能在9月底。除了我还会有其他人去中国，有安治泰神父，还有两三个司铎以及几个辅理修士——就像传说中的‘沙漠中的旅行队’。上个星期一我第一次公开地在教堂中讲道。”<sup>i</sup>

1885年10月韩宁镐回家探亲，并在故乡举行了自己的首祭弥撒，同时告别家人。关于那次庆祝，没有留下什么资料。但是我们知道，天主教信徒在首祭弥撒时都会对新司铎表示极大的支持和尊敬，所以可以想象，门登那些十分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会很热烈地庆祝这一节日；再加上，这是一位年轻的且将要去往海外的传教士，在他的胸前戴着一尊传教士的十字架（Missionskreuz），<sup>ii</sup>他与家人和故乡告别，这更是一件不寻常的事。

这次回家时，韩宁镐神父在门登、巴尔威（Balve）等地讲道。他的题目当然是基督徒的传教任务。因为那时教会正好在过玫瑰经庆节（Rosenkranzfest），他特别强调要为传教工作祈祷。关于那次讲道的手稿，他留给了大姐伊丽莎白，而她一直保留着这份稿子。根据手稿，我们能窥见那位23岁的年轻人的传教精神，同时也能发觉，韩宁镐很有口才，而他后来也确实成为一名富有激情的演讲家。

首先，韩宁镐在讲道时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在玫瑰经庆节讲传教的使命和为传教区祈祷。他在第一段中将天主教信徒的精神财富与外教人的可悲状况作了对比，这种对比很具说服力。信徒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繁荣的、

---

i 见1885年春天的信。

ii 译者注：斯泰尔修道院在派遣一名传教士去海外传教的时候都以隆重的仪式送给他这个约20厘米高的金属的“传教士十字架”。

有着各种花草树木的神圣花园中，而外教人生活在沙漠，在“黑暗与死影中”，正如教会每天在祈祷中所说的那样。<sup>i</sup>

其次，韩宁镐陈述，我们出于感恩的心——因为我们蒙受了信仰的恩典，以及出于仁爱的心，应该帮助外教人，并尽力协助他们。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支持天主教的传教事业，但最重要的方式是祈祷和祈求，因为祈祷能把天上的恩典带到人间。

因此，所有的人都能够并应该参与这种协助，韩宁镐在此指出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机会。为了鼓励人们协助传教事业，他最后还提到支持传教工作的赏报，因为上主的许诺是仁慈的人将会受到丰厚的赏报。<sup>ii</sup>

不过，他们去中国的日子推迟了几个月。安治泰在1886年1月24日被祝圣为山东南界地区的传教主教。斯泰尔修院的人都兴高采烈。在那年冬天，奥古斯丁·韩宁镐去了很多地方作演讲，寻找传教事业的恩人和支持者。为了这个目的，他1月初再一次回到自己的故乡和周围的地区。他还写给亲戚们一封信去安慰他们。比如，在1886年1月底的信中他说道：“正如马斯河在我们的园子前安安静静地将它的波涛传到大海，我们的生命也同样安静地流过去。当然，对我来说，我很快就要开始一份新的工作。不过，只要内心平静，只要心里有上主的爱，而这个爱是以和平的统治引导一切，外在的挑战还有什么影响呢？让我们祈祷，愿主的恩宠存留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在耶稣的恩典和爱之中常是聚合的，无论命运会带我们去往何方。我们不用担心这些，当我早上站在祭坛边、在祝圣面饼后用

---

i 译者注：见《圣经·路加福音》Lk 1: 79提到那些“坐在黑暗和死阴影的人”。这个经文属于《日课》中的祷文，所以圣职人员每天念这个祈祷。

ii 译者注：见《圣经·玛窦福音》Mt 5: 7。

我这充满罪恶的手来举高无限伟大的上主时，当我意识到他的无限仁慈和对我们人类的同情时，我深深地感到，我们在他那里能拥有一切、找到一切。那时我要将我的家人融于这个庞大的神心，在那里我们能随时找到对方，能彼此交流，因为耶稣的爱——这条统一、聚集所有人的绳索，时时处处联结着我们……”

他在另一封信里，也就是在1886年2月7日写给父母的信中说：“我刚刚想到救世主的话：‘谁为我的缘故舍弃父亲或母亲，必要领取百倍的赏报并承受永生。’<sup>i</sup>可爱的父母，我们是有福的！为主作牺牲是多么的甘甜。让我们快乐地作这种牺牲，因为上主喜爱全心奉献的人。<sup>ii</sup>我要祈求至圣圣体中的救世主，降福你们，让你们坚强，并让你们充满他的博爱精神。你们也要为我祈祷，使我能成就我的理想——我应该成为基督的真正使徒，即一个符合天主心愿的人。”

安治泰主教决定他们将于1886年3月离开欧洲。四位司铎和两位辅理修士要陪同他。但是，重要的任务阻碍了主教，所以他要晚两个月才能出发。其他人还是于3月启程，只有韩宁镐被指定要陪伴主教。这样，安治泰主教带到中国的新传教士就是那位18年后（1904年）将成为他接班人的韩宁镐神父。

1886年5月12日是他们出发的日子。在斯泰尔修院团体的欢送晚会中，主教激昂地赞扬了传教士的理想，他最后说道：“告别的言辞我还是让我的伙伴说吧。”韩宁镐根本没有作准备——安主教喜欢用这样的方式使人

---

i 译者注：见《圣经·玛窦福音》Mt 19: 29。

ii 译者注：见《圣经·德训篇》Sir 34: 11和《圣经·格林多后书》2 Cor 9: 6。

感到意外和惊喜。然而，韩宁镐也很快地开始说了几句告别的话：“要求我向你们说话，我并没作准备，而在这个时刻，我更不愿意说话。然而，因为我们须服从圣愿，我还是要服从，所以我不能沉默。

“对我来说，告别的时刻到了。我大概不会再见到这座房子，也许在此后也不会再见到你们中大部分的人。这令我感到痛苦和悲伤。今天，一整天我都感觉自己好像是一棵小树，而园丁从土壤中拔出了这棵树。但是，园丁知道，他为什么要拔出这棵树，也知道他将来会在哪里种植它。虽然它的根在流血，虽然枝叶‘垂头丧气’，但这棵树将来还会复苏，因为阳光和雨水永不会缺乏。今天我虽与你们诸位离别，但希望你们中有一些人——希望是很多人——我能在中国再一次见到。虽然在表面看来，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是几千个小时的路程，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耶稣圣心内，我们是聚合的，而这圣心的爱——来自圣神的爱——将来也要继续联结我们。在我们的告别歌中，我们这样唱：

无论是喜乐还是眼泪，  
我们聚合在耶稣心内，  
从现在直到永远。

“我们一生当中都要紧紧把握住这个希望。虽然在我们的道路上会有十字架——每一个传教士都会面对它——但我们知道：通过十字架我们能获得胜利，到达天堂、永福……但现在要出去，要为了灵魂的救赎，为了基督的爱而出去！

“你们呢？可爱的兄弟，我感谢你们给我的爱。你们将来也要将同样的爱和关心送给我们，要为我们祈祷，特别为安主教祈祷，为了使上主给



我们更多的恩典，使我们能引导更多的灵魂加入基督宗教的羊栈，引导他们走上圣洁的途径并达到永福。不再说了！再见——在中国或在天堂！”<sup>i</sup>

他们于1886年5月12日出发。安治泰主教在罗马还有一个星期的工作。这一个星期在韩宁镐的心里留下了令他终生难忘的印象。教宗利奥十三世<sup>ii</sup>接待了他们，面对面地与他们谈话。安治泰写道：“教宗很友好。他叫我将我的椅子挪到他那儿，而我们的谈话长达四十多分钟。我向他提出了很多请求，他都一一应允，甚至赋予我那些我都不敢提出的特权。教宗周围的人都很惊奇，因为他那么慷慨。他非常关心传教工作。对我们这些在中国服务的主教来说，这是巨大的鼓舞。这让我们知道，教宗深深地关爱着我们和各地的传教事业。”

在受到教宗接见之后，安主教还去拜访了一些枢机主教，韩宁镐也都全程陪同。有一天，科隆总主教保禄·梅尔歇斯（Paulus Melchers）枢机请他们吃午餐，这同样留给韩宁镐特别深刻的印象。这位枢机主教在罗马教廷已经工作了十年，而在这十年内，他始终是山东南界传教区的重要恩人和支持者。

5月28日，安、韩两位在意大利安科纳（Ancona）的港口乘轮船出发。然而，第二天他们的船就在布林迪西（Brindisi）停滞不前了。他们开始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很快就发现了原因。韩宁镐向斯泰尔写报告道：“我们船上的人来自多个国家，有意大利人、英国人、德国人、葡萄

---

i 《耶稣圣心小通讯》，1886年，第70—71页。

ii 译者注：利奥十三世，意大利人（1810—1903年），1878—1903年任教宗，爱好哲学，赞同发展科学，发布《新事物》通谕（1891年），主张劳资协助合作，保护私有制，创设宗座圣经委员会（1902年）。

牙人、印度人、阿拉伯人。但船员几乎都是葡萄牙的天主教信徒。当我们第二天在布林迪西港口停留时，一个葡萄牙人闯入我们的舱房，画了一个十字，从他的表现来看，他应该是想要办告解圣事。但他只能说一点点英语，他对我们说，有一位葡萄牙人疾病发作，想要请一位司铎去看他。安主教随即派我前去。那个病人手脚痉挛，医生说，他的情况很危险。通过一点点的英语，我可以对这个病人说我降福于他并因父、子及圣神之名赦免了他的罪愆。后来安主教也来了，说他的情况不太严重，所以我们并没有给他施行病人傅油圣事，但我多次去看他，还告诉周围的人如果病人的情况继续恶化就立即通知我。但那些人总是说他很好。不久却突然传来消息说，那个病人刚刚过世了。我感到很羞愧。船离开了港口，我们在海上为那位葡萄牙人举行了葬礼（主教指派我这样做）。当船员们将担架和尸体慢慢沉入海水时，观看的人都十分感慨。海洋真是一个巨大的坟墓啊！

“然而，更糟糕的是我们的船必须返回港口，因为我们刚刚得知，那个刚刚病死的船员竟然患的是‘霍乱’。‘我们的船上竟然带有这样可怕的流行性疾病！但我并没有真正害怕，因为‘我相信我的命运在上主的手中’。但是，船上的其他人大都神情紧张。第二天晚上，他们又请我去看一个病人。这次我很好地了解了他的情况。因为这个人的英语相当好，他办了告解，也接受了傅油圣事，并在第二天领了圣体圣事。然而，他并没有死，因为死亡的天使已悄然走开。

“港口的警察还是怀疑我们的船。他们说，这艘船必须回到威尼斯去。正在那时，一封来自伦敦的电报要求我们的船去塞得港（Port Said）。布林迪西的乘客换乘另一艘比较小的轮船。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生病。

---

i 译者注：霍乱是一种急性疾病，病发高峰期在夏季，能在数小时内造成腹泻脱水甚至死亡。

“我很好。我开始学习汉字，这些奇怪的象形文字。我在船上走来走去，观看希腊的海岛、海岸以及蔚蓝的海洋。圣母玛利亚保护着我们，她就是海星（stella maris）。<sup>i</sup>我们刚刚开始过耶稣圣心月。<sup>ii</sup>我常常思念斯泰尔：‘我们聚合在耶稣圣心内，从现在一直到永远。’在塞得港我们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有15个新乘客上了我们的船。”<sup>iii</sup>

从布林迪西开始，韩宁镐又给他的同学弗朗茨·波格尔写信。他的这位同学本来想去斯泰尔与韩宁镐告别，但韩宁镐没能早一点通知他，因为他自己也仅仅是出发前一天才获知第二天就要走。现在他告诉了弗朗茨这个情况并继续说：“现在我的时刻来到了，我可以迈向我的伟大目标。但是，我的朋友，我心里的感受很难说出来。离开故乡我很难过，离开斯泰尔我更痛苦，要割断无数的联系——斯泰尔真是一个乐园！这个经验是无法言传的，只能自己体会到。我把这个牺牲放在十字架的祭坛上，现在也可以说：‘完成了！’<sup>iv</sup>虽然我有时还是会感到有些悲痛，但我觉得自己好像也是一条船，这条船整天与暴风巨浪搏斗，但现在——在这一天的傍晚——这条船平安地航行在平静的海面上，落日的余晖伴着诱人的红霞洒落在我们的脸庞。虽然还能看到暴风的痕迹，但顺风吹向帆布，船只充满希望地奔向它的目的地。

“现在，我们已经在海上航行了17天。通过了科隆、美因兹、慕尼黑、因斯布鲁克，我走过了故乡，随后到达了那个‘柠檬发芽的地

---

i 译者注：玛利亚的一个称呼是“海洋之星”。

ii 译者注：即六月。

iii 《耶稣圣心小通讯》，1886年，第77页。

iv 译者注：这也是耶稣在十字架的最后一句话。见《圣经·若望福音》Jn 19: 30。

方’——意大利。不幸的是，我们在神圣的城市罗马仅仅待了五天的时间，因此也没有去参观多少古老的教堂和文物。但是我经历了两件事——很少有人会享受到这种恩典。第一，教宗两次接见了我们，第一次与很多来自荷兰的朝圣者一起，但第二次只有我们的主教和我。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刻：我跪在教宗跟前，他对我说话，说劝勉和降福的话，他是那样的慈祥与庄严；他好像要给我指出我一生的终极目标。一位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要记住！上主将来会依这些话来审判你！’第二，我们去了罗马最古老的地下墓穴。一位专家——得·瓦尔（de Waal）蒙席，给我们当导游。在那里，我开始佩服早期基督徒的勇气，以及他们信仰的深度和虔诚的心态。我们也去了地下墓地中的圣母堂，并在那里作了祈祷，那大概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圣母堂了。后来我们参观了许多殉道者的坟墓并唱着《至圣者》（*O Sanctissima*）这一圣歌。地下墓地的回声很特别！在圣人的坟墓边，我们也为我们年轻的中国教会作了一些祈祷，因为这个教会可能也会走入地下墓地。因为传教区的教会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一个在奋斗中的教会。”<sup>i</sup>

在红海南边亚丁（Aden）港口的短暂停留又带来一种不好的经验和挫折。韩宁镐神父写道：“我们每天向圣神祈祷，求他能够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作弥撒。也许是我们的祈求不够虔诚——我们很希望能在亚丁休息，但第二天有消息说，我们的船很快就要出发。我们很失望，但主教没有放弃希望。他乘着一只小船上了岸。可问题是：罗马天主教的教堂在哪里？他问了几个当地人后才找到了教堂。不过，那是一座新教的教堂。那里的传教士说，他不知道天主教的教堂在何处。然而，他说对面有一个小圣

---

<sup>i</sup> 见1886年5月29日的信。

堂，可能是天主教的。没错，那里确实是天主教的一个小圣堂，但天主教的传教士不在，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圣饼和弥撒用的葡萄酒也都锁起来了！从船那里发出了要离开的召唤。主教立马往回赶，出了一身的汗，还好他赶上了开船。”韩宁镐这样结束他的信：“戒绝和忍受（*Entsagen und Ertragen*）<sup>i</sup>是传教士的命运。在我的生活中，很早就面对了这种命运。”<sup>ii</sup>

关于他们在旅途中后来的遭遇，韩宁镐没有写任何报告。但是，1920年他在其《圣言会福若瑟神父》一书中说：“其他人已多次描述从欧洲前往中国的航海旅途。最近几十年以来，这条路成为繁荣的路线，世界的贸易都依靠着它。第一次走这条路的人还会觉得它是非常有意思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en*）、亚丁、科伦坡（*Colombo*）、槟榔城（*Penang*）、新加坡（*Singapore*）……在每一个港口人们都会看到一个新的、充满生命力的、充满阳光和南方气氛的世界，一个多彩多姿的纷繁世界——这也是国际贸易所带来的结果。”<sup>iii</sup>

这是34年后写的，而在1886年踏上这条道路的德国传教士并不多，所以大家都很喜欢看这类消息。在那些比韩宁镐早两个月离开的五位传教士当中有一位善于写作的人——卢国祥神父（*P. Rudolf Pieper*），<sup>iv</sup>他在《耶

---

i 译者注：“戒绝和忍受”是来自斯多亚学派（*Stoa*）哲学的伦理道德（拉丁语的 *Abstine et sustine*）。“戒绝”意味着拒绝不必要的或不应该的享受，而“忍受”意味着能接受各种挑战，但内心仍然保持稳定的平衡。

ii 《耶稣圣心小通讯》，1886年10月，第6页。

ii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

iv 译者注：卢国祥（1860—1909年），出生于德国。1879年前往斯泰尔，1885年祝圣司铎，1886年赴山东，在山东传教，从1895到1909年在坡里庄任院长，1909年在山东去世。他编写的著作包括《来自中华的野草、萌芽和花朵》（*Unkraut, Knospen und Blüten aus dem blumigen Reich der Mitte*）。

稣圣心小通讯》中生动活泼地描述了通往中国的旅途。（《耶稣圣心小通讯》是斯泰尔团体出版的月刊。）

1886年7月初，安治泰主教与韩宁镐神父到达山东港口芝罘（烟台）。韩宁镐第一次踏上中国大地，并在之后的53年里都在这里当传教士和主教。管理山东东部的意大利方济各会会士在芝罘有一个办事处。这些方济各会会士于1882年慷慨地将自己地区的南部给了斯泰尔传教会。他们在此也很热心地接待了安、韩两人。山东东部的主教李博明（Msgr. Geremia）<sup>i</sup> 蒙席也正好在烟台，于是这两位主教开始谈论一些传教的问题。韩宁镐神父写道：

“李博明蒙席是一位很有经验的传教士，而我是刚刚到的，所以他给我很多建议——关于我将要经历的‘蜕变’。现在我就应该脱掉欧洲人的个性，然后带上中国人的特性：要穿华服，要剃头，要将假辫子与脑后的真发连接起来。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打扮方式，但它却是必要的。关于通往山东内地的旅途，他也有很多想法。他也第一次提到了山东强盗的活动和他们的手段。”<sup>ii</sup>

韩宁镐提到的“蜕变”在他那里还有两个不太理想的阻碍：他的头发和胡须。他的头发是红色的，与黑色的辫子根本不搭配，但如果留一条红色的辫子，那将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中国人的头发都是黑的。因此，他那种“红黑并存”的头发引起了人们的笑声。另外，他红色的胡须也会让人们从很远的地方就能认出他是一个欧洲人。在那时的中国仍有较重的排外

---

i 译者注：李博明（1843—1888年），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1870年来华，1885—1888年任山东北界代牧（主教）。

i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151页。

情绪，也有不少排外运动，所以这一点是很不理想的。韩宁镐虽能遮盖他的头发，中国人也认为戴帽子是一种礼貌的表现，但他的胡须怎么办呢？他必须留胡须，因为中国人认为，唯独老人值得尊重。如果剃掉胡须，韩宁镐会显得很年轻。他身材很矮，在那时也很瘦，可能让人们误以为他是一个小男孩。因此，他必须留一撮胡子，哪怕是红色胡须，也必须忍受中国人的微笑和其他传教士的讽刺和嘲笑。中国人在1911年之后也剪掉了辮子，韩宁镐的红色胡须也没有阻碍他成为一位杰出的传教士。

当时圣言会的主要传教点是坡里庄，<sup>1</sup>而通往坡里庄的路要经过方济各会的地区。方济各会的中心在济南，他们在那里又休息了一天。让我们聆听韩宁镐的报告：

“在芝罘的任务完成以后，我们乘中国式的独轮车去内地。如果不用一些软的东西作靠垫，又或者背后还有一些摇摆着的箱子或坚硬的东西，就要受很大的苦。另外，如果没有蚊纱，如果不能消化中国人在夏天吃的食物——这些食物中都有很多大蒜，就会在坎坷的山路上，在那些因水流分裂的沙土路上，以及在那些充满蚊子的旅馆中受很大的苦。我们那次旅程需要11天才能到达目的地。

“7月26日晚上，我们到达济南府。在城门附近，安治泰主教去了附近的一个传教点，它的名字是‘洪家楼’。因为那里有一座新盖的主教大堂——两座高塔从远处就能发现，人们都知道‘洪家楼’。

“济南主教府的人早就听说山东南界的新宗座代牧安治泰将要到来，所以司铎们站在教堂前欢迎他。

---

i 译者注：坡里庄（或“坡里”）位于聊城和阳谷之间。

“他们可能觉得很奇怪，因为在这辆从大门进来的车上只有我一个人，而我因长久的旅途以至于外貌变得相当憔悴！他们肯定都很失望，因为没有看到主教。不过，他们也没有对我有所抱怨。马上有一位司铎走过来跟我握手表示欢迎——这位司铎就是我们的福若瑟神父。看到他，我是多么高兴！我听过很多关于他的故事，我也一直想认识他。此后其他的司铎也来迎接我。

“这些人的注意力当然不会停留在我这个卑微的人身上。主教随后也到了，他们热烈地欢迎他，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在迎接我们之后，大家去圣堂朝拜圣体，随后去客厅吃饭。

“那天晚上，我有机会与福若瑟神父和方济各会神父泽诺·默勒（Zeno Moeller）——他和福若瑟一样也是蒂罗尔人（Tiroler）——进行交谈。这次对话我还记得很清楚，福神父开始赞扬中国人的优点。这大概是由于我的一句话引起的，因为我当时可能说了一句批评中国人的话。福若瑟神父赞美山东人的良好品格、严格的道德规范、家庭生活的俭朴纯洁——特别是山东农村的家庭，并且以此来与我们欧洲现代化大城市的道德和习俗相比较。<sup>i</sup>

“他竟如此赞美中国人，以至于我忍不住反驳他。我们因此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后我说：‘如果中国人真的像你所说的如此善良高尚的话，我们就不能认为，他们受了败坏的外教文化的影响（Verderbnis des

---

i 译者注：福若瑟出生在乡下，而19世纪的“欧洲大城市”也面临很多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因此，他倾向于赞扬农村生活并批评城市人。19世纪的欧洲人一方面推动了工业化、机械化、现代化，但同时也渴望一种“纯洁的、浪漫的、安静的”农村生活。来华的传教士也带来了同样的思想张力。



Heidentums)。'所以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

“当然，我那时就是一个不了解中国情况的青年，我也仅仅会说几句汉语，竟敢大胆作这样的评论。几年后，福若瑟神父也坦白地告诉了我，他当时既惊讶又生气，因为我如此自信地反驳他，而他当时已经有相当的经验，在中国已经生活五年了。”<sup>ii</sup>

但这次碰撞也有良好的效果，它激励韩宁镐神父反省自己的观点，这样他很早就“开窍了”，因为他开始寻找一种合理的眼光和合理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人。任何传教士都需要一个合理的角度和立场。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再次讨论。

韩宁镐继续描述他们的旅途：“安治泰主教在济南仅仅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就向坡里庄出发。从济南到坡里有30个小时的路程。

“我们的旅行队得到了教友的接待。坡里的村长——他同时也是坡里教会的会长——听说安主教要回来，就赶去芝罘迎接主教。他虽然比较穷困，但相当能干，坡里的人都很尊重他。对他来说，去芝罘接主教是一种荣幸。

“福若瑟神父与他的传教先生（Katechist）乐秉君（Y ü obingdj ü n）<sup>iii</sup>在济南加入了我们的旅行队。乐秉君为人谨慎却不乏圆融，他与地方的官员有融洽的交往，在衙门里也曾帮助山东南界的传教事业20年之久。他很英

---

i 译者注：Verderbnis des Heidentums指“外教文化的败坏”。“外教文化”指基督教以外的“无信仰状态”或古代文化的“迷信状态”、“愚昧状态”、“道德堕落”，等等。传统的基督教信徒认为，“外教人”（亦译“外邦人”）的社会与文化必然有很多缺陷，必然是败坏的，因为它缺乏基督信仰之光、基督的博爱、基督的道德等。

i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154页。

iii 译者注：该人名对应的汉字无法考证。

俊，着装得体，头上戴着礼帽，他骑着马领导着我们的小队伍。

“那时，我可以与福神父一起坐在马车上。这样，我可以比较享受这次旅行了。我们愉快地谈话或作祈祷，忘记了那闷热的天气和身体的不适。几个小时后，我感觉到，那位可爱的人很亲切，好像我们已经认识好多年了，真是一见如故。我当时根本没有发现——因为我尚未知道中国人的习惯——他坐在车夫旁边，就是说坐在马车的车架上，但他让我舒服地坐在车子里。他应该坐在那个舒服的地方，因为他在年龄和地位上都远远地超过了我。

“这三天的旅途还算顺利，除了三次翻车，没有再发生别的意外。我们翻了三次车——这是因为我们的车夫很笨拙，但我们和我们的马都没有受伤，只有一些啤酒瓶子摔碎了——安治泰蒙席在芝罘买了这些啤酒，因为他想在坡里庆祝我们的到来。

“我最感兴趣的问题当然是传教事业和坡里庄的传教点，毕竟我将来要在那里生活。在如此漫长辛苦的旅途中，我已经放弃了对‘舒畅的中国’的期望，或至少将它压抑到最低限度。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我想坡里大概也不会是一个舒服的地方。因此，当我们在黄河岸边一间简陋的房子里休息时，我小心翼翼地福若瑟神父提出这个问题：‘坡里是怎样的一个地方？那里的房子比这个房子好吗？’他用安慰和可信的语气说：‘那当然，好多了！’没错，坡里的房子确实好一些，但是福若瑟说的这个‘多’似乎有点儿夸张。

“第三天下午我们终于临近了我们的目的地。在午休后我们去看望了东昌府（聊城）<sup>i</sup>的基督徒。他们虽然不属于我们的传教区，但仍然很隆重

---

i 译者注：聊城离坡里约20公里，位于坡里的东北方向。

地接待了主教，并邀请我们一起进餐。

“从聊城到坡里只需两个小时。走在去往坡里的路上，我们行进的队伍越来越长。首先迎接我们的人是岳昆伦（Hermann Ceslaus Blas）修士，<sup>i</sup>他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在他后面有会长和好几个传教员，同样骑着马。后来我们看到一些旗子，听到了大号和小号的声音——这大概是中国传统音乐吧！其中也能听出一些中国式的笛子（唢呐）和黑管的声音，甚至还有一支欧洲的小号——一个小男孩儿吹出了一些可怕的音调。从前面的坡里庄，我们听到鞭炮声，还看到连续不断的烟火。主教现在坐上一顶轿子，而我们的队伍也兴高采烈地向前迈进，通过田野——真是一个奇特又壮观的景象。

“坡里庄的所有教友都站在村口，包括传教站的居民，<sup>ii</sup>教会养的孤儿、学生等。他们在司铎的指导下在村口列队。另外还有大批的外教人从四面八方来‘看戏’。

“他们在一张桌子上准备了主教的衣服和一些圣物。他们想在这里让我们穿上弥撒礼服和大祭披，并从教会楼的大门口那儿戴着主教帽子和权杖隆重地进入教堂。我们在最后一个休息站很不幸地丢失了主教职杖，但岳修士将它带了回来。我和福若瑟神父应该帮助主教穿上他的礼服，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大祭披，我们如何才能知道穿上这件礼服的秘诀？因此，我们越拉扯这件礼服，它就越乱。最后，主教无法穿上它，只好穿着白色短袍和短斗篷前进。

---

i 译者注：岳昆伦，1857年生于德国，1882年去往斯泰尔，1883年到山东，1883—1891年在坡里照顾农场，1891年回欧洲，后来离开了修会。

ii 译者注：坡里的教会房子包括孤儿院、小修道院、神父和一些教友居住的房屋。

“同时，我将权杖和主教帽给了维修士（Franziskus Peter Dewes）<sup>i</sup>和隋修士（Augustinus P. Schmitz）<sup>ii</sup>，叫他们领导我们游行。但当我们走到大门时——主教需要在这里亲自戴上帽子，佩上权杖——他们两个却失踪了。原来他们走到了教堂里面并在那里——祭坛前面——等着我们。

“尽管发生了如此多的失误，这个欢迎仪式还是很隆重的。福神父作了很激动人心的汉语演讲，但我一个字也没有听懂。后来我们唱感恩赞（Tedeum），<sup>iii</sup>在这支歌曲中，我们的一切感谢、赞颂和内心的祈求都上升到上主面前。聚集的司铎和教友都拥在这个小堂之中，主教便降福大家。那时已经是傍晚了，接下来是一顿非常朴素的晚餐——这个庆节的结束。

“那天晚上，我这个新手还经历了一次意外。在晚祷后我问一个兄弟：‘我们将在哪里睡觉呢？’他叫我爬上一架很脆弱的梯子。我发现，在那个屋顶上已经有好几个人在睡觉了。在屋顶上至少没有蚊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睡在上面比睡在那些又小又闷的土房里更好。而且，这几个小房间大概也不能容纳那么多客人。”<sup>iv</sup>

在主教到来后，他们还举行了三个宗教庆节活动：司铎和修士们对于圣言会的新会规宣发圣愿<sup>v</sup>、坡里的孩子和孤儿首次领圣体圣事以及陵修士

---

i 译者注：维天爵，1862年生于德国，1883年到山东，1884年负责坡里庄的小印刷厂。他本来是辅理修士，但也进行传教，是一位很好的开拓者。1890年在临沂郯城开教，后与中国修道生一起学神学，1896年被祝圣司铎。他1904年离开圣言会，在山东东部教区继续传教。

ii 译者注：隋德明（1849—1911年），德国人，1886年到山东，在坡里工作，1902—1911年在兖州服务，在兖州去世。

iii 译者注：感恩赞的开头为“Te deum laudamus”（拉丁语，意思是“我们赞美你，主啊”）。

iv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167—170页。

v 译者注：圣言会的会规（Regel, Constitution）当时刚刚被罗马批准，所以原来的会士可以正式宣发圣愿。

(Gottfried Riehm)<sup>i</sup> 被祝圣司铎——他对这一天期盼已久。三年前当他来华时，他是五品修士 (Subdiakon, 五品辅祭)。他在这里学习汉语并在坡里的小修道院完成了神学课程。主教叫韩宁镐神父给他讲避静并与他练习祝圣典礼的仪式。祝圣典礼举行于1886年9月8日，即圣母诞生的瞻礼日。

---

i 译者注：陵格菲，德国人，生于1850年，1882年来华，在山东传教，1886年被祝圣司铎，1889年在坡里庄去世。

## 第二节 传教学徒时期

就这样，韩宁镐神父安全抵达中国——这是成为他第二故乡的地方。当然，外在生活的变化非常大。周围的一切都很陌生、奇怪、充满神秘性和挑战，开始的一段时间他无法面对那些挑战。外在的生活条件要求他彻底改变自己以适应中国的环境，他必须在很多方面完全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然而，心灵上的困惑更令人感到迷茫。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很多问题。他在精神上也必须有所调整。然而，这并不是是一件可一蹴而就的事，他必须再次当一名小学生，必须从零开始再次上这所“生活学校”，才可以成为一名有用的传教士。

几年后他这样回忆“当新手”的感受：“来华的新传教士真的必须经历学徒时期。首先，必须学习汉语，而汉语并不是很容易掌握的语言。只有学过汉语的人才知道一位年轻的、刚刚来中国的传教士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自己学过各种领域的知识，而且学了好几年，但是一来到中国，我却变成比小孩子更无能的人。一个七八岁的小孩至少可以随意说话，但我连说话也不会。我心怀好意，有很多感想，愿意与周围的人说话，愿意尽快回应来自各方的迫切需求，但就是不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所以，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像小学生一样坐下来，好好学习。不久后我开始勇敢地与本地人谈话，虽然他们多次嘲笑我这个新手的结结巴巴。

“新来的传教士们会想，上主为什么不赐给现代传教士圣神/圣灵降临

时的恩典，为什么不行奇迹让我们马上有说外语的能力？<sup>i</sup>但是，老传教士讽刺我们说：‘天主不这样做是因为他怕新传教士做蠢事。’实际上，这个回答不是没有道理的。新传教士不仅仅需要学习语言，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他对传教工作和环境的深入了解。传教工作和传教行动并不能从传教报告或从书本中学习到。没有一个人能脱离自己的经验，而从来没有离开过故乡的人往往会用故乡的标准作出判断，这样他对传教工作的看法多少还是一种空洞的幻想。

“人们几乎可以在每一位新来的传教士身上看到这一点：他带来的传教观念与真正的传教工作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或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或缺乏那方面的能力。

“有些新来的传教士想，他们将来的传教工作肯定是很危险的。他们也许读过一些游记报告或听说过关于强盗的事。

“另一些人想，传教地区的生活肯定很艰辛，会受苦，物质上很匮乏。他们看过一些关于传教士的破旧房子、土屋和艰苦工作的报告。但他们想不到，当传教事业有所发展时，人们在比较大的传教点也会关注传教人员的身体健康和工作的长期发展。<sup>ii</sup>

“另一些人感到奇怪，因为他们在漫长的旅途中看不到任何教堂。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周围几乎都是教外人。他们原来看过西方出版的《传教年鉴》或《传教年度区报告》，而根据基督徒的统计数字，他们推想中国三个村中就有一座教堂，许多地方都会有一座带有十字架的尖塔。

“绝大多数的人对新信徒有完全错误的想法。他们认为，中国的信徒

---

i 译者注：见《圣经·宗徒大事录》Acts 2: 11。

ii 译者注：意思是说，教会也必须为传教士办一些医疗机构或养老院。韩宁镐后来在济宁和兖州建立了这类机构。

是圣人，或至少是半个圣人——充满热忱，充满孩子般的虔诚，具有最纯洁的生活习惯。这是因为偶尔有一些关于模范信徒的报告，有一些关于信徒的虔诚信仰、热忱和美德的报告，而那些新来的传教士认为，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他们想象着一个超自然的光环环绕着整个传教事业。他们与那些刚进入修道院的人一样，也认为在修道院中只有圣人，而当他们发现一些世俗的因素，他们就会觉得奇怪。我们的传教士是否也要为这些错误思想负责任呢？这一点暂且不在这里谈论。但是，会理性思考的人很快就会发现，传教地区不是这样神圣的。

“除了早期门徒时代，教会内的奇迹——包括恩宠的奇迹（Gnadenwunder）——并不常见。在精神和宗教领域，上主同样喜爱简单的、平静的发展过程。正如草木的成长需要时间，基督宗教的生活也需要时间和培养过程。‘保禄栽种，阿波罗浇灌，然而，使之生长的，却是天主。’（《圣经·格林多前书》3：6）

“当然，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例外、恩惠和奇迹。但是，之所以报告这些奇迹是因为它们很特殊，很引人注目。一般来说，新的基督徒也是普通人。那些出于很纯洁的目标，通过超自然的动力，通过恩宠而寻找传教士的人并不多。在使人皈依的过程中，上主通常也使用最普通的方式，通过亲戚、朋友、个人的某些世俗利益，任何普通的经验或机会。

“普通的中国人第一次去找传教士或报名参加道理班，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接受基督信仰。皈依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三方面的合作：上主的恩宠、个人的良好意向以及传教士的努力工作。人们必须消除很多不纯粹的因素，必须改变很多错误的思想。如果一个人在相当长的考验时期后领受了圣洗，也不意味着洗礼的水已经洗掉了一切渣滓，剩下的只是纯粹的黄金。



“洗礼后，新基督徒也需要谨慎的照顾，因为再次堕落或离开教会的例子也不少。这就是传教士的负担和‘荆棘’：他必须和那些不完善、不热心、不忠诚、摇摆不定的态度进行搏斗。这是他内心的忧郁所在。传教士能忍受许多苦楚，偶尔发生的强盗袭击也不是最令人难受的，毕竟强盗行为不经常发生；对传教士来说，培育的基督徒不符合教会的理想，这一点才是最让人难受的。

“不过，这不足为奇。试想一下，我们自己获得的是怎样的宗教教育，我们家乡的信徒接受过多少宗教培养！从孩提时代开始，在家庭，在学校，在教堂，有多少司铎讲解道理，人们不断有领受圣事的机会，有教会生活，甚至人们呼吸的空气都有信仰的味道，这一切都加强了人们的信仰。然而，即使是在这种环境中也不乏误入歧途的人，他们原本来自最好的公教环境，获得过良好的宗教教育，但他们后来也堕落了；他们一旦去往国外，进入陌生的环境，生活在其他宗教环境中，就会否认自己的信仰，更不要说完成他们的宗教任务了。<sup>i</sup>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于那些新基督徒该有怎样的期待呢？他们接受的宗教教育不多；他们在领受圣洗后也不得不继续分散地生活在教外人当中；他们面对很多的诱惑、敌意和阻碍；他们一年当中很少有机会看到神父，也很少能领受圣事。所以，他们的信仰生活不尽如人意，也多次不能善尽本分，难道这还能令人感到奇怪吗？

“此外，还有另一个错误的看法——这个想法在年轻的传教士当中很普遍——他们想，传教工作是很容易完成的。有的人会想，传教士仅仅需要口说天主圣言并一手拿着十字架，就能令这些教外人马上跪下来要求加

---

<sup>i</sup> 译者注：韩宁镐在此大概间接地批评了1897年后山东——特别是青岛——的德国商人，因为他们在宗教方面的表现并不好。

入教会。不，不，绝对不是那么容易！每位传教士都有这方面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只要想一想，假如一个中国人去德国，并在街头或饭店里用半汉半德的结结巴巴的话语来向德国人讲道理，我们的德国同胞大概会说什么呢？

“传教士的话不一定都有效果——有的种子落到石头上，有的种子落到荆棘中，有的落到很硬的路面上。然而，虽然撒种人的手很笨拙，但毕竟还会有种子落到沃土里并结出美好的果实。

“这一切本来都很自然，老传教士早就明白这些情况，但对许多年轻传教士来说，这还是一项重大的、令人失望的挑战。他们需要经历学徒时期，需要积累一些经验，这样才能适应传教工作的真实境况。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传教工作的一部分——也许只是最小的部分，因为新传教士还必须学习更多的知识。同样重要的是，他应该了解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学习他们的风俗习惯，当然首先要学习他们的语言。

“曾经有很多人说过：‘但愿我能窥视中国人的内心，知道他们想什么，有什么感受，他们如何评价各种事物！’实际上，我想人们也不会在中国人的灵魂里找到很多奇特的东西，因为人性基本上还是相通的，人的思想和感受虽然因性格和气质而迥异，但仍然不会离开某个固定的范围。但是，不同民族思想和感受都由各自不同的环境和条件造成，每个人都会根据民族和时代的背景来作判断。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但风格不同，所以传教士应该了解这一风格。

“如果想与陌生的民族进行沟通，那就必须先熟悉它的风俗和习惯；如果要对人的灵魂产生影响，则必须先了解他的看法和观念。这个原则是普遍适用的，而在中国人那里更是如此，因为他们有着一种古老的、与土地不能分离的文化。他们的思想观念与我们的不太一样，比如，他们对

‘荣誉’、对‘应该做的事’、对‘家庭’和‘亲戚关系’等等都有着很不一样的理解。他们站在古老文化的土壤上，正如我们也站在自己文化的土地上。如果不清楚这个立场或不了解这个民族的习俗和观念，他就必然会犯很多错误。这样，他会很容易得罪别人，引起别人的反感，很多时候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已经得罪了人家——虽然他们并不愿意引起麻烦。可能他想，他能深深地感动其他人，但实际上别人却总把他的话当作耳边风。也许，他以为自己的行为很明智，但实际上他的行为完全是错误的……

“睁开双眼的年轻传教士是蒙受祝福的！他应该有一颗开放的心，应该有学习的意愿；这样的人或许能减少不愉快的经验，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sup>i</sup>

韩宁镐神父确实有睁开的双眼和开放的心，他带来了许多先进的知识，具有努力学习的坚定意志以及刻苦的毅力。安治泰主教也注意到这位富有才华的年轻传教士，并愿意给他特殊的培育。因此，主教让他长时间住在坡里的传教站，这是当时的传教中心和圣言会在中国的总部。安主教特别关注韩宁镐的语言教育，给予他一些特殊的机会，让他在传教方面有进步的机会。其他的会士们由此认为，韩宁镐是主教的秘书，但安主教的信件基本上都是他亲笔写的。

韩宁镐是如何体验外在的生活条件的呢？他好像很快就能适应他的新环境。在华生活五个月后，他给波格尔老师写信，其中这样叙述他的经历：“今天是圣诞节，25号，不仅欧洲在过圣诞节，我们这个‘半基督教

---

<sup>i</sup>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30—36页。

化’的坡里庄也过节。这个快乐的日子——与太阳一样围绕全球——也来到这个小地方，并带给穷困的我们幸福和喜乐。同时，这个日子也唤起了我心中甘甜的回忆。我想起我的家乡、我的童年，我觉得我应该给你们写一封信。首先，我想到您，我可敬的老师，您早在孩提时代就引导了我，试图培养那伟大召唤的萌芽。上主将这萌芽放在我的心里，并借您引导我的步伐，真的非常感谢您。

“您可能多次想过：‘奥古斯丁·韩宁镐大概做了些什么呢？’所以这封信的目的就是向您作一个小报告。首先，奥古斯丁·韩宁镐很好，虽然留着中国人的辫子，穿着中国人的服装，但他依然感觉到‘如沐春风’，很健康，也很快乐，精神也非常饱满。另外，他已经开始成为一名真正的‘Han’（韩）——这是他的新名字，但在以前这也是中国人的总称。<sup>i</sup>他当然要做一名‘好汉’，而不是‘坏汉’——这是他向上主祈求的。

“现在叙述一下我目前生活的一些情况吧。人们经常提到的坡里庄其实就是一个小农村，正如白冷城（Bethlehem，亦译伯利恒）在圣诞节也被称为‘最小的城市’。<sup>ii</sup>坡里庄没有围墙或土墙，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和农村都有围墙。在城市里，城墙上还有很多很高的城楼，城楼的高檐很壮观，很迷人。当然，农村不会有这样的城楼，只有一个很大的门，晚上人们就会关上这扇大门。但我们坡里庄却没有这样的建筑。过去，坡里还有一堵土做的围墙，但这堵围墙早就倒塌了，而村民们没有钱修建新的围墙。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们宁愿依靠他们有力的手臂和锋利的长矛。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三年前有一群强盗劫掠坡里，而坡里的村

---

i 译者注：韩宁镐将他的姓（韩）与华人的总称（汉）联系起来。

ii 译者注：见《圣经·米该亚》5：1：“厄弗辣大白冷！你在犹太群邑中虽是最小的，但是将由你为我生出一位统治以色列的人……”

民战胜了他们。从那以后，坡里人很勇敢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地区——口口相传几乎比欧洲的报纸还要快。坡里位于山东省西部平原的中部，紧挨着直隶省，但没有围墙，没有保护。

“整个平原一望无际，就像大海一样。现在是冬天，所以一切都是咖啡色的、黄色的，就像黄河的水——黄河也从附近穿过。在附近还能看到其他的村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们的围墙。夏天的时候这里会有更美好的景象：每个小地方、每一块田地都被充分利用。当五谷长高的时候，如果从外面往里看，我们的小村庄是看不到的，因为它被15尺<sup>i</sup>高的高粱遮住了——房子大概还达不到高粱的高度。

“我住的房子稍微有点儿奢华，但很有代表性。我现在写信所在的房间有10尺长、7尺宽、12尺高。地面是砖头的——这就是所谓的‘奢华’。墙壁是黄土做的，所以它有中国的国色。墙壁上方有三根木梁。我每天都看这些木梁，但我还是不知道，哪一根是最弯的。<sup>ii</sup> 在木梁上有一层高梁草，而在草上还有一尺厚的黄土。这就是我的房子！不，还没有介绍窗子和门。窗子是用油纸封住的，而门就是两块木板。木板的外面涂着绿色油漆——这又是奢华的表现。

“房间内有这些好东西：靠墙有一张床，是由几块木板组合的木架，上面铺上草席、几床被子以及一个装满糠的小枕头。桌子和床是配套的，只是一些木板，但老鼠也许已经开始啃食木板的角落了。另外有一把木板做的椅子，一个由五块木板组成的书架（上面有几本书），还有一个衣架。在最好的那面墙上有一尊美丽的十字架——这是我房间的辉煌之

---

i 译者注：通常认为，1尺大约等于30厘米，15尺等于4米多。全书照此推算。

ii 译者注：意思是说，它们都非常歪。韩宁镐用幽默的语气来描述他所处的环境。

处——和一些没有框子的圣像。桌子上有一个土做的烛台和一支中国式的油脂蜡烛。

“好，现在您大概了解了住的地方。这里的房屋都是一样的。房屋的平顶虽然不太好看，但很实用。夏天天气非常热——连晚上也是一样——而在房间中蚊子实在让人受不了，所以屋顶就是睡觉的地方。人们在上面铺上草垫，用被子或书（中国人也用砖头）代替枕头——这就是最好的床铺！”

“平面屋顶还有另一个好处。如果强盗袭击我们村——这并不罕见——屋顶是最好的隐蔽场所，也是保卫自己的好地方。农民们很快地聚集在屋顶上，而邻居也从自己家屋顶跳到隔壁家（如果他们关系很好）。他们从上面向强盗扔砖瓦。强盗一般都是一群人。如果强盗们不能马上翻过墙，他们就再也不会成功了。”

“目前我们正在准备对付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他们好像要同时从不同的方向攻击我们的村子。让他们来吧！我们依赖天使的保护，但我们也谨慎。三天前的晚上，我被喧哗声和犬吠声吵醒。我以为强盗来了，马上跳起来，穿上衣服，爬上楼顶。但那里有一位会士。他在守卫着，还带着枪。他说没有危险，这事与我们无关。那次只是一些乞丐，他们点燃了一个农夫的草堆，因为他对他们不客气。黑夜中的火焰很高！这就是传教生活中一些小小的经历。我很快就习惯了这些小问题。”

“我们的服装完全是中国服装，真不错。不过，色彩太多。比如，我现在身上有这些颜色：鞋子是黑布做的，两指厚的鞋底是白的，袜子和裤子是黄色的，长袍是深蓝的，领子是浅蓝的，夹克是黑的，而在我剃过的头上却戴着黑色的帽子（帽子上有颗黄铜扣子）。我后面戴着一条很长的辫子。这就是我们冬天的服装。”

“虽然我们这儿与北阿非利加（Nordafrika）<sup>i</sup>的纬度一样，但在这里才算有真正的冬天，特别是早上很冷，冰和雪也很多。这里的气候相当宜人，但在冬天，我们还是很怀念欧洲的火炉。我们不会抱怨，特别是在圣诞期，因为小耶稣也躺在破旧的马槽中，他受苦是为拯救我们的灵魂。传教士的道路是牺牲的道路，而如果想在传教区寻找别的东西，他一定会很失望。对传教工作者来说，始终应有这样的原则：‘他们且行且哭，出去播种耕耘。’<sup>ii</sup>这句话不仅充满诗意，也满含十字架的精神——然而，这里却只有十字架的痛苦。”

“在这里当传教士并不是成为第二个方济各·沙勿略（Franz Xaver），<sup>iii</sup>更不是手拿十字架到街头和公共场所去布道、宣讲福音。这里也不会有数不清的人来听福音，中国人也不把传教士看成最大的恩人。这些事也许曾经发生过，但肯定不会经常发生。在这里当传教士意味着要当一名好牧者，必须耐心地寻找‘羊’（信徒），不断吸引他们、叫他们，而且不要顾虑失望、痛苦、艰难和种种无力的经验——这些就像荆棘一样从四方刺伤传教士。最后，传教士找到了一些善良的‘羊’——有时候他们突然到来，不是被传教士的声音所吸引，而是因全能的圣神/圣灵而受到感动。那时候，传教士必须耐心地引导这些灵魂——他们像弱小的婴儿一样。传教士必须很耐心地包容他们的缺点，缓慢、慈祥而坚定地教育他们进入基督宗教的生活。”

“传教生活的外在困难还是比较容易克服的，人们都能适应，克服

---

i 译者注：亦译“北非”。

ii 译者注：见《圣经·圣咏》126：6。后面一句话是：“他们载欣载奔，回来背着禾捆。”

iii 译者注：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年），西班牙人，耶稣会传教士，在印度、东南亚和日本有很成功的传教经历，在那些地区有很多人接受基督信仰。

肉身的困难不需要很长时间。不久之后，肉身在某些方面再不像以前那样挑剔。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想到某种小动物——欧洲人不愿意提到它们的名字，更不愿意接受它们为伴侣——虱子。在这里的外国人必须适应和接受这些小朋友，而且也确实能够适应它们。虽然要作出这种牺牲，但我仍然感到快乐和舒服，我像宫殿中的国王一样自豪。然而，辛酸的经验也有：传教士好像徒劳无功，似乎有很多人和恶势力反对传教士，要夺取他们用汗水换取的成果。我本人在这方面还没有经验，但我听我的会士们说过，他们有这种经验。现在也面临这样的搏斗，因为恶势力要阻碍我们去兖州府。好像整个黑暗的力量都要反对我们，传言说我们是无恶不作的人。人们通过宣传和海报传播这些消息。但上主比整个地狱还强大，他将会消除一切障碍。

“我告诉您这一切，不是抱怨或诉苦——我们不应该，也不愿意抱怨。我真的感到幸福。我只是要激励您更多地为传教事业祈祷：‘愿上主受光荣！’<sup>i</sup>

“我目前的工作只是学习汉语和每天教两个中国修道生学习信理学（Dogmatik），教学的语言是拉丁语。最近我也开始给我们的孩子每星期讲一次道——当然是用汉语。”<sup>ii</sup>

最后这句话表明，韩宁镐神父在学习汉语方面有很大的进步，虽然他来中国仅仅五个月。安治泰主教安排了一位能干的老师做他的语言教师。这位老师很好，但他爱显示自己的学问，他要让他的欧洲学生感觉到他精

---

i 译者注：见《圣经·若望福音》14：13等章节。

ii 见1886年12月26日的信。



通汉语。比如，他教韩宁镐一个字，但他要求学生用两天的时间不断地重复这个字来练习四个声调。他让韩宁镐写同一个汉字两天之久，直到韩宁镐完全掌握这个字的写法，把它写得非常漂亮。两个星期后，韩宁镐就受不了这种教学方法，所以他通过译者告诉老师，如果继续用这个方法，他活到100岁也学不会汉语。他说，从现在起，他会不断复习一个字直到记住，此后就不再重复这个字了。他的老师同意了，而从那时起，韩宁镐的语言学习有了很大的进步。在献耶稣于圣殿节（1887年2月2日）那天，他在坡里做了第一次公开的、汉语的讲道——在他来华六个月后。他先用汉字写下这个道理。在韩宁镐之前还没有一个德国传教士这样快学习汉语。

那时的奥古斯丁神父也开始更多地参与坡里的牧灵工作，当时坡里就是主教府。这个“主教府”非常简陋，它只是一排平房，就是上述的土屋，“主教堂”和“主教府”都是临时盖起的黏土茅舍。

虽然这个传教点只是五六年前（1882年）创立的，但它的领导者安治泰主教已经有了长远的打算，<sup>1</sup>所以通过坡里的传教点可以窥视传教工作的各个领域。新来的传教士们可以在这里观察和学习整个传教工作的方方面面。

首先，坡里庄有几百名本地基督徒，而这个教友村正在蓬勃发展。坡里的望教者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有道理班和慕道班），传教士们更是不断进行宣讲，让坡里庄和周围村子的教外人尽量都能入教。从1887年起韩宁镐神父也参与了这项工作，他很自豪和快乐，因为他为老教友或新教友的孩子施洗。

坡里已经有了一个小修道院，目的是培养本地的司铎和圣职人员。修

---

<sup>1</sup> 译者注：安治泰于1882年春天开始在坡里工作。当时只有一百多名信徒在坡里，而安治泰一步步建立起各个机构，添置设备。

道院有一批刚刚开始学习的修道生，也有一些相当有水平的老学生。上面说到，韩宁镐也给他们讲课。老师们必须慢慢引导这些修道生16年或17年之久，使他们达到圣召的圆满<sup>i</sup>。安主教真是传教事业的杰出组织者，他很早就开始开展这些核心传教工作，它们将来必定会结出美好的果实。最先在修道院任教的人是白明德（Franz Bartels）<sup>ii</sup>神父、布恩博（Theodor Bucker）<sup>iii</sup>神父，后来是陵博约（Eberhard Limbrock）<sup>iv</sup>神父和郎明山（Johann Laxhuber）<sup>v</sup>神父。

坡里的慈善机构有男童孤儿院。陵格菲修士和一位善良的新教友负责这个孤儿院。还有一家女童孤儿院，由本地的贞女们（Jungfrauen）<sup>vi</sup>来负责。韩宁镐每个星期给孩子们讲道理，每一两周给贞女们讲一次信仰方面的道理，使她们有机会更深入地理解基督信仰，学习生活中的种种美德。另外，他们也很关注堂区中的病人。

其次，坡里的教会有很多作坊：制鞋工厂、缝纫厂、木匠的作坊、钳

---

i 译者注：教会提供给修道生的教育是从小学、中学、备修道院到“大修道院”（哲学、神学教育）。因为基督宗教的神学、哲学涉及许多知识领域（圣经学、教义、历史、伦理学、教会法等），这个培育需要很长时间。另外，公教的司铎培育也强调基督信仰的国际性，强调拉丁文。

ii 译者注：白明德（1859—1928年），德国人，1877年到斯泰尔，1882年被祝圣为司铎，1883年来山东，先在坡里教书，后在山东很多地方开教。他是一位成功的拓荒者，1928年在青岛去世。

iii 译者注：布恩博（1856—1912年），德国人，他原来是老师，1879年到斯泰尔，1883年被祝圣为司铎，同年来华，在山东很多地方开教，1912年在济宁去世。

iv 译者注：陵博约（1859—1931年），德国人，原来是铁匠，1877年到斯泰尔，1883年到山东，1886年被祝圣为司铎，任坡里修道院的院长，1895年到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1931年在那里去世。

v 译者注：朗明山（1858—1891年），德国人，1881年到斯泰尔，1883年到山东，1884—1886年指导坡里庄的修道院，1888年去沂水王庄，指导学校和备修院，但1891年因伤寒症在王庄去世。

vi 译者注：“贞女们”或译“姑姑”、“姑婆”、“守贞女”，是为教会献身的女士。

工和铁匠的工厂、印刷厂。陵修士负责这些作坊，而辅理修士们也在这里培训年轻的中国人学习各方面的新技术。一位传教修士管理教会的农场和磨坊。

在这样的教会基地生活，主要的特点是贫穷和自愿的刻苦。韩宁镐神父曾在报告中这样写道：“住在坡里的人做很多祈祷。他们很早起床，夏天是早上四点，然后很快开始宗教活动：早祷、默想、弥撒、感恩祈祷。贞女们特别热心地祈祷，她们与传教士一样守斋。神父们和修士们每个星期有三天的斋戒日。<sup>i</sup>这似乎太严厉了，因为这里的食物本来就非常简单——‘中国农村菜’。早上有黄米粥和馒头，中午和晚上有一点肉和中国蔬菜。我们当时根本没有咖啡、奶油、土豆之类的食物。这样的东西只能在天津或上海买到，但要从那么远的地方带来这里，必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太贵，运输条件又艰苦。每一两个月我们派人去那些地方（上海或天津）取我们的邮件。”<sup>ii</sup>

韩宁镐提到的“馒头”也被称为“馍馍”（Muomuo）。他给姐姐写信，信中进一步描述这些食品：“你们那里也有一家面包厂，所以你们肯定很想知道我们这里烤什么东西。这边的面包匠不多，每个家庭基本上自己做面包。快到吃饭的时候，裹小脚的家庭主妇开始工作。她将谷物——小麦、黄米和高粱——放在磨上，用手柄转动磨。如果这个家庭（中国人将家庭称‘门’）比较富有，他们有驴，那么家庭主妇就不必推磨了。然后她用一点水加入面粉做成小面团，把这些面团放在一个筐子上，筐子放在

---

i 译者注：Fasttag（“守斋的日子”）指人们不吃肉、不享受很丰富的饮食的日子。

i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130页。

大水锅上。这样，水蒸汽渗入这些小面块——面包就做好了。人们就喝着中国茶或黄米粥来吃这种热的面包——没有牛奶，没有奶油，没有干酪。

“你们可以想象，一个欧洲人刚开始吃这些，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欧洲人的口味都很敏感或挑剔。当我来这里时，对此我难以下咽，往嘴里塞的时候就想我会把它吐出来。不过，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困难了。”<sup>i</sup>

传教士感觉到，没有好面包是一个缺陷，所以，那些辅理修士们自己做了一个烤炉，做出高级的面包。在大城市的市场也能买到那种在火边烤的面包，但在乡下工作的传教士还是要吃“馍馍”。

韩宁镐神父在这封信中也描述了他的感受：“你们肯定也想知道我的情况。我想，父亲也会让你们看我写给他的信，所以你们也知道一些，我在此不细说了。自从离开你们，我见到了世界上竟然还有中国这样广阔的地方，在这里也见到很多陌生的人和新奇的事物。但是，这些新东西看惯了就不再是‘新’的了。我经常记起我们的同胞——写过《十三椴树》的诗人<sup>ii</sup>——所说的一句真话：

任何时代、任何地区的

子女都是人。

无论住在桦树下，

或者住在棕榈边。<sup>iii</sup>

“当然，外表——衣服、习惯、语言——很不一样，但是，核心——

---

i 见1887年11月6日的信。

ii 译者注：即德国诗人Ludwig Uhland。

iii 译者注：桦树是北方的植物，而棕榈是南方的树。

具有情绪、感觉、追求、渴望、爱慕和憎恨的人心——一般来说还是一样的，无论这个人心是属于华人还是欧洲人的肉身。”<sup>i</sup>

他在一年内就达到了这样淡定与平衡的心态。又过了两年，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道：“虽然我们是传教士，但还是喜欢听到故乡的消息，而每一封报告家人情况的信都被视为一个带来喜讯的使者。<sup>ii</sup>但是，我必须承认，可爱的中国几乎已经成了我的家乡。我感到很幸福，感到这是我的故乡，而我想，如果我必须离开这个地方，我会很难过。当然，我来到这个地方也需要作一些牺牲，我曾经经历了外在和内心的种种折磨。一开始我认为中国是那么的奇怪，那时我想，在这里我一辈子都不会有真正的喜乐。

“但是现在呢？身体和精神很快就习惯了新的生活方式。我已经适应了语言和习惯、人民和水土。人们的心也已经向我开放，而我也在这里找到了爱，很多爱，实际上，我不配获得那么多爱。另外，上主给了我这份工作，很美好、很漂亮！我还需要什么呢？虽说传教是一步步走过的‘泪路’，但派遣我们到普世万民去做他见证人的那一位（上主），也经常给我们很多内心和外在的安慰，所以我们的一切痛苦也获得了丰富的赏报。

“你们总想，我们很难接受这种艰苦的生活方式。这是不对的。我写这封信时正坐在一间很可怜的土屋里，外面下着大雨，而流进来的水几乎淹到我的桌子。地都湿了。我的周围很拥挤，都是新教友——他们不久以前还在庙里向那些丑而肥的佛陀烧香。当然，受过教育的欧洲人会要求更高级的环境，但这又怎么样呢？这都是习惯问题。如果你能习惯，你在中

---

i 见1887年11月6日的信。

ii 译者注：见《圣经·依撒意亚》52：7和《圣经·罗马人书》10：15：“传福音者的脚步是多么美丽啊！”

国农民茅屋的黄土地板上也会感觉到舒畅，你会认为这和欧洲大厅的镶木地板是一样的。”<sup>i</sup>

然而，在我们的奥古斯丁神父写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不住在坡里庄，而是到外面的乡下地区从事积极的传教工作了。

---

<sup>i</sup> 见1889年11月24日的信。

### 第三节 巡行传教士

1887年8月，也许就是韩宁镐神父刚来山东一年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出去传教了。安治泰主教派他去阳谷地区几个星期，那是坡里附近的地区。韩宁镐骑着一头小驴子，一位中国籍的传教员陪着他，背着弥撒用品。就这样，这位年轻的传教士出去传教，充满期待和忧虑，因为他还没有什么经验。

他去拜访那些分散在各个村子的信徒们——当时还没有很多信徒——偶尔也为他们举行圣事。望教的人很多，他们需要教导、鼓励和考验。韩宁镐首先让他的传教员宣读和讲解他编写的“道理”，即关于基督信仰的基本知识。但是，他很快感觉到，这样做太烦琐，所以他开始自己宣讲信仰，并与当地人谈话。他很成功，因为他能听懂听众的问题，别人也能理解他。虽然这种讲道很辛苦，也会引起一些小误会，但韩宁镐非常高兴，因为他现在能感受到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几个星期内，他重获新的勇气，深深感受到做传教士的幸福。

四个星期后，主教的使者传来消息，要求他回到坡里。他的新任务是做梁山堂区的副本堂司铎。梁山这个新开发的地区带给传教士们很大的希望。布恩博神父在照顾和培养那里的信徒。韩宁镐神父很乐意去那里，因为布神父三年前就来到山东，已能很好地适应本地语言和传教生活，所以他会是一名好导师。坡里庄的会计陵修士送给奥古斯丁神父很多实用的东西。从此，韩宁镐神父不用继续骑驴，可以骑马了。另外，他还必须带

上相当多的银子，因为他们打算修建一所小教堂。另一位传教员陪着韩宁镐。在这次旅途中发生了很危险的事。我们听听韩宁镐自己的叙述：

“这样，我突然奉命离开我的地方，去一个新的基督徒团体。这个团体离坡里大约有140里或14个小时路程。<sup>i</sup>因为要在当天到达目的地，我很早就开始准备我的马，让它驮着我的旅行袋。我童年时期经常骑小木马，也骑过几次农场里的马，所以你们不要以为我不会骑马。另外，在这片神州大地上我也有骑马的经验，虽然有时候我很害怕，但还没有摔下来过。因此，我放心地骑上我的马并以上主之名开始这次旅程。

“刚开始也没有什么问题，我因此也鼓起勇气放开了缰绳。不过，当这匹老军马尝到自由的滋味后，它的野蛮兽性和恶劣气质就彰显出来了。它像是要攻击敌人似的咬牙切齿，奔放地跑，离开马路跑进路旁的树林。我躲在马背上，但仍被树枝碰到头，感到耳目失灵。突然一根很粗的树枝猛烈撞击我的胸部，但我无意中抓住了它。这样我就像阿贝沙隆（Absalom）<sup>ii</sup>王子一样悬在天地间，而我的马跑开了。它跑到临近的村子，跟我一起的传教员在那里找到了它，和其他人一起把它领回来。

“我从树上掉落下去，但并没有受伤。因此，我在我的马后面追赶它。我们也很快、很好，和睦地继续往前走。从此以后，这匹马驯服地顺从每一句话和每一个暗示。

“那天晚上我很晚才到达梁山这个教会团体。不久之后，我恢复了体力，那14个小时的骑马让我感到非常累。

---

i 译者注：梁山在坡里南边，大约70公里外。

ii 译者注：见《圣经·撒母耳记下》18：9：“阿贝沙隆……骑着一匹骡子，由大橡树的从枝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橡树枝缠住，身悬在天地间，所骑的骡子已跑走。”希伯来语Absalom的原义是“父亲是和平”。



“在中国，梁山是个很有名的地方。从地名可以知道，梁山是一座山。在这高度为800—1000尺的山丘周围都是平地。梁山好像还是泰山山脉的最后一部分。从六七个小时的路程之外已经能看到圆形山顶的石灰岩——上面不长草木，而在山坡上有一圈陈旧的、已破损的围墙（是为了抵抗强盗和叛徒而建的）。这圈围墙就像一个巨大的冠冕。在山上部还有一些古老而奇怪的佛塔——它们是为了尊崇各种神明而建的。那里也有古老而巨大的柏树，四季青绿的树叶可以提供树荫。现在有很多飞鸟栖身于这些神庙，神像（泥菩萨）是用从屋顶漏进来的水和着黏土做的。

“围绕着山脚的地区都显得生气勃勃。这里有40到60个小村子，一个挨着一个，周围有一道巨大的土墙。那些肥沃的菜园里有许多果树：梨树、桃树、杏树、葡萄树。真是一个乐园！茅屋的平台屋顶周围都有绿色草木，这里的民众都十分勤劳（Myrmidonenvoelklein）。”<sup>i</sup>

“梁山在历史上也很有名。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告诉你，在古代，整个平原是一片水泊，山上有一个国王，他统治着一个湖岛小国。

“另外，梁山还有一个不那么光彩的名字，它被称为‘贼窝’，也就是说梁山是强盗的根据地。历代的众多居民中都有几百个人是强盗，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发生一起抢劫案或杀人案。”<sup>ii</sup>

上面所讲的骑马经历也传到韩宁镐神父的亲戚那里——他们从斯泰尔的杂志上读到了这个故事，而他们给他写信时就讽刺他。不过，他回信说，不是他失去控制，只是马开始跑，而他愿意让马奔跑。他写道：“我在神州大地真正学会了骑马，现在绝对不会掉下去。尊敬的主教也可以为

---

i 译者注：Myrmidonen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民族，即宙斯从蚂蚁（myrmekes）中创造的民族。Myrmidonen也有“盲目执行法律的民众”、“忠实的臣民”这类意思。

ii 见《耶稣圣心小通讯》，1888年，第63页（根据1887年11月6日写的信）。

我作证——如果下次遇到他，你们可以问他。”<sup>i</sup>

然而，梁山那些强盗的故事确有其事，而韩宁镐神父也很快有了这方面的经验。

欧洲的宗教老师想在梁山修建教堂，这个消息迅速在新教友以及当地居民中传播开。强盗们也注意到这个消息，他们猜想：哪里想盖房子，哪里就有钱。因此，他们要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听听韩宁镐自己的叙述：

“事情发生在圣弥额尔总领天使的节日（Fest des heiligen Erzengels Michael）<sup>ii</sup>期间。布神父和我很高兴地庆祝我们的主保节日。晚上我们去休息，也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深夜一点钟左右，一阵奇怪的呐喊和呼唤声把我们叫醒。一开始我以为马有了问题，感到不安。我叫道：‘布神父！发生了什么事？’他就跑到门那里。这时我们听见一声枪响。布神父叫道：‘他们来了！’就是他们！大约是十来个人。他们带着手枪、刀剑和棍子，攻击我们的三位传教员——恰巧那天他们也在这里过夜。他们殴打我们的先生们，把他们捆起来拉到园子里。然后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只有一支枪。我在枪管里塞入子弹和火药，递给布神父。他想从门口那里射击，但已经太晚了。门被冲开，那六个人袭击我们，他们有手枪和刀剑。

“我想我们的最后时刻要到了。我喊叫着：‘圣弥额尔，救助我们！’我们根本无法保卫自己，完全落在这些恶棍手里。他们把武器放在我们胸前并向我们要钱。

---

i 见1890年10月2日的信。

ii 译者注：根据天主教的传统，弥额尔天使的节日是9月29日。“Michael”是希伯来语，意思为“谁能与上主相比”。弥额尔也是圣言会和斯泰尔母修院的主保（patron）。

“布神父说：‘你们可以拿走我们所有的财物，但不要杀死我们！’

“这些家伙们急忙抢走我们的物品。在沥青火炬的红光下，他们很快找到了我们的银子。一个人拿走我们的枪，另一个夺走我的怀表和被子。他们也打开了我们主教的箱子并拿走了里面的东西。这一切就是几分钟的事。

“我们什么也不能做，那两个人不断用枪威胁着我们。如果我们有一点儿反抗，他们会马上枪毙我们。

“他们的头目是一个高大的家伙，他不断催促他们：‘快！快！走吧！’他们在喧哗声中跑了，一如他们在呐喊声中到来。

“最后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那时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我们经历了如此大的危险。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上主，因为我们还活着！’后来我们跑到外面看我们的人在哪里。有一个人带着灯在门口遇到我们。他们哀叹，因为他们以为强盗杀死了我们。另外两个人害怕起来，跳墙逃走了。三位传教员都躺在地上不能动弹，疼得直呻吟。我们的损失（包括钱和物品）大约相当于1500德国马克，对于贫困的我们而言，这是相当多的钱。上主允许了这个不幸的发生，但我希望，他也会启发一些善良人的心，帮助我们弥补这个损失。

“有谣言说，强盗还要来，而在附近的山区，人们也看到过一些土匪。这样，我们必须很小心地生活，以免再在睡眠中遭到袭击。每天晚上都有几个信徒住在司铎的房子里，守卫我们。我们沿着墙壁放了一排长矛，门口有三个带枪的中国人。

“这样，我们好像生活在军营中。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放枪，目的是警告那些强盗。我们的保安们大声谈话，陪同我们睡觉。有一次，他们把一樽小炮放在我们的房间，以更好地保护我们。负责它的保安把用来点燃

小炮的导火线放在草席附近。有一次，导火线烧着了草席，保安的床也着火。我听到火焰的声音醒过来，把火熄灭，避免了更大的灾难。”<sup>i</sup>

当安治泰主教听说强盗事件后，他写信安慰两位遭受灾难的传教士并对他们说，你们应该由衷地感谢上主，因为你们还活着。虽然你们丢了钱，但这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小的损失。不过他们还是应该修建梁山的圣堂，因为当地的教会看起来很有前途。所以，安主教会尽量寻找新的资助。然后，他们就可以开始盖房子。但以后他们不能在家里存放很多钱，他们应该把钱托给可靠的“银商”。当他们需要钱时，再将钱取出。主教也派来了岳文成（Joseph Overloeper）<sup>ii</sup> 修士，他是小建筑队的队长。没多久，一座漂亮的小教堂就建好了。主教亲自来祝圣它。这样，教外人被吸引过来，他们开始重视基督宗教。传教工作在梁山地区有了很大的进展，梁山成了基督宗教的重要根据地。

然而钱的问题仍导致了悲哀的后果。当时的知府毓贤<sup>iii</sup>是一个憎恨基督徒的人。他听说传教士的钱存在一个“银商”那里——这位银商是信徒，但他也接收强盗的钱。（中国的银商相当于小型的银行。）因此，毓贤控告布神父，说他是土匪的头目，这些钱是他偷来的。同时，知府逮捕了那

---

i 见《耶稣圣心小通讯》，1888年，第48页。

ii 译者注：岳文成（1860—1918年），德国人，学过木匠，后当建筑师。1884年到斯泰尔，1886年到山东，曾在坡里、济宁、兖州、菏泽、胶州、单县、即墨、戴家庄工作，建立各地的教堂，有时候雇用100个工人。1918年在山东去世。

iii 译者注：毓贤（1840？—1901年），清末正黄旗人，1890年任山东曹州（今菏泽）知府，1896年镇压大刀会，但又“痛恨西人，峻拒变法”，1899年任山东巡抚，支持义和团。通过安治泰主教在北京向李鸿章的建议，毓贤被撤职。次年调任山西巡抚，曾在1900年夏天捕杀三十多名外国传教士及其妻儿，支持义和团的排外运动。八国联军入北京后他被指控为排外仇教的“罪魁祸首”，革职充军到新疆，1901年年初行至兰州时被处死。

位银商。后来，安治泰主教坚决声明他的传教士是无辜的。他证明，布神父的钱是他——安主教——送到梁山的。因此，官员们不再控诉布神父。但是主教的努力还不能解救那位银商，他不久后死在监狱中，据说是因为发烧而死的，但他大概是被毒死的。

在梁山地区不到一年，韩宁镐神父的工作就被中断了几个月。主教叫他去坡里，因为需要有一人陪同主教去北京——中华帝国的首都。

主教想在北京与相关人员进行谈判。他的目标是在兖州府——他传教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建立教会。虽然山东的地方官员很不欢迎教会，但主教想在兖州府建立传教总部。兖州的官员拒绝主教的申请，他们不愿意为教会规划土地。但根据清廷所签的条约，教会在全国是合法的，所以安治泰主教认为，兖州府官员的做法是不对的。

不过，地方官的拒绝还有一个特殊的理由：兖州府是孔子家乡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城市，而在当时有影响的绅士和文人眼中，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是中国的“国家圣人”。所以如果让外国宗教进入这个古老的城市，等于是伤害他们的宗教情怀。

法国当时对全东亚的罗马公教提供保护。安治泰向法国驻北京的大使求助，但他也没有办法。那时安治泰写信给斯泰尔修院：“中国政府正式告诉法国大使：‘我们中国人对孔圣人怀有最大的尊重和敬仰。哪里有孔子，哪里就不能有罗马公教。’北京的主教告诉我，他认为我们这些在山东活动的传教士还没有被驱逐出境，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sup>i</sup>

为了建立兖州教会，主教去了北京。当然，年轻的韩宁镐神父对他不

---

i 译者注：当时的北京主教应该是戴济世（F. Tagliabue, CM, 1822—1890年），法国人，1854年来华，1884—1890年任北京主教，1888年承担迁移北京北堂的任务。

会有很大的帮助，他让韩宁镐陪同是为了培养韩宁镐，使他有可能会获得更多知识和经验。让我们再看一看韩宁镐的叙述：

“几个星期前，我陪同我们尊敬的主教到中华帝国的首都。我们来回总共需要四个星期，有三个星期待在北京。主教带我到北京的目的是给予我鼓励，尤其是汉语学习方面的激励。这样我认识了富成章神父（Jean-Baptiste Fioretti），<sup>i</sup>他是遣使会最杰出的汉语专家。他很善良，照顾我也很周到。他几乎每天都抽出几个小时和我在一起，谈论他的学术成果。他研究孔子思想、汉语、中国历史和文学已达25年之久。”

回山东的旅途很漫长，他们乘中国式的小船用了11天；由于七月的天气很热，加上满是蚊子、害虫的脏乱环境，这次旅途等于是一种酷刑。主教稍早一点儿离开了船，但韩宁镐神父想直接去坡里。他有11天之久没有机会做弥撒，所以最后一天很早就出发了。他想在中午之前到达坡里庄。有一位传教员陪同他，但一场大雨让他迷了路。韩宁镐写道：

“那天下了大雨。马路前一天就受了雨水的影响，而现在完全不能通过了。我的中国式鞋子的鞋底裂开了。为了安慰自己，我开始唱歌。而且，我也没有了传教员的陪同——我派他去村子里买些食物，但他没有回来。这样我站在田野中，不认得路。一会儿我尽力向前跑，一会儿又撑着雨伞休息。就这样我已经走了六个小时，我不再唱歌，每一步都使我陷进黄土几寸深。一只鞋留在土里，我必须用手把它拉出来。

“坡里还没有找到，周围也没有任何房子，没有人，什么也没有。我就这样站在广阔的平原中，站在雨中。我很累，根本不能继续走。啊呀，此时我感到是那么的寂寞！”

---

i 译者注：富成章（1832—1896年），意大利人，1863年到北京，1896年在天津去世。

“我刚想在一个灌木丛中躺下休息，突然在远处看到了一座佛塔。我努力辨认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对了！我离坡里只有15分钟的路了。所以我用尽最后的力气继续往前走。你瞧，一个信友正好过来了，他牵着一头驴。我的传教员——他早就回到了自己的家——派这个人出来找我。因为我几乎不能动了，他扶着我坐在驴背上，并送我去我们的传教点——坡里。半个小时后我又站在祭台边，举行了那么多苦难日子后的第一台弥撒。”<sup>i</sup>

此后他必须继续开展梁山的传教工作。这种传教工作意味着不断地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吸引新的“羊”，要监督和协助几位传教员的工作，并向分散在各地的教友们发送圣体或为他们施行其他的圣事。这种生活很艰苦，充满各种牺牲，但是，传教士的特殊恩典是，他会因很小的成就感到喜乐和慰藉。这一时期，韩宁镐神父给家人写信说道：

“复活节以来，我要准备八个孩子的初领圣体。我每天给他们上课，而他们也给我很多安慰。我特别喜爱那个小约翰——他大约15岁，最近才领洗成为基督徒。虽然他的父母坚决反对他入教，但他还是坚持他的信念并要求加入我们的教会团体。他那么热切地请求我同意他领受圣体。我问他为什么如此渴望这个圣事，为什么渴望圣体。他说：‘我要与我的耶稣密切结合。’从一个刚刚入教的小男孩儿口中听到这句话真令我感动，因为中国人一般不善于表达感情或缺乏这种宗教情怀（*gemütsarm*）。”

韩宁镐神父的母亲于1888年11月21日去世——她将她的儿子奥古斯丁·韩宁镐献给了传教事业。她享年67岁。虽然韩宁镐神父很悲痛，但他还是用体贴的言辞来安慰家人，特别安慰了老父亲。他向大姐伊丽莎

---

<sup>i</sup> 见1888年8月1日的信。

白写道：

“当我接到你们的信时，我正准备去北京。信中有我们母亲的几句话。她说，她希望圣母可以替她始终陪同我、帮助我、安慰我。也许她那时已经有预感，感觉到死亡很快要把她从我们中间夺走。现在这已成为现实：她不再与我们在一起。当然我也很悲伤，因为我虽然在遥远的山东，但我仍感觉到母亲在为我担心、为我忧虑，这种感觉很甜蜜。不过，我们也应该欣慰。我们的母亲从这个‘涕泣之谷’<sup>i</sup>走到天堂的永恒家乡，在那里，在圣父的宝座那里，她不会忘记我们，她的孩子。你看，亲爱的姐姐，在人间我们没有母亲了，所以我们要更虔诚地瞻仰我们的圣母玛利亚。妈妈走了，但圣母会弥补这个损失。”

他在这封信中继续说道：

“前几天我寄给父亲一封信。他大概给你说了我目前的情况。你看，强盗们还没有打死我。他们曾经有这个计划，但现在还没有成功。

“我住在传教区，周围都是教外人。我的房子很小，若伸出双手，就可以碰到两边的墙壁。我的教堂是一间土房，祭台是一块黄土。这是我目前的住宅，也是我传教堂区的办公室，而我的堂区在大小上与整个阿恩斯贝格（Arnsberg）县<sup>ii</sup>一样大。我有400个新教友和慕道者，但仅仅有40个人领受了圣洗圣事。这个大堂区的其他所有人都是教外人。为了引导他们进入善牧的羊栈还需要做什么呢？在一本古老的中国经典中，我看到这样一句话：‘使人改变思想，难也！’<sup>iii</sup>我们每天都能体会到这句话的确是真的。在生活中传教士也遇到很多挫折，有许多令人失望的经验。有时候，

---

i 译者注：“涕泣之谷”指人间。《圣经》注重世人的痛苦。

ii 译者注：德国的一个县。

iii 译者注：这句话的汉语原文无法考证。



我想我能带领几个人走进教堂的门槛，仅仅差一步，他们就能进入圣所。但是，教外的亲戚只说了一句不利的话，就使整个工作付诸东流……

“你们要多为我和我的传教事业祈祷！我被派遣是为了照顾这一块土地，而这里真是一个好地方。几天前我爬上一座山，从山顶上我见到美妙的风景：房连房，村连村，每个村庄周围都有一圈发芽的桃树、果园和小麦田。一条河流经这里，而那时正是黄昏。太阳的‘火眼’也在向田野说再见。那时我感到很难过——住在教外人国家的传教士也许经常会感到难过。我向这国土伸出我的手并祈求：‘正义的太阳啊！你何时会照亮这个伟大的民族，你何时会照亮住在无信仰的黑暗中的人们！’<sup>i</sup>请你们帮助我祈祷，让恩宠的时刻迅速到来！”<sup>ii</sup>

上面这封信是在一个新的传教区写的。当时任主教代理人的福若瑟神父好像要在属于鲁南的很多新地方开始传教——这也许是他的命运，也许是他的特恩。当然，“开教”很难，奠定新基督徒团体的基础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福神父一次又一次让年轻的传教士们进一步建立教会团体，而他自己去新的地方“开教”。这样，他在山东西南地区的巨野县和嘉乡县开展起充满希望的传教工作。那时，主教请他搬到南部去开拓一个新的地区。他在巨野和嘉乡的接班人是布神父的副本堂司铎——韩宁镐神父。现在韩宁镐第一次当了传教地区的负责人。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有一些小山，教会在好几个村子已经有立足点。韩宁镐神父的副本堂司铎是韩理

---

i 译者注：见《圣经·路加福音》1：78—79。

ii 见1890年10月2日的信。

神父 (Richard Henle)<sup>i</sup>——他后来被大刀会的人杀害。他比韩宁镐小三岁，两个人的合作很顺利。韩宁镐神父很乐意在那里工作。他写道：“我很好——感谢天主！身体和精神都很健康，也有很多工作要做！”<sup>ii</sup>

上面已经提到，这个堂区与阿恩斯贝格一样大。他又写道：“我们尊敬的主教又托给我两个新的县。因此，我几乎要不断地走在路上。请你们祈祷，求天主降福给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基督徒也为你们祈祷。他们经常问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是谁。这样，我向他们介绍和谈论你们。那些善良的中国母亲们听到外国家庭的种种事，经常流泪。”<sup>iii</sup>

山东南界的早期传教士必须不断流动，而韩宁镐神父后来这样评价和总结：“在当时，无论哪里有一个教友，哪里就是传教士的家。当然这并不舒服和安逸。不断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茅屋到另一个茅屋，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这本身就是一种苦修。

“但是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也有一个好处：它让传教士不会在某一个地方扎根太深。传教士能保持精神的自由，不会太留恋某些人或某些地方。

“而且——这是最大的好处——这样司铎就能与他的新信徒有最密切的接触。他能很仔细地了解他们，而他们也很愿意在情感方面接近司铎。

“随着传教事业的发展，我们必须采取较多的‘中央化’措施。仅由于强盗的危险——这个危险始终存在——我们就必须将每个县的总站搬到比较大的城市或乡镇。因为工作越来越多，我们也必须集中工作，必须在道理班 (Katechumenate)、冬天慕道班 (Winterschulen) 以及类似的活动

---

i 译者注：韩理 (1865—1897年)，德国人，1888年去斯泰尔，1889年祝圣为司铎，同年来华，1897年11月1日在巨野县张家庄遇难。

ii 见1890年10月2日的信。

iii 见1889年11月24日的信。

和机构中集中开展教育工作。这是唯一能教导更多人的办法。新信徒的人数越来越多，而如果在每个小地方开展一个小道理班，很多人就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

“不过，毋庸讳言，在这些好处之外也有不好的地方。传教士与他的精神子女（geistige Kinder，信徒）没有了那么多接触，传教士也不太熟知每一个人，基督徒对传教士的态度也许会比较冷漠和冷淡。另外，传教士会面临这样的危险：他可能过分留恋某一个地方，他对‘居住任务’（Residenzpflicht）<sup>i</sup>的理解可能会产生错误，或他太轻易去探访他的团体、去监督传教人员，虽然这些探访非常重要。”<sup>ii</sup>

在这种充满牺牲、单调和心灵上孤独的“游牧”传教工作中，能与一位会士相遇是一件快乐的事。当好几个传教士聚在一起时，这种鼓舞和激励就更大。后来他们计划每年抽一个月的时间聚在一起。安治泰主教也意识到他的同工有这种需求，所以他偶尔也会安排这样的聚会。韩宁镐神父回顾那个时代并写道：

“我们也不缺乏华彩时刻——上主是仁慈的大父，他照顾我们，使我们在工作和种种压力之外还能享受他安慰我们的甜蜜葡萄酒。

“比如，1889年<sup>iii</sup>春天我们在梁山一起过了复活节，这是华彩时刻。那时坡里庄正在修建教堂，所以没有场地。因此，安主教想在梁山庆祝复活节。几乎所有的传教士都聚在那里，修道生、望教者以及慕道班的学生

---

i 译者注：“居住任务”是指本堂司铎必须居住在他的堂口，当教友们需要他时，就应该能找到他。“错误地理解居住任务”指一位司铎根本不去“下会”，仅仅坐在自己的教堂而不出去。

i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214、215页。

iii 译者注：原著为“1899年”，有误。

也都来了。山上的桃树正在发芽，天空的鸟儿飞来飞去，从四面八方来的客人站满了狭小的、可怜的土屋和小小的院子。所有的房间都挤满了，里面的人一个挨着一个。虽然地方是如此简陋和狭小，但传教士们都非常喜乐，有‘庆祝节日的心情’。人们都很高兴，因为他们能聚在一处，能彼此交谈或交换意见。

“我还记得另一个节日，大约是元旦前后，我当时与福若瑟神父一起去拜访梁山的布恩博神父。福神父从南部来梁山，这是很快乐的时光。我们一起出去，看看冬天的景色，也讨论我们的经验和看法。福若瑟神父很同情我这个新手的小忧愁和痛苦。那时我就发现他心肠很好，思想也很崇高，对我怀有兄弟般的爱。晚上我们是布神父的客人——他一直很好客，也很幽默。他让他的中国农村厨师们尽一切努力为我们做美食。在这样的聚会后，传教士们就有了新的力量来耕种传教区的贫瘠土地。”<sup>i</sup>

在别的地方，韩宁镐神父提到一次复活节聚会，这次聚会的高峰是周围农村有50位男士和30位妇女领受洗礼。主教亲自给他们施洗。同时也与传教士们讨论“保教权”的问题。聚会的一个结果是，我们的韩宁镐神父被派遣到坡里，在主教座堂那里担任坡里庄的院长。

---

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234、235页。

## 第四节 担任管理工作

韩宁镐神父，这位年轻的传教士当时才27岁，但他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学习，已经成为一名很能干的传教士和信仰的使者。他在传教站和乡下那些地区都持之以恒地继续着他的汉学研究。他去拜访遣使会的富神父。这对他也有很大的好处，因为那位司铎在研究方面给了他很好的指导。富神父当时在编写一部很厚的汉语著作——关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四卷本著作，而韩宁镐神父从这部著作中得到了很多知识，也获得了很多启发。

韩宁镐神父来华才四年，但已精通汉语，不仅掌握了日常的口语会话，也了解了难学的文言文，即那时的绅士文人所用的语言。另外，他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精神生活也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他的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中国和在华的传教工作。为了这个目标，他想成为一名能干的、名副其实的传教士。

在他的会士中，他很快被称为“小学者”，他们都很尊重他的看法和意见，特别是在有关中国的问题方面。当安吉泰主教面对“保教权”这个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问题时，他也请韩宁镐神父与其他有经验的传教士一起去坡里探讨。主教还想在其他工作方面重用韩宁镐。

“保教权”的问题是指山东南界的传教士们应该选择哪一方面的政治保护者。德国从1870年开始在北京派驻公使，本来也可以保护德国的传教

士。德国驻华大使冯·巴兰德（Maximilian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sup>i</sup>曾经劝说安治泰主教考虑这件事，但他的建议引起很大的反应，因为在那个时代法国是所有远东天主教传教士的保教国家，那时的法国也保护德国的传教士。<sup>ii</sup>关于这些问题已有很多著作，我们在此不作深入探讨。

安治泰主教一直想在兖州府设立一个传教点，但根据他的经验，法国的声誉和影响都不如从前了，而德国因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繁荣和快速发展而在1870年后受到各地人士的尊敬和钦佩。<sup>iii</sup>那时所有的传教士都想拥有政治上的保障，山东的传教士当然也希望如此，而选择德国的保护从当时的背景来看也是理所当然的。那些在坡里聚会的传教士在这方面都有同样的看法。但是他们也都认为，这件事事关重大，所以安治泰主教应该到欧洲，与罗马教廷、斯泰尔总会长和柏林政府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因此，安主教1890年8月第二次去欧洲。结果是，鲁南的传教士接受德国政府的保护。

在主教离开之前，韩宁镐神父协助主教处理一些其他的问题。首先，主教于1890年复活节调动了传教士，韩宁镐神父因此成为坡里庄的院长和坡里传教员学校的负责人。由于他是坡里传教点的院长，他必须管理那

---

i 译者注：巴兰德（1835—1920年），德国外交官，1861年首次来华，后任驻日公使，1875年调任驻华公使，1893年回国。德语著作有《透视中国：华人的习惯、华人姑娘和妇女的生活》（1895年）、《中国哲学和国立儒教》（1898年）、《华人自己描绘的社会和家庭中的华人》（1911年）。巴兰德曾好几年劝说安治泰接受德国的保护，特别是在1887年以后。德国政府早在1882年就向巴黎政府表示，德国想保护在华的德国传教士。安治泰于1890年6月23日在北京正式同意接受德国对传教士的保教权。（见Rivinius, *Mission und Politik, St. Augustin*, 1977年，第23、24页）

ii 译者注：罗马公教的教廷于1857年取消了葡萄牙在东亚的保教权。江南代牧区被托给法国的耶稣会，而北京的代牧区被托给法国的遣使会。同时，自从1844年（《黄浦条约》签订）以来，法国用政治影响力来协助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

iii 译者注：普鲁士人于1864年征服了丹麦，于1866年征服了奥匈帝国的军队，而于1871年征服了法国。1871年普鲁士人在俾斯麦（Bismarck, 1815—1898年）首相的领导下统一了德国。

里的传教士和教育机构，同时他也是整个传教区最大堂区的本堂司铎。安主教把整个传教区划分为三个地区，并任命韩宁镐神父做兖州府地区的区长。<sup>i</sup>韩宁镐神父必须同时担任很多重要的职务。对他来说，他不认为这是重担，因为他乐于工作，但是他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他成了其他传教士的长上，而他们中有一些人比他年龄大或比他经验多。但是他必须服从。我们下面将会谈到他的新任务。

另一件大事是第一批本地的修道生被祝圣为司铎，即赵玛竇（Matthias Dshau，赵永荣）<sup>ii</sup>和夏若瑟（Joseph Cha，夏文林）<sup>iii</sup>。开始时他们在山东的方济各会修道，因为方济各会本来负责全山东的传教工作。当鲁南地区被分给圣言会后，他们回到自己的故乡——方济各会的主教同意他们隶属于新建立的鲁南教区。他们两位于1889年12月8日被祝圣为司铎，中国信徒当然兴高采烈地庆祝这个伟大的日子。这是他们自己的人，现在也被选为罗马公教的司铎。韩宁镐神父被委任在这两位修道生晋铎前的最后四个月里，帮助、指导他们。这意味着，他必须每天教导他们，以完成他们的神学训练，与他们练习弥撒礼仪（Rubriken）以及为他们的

---

i “三个地区”指曹州府（菏泽）、沂州府（临沂）、兖州府，区长分别是福若瑟神父、白明德神父、韩宁镐神父。

ii 译者注：赵永荣，圣名“玛竇”，1856年2月12日生于山东平阴县（阳谷县东边）胡家庄。在济南洪家楼修道，后在湖南省任传教员。1885年开始在坡里庄修道，1889年祝圣为司铎，后在兖州（慈阳）和鱼台传教。1900年到1903年任坡里小修院的院长，后在兖州、郛城、范县、梁山、寿张传教。外国传教士对他的评价是：“他始终是一位好的伴侣和合作者。”于1920年5月去世。见Bettray Fleckner, *Priesterausbildung in Südschantung, China, in: Verbum SVD*, 1990, 第210页。

iii 译者注：夏文林，圣名“若瑟”，1861年5月30日生于Linchu（？，山东省），在济南洪家楼修道，后在坡里庄传教。1889年祝圣为司铎后在单县、济宁、鱼台、莒县等地传教。在义和团暴乱中保护了王庄（沂水）的教会团体。后在兖州（慈阳）传教。1914年入杨家平的隐修会（Trappists），撰写一个祈祷册，任该隐修院的院长若干年。1939年7月6日去世。见Fleckner, Bettray著作。

心灵充电——这是最重要的。韩宁镐神父很体贴和投入地指导这两位修道生，并与他们一起再次体验那种“司铎春天”的快乐。对他来说，这第一批新司铎的祝圣和他们的第一台弥撒是一种特殊的经验。同时，坡里的新教堂也被祝圣——这是一座三间宽的大堂。这样，祝圣司铎的典礼和首台弥撒就可以在庄严的教堂里举行了。

韩宁镐神父的亲友们听说安主教要回欧洲，写信说希望他们的奥古斯丁·韩宁镐神父也能与主教一起回欧洲。同时他们也请韩宁镐神父寄给他们一张相片，他们想看到他传教的“真相”。韩宁镐神父这样回信：“亲爱的姐姐，如果你曾想过我会和我们的主教一起回去，你的预感不完全错，因为主教跟我提到说要带我回去。但是我不想离开。我们这里有那么多工作，我不想离开我周围的中国人。假如我们在人间不能再见，将来在天堂会永远在一起。但我们要好好地祈祷，只怕我们中有人不能进入天堂。

“我在这里叫人拍了一张相片，但我看这张照片时，我会感到害怕和羞愧。我绝对不能寄给你们这张照片。我只能告诉你们：我留着红色的长胡须。”<sup>i</sup>

主教去欧洲的旅程推迟到1890年8月。这是因为在传教旅途中，有一次他必须在黄河泛滥留下的水地中徒步五个小时，而这又缓又腐烂的水使他染上一种皮肤病，溃疡很严重，治疗需要半年的时间！然而，1890年11月24日他通过电报告诉他的代理人福若瑟神父，保教权的问题决定好了，鲁南传教士从此受德国的保护。

---

<sup>i</sup> 见1890年10月2日的信。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韩宁镐神父的新任务和职位。他是兖州府地区的区长，而福若瑟——他是整个山东南部传教区的代理人——对他帮助很多。特别是在兖州市建立教会这个计划中，各个项目都由福若瑟神父来负责。

保教权的问题解决后，德国公使冯·巴兰德想表现出德国政府会很认真地照顾传教士以及维护他们的权利，为此，他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他委派天津的德国领事司艮德男爵（Freiherr von Seckendorff）<sup>i</sup> 到山东南界视察情况，并亲自为传教士们开拓通往兖州市的道路。领事在1891年1月开始这次旅程。虽然这位德国领事先去会见了济南的巡抚，获得了许可，并有士兵的陪同，但他去兖州府的尝试差一点酿成血案。兖州府的绅士们煽动群众，组织几千人游行，而当地的官员们也私下支持这种行为。领事和陪同他的传教士们直接面临着死亡的危险。福若瑟神父的明智行动解除了这个危险，但此后他们决不能期望能在兖州府建立教会或修建教堂。而德国使团努力的结果是，传教士们获准在济宁市建立传教点——济宁离兖州有六个小时的路程。<sup>ii</sup> 令他们欣慰的是，以后也许能在兖州市建立教会。实际上，四年后兖州市就允许传教士们进入，而且完全是以和平的方式。我们也不能怪兖州的中国人曾有这种抵制，如果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就完全能够理解。

司艮德领事也去会见济宁的官员，并参观教会的总站坡里庄。虽然1月的天气很冷，而从兖州到坡里需要三天，但司艮德还是要去坡里。在路上他们视察教会团体。因为领事的汉语很好，也很熟悉中国人的习俗，态度客气和蔼，所以这位德国的正式代表给传教士们和中国基督徒留下了非常

---

i 译者注：司艮德（1854—1933年），德国外交官，1881年来华，1883—1888年任驻汕头领事，1888—1897年任驻天津领事，1913—1915年曾任使馆代办。

ii 译者注：等于25公里。

好的印象。

坡里的院长韩宁镐神父通过专门的使者获悉领事要去坡里，所以他为领事准备了隆重的迎接典礼。晚餐时，他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表达了传教士们的喜乐，并说终于在几年的不安全状态后，“自己的祖国能庇护他们，而他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无可奈何地接受一切压迫。他们欢迎领事的到来，因为这是他们将获得有效保护的第一个证据”。<sup>i</sup>

然而，韩宁镐神父在他的报告中还加了一句：“当然，我们这些有信仰的人都知道，在任何人间的保护之上还有那位统治一切的主，关于他我们要说：‘若不是上主兴工建屋，建筑的人是徒然劳碌；若不是上主在护守城堡，守城的人人白白警醒护守。’”（《圣经·圣咏》127：1）<sup>ii</sup>

德国领事在坡里住了两天，他很享受与德国传教士在一起的日子。后来，福若瑟代理陪同他回到天津。

韩宁镐神父在坡里庄当院长两年，那段时间他做了很多工作。上面提到，在坡里庄有本地圣职人员的修道院、两个孤儿院、传教员学校、一些作坊以及一个大农场。另外，这个大堂区的牧灵工作也需要很多关注。虽然院长神父有一些得力的助手，有几位能照顾各个机构的司铎，一些忠贞而可靠的修士在各个作坊中，但他还是关心着很多问题，并为整个团体承担责任。

---

i 译者注：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政府于1886—1887年才结束了对天主教的压迫，而于1890年5月宣布“驱逐法律”的取消。根据这个“驱逐法律”的规定，在德国不可以有修会人士居住和活动。由于德国政府对教会的压迫，圣言会的母院不能在德国建立。因此，德国政府对教会的新态度——尊重和保护——当然也让在华的传教士感到高兴。他们肯定传教士与德国政府的友好关系：政府给教会自由，而传教修会接受德国政府的保护。见Rivinius, *Mission und Politik*, 第25页。

i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258页。

这段时期，人们称赞他在主日和节日弥撒中所讲的道理，因为这些讲道内容都很丰富，他的言语表达也很清楚，使人容易理解。因此，中国人最喜欢听他讲道。另外，他还给修会团体——特别是传教修士们和管理女育婴堂的贞女们——讲很多苦修方面的道理。他每次都很认真地写出他将要讲的道理。韩宁镐神父认为，这些讲道是院长的工作方式和机会，通过讲道他能保护和加强团体精神。

这段时期韩宁镐神父最艰巨的工作是指导传教员学校。在他的报告中他告诉我们“传教员学校”应该是什么，以及他如何评价传教员在传教事业中的地位。由此我们可以推想，他以何等的热忱和关怀投入到教育工作。下面是他的报告：

“在欧洲教会，几十年以来，人们越来越强调平信徒的重要角色。中国的传教事业在这方面可以令我们感到满意，因为它虽然弱小和贫困，却以杰出的方式利用平信徒的能力来传播基督信仰。如果没有男传教员、女传教员和各地的会长，还会有什么传教活动？而这些人都是平信徒。

“传教员（或“传教先生”）是司铎开创、培育和指导新兴基督徒团体的助手。如果村子里有一些人对基督信仰有兴趣，我们就派遣一位传教员去那里。他首先要告诉人们最基本的信仰真理，教他们祈祷，向教外人讲道（如果他们愿意听）。传教员是新团体的指导者和支柱。传教士的拜访——因为团体很分散，这种拜访也许不多——主要是为了激励和监督他的工作，也是为了鼓励和考验新信徒。最后，望教者通过圣洗圣事（洗礼）成为有恩典的信徒。

“虽然真正的牧灵工作——施行圣事和组织慕道班——还是落到传教士的肩膀上，但堂口不能缺少传教员。传教员必须长期生活在教会团体

中，管理信徒的信仰生活，教他们更好地祈祷，更完善地遵守上主的戒律和教会的规条，<sup>i</sup>也必须特别注意到儿童们的教育。

“男传教员是男基督徒的老师，而女传教员、贞女和姑姑们（修女）是女基督徒的老师。一位兼具美德和一定教育水平的贞女教友始终很受大家的尊敬，她在堂口能发挥非常好的作用。

“传教士们应该选择一些善良的信徒承担传教员的职务。这些信徒必须深刻理解信仰的各种真理。如果他们受过教育，有良好的性格和生活习惯，那当然是更理想的。不过，能付给他们的工资并不高——这点钱几乎不能养活自己本身，何况他的家人！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传教员并不是那些最优秀的人。

“在整个中国的传教事业中，传教员们是一批不可缺少的‘援军’，而对鲁南地区而言更是这样，因为在山东我们必须从零开始建立教会。传教士一开始都是新手，他们不太了解当地语言、习俗和传教工作的实际运作；信徒团体也都是新的，他们需要有人来领导和教导。因此，大家都提出这样的要求：给我们一位优秀的传教员！这个呼声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消失。

“优秀的传教员从哪里来呢？一开始我们完全依赖于邻近的几个传教区。那些在自己家乡和自己的教区没有找到工作的人开始与我们合作。其中有些人需要拯救灵魂、要认真地为上主的事业而工作，但另一些人只想挣一点钱。

“传教员的工作和职位没有什么吸引人的亮点，在新兴的基督徒团体

---

i 译者注：“上主的戒律”指摩西的“十诫”等戒律，而“教会的规条”指：（1）主日及法定庆节应参与弥撒；（2）应至少每年一次告明自己的罪；（3）应至少在复活节时谦卑地领受圣体圣事；（4）应遵守法定的大斋和小斋。

中工作也有很多不便。有时候教外人找麻烦，有时候新信徒不听话、不服从，有逆反心理。

“因此，要圆满地完成这个任务不仅需要宗教方面的知识和适合的性格，也需要一定的牺牲精神和虔诚的心态。政治家的原则也是传教事业的原则：‘政治是实现可能的技巧。’（die Kunst des Moeglichen，也可以译为‘在具体条件中尽力而为’。）意思是说，人不能等着一切理想条件具备，等着一切要求被满足之后才去行动。如果等到这个时刻，人们会等很长的时间。我们应该掌握那些可能的发展。我们应该通过现有的方法和力量进行工作。

“因此，我们也必须接受那些来自外面的‘临时同工’。我们也必须感谢他们，我们承认，在他们中间有一些很能干的人。他们对传教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不过另一些人没有提供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些人，他们破坏多而建设少。

“传教员在质量方面有缺陷，在数量上也同样有限。其他传教区也需要他们自己的人，所以我们不能长期使用别人的传教员。因此，我们的新传教区必须很快地从自己的信徒中培养传教员。我们的传教员学校就是为此创立的。当安治泰主教第一次从欧洲回来后，他马上开始创立传教员学校。在初期阶段，这个学校很简单，无论是在外观或在内部运作上——当时的传教事业都是很简朴的。

“学生人数在30到50人之间，学生的年龄从20岁到60岁，其中也有一些曾经任过教的老师或有高深修养<sup>i</sup>的人。另一些学生几乎不识字，也不能写字。在信仰方面也是类似的情况。有的人领洗已经有好几年，而另一些

---

i 译者注：“高深修养”指那些参加过科举考试的人。

是刚刚领洗的，才领会基督信仰不久。

“传教员学校的课程都是宗教方面的课：解释和说明教会的信仰，反驳教外人的迷信，用一本较厚的手册系统学习教理问答（教义），学习《圣经》和教会历史，解释经文集（祈祷手册）中的祈祷，每天练习讲道理。教科书都是一些早期的传教士编写的汉语著作。学生一般在传教员学校学习两年，但这方面没有严格的规定。

“然而，这所传教员学校最优先、最重要的任务是教导学生们有信仰和过实际的灵修生活。”<sup>i</sup>

1891年夏天安治泰主教从欧洲回来时，他马上继续开展关于济宁市的谈判，因为他要在那里建立教会。他想把传教中心先迁移到济宁，一旦兖州变得开放一些，再搬到兖州。他与济宁市政府的谈判进行得很快，也很成功。“他完成了谈判，而其中没有不和睦的声音。”<sup>ii</sup>那时他们把主教建立的种种机构从坡里迁移到济宁。韩宁镐神父与他管理的传教员学校也同样搬到济宁。

他写道：“1892年春节前后，我们这个‘探察队’从坡里出发，也就是我们的学生（他们背着自己的衣服）、能方济神父（P. Nies）<sup>iii</sup>和我。我们都很难过。我们前面又是一条坎坷的、不安定的路。”<sup>iv</sup>

---

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292、293、313、317页。译者注：平信徒传教员的学校后来搬到济宁，其主任是赫德明神父（Joseph Hesser, 1867—1920年）。他从1898年到1914年很成功地在济宁办理传教员学校。学生们接受四年的教育，其中也包括学习自然科学知识。

i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259页。

iii 译者注：能方济（Franz Nies, 1858—1897年），德国人，1879年入斯泰尔修院，1884年被祝圣为司铎，1885年来山东。1897年11月1日与韩理神父一起被大刀会杀害。

iv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261页。

坡里的信徒团体做完告别祈祷后，韩宁镐神父还有一次讲道理的机会。但是他很快停止讲话。信徒的哭泣和哀叹也使他流下眼泪。之后他与能神父一起登上马车，三天后他们到达目的地。

前途是“不安定的”，因为济宁的绅士和文人也许还会煽动当地民众。中国民众本来爱好和平，但在绅士群体中流传着很多关于传教士的谣言，以及一些关于传教士来华目的的奇怪成见，绅士们也经常称传教士为“洋鬼子”。为了让市民更全面地认识公教的传教事业和传教目的，安治泰主教开设了一个“训练班”。韩宁镐神父必须在传教员学校之外进行这项“训练”。韩宁镐神父写道：

“这个训练班是为那些想深入认识天主教的市民而建立的。为了提供方便，我们不要求付学费，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还免费提供食宿。当然，在这样的条件下来了一些学生，大约三十个人。他们都是一些狡猾的人——市民一般都比较狡猾，他们有一定的教育修养，穿着比较体面的衣服。我尽一切努力通过辩护和教理教育（*apologetischen und katechetischen Unterricht*），<sup>i</sup>以及通过祈祷训练（*praktische religioese Übungen*）<sup>ii</sup>引导他们理解我们的神圣信仰。

“不过，我很快发现，我的学生几乎都不想学习宗教信仰。天主教的信仰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能填饱肚子的奇迹或获得现世利益的另一种跳板。一旦他们发现事情并非如此，他们就不再热心，一个个都离开了。我们于1892年的圣神降临节关闭了这个训练班，那时最后几个人也都走了。”

---

i 译者注：*apologetisch*指“替信仰辩护”，而*katechetisch*指“说明教会的基本信理”。

ii 译者注：即祈祷、忏悔、默想、反思、参加礼仪。*Übung*是“练习”、“课”，意思是说：每一个人通过“练习”能学会宗教实践，能有“宗教经验”。

福若瑟神父当时是济宁市传教点的院长，他写道：“我们关闭了学校，就好像是一声枪响，来学校吃饭的学生像麻雀一样都飞走了……可爱的韩宁镐神父那么努力地教导那些‘才子和诗人’，但他们没有报答他的努力和热心。”<sup>i</sup>

韩宁镐神父尽心尽力投入传教工作，但济宁这个贸易城市的人对信仰几乎没有兴趣，真是一块“不毛之地”！连那位通常很同情或赞扬中国人的福若瑟神父也抱怨说：“我们在这儿面对的人都是斤斤计较的人，除了钱，他们不懂别的，他们就像鼯鼠一样钻进尘土、投入红尘。当他们发现，宣道的人所给的是生命之粮，而不是能吃饱肚子的面包，他们就不再听道理。”

韩宁镐神父的报告也不容乐观。“前几个月有很多人来看我们，各个阶层的人都来看我们。因为我们想赢得人们入教，所以尽量客气地接待他们。我们在客厅里坐好几个小时，有时候是谈论宗教的事，但更多的只是听些无聊的话或耐心回答人们好奇的问题——有的人简直不想走。”<sup>ii</sup>

韩宁镐神父在济宁仅仅住了半年时光。在1892年圣神降临节后不久，主教召集一些传教士到坡里开会，其中也有韩宁镐神父。他们探讨的问题是：重新撰写《传教手册》（*Manuale für die Missionen*）。这个手册是罗马传信部种种规定的汇集，在中国召开的主教会议的规定，其他传教区的习俗和规定以及自己传教区主教的规定、教训和劝勉。他们谈论这个新《手册》的必要性，而写稿子的工作委托给了福若瑟神父和韩宁镐神父。

---

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303、304页。

i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303、304页。



另外，主教也想为其他的传教人员——男女传教员们、会长们——汇编和出版一些有关“生活规律”的手册。再者，他们还需要简化信徒们诵念的冗长的早课和晚课经文，以使这些经文更接近民心。在这方面，韩宁镐神父给我们这样的解释：“中国教会的一个特点是每天共同祈祷的习惯。实际上，对基督徒来说，这是相当高的要求。每天早晨和晚上，所有的基督徒聚集在一起——当然每一家有一人必须看家，他们大声在教堂中念经，大约是早晨半个小时和晚上半个小时。如果有司铎或传教员在场，在晚祷后还会讲一篇道理或给予教导。

“每天的祈祷是基督徒聚合的纽带；他们处在很多痛苦和困境中，但因着这共同的祈祷而获得信仰上的力量。因为司铎少而信徒团体很多，所以必须要有这个纽带。如果没有它，这些团体将会解体。每天做祈祷的信徒也会遵守信仰上的其他诫命。可以说，中国天主教的特征和标记就是每天的念经。

“他们每天早上和晚上三次打钟——这个铁钟悬挂在教堂前面的木桩上……如果这些团体离得比较近——有时候是这样，人们可以从四面八方听到钟声。当然，他们用的木槌不能敲出我们家乡那种响亮的钟声。此后他们就开始念经，男人和妇女轮流唱经和念经的声音充满教堂和整个村子。这一方面是为赞美上主，同时也是为了给予那些住在附近的教外人严肃的劝诫，使他们能透视和超越这可怜的尘世生活——他们的灵魂就消亡在这个尘世中。”<sup>i</sup>

当时流行的祈祷经文在中国教会已有很久的传统，但言辞太过文雅，而早上和晚上都必须要诵念半个小时。因为信徒们必须背诵这些经文，这

---

<sup>i</sup> 见德国杂志: *Katholische Familienblaetter, Beilage zur Frankenstein-Münsterberger Zeitung*, 1898, Nr. 47.

也是种负担；更糟糕的是，他们不容易理解经文的意思。因此，很早就有人已经提出这样的问题：如何能简化经文，使之符合平民的理解能力？

后来，传教士们还召开了一次省会会议（Provinzkapitel，即圣言会山东省的会议），探讨传教士的灵修生活。他们也在调整修会的会规与传教工作方面作出了一些决定。

韩宁镐神父要在工作的所有方面帮助他们，而最后他必须承担新《手册》的全部编写工作，因为福若瑟神父必须回到济宁。这样，韩宁镐神父又在坡里住了一年（其间他短暂离开过坡里）。他重新领导坡里这个传教点和那里的堂区，这令当地的信徒十分高兴。同时他持续进行着那些委托给他的文字工作；主教当然会随时协助他。

## 第五节 恩宠的日子

现在我们要离开外在的活动，将注意力转向韩宁镐和其他传教士的内心和信仰经验。我们必须了解，由于缺少隆重的教会节庆，没有漂亮的教堂，所以他们很珍惜那些小小的、能产生宗教激励<sup>i</sup>的机会。从韩宁镐神父的陈述中，我们能看出来，他们在穷困中是多么珍视上天的礼物，多么感恩地保留着这些恩典。

韩宁镐神父在济宁待了半年，那时他虽然遇到一些令人失望的事情，但也有一件事充满安慰、令人难忘，这就是传教士们将整个鲁南传教事业奉献给圣神的大事。圣言会在斯泰尔的总会长扬森神父热切朝拜天主圣神，他建议应该将鲁南地区奉献给天主圣神。安治泰主教很乐意接受这个建议，他将一幅圣神的画像从欧洲带到山东。这幅圣像是后来任科隆主教<sup>1</sup>的赫尔曼·施米茨（Hermann Schmitz）总本堂神父献给圣言会的。圣像将要在奉献典礼中安置在济宁的教堂里，此典礼将在1892年圣神降临节举行。

那时，所有的传教士都聚集在三个比较大的传教点——济宁、坡里和王庄，并参加十天的避静，以准备这个节庆。安治泰主教在九位传教士的陪同下来到济宁。在这里，在“孔圣人家乡的边缘地区”，他们要举

---

i 译者注：德语的“宗教激励”（religiöse Erhebung）指一些感动人的道理、宗教音乐、教堂中的宁静等。这类的经验能“提高”、“提升”、“振兴”（erheben）人心，振奋精神。良好的宗教环境能产生很多这类的宗教经验和“激励”。

行重要的奉献礼。韩宁镐神父当时很兴奋地写了一篇报告，我从中选取一部分：

“圣神降临节！强烈的南风是这个庆节的先兆，在这个神圣的日子，太阳依旧从东方升起。济宁市的人们还在熟睡，而教堂中的太阳并不照亮睡觉的人们，只照亮那些虔诚祈祷的人。这些人很早就跪在这个小小的、布置好的祭台前。在祭台上有一张画像在等待着它的揭幕典礼。这些教友学着宗徒们的榜样守夜。

“在‘第三个小时’——上午九点，我们的主教穿着美丽的红色祭披，在辅祭们的陪同下走上祭台。福若瑟神父向在场的中国信徒讲解了礼仪的意义，此后主教跪在祭台的台阶上开始唱‘恳求造物主圣神降临’。在歌声中，画上的帘子被揭开，美丽的圣神画像出现在我们面前，周围是花朵和蜡烛。在圣像中能看到天主圣父和圣子，他们坐在云霄间，下面有彩虹（和平的象征），而在圣父和圣子中间有光芒四射的圣神像，他的降福和恩典充满着整个世界、整个地球。七位光荣的天使俯伏，向天主敬拜。

“‘恳求造物主圣神降临’的歌声在我们简陋的教堂缓缓上升。人们都仰慕这幅圣像——今天是圣神的节日，作为博爱之神的他今天来到人间。主教用拉丁语慢慢地、隆重地致奉献词，而每一个人也完成自己内心的奉献。主教祈求圣神接纳这个穷困的传教事业，使它成为圣神的葡萄园，保护它如同眼中的瞳仁，以恩宠的双翼庇护它，接纳所有的传教士、基督徒、望教者和教外人。

“里面的聚会神圣而安静。而在外面，已经有了白天的繁忙，商人喊着贩卖商品，门前有乞丐，官员在鼓声中走过，在外面走来走去的人们都不知道在圣所中发生了什么事。有些人听到了我们的鞭炮声，他们也许

会惊奇地问：‘洋鬼子’们在里面干什么？但他们会继续走他们的路——是通往罪恶的路？或是通往现世利益的路，还是通往人间欲望的路？

“不过，今天的节日和圣神的恩宠这条纽带也应该包容这些人，应该包容所有无牧者的‘羊’；包容所有的无数的教外人——地狱的恶魔仍用锁链捆绑他们。今天的奥迹意味着，山东南界献给了光明之神和恩宠之神，而无数的人都包含在内。几千年里，毒龙的势力控制着这个国家，但从现在起，圣神恩宠的双翼将会庇护它。”

“这思想充满我的内心，而在后来隆重的弥撒中，我也这样祈求上主。这个庆节的最后部分是‘光荣颂’和圣体降福典礼。”

很多年后，韩宁镐主教这样回忆那次奉献典礼：“那个奉献典礼已经是26年前的事了。我们经历了喜乐和痛苦，度过祥和的日子，也度过恶劣的日子。但是，在这一切经验中，圣神的恩典和他的仁慈就像一条金黄色的纽带将我们连在一起。他的怜爱陪同我们一生。当时，安治泰主教在他的年度报告中写道：‘我们将山东南界奉献给圣神，因此这里有了恩宠的泉源，而这个泉源也会降福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这个希望也真的实现了。当然，在鲁南地区仍然有不文明和不开明的人，但那么多风风雨雨和危险并没有消灭我们的小小园林，我们这些笨拙的助手也结出很多果实，我们的缺陷虽然很多，但我们仍能获得降福——这一切归功于圣神的恩宠和护佑。”<sup>i</sup>

有意思的是，恰恰在圣神降临的那些日子，有一个年轻的信徒从湖北来到济宁，说他想为教会工作。他的叔叔在济宁当官。这个年轻人后来成为一名忠贞的助手，他对教会的发展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另外，传教士

---

<sup>i</sup>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288—290页。

们的努力——特别是福神父的工作——后来几年也在济宁和周围地区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另一个“恩宠的日子”是20位传教士隆重复愿的典礼。这20个人中也包括韩宁镐神父。1892年8月24日，在上述的省会会议结束后，这个复愿典礼在坡里举行。这些司铎们所宣发的圣愿还是暂愿——韩宁镐神父于1884年5月5日第一次宣发暂愿，而他们必须定期复愿。

斯泰尔的圣言会仍然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修会，刚刚起步，所以还在寻找适当的发展形式。因此，会士们宣发暂愿的时期很长。但是，他们热切地渴望通过圣愿完全融入这个团体。因此，对他们20位传教士来说，这次复愿典礼是一件大事。

韩宁镐神父在斯泰尔的杂志上也曾发表过一份报告，从他的言辞中能看到，他忠于修会的神圣使命。他写道：

“夜晚的景色很奇妙，我们这里的平原非常安静。天上繁星点点，大地如此安静，这美妙图景就像是在梦中。

“‘主彻夜祈祷！’这是今天早祷中的经文。当主耶稣——这位神圣的祈祷者——祈祷时，晚上的夜色可能也是这样。我现在看到的星星，他当时也看到了！但是，我的眼睛没有透视的能力，而他能透视一切，超越这个暂时的宇宙，会在短暂的世界之外见到一个新天地和新的灿烂星辰，即教会的天地。在教会的苍穹上也有无数的光体：那12位跟随他的使徒，他们听了他‘跟随我！’的号召，第二天就与他在一起。另外还有无数的人，两千年来他们在神贫、贞洁和服从内跟随耶稣的召唤，几乎与使徒们

---

i 译者注：见《圣经·路加福音》6：12：“耶稣彻夜向天主祈祷。”

一样。

“这默想和反思与我们今天在坡里庄举行的典礼有密切的关系。正如耶稣在彻夜祈祷后拣选和召唤了他的门徒，<sup>i</sup>我们这些人也同样听见了他的召唤。他们来这里正是为此：他们要在圣愿的奉献中回应救世主的召唤。

“在欧洲，隆重的发愿典礼是特别有感染力的，而在中国，这样的典礼更是动人。在中国虽然有很多关于宗教自由的条约，但基督教的圣所仍然处于地窖的黑暗之中（im Daemmerlicht der Katakomben）：<sup>ii</sup>而个别的传教士终年分散在各地，他们住在陌生人和教外人当中。然而，今天他们聚集在一起，通过这个神圣的发愿行动建立起精神的、高尚博爱的纽带。另外，这个典礼很重要，它是山东南界第一次省会会议（Provinzkapitel）<sup>iii</sup>重要工作的结束之笔。

“我们的辅理修士们早在圣母升天瞻礼（在8月15日）上宣发了圣愿，而今天，在圣巴尔多禄茂（Bartholomaeus）的节日（8月24日），司铎们站在祭台边宣发圣愿。

“我们都穿着白色礼服（Chorrock），头上戴着中国式的祭巾，<sup>iv</sup>跪在祭台前。祭台上有圣三像。坡里的小教堂座无虚席。尊敬的主教在辅祭的陪同下走向祭台并向他的传教士们讲道，他阐述了这个典礼的重要意义。

“后来他将圣体光放在祭台上，我们在救世主面前，在主教感人的言

---

i 译者注：见《圣经·路加福音》6：13。

ii 译者注：“地窖”（Katakomben）指古罗马教会的地下墓穴，当时是教会的避难所。韩宁镐暗示，中国教会也处于迫害和教难之中。“宗教自由的条约”指清廷于1842年、1844年和1858年签订的条约，其中有规定：中国人有宗教信仰自由，也可以选择基督信仰。

iii 译者注：“省会会议”指修会，即圣言会内部的会议。这种会议一般几年举行一次。

iv 译者注：当时的习惯是，司铎在弥撒中应该戴着“祭巾”，这样符合中国传统。

辞下宣发圣愿：神贫、贞洁和服从圣愿。20位司铎分别宣读那充满意义的誓词。这些誓词仿佛串成一首歌上升到上主面前——上主以具体的形象降临在祭台上，在我们中间。1900年以前，上主接受了那12位门徒的诺言，而现在他同样地接受着我们的诺言，他召唤我们成为他的使徒，召唤我们将福音带给山东南界，带给那些可怜的教外人。

“后来我们还唱了圣母玛利亚的赞主曲（Magnificat）<sup>i</sup>来表达对上主的感恩，最后，圣体降福典礼结束了这个美好的庆典。

“会士们心怀诚恳、喜乐，彼此祝贺，他们全心全意投入这个‘家庭节日’。所有的人都属于这个团体，重新肯定了这心灵聚合的纽带。告别的时刻很快到了，每一个人又将出发，有的去东边，有的去西边，继续走每个人的苦路。但是，虽然我们分散在各地，每一个人会一次又一次回顾这个节日，它是我们聚合的纪念碑。”<sup>ii</sup>

第三个恩宠的日子是宣发终身愿的时刻，也就是1894年在济宁举行的一次典礼。在八位宣发终身愿的人中也有韩宁镐神父。他们在发愿前作了四个星期的准备，就是圣依纳爵的大避静。他们仅在圣母升天瞻礼那一天中断了持续四个星期的缄默。<sup>iii</sup>安治泰主教指导避静的开端和结束，其他时间由福若瑟神父指导。这个典礼在圣奥古斯丁（Augustinus）<sup>iv</sup>的节日（8月28日）举行。圣奥古斯丁是韩宁镐神父的主保，他当然会更喜欢这个庆节。

从那时起，韩宁镐神父一辈子通过最神圣的纽带（圣愿）——属于他

---

i 译者注：见《圣经·路加福音》1: 46：“我的灵魂颂扬（magnificat）上主……”

ii 见《耶稣圣心小通讯》，1892/1893，第45页。

iii 译者注：圣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年）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他曾写过“神操”和有关避静方法的书，其中一个方法是保持安静和不说话的方式。在“大避静”中，人们不应该说话。

iv 译者注：圣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年）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神学家、主教、教父和圣人。



的传教修会——也完全投入他的传教使命。我们来听听他如何看待自己的双重身份：“传教士与修会会士（Missionar und Ordensmann）一方面要做勇敢的宣传者，另一方面要做安静的隐修士——这两个理想似乎很是不同，但也不矛盾。我们的经验就能证明这一点。

“通过浏览教会的传教历史，我们会发现，修会对传教工程有很大的贡献。当然也有一些独立的传教士，他们没有修会团体，而我们不要小看他们的贡献。我们也不要说，一名好的传教士必须是修会会士。不过实际上，从中世纪至今，传教工作主要落在修会人士的肩膀上。

“现在的传教地区都分给不同的教会组织负责，而这些组织或多或少都有修会的基本性质。<sup>i</sup>将中国划分为几个地区并交给不同的修会，这种做法的理由很明显：如果将一个传教地区托给一个修会组织，这个地区就能获得长期的、持久的、建设性的服务。虽然一位单独进行工作的传教士也会有很大的贡献，但他的成就必然面对很多方面的挑战：孤立化和缺乏持续性，因为在他年老时，没有接班人会继续他的工作。

“与此不同，修会组织一旦接受一个地区的传教任务，在一定程度上能确保服务的持续性。修会的会士们可以彼此互补、彼此协助，因而他们能保存和继续他们的工作，尽管个别的会士或许不太能干或缺少才华。

“另外，修会团体可以为传教士提供家庭和故乡的安全感，这是支撑他们的力量。传教士们在远方传教，而他们需要从家里获得援助，就像军队一样，前线的士兵也需要背后的援助和相应的组织，才可以维持他的奋斗和勇气。

---

i 译者注：当时在中国工作的主要是这些修会：方济各会（在山东北部、西山等地）、耶稣会（在上海、河北献县等地），也有新兴的修会（如比利时的圣母圣心会、圣言会）和类似修会的组织，如遣使会（在直隶等地）和巴黎外方传教会。

“团体中的老成员照顾那些新来的年轻传教士，而这些新力量在适当的时刻也能走到战争前线。团体提供资助，它是母体，支持传教事业的扩大和成长。但是，团体首先是‘祈祷中的援军’，这很像摩西（Moses），他在山上伸开双手并通过祈祷为他的人赢得胜利。<sup>i</sup>

“对每位传教士来说，在一个好的修会家庭中成长，会受到修会在灵修、自我否定、牺牲精神和彼此协助方面的指导，而这些训练是将来传教工作的良好准备。当然，如果修会的训练也考虑到传教工作的具体需要，比如在学习语言、科学教育、技术等方面的需要，那就更好了。

“而且，传教士本人会从修会生活中获得最大的益处。他的会规、长上的监督、多次的灵修激励和训练，这一切给他很大的力量，确保他保持内心的热忱，同时也避免陷入不明智的狂热。如果一名传教士属于一个修会，我们可以说，他越想做一名优秀的修会会士，就越是一名优秀的传教士。

“在传教区中，会士——哪怕是杰出的会士——的生活当然不会如同隐修士的生活，他的‘规律性’（Regularitæet）<sup>ii</sup>要有一些弹性（elastisch）。这种规律的生活不能始终服从钟声的命令或刻板的、不变的形式。灵魂的得救应该是最高的原则！（Salus animarum suprema lex esto!）<sup>iii</sup>这个原则在这里也是有效的。不过，就会规的精神和规律性的精神而言，传教士需要它，更甚于家乡修道院中的会士和隐修士对它的需要。

---

i 译者注：见《圣经·出谷记》Ex 17: 11。

ii 译者注：这里的“规律性”指修会的“会规”（regula），也就是修会对日常生活的安排，比如，共同的祈祷时间、工作的节奏、每天的作息时间表。韩宁镐神父指出，隐修院中的“规律性”当然比较全面，海外的传教士也很需要这种规律性和会规的协助。

iii 译者注：这本来是天主教法典的一个原则。意思是，一切具体的规律和规定本来要为了这个目标，即人们的得救而服务。

“因此，如果修会的修士想成为好的传教士，就应该提高灵修生活、强化修会的精神，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个人的重大传教使命。在这方面，传教事业的内在发展和精神基础的深化必须首先从实际情况着手。”<sup>i</sup>

---

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340—343页。

## 第六节 回到传教前线

1893年秋天，韩宁镐神父又踏上了传教之路。主教派遣他到单县和曹州府（今天的菏泽）去传教几个月。该地区位于山东西南边，有很多强盗。1893年11月21日，韩宁镐从那里给他的亲人写信：

“今天是我们的好母亲去世的纪念日，而我非常思念遥远的家乡。也许你们一如既往地生活，而我则骑着我的小马去拜访周围的农村。我去看望那些刚刚接受基督信仰的农民。我走进他们那被烟熏黑了的屋子，北风从四面吹入房子，潮湿的土地使我的脚感到很冷。

“上主，我们仁慈的天主，对我们每一个人有独特的计划，而最幸福的人是那些把自己完全交给他神圣旨意的人，就是那些能忠贞地服从上主安排（*seinen Fuehrungen*）的人。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之路导向那扇‘导入生命的门’。我们已亡的母亲肯定特别关怀我们，并在上主的宝座那里为我们祈求，我希望她已经成为圣人。”<sup>ii</sup>

安治泰主教让韩宁镐神父照顾单县的信徒和望教者，在此之外还给了韩宁镐神父一项特殊的使命。韩宁镐自己写道：“当我去年（1893年）秋

---

i 译者注：见《圣经·玛窦福音》7：13—14：“你们要从窄门进去，因为宽门和大路导入丧亡；但有许多的从那里进去。那导入生命的门是多么窄，路是多么狭！找到它的人的确不多。”

ii 见1893年11月21日的信。

天去山东南部时，尊敬的主教在告别时给予我这样的命令：‘您必须在定陶县建立教会！’定陶县属于曹州，那里还没有教会。

“我十分愿意，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过这次，上主的‘成事’好像与我的‘谋事’是一致的。在附近的曹县已经有很有活力的基督徒团体，虽然也有很多强盗和土匪。这样，我在定陶的边界安排了一位曹县的传教员，如果机会适宜，他就可以在定陶开教。

“果然如此！两个星期后，我在边界的‘守卫者’告诉我，他已经进入这个新地区。曹县的教友们去拜访他们在定陶的教外亲戚并劝他们参加慕道班。那些亲戚本来属于一个较好的民间团体，<sup>i</sup>他们也是可靠的人。传教士的到来令人感到那个地方充满希望。望教者认真学习经文，在他们周围一切都平安。从此以后，定陶开始有了教会生活，而我没有加入其中，这是最美妙的一点。

“一个月后，我想时间到了，我应该亲自去认识我的新子女。因为我不知道去那儿的路，我先去了另一个信徒团体所在地。那里的老会长——一位很活泼的老先生，留着白色的胡须，一看到我就很不好意思，因为当地的信徒没有出来迎接我。这个团体本来不太热心。晚上我召集他们时，有些人也没有来。那位老会长给我介绍他的家人，大约是十多个孩子，最小的两岁，而最大的已经有胡须了。他们都有相当好的信仰基础，也掌握了不少宗教知识。我讲完道理后，我们继续讨论如何鼓励那些冷淡的信徒。不过，好像没有很大的希望。

“第二天快到傍晚的时候，定陶的一个人来了，他要带我去定陶。他

---

i 译者注：“一个较好的民间团体”可能指一个民间宗教或佛教团体、练功夫的团体。在当时的山东社会中，民间团体很多，而传教士们把它们分为“好的”（和平的、非暴力的、虔诚的）与“不好的”（仇视外国传教士的或蔑视基督信仰的）。

三天前刚刚想要成为基督徒。但是，天色已晚，我不敢晚上出发。

“我们刚去休息不久，外面开始传来激烈的枪声。不过，在曹州府地区这是常见的事，人们都不予理会。彻夜都有枪声。据说那天晚上强盗在村子的西边试图袭击这个村子。

“我们一早就出发了。来接我的那个人骑着一匹很瘦的马。当我们两个愉快地往前走时，还听到了南面和北面有枪声。他告诉我，这是为了吓跑那些强盗。

“我越走越感到奇怪。我本来很有‘男子汉’的勇气，但是如果现在强盗来了，用枪瞄准我，我会怎么样呢？我拿着我的玫瑰珠，我想它可以作我的武器。但我们没有遇到强盗，只见到一个老妇人和一个推着独轮车的人。

“在前面，我们看到一座城市的塔楼——城里有较大的军营。我原以为这是人民的自卫队，能保护城市不遭受强盗的攻击。异想天开！这个军营就是土匪的基地。德天恩神父（Vilstermann）<sup>i</sup>已经告诉过我这里的很多离奇的事。另外，我看过一位老道明会会士的记录。他在200年前写道：  
‘在那个地方有基督徒的团体。但是，传教士不能去那里，因为居民太凶悍。因此，我们为一名望教者施洗，而他现在为别的望教者举行洗礼。’  
今天还是这样。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进去了。上主保护他的人！”<sup>ii</sup>

“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你是第一个走入这地区的天主教司铎，你首次用降福之手战胜了这罪恶和长期无信仰的势力。这个还不知道宗教恩典

---

i 译者注：德天恩（1857—1916年），荷兰人，1878年入斯泰尔，1885年祝圣为司铎，1886年到山东，1887年在汶上，1892年在单县，1894—1899年在济宁，1901年后在郓城，1908年任区长，1916年在兖州去世。

ii 译者注：见《圣经·圣咏》97：10。

的地区处于黑暗和迷惑之中。我很想跪下，全心全灵地祈求圣神的降临，使这些最可怜的人获得上天的种种恩惠。

“最后，我们来到李家庄——新的教友团体所在地。望教者们很好奇，他们在村子前等待着我们的到来。孩子们乱叫着，跑过来迎接我们。也有很多的教外人看着我们。我们走到他们的祈祷所——这间房屋真值得描述一下！这是一间草屋，草席挂在门边。墙壁有好几个窟窿，屋顶的木梁很低，尽管我比较矮，但也会碰头。

“这些基督徒请我降福给他们。一开始他们大概觉得这个欧洲人有点儿奇怪，但不久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我与他们交谈，询问他们信仰知识，考他们，也给他们解释他们不懂的信仰真理。我感到很惊讶，这些人懂得很多，特别是小孩子们也会背诵小教理问答和祈祷手册。不过，他们还不太理解那些知识的内涵。

“当我为他们讲课时，外面来的教外人很快打断我们的课程。他们一批批地从附近的村子过来，以电报般的速度传播这个消息：‘红胡子’来了。哎呀，‘红胡子’！我多希望没有这可恶的胡子！这道胡须很远的地方就宣布：‘欧洲人来了！’还吸引了很多人来看笑话。但是，这道胡子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因为没有胡子的传教士看起来就是一个年轻人，而中国人只尊重老人，不尊重年轻人。因此，我必须接受我的红胡子。

“村里的人一个个都来看我的胡子，此后我就开始和他们说话。一直有新的人来，也有人离开，我还是尽量讲完一个道理。人们告诉我，在前面的村子也有人想入教，他们劝我拯救他们的灵魂。这些人如此善良、如此俭朴，谁都会觉得上主应该怜惜他们。

“讲完道理后，我们谈论强盗的问题。人们的哀叹真令我难受。他们

说，现在的情况很糟糕，比叛乱时期<sup>i</sup>更艰难。现在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有强盗出没，没有人能保证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他们也谈论很多令人感到恐惧的故事。最后一个人小声地说，昨天有一伙土匪袭击单县将军，即岳将军，而这些强盗现在就住在附近一个比较富有的农夫家里——离这里只有一里半的距离。那个农夫不敢拒绝他们。我们也应该小心一点。我想，多么糟糕，因为曾经有一名传教士抓了一个土匪首领，从那以后，土匪们就不太喜欢教会了。

“因为整天说话，晚上我感到很累。虽然心情很好，但那时我感到实在没有力气，甚至也没有时间念日课。我在屋子里念日课的时候，我的传教士在外面继续与那些人说话，然后送走他们。最后还来了一个喝醉了的男子，他非要看我不可。最后我们终于很客气地把他送走了。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望教的人——特别是小孩子——如此信赖我，好像他们已经认识我很长时间。他们看我的日课本，背诵教会的祈祷经文并讲述他们家庭的事情。这些都很奇怪，因为新信徒一般来说都比较谨慎。

“我教他们画十字圣号——传教员没有教他们这个。他们也从来没有做过共同的祈祷，所以我想教他们练习一下。我跪下，然后开始做一个祈祷。当然，他们念经并不是很好听，他们不重视圣歌的节奏，也没有把曲子唱好。我想起了被投入狮圈的达尼尔（Daniel in der Loewengrube）。<sup>ii</sup>但仁慈的上主也会喜悦地接受他们的祈祷。后来我向他们讲述关于十字圣号的道理。

---

i 译者注：“叛乱时期”大概指捻军（1853—1868年）和太平军北伐（1853—1854年）时的混乱状态。

ii 译者注：见《圣经·达尼尔》6：11等。



“我们还谈论了很长时间。那时，我知道了很多事情，特别是教外人对我们欧洲人的认识。比如教外人说，当欧洲人向土地吹一口气，这块土就会变成银子。所以基督徒们开玩笑说：‘神父，请你给我们吹几块地！’哎呀，如果我真的能做到，我就会吹一吹，直到我的面颊吹坏了！这样，我们的传教事业会赚多少钱呀！这个方法太好了，不需要写信劝人为传教事业捐钱。”

“整个夜晚都不太安静。60个人在外面守卫。周围始终有枪声，我们好像是在战场上。那些巡逻的守卫者从我们的屋子进进出出，他们点着炉子，学习、祈祷、谈话。我根本不能睡觉。”

“第二天一早，我起来准备举行弥撒。天气很清爽，偶尔能听到枪声、炮声从远处传来。我们用一个桌子作祭台。因为没有别的烛台，我就用望教者以前在祭祖先的时候用过的烛台——一匹小小的石马，马背上有一个可以放蜡烛的地方。信徒们围绕着祭台桌。虽然我作了一些讲解，但他们大概还不太了解他们所分享的伟大恩宠是什么意思。就这样，我在这个地区举行了第一台弥撒，基督那纯洁牺牲的火焰升腾在一个外教文化统治了几千年的地方。”

“太阳出来了，我们又要出发了。一般来说，传教士的第一次到访都比较短暂。那些信徒一直送我到村外。我们已经成了朋友，走的时候我感到有些悲伤。我向他们承诺我很快就会回来。”

“在路上我们随时可以听到已经习惯了的‘战争音乐’。很多地方都会这样：手拿长矛或枪的人站在房子门前防守。这真是‘强盗之邦’。我的小团体发展得很好，那里有80个望教者。人们自己建的新祈祷所很快就要完成。在整个陶县，李家庄是唯一有基督徒的地方。我希望，明年冬天

我们的信徒会大量地增加。”<sup>i</sup>

我们的韩宁镐神父很快就要体验到他确实是生活在“强盗之邦”了。上面已经提到过，那时有一位传教员用计谋抓住了一名土匪首领，并将他扭送到衙门。这件事影响到了别人，在韩宁镐的传教区有两个传教员也这样做。他们请当地声名狼藉的土匪首领吃饭。先给他很多东西吃，当他喝醉时，他们在几位基督徒的协助下将他捆起来并送到监狱。

这件事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被逮捕强盗的哥哥带领了一批强盗，要找那些基督徒进行报复。这两个传教员被迫逃跑，其他的信徒与传教士也处于很大的危险中。韩宁镐神父也面临死亡的威胁，而他能安全地逃脱困境真是一个奇迹。他叙述道：“这个人晚上与他的同伙在一个祈祷所威胁我，用他的枪杆瞄准我。就在这个时刻，他背上的另一件武器走火了。子弹从他耳旁擦过并射入草屋。他的衣服上烧了一个很大的窟窿。因此他很快改变语气并安静下来。我一直认为，在这个奇怪的事件中我看到了护守天使的保护。”<sup>ii</sup>

这个强盗吓坏了。他向韩宁镐神父道歉，说不敢再骚扰他。但是，整个地区的强盗对教会还是充满敌意，所以传教士们必须暂时回避一段时间。韩宁镐神父去了济宁，两个月后返回，夏天再去济宁宣发终身愿。后来他在“强盗之邦”（菏泽地区）任四个县的总本堂神父。

关于传教员的行动，他曾说：“在公共安全、治安和逮捕强盗的问题方面，传教士们应该等待当局的行动。传教士们不应该引起那些粗暴强盗

---

i 见《耶稣圣心小通讯》，1894年，第2页、11页等。

i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266页。

们对传教士或信徒的敌意。”<sup>i</sup>

刚开始没有遇到大的问题。他给德国的家人写信说道：“这个冬天工作很多，也充满风险，但现在我终于可以在自己的房间中稍事休息。政府派给我们很多士兵，以至于强盗都逃跑了。不过，他们还没有完全消失！前几天就有一些强盗来找我。一看这些家伙，你就知道他们是强盗，因为他们让人害怕不安。你想想，这些人已经放了多少人的血，真令人毛骨悚然。

“感谢上主，我在这里相当好！我有很多工作，也有很多人加入教会，但是十字架和忧虑也更多。我的心，你还求什么别的东西？有一样东西我真缺少，那就是钱。我的主教给我的钱不够，这一年我几乎不能继续工作。我也需要一个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sup>ii</sup>先生，需要一个将善功兑现为金钱的人！但是光靠人们的帮助是不够的，所以我将会依赖上主的助佑。我相信，我和我的信徒在这里会获得最好的保护。”<sup>iii</sup>

半年后，他写道：“我还住在这个充满风险的强盗之邦中。去年冬天的动荡和暴风差不多过去了。”<sup>iv</sup>因此，传教工作也可以安然地进行。今年，上主特别降福我们，并带给我们很多新的信徒和望教者，大约有几千人。我们所在的这个总堂区现在共有四位司铎。

“今天我在城里（单县），要拜访这里的新官员，他前几天才调到

---

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266页。

ii 译者注：罗斯柴尔德家族是19世纪欧洲著名的银行家族。

iii 见1895年5月25日的信。

iv 译者注：“去年的动荡”指1895年5月8日在烟台签订《马关条约》之前的“动荡”。当时，清政府很弱，而内地的强盗利用了当时的无序。1895年5月，政府才派兵镇压山东地区（特别是巨野、单县、成武、曹州）的强盗组织。

这里来。在中国，官员有很高的地位，他们在自己的辖区拥有绝对的主宰权，他们可以任意下令打一个人或拷问一个人，而官府的豪华装饰就表明他几乎是半个君王。

“这个城市还没有基督徒。因此，虽然今天是主日，却只有我一个人在餐馆的小屋子中安静地举行弥撒。每当我在教外人的环境中偷偷地举行神圣的弥撒圣祭时，我就感到很悲哀。我想，初期教会的信徒走入罗马城的地下墓穴时，他们大概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们在下面祈祷，而在他们头上，罗马的街头正充斥着罪恶和残暴。中国要变成基督化的国家，那还得走很长的路。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大家做很多工作、很多祈祷，而且要接受很多痛苦。

“另外，你们不要认为，这个民族因为没有基督信仰就没有文化或没有修养。在单县这个城市中可以发现，中国的文化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街市上一个摊子挨着一个摊子，人们相互沟通时都很有礼貌——礼貌得几乎让人受不了。他们的服装很干净，与欧洲服装一样有风度。但在这些比较文明的市民中，很少有皈依者。直到今天，福音的恩宠更多施予乡下的人。

“单县正在举行年集，这个年集要持续15天。商人们途经100或200小时的路程来到这里，在街上摆设自己的摊位。中华帝国所生产的一切东西，在年集都能买得到，走马灯、回转画、稀奇的动物，等等，在这里应有尽有，就像欧洲的博览会一样。总而言之，我们很佩服中国人在娱乐方面的知足（*Anspruchslosigkeit*）。<sup>i</sup>他们没有舞蹈或舞会，也没有低俗的娱乐活动或非法集会。

“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是11月底。虽然我们的纬度比德国靠南很

---

i 译者注：意思是，韩宁镐认为，中国人在很朴素的东西中也能找到乐趣。

多，但这里已经下了几次雪，不过每次都会在中午的阳光中消融。这里有时候很冷，因为没有炉子，也没有煤，所以我偶尔会感到不舒服。如果我的笔迹显得我写信时手有点儿发抖，你们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了。”<sup>i</sup>

然而，那时的平安原来只是暴风来临之前的安静。韩宁镐1896年2月和7月给斯泰尔修院写了报告，描写当时的情况。

“因为在乡下爆发教难，我逃到单县了。我住在一家餐馆，也有时间写信。今年的春节好像带给我们的曹州府（菏泽）地区很大的灾难。

“我之前说过那些新的民间组织的情况。这个组织自从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年）以来一直在这个地区活动。他们自称‘金龙照’或‘大刀会’。首先，他们唯一的目标是保证他们的拥护者不受伤害，他们认为，敌人的刀剑或枪弹都不会伤害他们。我们很难知道他们多大程度上是出于恶势力的影响或纯粹是哄骗。”

在后来写的一些报告中，韩宁镐神父关于这一点有这样的说法：“寿张集的官员非常坚决地反对该组织的人。很多大刀会的人在镇压中伤亡，而这位官员又处死了许多被逮捕的人。他审判那些人时，用一种所罗门式的判断方法（salomonisches Urteil）：<sup>ii</sup> ‘我仅要考察一下，你是大刀会的人还是强盗。如果你真是大刀会的人，那么我就不能伤害你。但是如果你是强盗的话，你就应该受到惩罚。因为你们这些大刀会的人不会受伤，所以，当我砍你的头时，假如你的头真掉下来就证明你是强盗。而如果你是大刀会的信徒，我的剑也绝对不能伤害你。’ 结果这些人士都被发现是强

---

i 见1895年11月24日的信。

ii 译者注：Solomon（一译所罗门，又译撒罗满）是公元前970年代左右至公元前932年的犹太人国王，被认为是最聪明的法官和判决者。见《圣经·列王纪上》3：16—28。

盗。”<sup>i</sup>

“自从这个组织形成以来，我始终很担心，它将是天主教的敌人。大刀会真是一个魔鬼的组织，是那条旧蛇的后裔，它用魔术的诡计引诱无数的人陷入灾难。这条毒蛇抵抗那位神圣的踏碎蛇龙者（goettlicher Schlangenzertreter），<sup>ii</sup>这也是必然的。

“然而，危险加剧了，因为在大刀会势力最盛的地区，天主教也有很大的希望和进展。就在这个地区，两个县（成武县和曹县）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了五十多个新教友团体。这样，教会面对着一个迷信的民间组织，可以想象，针锋相对的派别之间必然会有一些摩擦。

“当然，我们尽量避免一切会引起争吵的事情发生。我们嘱咐我们的传教员和新信徒不要说任何会引起争论或表示敌意的话。一开始，这种共同生存的方式还是可以的。但是，大刀会成员的傲慢表现引起新教友的不满，而这些新信徒也不能保持忍耐，当然他们不是最谦逊的羔羊。因此，双方之间的张力增加，冲突加剧，我们这些传教士十分忧愁，因为教难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发。

“在单县地区就发生了这样一个‘前奏’。这个地区的基督徒团体都是望教者的团体，当他们反驳那些辱骂他们的人时，一位传教员被捕。他因自己口才好而获得释放。侯神父，<sup>iii</sup>他是中国人，也马上通知天官<sup>iv</sup>的武

---

i 见 *Taegliche Beilage zur Germania*（德国某报纸副刊），1900年2月24日。

ii 译者注：基督被视为“踏碎蛇的头颅”者（《圣经·创世纪》3：15），亦见《圣经·默示录》20：2。

iii 译者注：侯伯禄（Petrus Hou Bolu，1862—1934年），1862年6月13日生于易县（河北）八里庄，方济各会会士，来到坡里庄后，于1892年6月29日由安治泰祝圣为司铎，后在成武、定陶、阳谷、高密、即墨等地传教，于1934年11月14日去世。

iv 译者注：天官庙，山东地名，地理位置在成武以南。

官。这位军官在镇压强盗组织中曾有很大的贡献，也一直是教会的朋友，因为他的一些亲戚是基督徒。我们必须感谢他。因此，有一次我送给他一只小小的怀表（价值4马克），他特别高兴。现在他马上派出了一个军官和十个士兵。但这十个人远远不够，连他们自己也受到威胁。因此，他们只能通过谈判而获得撤退的机会。当然，大刀会人士因此更加自得。

“我们很快发现，他们通过各种毁谤使那些高级官员对教会产生怀疑和敌意，因此这些高级官员此后不再反对大刀会，一部分官员甚至直接支持他们。我们没有反抗的余地，这又引起大刀会人士和教外人的冷嘲热讽。而我们的望教者和新信徒面临重大的考验，他们中也有不少人离开教会。

“当地的道台——他是一位有正义感的人——宣布要严惩大刀会，并悬赏捉拿大刀会的首领，所以我们有了新的希望。<sup>i</sup>但这不过是说说好听的罢了。大刀会的头目还多次公开去衙门，他们并没有被逮捕，反而与官员维持着良好的关系。那次宣布的效果实际上适得其反，因为大刀会的人认为是教会影响了道台作这样的宣布和规定，所以他们更憎恨教会了。

“这样，就激发了反对我们的风暴：<sup>ii</sup>许多教堂被破坏，信徒被殴打，他们的财产被掠夺。在教堂和被破坏的房屋的废墟上，那些人进行着各种贸易活动。他们以几乎相当于白送的价格向教外人出售基督徒们的财产：一袋小麦只要40分或50分，一个手转磨只要1马克。这些凶手和放火者马上宰杀了牛、驴、马、鸡，或把这些东西带走。最后他们还找到基督徒的田地，毁坏他们的庄稼。一拨又一拨歹徒破坏着基督徒的村子，他们夺走全

---

i 译者注：根据伯义思神父（Buis）在*Stadt Gottes*（1897, S. 71）的报告，当时的道台是毓贤，他于1896年5月去视察曹县和成武地区。视察后他于5月底宣布要逮捕大刀会的头领，头赏是100两白银。

ii 译者注：这个“风暴”指单县1896年6月15日到6月25日的大刀会暴乱。6月底，政府军队成功地镇压了这次暴乱。

部财产，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我们这些可怜的信徒逃来逃去。很多家庭破裂，他们面临死亡的威胁并躲藏了起来。他们向同情他们的教外人乞讨。他们也不能去外教亲戚那里，因为如果去了，那些亲戚也会遭受迫害。当地的官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制止这种残酷的破坏。那些高级官员也没有任何行动，而省会济南的巡抚<sup>i</sup>希望在华的一切欧洲人和整个基督教都被消灭掉。

“我们处于如此大的困境中，所以我们发电报给领事馆和北京的外交官。我们也向斯泰尔的总会长发电报，求他为我们祈祷。我们只能通过大家的祈祷而获得拯救。也确实如此！在那些日子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些叛乱者抢劫信徒的财产之后，开始攻击那些比较富有的教外人，还掠夺他们的财产。公共舆论因此开始转向，越来越多的人反对他们。几个村子的人集合起来一起反抗那些叛乱者。在这场战斗中，叛乱者不占上风，大约有100人被杀，15名强盗被捕并在单县被斩首。两个主要首领也被斩首。这件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至少在表面上这个迷信组织被瓦解，但有很多拥护者还想进行报复。

“传教区很多地方的教会团体被毁灭，十年辛苦毁于一旦。仅在单县地区就有5个比较大的教堂被烧毁，11个比较小的圣堂被拆毁，28个基督徒团体的信徒的财物被抢劫一空。其他地区的教会也遭受了破坏，特别是耶稣会管理的江南的传教区。<sup>ii</sup>

“现在我们应该在废墟上重建教会。但是，资助从哪里来呢？首先我必须照顾和帮助那些可怜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失去了一切。我不能拒绝那

---

i 译者注：当时的山东巡抚是李秉衡。

ii 译者注：指碭山地区。



些遭受沉重打击的人——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和自己家里不受欢迎。因此，我接受了这重大的负担。但是，如果没有你们的协助，我恐怕不能坚持很长时间。

“在那些悲痛的日子，因一些基督徒的坚强和忍耐，我们感到一丝欣慰。很多人约伯一起说：‘上主赐的，上主收回。愿上主的名常受到赞美！’很多人在教外人的迫害下坚持并宣告他们的信仰。这是上主给予的恩典，感谢他！”<sup>ii</sup>

大刀会的头目被逮捕后，整个地区恢复了平静。“但是信徒们还要等待几个星期才可以回家重建他们的房子。经过艰难的谈判，政府同意给一些赔偿。为了重建被破坏的教堂，政府赔偿了一万两白银。但是，基督徒本身很少有得到赔偿的。他们大多数人都空手而回。这样，传教士必须照顾他们，在困境中协助他们。”<sup>iii</sup>

韩宁镐这位受苦受难的传教士是基督徒的好榜样；他没有垂头丧气，而是依赖上主，同时努力重建他的传教区。他写了很多信向家乡求援，特别是给自己的亲友写信。1896年4月他给他的姐姐写信道：“我很少给你们写信，而今天又是出于私人的利益。我需要你们。请你们帮助我向别人寻求资助。你们以前已经这样做过，但在这个时候，你们必须做更多。因为我正处于困境中，我急切需要协助。如果我不能还清我的债务，我便不能长久在这里工作。

“你们知道，我是曹州府地区（菏泽）的总本堂神父——这个地区动

---

i 译者注：见《圣经·约伯传》1：21。

ii 见1896年2月23日和1896年7月18日的信。

ii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366页。

荡不安、充满风险，但这里的传教工作也结出了很多美好的果实。去年这里有两百多名新领洗的人——虽然大刀会这个邪恶的组织极力反对我们，如果没有教难还会有更多的人领洗。因此，我很喜欢在这里工作，只是‘物质上的困境’带给我忧愁。

“今年我应该至少在六个地方建立祈祷所。中国的信徒团体都需要祈祷所，这是一个基本的需求。传教员和路过的传教士一般都住在祈祷所。信徒们在祈祷所共同完成他们的早祷和晚祷。他们在这里学习教理问答。每天的共同祈祷是中国基督徒的纽带，如果没有这个祈祷，基督徒团体将会解体，而信仰会死去。因此，建立这些祈祷所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人弹管鼓瑟，一切乐器都是缄默无声’（Wo du nicht bist der Organist, da schweigen alle Floeten, 意即‘无人努力去做，就无收获’）——你们也熟悉这个谚语。这里的基督徒几乎都很穷，而那些富有的人几乎都没有基督信仰。

“我为两个团体挖掘了山洞，这些山洞是我们的祈祷所。当然，这些黑暗的洞穴并不太舒适——你们可以相信我，因为我有体验。土墙滴水，那些爱冷嘲热讽的教外人嘲笑我们这种‘天主堂’——可想而知。不过，这至少是一个可以住的地方。但这些土房的木梁是一个教外人的，他要我们还给他。此外，即将到来的雨季肯定会淹没这两个窑洞。传教员将必须穿上游泳衣，他们可以在祈祷所中做冷水医疗。那里的基督徒热切恳求我帮助他们。我很想帮忙，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另一个团体，一个新信徒把他的房子借给我们。那时他正好在外

---

i 译者注：“冷水医疗”即Kneippische Kur，是当时德国流行的治病方式之一。在山东的外国传教士也多次依赖于这类的“土方法”来治他们的病（如伤寒症），因为起初他们没有更好的医疗设备。“传教员去游泳”这句话当然是韩宁镐开玩笑说的。

面种地，但现在他不再种地了，所以他和他的家人没有了房子。这样，我当然必须归还他的房子。在别的基督徒团体中，基督徒几乎都垂头丧气。他们叹息说：‘传教士不要我们了！’而个别的人就离开了教会。

“这就是教会的困境！另外，我还必须给几个传教员和女经文老师（Gebetslehrerinnen）支付工资。如果我让他们回家或不再雇用他们，传教事业将会解体。

“因此，求你们帮助我！请你们去找朋友和亲戚。我也很愿意向我的恩人们写去感谢信。谁帮助得快，就请谁帮助两次！”<sup>i</sup>

图林根的圣伊丽莎白（Elisabeth of Thuringia）的主保日<sup>ii</sup>那天，韩宁镐给他的姐姐伊丽莎白写了一封祝贺信，也在信中描述了他在忧患时期的心态。他这样写道：“这几个月，我感到我的十字架太重。但我突然想到，圣伊丽莎白，她是一位奇妙的圣人——她遭受抨击，但仍然在内心赞颂上主。

“当然，如果心在上主那儿获得安宁，世界再多忧患又如何？你在家庭中有那么多孩子，大概也知道什么是十字架吧！但我们应该为此而感谢我们的在天大父。今天我在阿尔（Ars）的圣牧<sup>iii</sup>讲道词中念到这句话：‘不爱十字架的人也许能得救，但他也会面临很多问题。每天早上将自己献给上主，将自己作为祭品，并将一切困境视为对罪过的补赎，这是多么甜蜜

---

i 见1896年4月17日的信。

ii 译者注：图林根的圣伊丽莎白（1207—1231年），匈牙利公主，图林根路易四世之妻，她从事慈善工作，办济贫院，收容贫民和病人。

iii 译者注：阿尔的维阿内神父（Jean Baptiste Maria Vianney, “Cure d’ Ars”, 1786—1859年），法国司铎，在艰苦的条件下引导很多人了解基督信仰。1925年被册封为圣人，是牧灵者的榜样。

啊！’

“在这个涕泣之谷的世界，我们都有一个召唤，就是背负十字架的召唤。最近几个月，我也接受了很多痛苦和十字架，而将来也许会有更多的挑战。最可恶的是那些不讲理的官员，他们千方百计来阻碍我们的工作。这些恶意的迫害者毁灭我们费尽心思才取得的成果，我们只能徒呼奈何。另外，一些软弱的、不冷不热的信徒——圣保禄说这些人只‘谋求自己的事’<sup>i</sup>——也让我头痛。有时候，我真想与保禄宗徒一起说：‘我厌恶这个生活！’

“但是，上主的恩典协助我面对这一切困境。我们都必须经历忧愁而进入上主的光荣。<sup>ii</sup>上主的国从一开始就是由血、汗和泪水构成的。

“大概你也不想继续听我的叹息和呻吟，但请你谅解我：心满其事，口出其言，笔出其词。<sup>iii</sup>

“目前我正在建房子。教外人所破坏的，我现在重建。虽然是11月底，但每天都是晴天。我希望好天气还能持续几天，直到屋顶盖好。这里的冬天气候很难预测。有时很早就冷得不得了。没有炉子。中国人烧炕取暖，但烟很多，几乎让人窒息。

“中国人的服装穿戴非常方便，习惯了你会觉得比欧洲的衣服更舒服。今年的夏天非常热，我们传教士中有很多人因气温太高而生病。我的手和脚也肿起来，几乎不能动。”<sup>iv</sup>

---

i 译者注：见《圣经·斐理伯书》2：21：“人们都谋求自己的事。”

ii 译者注：见《圣经·默示录》7：14：“忧愁”（Truebsal）或译“大灾难”。

iii 译者注：见《圣经·玛窦福音》12：34：“心里充满什么，口里就说什么。”

iv 见1896年11月18日的信。

那时，山东西南地区的教会走过了一段很艰辛的路，而与此同时，山东中部地区的事业也有很大的进展。十年里，人们热切期待在兖州市能有教会的房子，而这个愿望在那时实现了。通过清朝皇帝的直接介入，兖州府打开城门欢迎教会。<sup>i</sup> 当安治泰主教进入兖州时，市政府为他准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还支持他在兖州建立传教点。多年的争吵终于和平结束。这个重大的突破给天主教带来很好的名声，并因此吸引了很多信徒。

韩宁镐神父也必须放下他于1896年8月至9月间在菏泽地区的重建工作。他的长上要求他去济宁当避静导师，叫他主持外国传教士（神父和修士）的年度避静。他必须讲三次避静，两次为神父们，一次为修士们。因为神父们大多都比他大一些，再加上主教和会长（福若瑟神父）也都参加避静，所以他有点儿紧张。但是，他服从长上的命令。他报告说：

“第一个避静福若瑟神父和安治泰主教也参加。主教的房间有一个通往教堂的窗口，所以他随时能听到我的讲话。福若瑟神父始终坐在最前面的长椅上，他和平常一样，一直很专心，很谦逊。现在（24年后）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念头，就是：他就符合我当时所描述的理想神父和理想传教士的标准。”<sup>ii</sup>

1896年秋天，传教士们在另一个地方买到一块地，韩宁镐神父在这方面也予以协助。传教士们一直有这样的想法：他们需要一个正式的修会会

---

i 译者注：“兖州突然向教会开放”这种现象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系。1896年是德国和清朝政府关系非常好的时期，因为中日战争结束后（1895年），日本索求辽东半岛，但德国和其他列强向日本施加压力，所以日本被迫放弃了辽东半岛。1896年，李鸿章去德国，但德国政府利用这次机会向他提出“德国在中国需要港口”的要求，其主要理由是德国轮船没有自己的煤炭，必须从上海或香港购买英国人的煤。当时李鸿章拒绝了这种要求。

i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347页。

院，需要修会家园。他们能在那里举行每年几个星期的年度避静，能在那里举行会议，在精神和身体方面“充电”，并能在会院照顾患病的或年老的传教士。为此，他们在济宁以北五公里的地方以合适的价格购买了戴家庄的房产。这个地方已经有房屋，七位传教士司铎在1897年下半年就在这里完成了他们的初学任务，初学后他们就宣发终身愿。<sup>i</sup>另外，在1897年耶稣圣体节瞻礼上，他们在戴家庄的宽阔园子中举行了山东南界的第一次圣体游行。

韩宁镐神父写道：“那是我们第一次与耶稣圣体一起隆重地走入美丽的春天。只有很少的信徒与我们一起游行。我们几个司铎还唱着多声部的歌曲。旁边院子的墙壁上坐着一些教外人，他们好奇地观望我们。那是一个简单的、美好的礼仪。对我们传教士来说，这是一个感人的礼仪，因为救世主的圣体在教外人的地方游行，这实在是很奇妙的想法。另外，传教士们也想起他们年轻的时候，这已经是很久以前了，但又很美。那么多年了，他们没有举行过这样隆重的圣体游行礼仪。”<sup>ii</sup>

1898年和1899年韩宁镐总本堂司铎与他的助手们在十分平安的环境下管理着他的大区。信徒们所受的苦难结出了成果，因为信徒和望教者的数量迅速增加，总共达到两万人。虽然山东南界其他地区的教会——甚至可以说全中国的教会——那时面临可怕的教难，但韩宁镐的地区保持安宁达两年之久。当时一些欧洲报纸以及德国国会中一些议员说，是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自己引发了教难，所以，韩宁镐神父在德国的《科隆人民报》

---

i 译者注：终身愿之前的初学被称为“第二个初学”（second novitiate）。

i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352页。

(*Koelner Volkszeitung*)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来说明当地的具体情况。根据他在文章中的观点，中国的基督徒是无辜的，而应为教难负责任的是一些高级官员。他写道：

“当时在别的地方爆发了反对教会、反对传教工作的运动，而我们的总本堂区反而安然无恙——虽然这个地区被称为‘经常发生起义的地区’。在南边，也就是在单县和曹县，人们根本不理睬外面发生什么事。靠近早已发生叛乱的地区，比如成武县和定陶县，那里的人们根本不愿意加入这种敌视教会的运动。本地区大刀会头目与我们的传教员的关系都很融洽！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不要加入那些暴动，因为我们和我们的信徒对他们都很友好。

“而且，根本也不存在任何引起暴动的理由。在这四个县，一年里没有发生过任何扰乱本地区信徒（很多，大约两万人）和教外人关系的事件。我们不必找地方的官员，不需要在他们那里提出什么诉求，不需要口头或书面告状。另外，那两位官员也对我们说，他们没有听到有反对基督徒的控告。他们赞扬基督徒们，因为基督徒待人平和，而且他们说没有任何不满。”

韩宁镐神父接着证明说，毓贤是一个反对教会、仇视教会的人。当他1899年4月被提名为巡抚后，人们的态度开始改变。毓贤悄悄地——但这是肯定的——煽动大刀会那些老叛徒去反对各地的基督徒。大刀会那些团体——其中也有士兵，甚至有一些官员——后来袭击信徒们并破坏他们的房子。

“然而，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很多教外人保护基督徒们！几个村子的村长——他们都是教外人——派民兵来保护基督徒。他们打败了大刀会人

士并驱散了他们。”<sup>i</sup>

韩宁镐神父不愿离开这个地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为这个地区投入了很多精力，并饱受磨难。后来几年，他在青岛负责欧洲人的牧灵工作，有时候他半开玩笑半严肃地叹息说：“但愿我能回到曹州府（菏泽）去，那里有可爱的强盗们！”

---

i 见1899年9月8日的报告，发表在《科隆人民报》Nr. 1039, 1900年11月16日。



## 第七节 在青岛

我们先回顾一下相关的历史，以便更全面地了解韩宁镐神父在胶州地区和青岛的工作环境。胶州地区和青岛原本不属于山东南界的传教区，但由于一个很不幸的事件，这个地区成为德国租界和圣言会的传教区。

在1897年11月1日，追思已亡瞻礼的前夕，能方济神父和韩理神父这两位德国传教士在张家庄（巨野市附近）遇难。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友好而充满前景的基督徒团体中，发生在一个平安的环境中。

凶手的主要目标好像是杀人，他们不想夺走什么财产。他们究竟是谁？有什么动机？当时人们并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这是一个谜。

这两位传教士本来很受人欢迎，一个在山东已经生活了12年，另一个在山东传教已有7年之久。韩宁镐神父写道：“一批又一批的基督徒和教外人来到棺材边，瞻仰这两位传教士的遗容，并在那里痛哭。他们悼念这两个人——他们为了中国人而离开自己的家乡，并且牺牲了性命。”他认为能神父是一位谦逊、负责任、服从长上的会士。所有的人都尊敬他，他忠贞地、不畏艰险地、以崇高的奉献精神进行工作。韩宁镐神父指出：“我们这些传教士都很喜欢能神父和韩神父。韩理神父无疑是教区最杰出的传教士之一。他有才华，相貌堂堂，说话流利，善于管理事物，并且是一位很可爱的、高尚的人。他的幽默和微笑能给人带来安慰，同时他愿意作出

---

i 译者注：亦译为“追思亡者的节日”。

牺牲，热心工作，愿意为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服务。他完全投入到他的传教工作中，而这个工作是在很复杂和危险的环境中进行的。”<sup>i</sup>

传教士们怀着悲痛的心情陪同他们的年轻弟兄走到戴家庄的新坟墓。韩宁镐神父用汉语在葬礼中致悼词。

而那些杀人犯呢？当地的官员们责怪强盗，他们逮捕并处死了一些人，虽然这些人被认为是无辜的。他们想这样解决此事。但是，人们逐渐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杀害这两位神父的凶手是一些大刀会的人。当地人也控告他们，并要求严惩他们，但他们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很明显，高级官员在保护他们。单县的道台曾流露出官员们的敌意。当时，韩宁镐神父寻求他的保护，因为在单县也许也会发生教难。但道台冷漠地回答：“如果你在这里感到不安全，你就应该回到欧洲去！”有这样心态的官员当然不会保护教会。但是，韩宁镐神父所在的地区能长期保持安定。

在谋杀案发生时，安治泰主教正在斯泰尔，参加在那里召开的修会大会。他通过电报获知两个人遇害的消息，就立即请求德国政府有效地保护德国传教士和基督徒，另外他还请求德国政府支持他向清政府提出的赔偿要求。他担心，如果不以较为有效的措施来保护山东的教会，那么这起杀人案可能是大规模教难爆发的信号。

德国政府原来承诺要保护教会，现在也马上采取行动。德国驻华公使海靖男爵（Edmund Baron von Heyking）<sup>ii</sup>在北京进行谈判。当时，安治泰

---

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372页、373页。

ii 译者注：海靖男爵（Heyking，1850—1915年），德国外交官，1896年任德国驻华公使，1897年德国海军占领胶州湾后，与总理衙门就租借胶州湾进行谈判，于1898年3月与李鸿章签订《胶澳租界条约》。海氏于1899年返回德国。

主教提出的赔偿要求是：调走山东巡抚李秉衡——他反对基督教，建立三座教堂，并在教堂悬挂皇帝的保护匾额。

柏林政府派遣德国在东亚的海军占领山东胶州湾与附近地区，这就是后来的租界。德国政府的这种攻击是一种政治性的策略，山东南界的主教与这种攻击本来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因为传教士遇害案构成了外在的起因，所以在中国人的眼中教会也要为那次侵略负责任，这也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结果。

德国政府的行动使清朝政府从睡梦中醒过来，社会政治层面有全面的改变，而对基督宗教来说，似乎将要开始一个黄金时代。年轻的光绪皇帝<sup>i</sup>突然表现出很大的改革热忱，他想以欧洲为榜样，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基督宗教受到尊敬，并很快在人们的心目中建立了威望。很多望教者愿意入教，而那些长期受迫害的基督徒们突然受到优待。这样，他们偶尔也变得骄傲，有时甚至滥用自由。

然而，反对的声音也不会少。中华帝国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时期都是封闭的，仍保留着很多古代的观念、风俗和政治制度。这些传统的体制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因此，守旧的势力越来越强有力地反对一切外来的东西，特别是基督宗教。很多中国人特别反感基督宗教，他们认为在西方文化入侵的过程中基督宗教是“罪魁祸首”。另外，其他的欧洲国家也利用当时的条件，强迫清政府为他们划出“租界”。这样，排斥外国人的情绪变得非常强烈。

1898年9月，这种排外的政治党派在政府中占了优势。慈禧太后下令囚

---

i 译者注：光绪皇帝，1875—1908年在位。1898年夏天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促进“维新”和“改革”，即所谓的“戊戌变法”，后因守旧派（慈禧太后等人）的镇压而失败。

禁光绪皇帝，她自己执政，并秘密颁布“消灭所有外国人”的命令。很多官员也支持她。

为了避免政治上的后果，反对外国人的斗争是不能公开的。山东莒州（莒县）的官员向文安多（Wewel）神父透露内情。他说：“慈禧太后不敢得罪德国人。因此，清廷就煽动民众将德国人从青岛和传教区赶出去。”所谓的“民众”首先指大刀会——英国人首次称他们为“拳匪”（Boxer）。1898年后，这些义和拳团体可以任意袭击传教士、中国基督徒和一切外国人。

教难开始发生在山东周围的省分，后传到山东东南部，进入德国租界，后来传到山东西部，甚至传遍整个中国内地。义和拳的人一批又一批横行过很多地区，他们杀人、劫掠，许多地方的教会很快变成废墟。

当这个风暴愈演愈烈时，韩宁镐神父于1899年秋天被任命为德国租界的军事牧灵者（Militaerpfarrer）。<sup>i</sup>在他之前，福若瑟神父曾在青岛服务，但因为安治泰主教去了欧洲，福神父就成为整个山东南界的代理人。

一位会士这样评价韩宁镐的新任务：“他在青岛，这是再合适不过了。韩宁镐神父的传教工作虽然艰苦，但他通过持续的研究，理解了问题的迫切和时代的困境。因此，他凭着他的渊博知识、杰出口才以及和蔼可亲的个性，通过演讲、讲道和其他机会，影响着他的德国同胞。”<sup>ii</sup>

从传教区的中心（兖州）到青岛有100小时的路程。骑马或乘坐中国的独轮车需要10到12天。韩宁镐神父选择途经上海的路线。他先坐船走运河，又从上海走海路去青岛。这样，他需要14天。这14天，他看到了

---

i 译者注：“军事牧灵者”即照顾军人宗教生活的神父。

ii *Mitteilungen fuer die Region Taikiachwang*, 1938, S. 158.

中国船员的工作、港口的活动以及不同的自然环境，也算是两个星期的休息吧。

关于这个新的工作地点、对它的第一印象和他的任务，韩宁镐神父自己写道：“这个新的、交给我们的传教地区——胶州，包括四个县，相当大。青岛港与周围的地区是德国的真正租界和德国人居住的地方。青岛之外的50公里是所谓的‘中立地’。”<sup>i</sup>

“这儿几乎都是山区。在青岛的东北——靠近海边——有崂山，这是座很高的山，关于它有很多传说和神话故事。这里的自然环境非常迷人。前面有大海，在遥远的地方还能看到一些小小的海岛；在北边、西边和南边能看到大陆的丘陵和山脉。但是，这些山似乎只有骨骼，还需要更多的填充，因为这些山光秃秃的，除了一些奇形怪状的云杉树，没有其他树木。田地几乎是灰色的，很少有人种地。房屋也很少。

“港口很大，它能包容全世界的船只。晚上当我从传教点大鲍岛翻山越岭到达青岛时，我非常享受这美好的风景。海上传来隐隐约约的声音，有点儿像风琴的音乐，夜色中能看到亮着灯的战船、轮船、帆船和小船。闪着灯光的街头和房屋似乎构成另一个布满星星的天空。

“青岛人与山东其他地区的人差不多。这些‘德国华人’<sup>ii</sup>也是纯山东人。但是，那里的语言与山东西部的语言有很大的不同。这也许是因为古代的青岛地区居住着一些土著民，到后来他们才与汉人融为一体。除了德国人，在青岛还有其他的外国人，特别是有很多日本人。

---

i 译者注：根据规定，德国人可以自由地通过这个地区，而清政府若想在此地区驻兵，需要经过德国同意。

ii 译者注：“德国华人”指那些居住在德国租界的中国人。

“1897年，德国人在迪特里希斯（Dietrichs）海军上将的领导下，在这里升起了德国国旗，而当时的青岛只是一个穷困的村子，几乎没有楼房。德国人对这里的设备建设作了很大贡献。他们修建马路、排水系统、防波堤、桥梁以及铁路。铁路线那时已经通往高密。几千名中国人以惊人的速度修建了一条巨大的铁路路堤，这个路堤围绕着整个海湾并通往济南。德国的矿业公司也在山东内地开发当地资源。

“在传教方面，新教的传教工作进展得比我们公教快一些。美国的长老会20年前就开始在这里工作，他们建立了几个教会团体。公教的传教工作交给法国的方济各会。他们两年前才开始在这里工作并创立了两个堂区。从去年开始，我们圣言会传教士在这里传教。福若瑟神父之前在这里服务，他带来七位新的中国司铎，这些新司铎在他的指导下开展传教工作。福神父在一年内建立了几个新团体，同时在四个城市<sup>i</sup>设有落脚点，购买了一些房产，并开始在那里建小型楼房或祈祷所。

“但是，这个充满希望的开始也带来了新的危险。在内地爆发的教难也影响了沿海地区。福若瑟神父挨打，<sup>ii</sup>薛田资（Georg Maria Stenz）<sup>iii</sup>神父

---

i 译者注：“四个城市”指即墨、高密、胶州、诸城。

ii 译者注：福神父于1899年3月27日拜访即墨地区赵哥庄（Kiaokochwang，在城阳的东南方向）的信徒。很快有两百多个仇视外国人的人聚集在那里。福神父迅速离开赵哥庄，但一帮人（大约有八十人）追赶他，夺他的马，向他丢石头，并强迫他回到村子里。后来一些老人替他辩护，这些人放他走。见Hartwich, *Steyler Missionare in China*, Vol.1, p. 378.

iii 译者注：薛田资（1869—1928年），德国人，生于Horhausen, Trier。1893年到山东，曾在嘉乡、巨野传教。1898年11月初，他去日照时，情况已经很紧张，因为当地信徒与教外人发生了冲突。他于11月8日到11日在街头镇（位于日照西北35公里处）被逮捕并遭受了残酷虐待，后因受伤被送到青岛。薛神父于1900至1904年在国外，1904至1925年在济宁的“中西中学”（Franz-Xaver-College）任教。薛神父曾写过关于山东民俗、农业、自然环境、传教情况的文章和著作，编过教科书。汉语著作有《华德辞典》、《小说总集》、《古新经切要篇图》等。他对济宁的教育进步有相当大的贡献。见《薛田资传》（S. Puhl, *Georg M. Stenz SVD*, Steyler Verlag, 1994, p.318）。

被拘禁两天并受到虐待。两天后，人们赎回了他。很多基督徒也遭受到劫掠、殴打，他们被迫离开家乡，甚至有一个人被杀害。

“从那时起就再没有了平安的日子。在那些被憎恨的外国人周围，敌对行动甚至比内地更多。而且，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憎恨欧洲人，与欧洲传教士有关系的信徒也受到歧视，他们被视为卖国贼。他们好像起了缓冲的作用，但这意味着他们首先遭受殴打。

“1899年夏天，福若瑟神父被调到兖州府，因为他必须担任整个传教区的代理人，中国司铎也跟着他回到山东内地去。他们是还很年轻的传教士，而青岛地区对他们来说不是最理想的地方。

“当然，在青岛，德国的船只能确保外国人的安全，教难不会在这里发生。白明德神父居住在青岛。他是传教士，同时也负责会计工作。他在附近的山区已经建立了一些团体，而那里的人也相当朴素和善良。

“我首先是军队的牧灵司铎，住在大鲍岛的传教点——大鲍岛是青岛市的华人区。在我这儿还有两个修士，即菲德勒（Hermann Fiedler）修士，他是木匠，以及兰乐敏（Adolf Glaremin）修士，他是印刷工。我们的印刷厂也要为德国人印刷很多东西，但主要还是服务于传教工作，印刷教科书、祈祷册子、关于信仰的书籍。从今年春节开始，我们发行了一份报纸，原来是双周的，现在是周报。这份报纸将来应该成为一个工具，通过它能发布与山东的公教有关的重要消息。这里也有一家德国学校，培养中国青年学习德语和其他的知识。他们将来可以在铁路局或在德国租界的其他机构工作。

“德国海军和卫队中有很多天主教徒。我在青岛市一所简陋的房子里举行弥撒。这所临时的房子几乎不能容纳那么多来参加弥撒的人。德国政府后来建立了一所小教堂，并建议我们与新教轮流使用它。但我们不能接

受这个建议。如果我们这样做，中国的天主教徒就会分不清自己到底属于哪一个团体——他们早就因公教和新教的关系而感到迷惑。因此，现在只有新教徒在使用这个新教堂。

“我们公教还没有长期的家园，没有教堂，没有机构，也没有固定场所，有的只是临时的房子。德国政府想给我们一块地，让我们建教堂。这个地方是在一座丘陵上，是很合适的地方。但是，德国政府已经说了，教会需要自己负责经费。这是天主教在这里的首要任务之一。”<sup>i</sup>

除了照顾天主教军人，韩宁镛神父也在上述的学校教授德语，同时他是自己创立的小报纸的主编，并偶尔为德国政府做翻译。他也在传教工作方面帮忙，安主教让他写文章和年度报告。在业余时间，他继续编写《华德辞典》——几年来他断断续续地撰写着这部辞典。

另外，他得不断处理一些法案，因为一些中国信徒被控告，如果传教士不协助他们，那些敌视他们的官员会任意惩罚基督徒们。不过，这是一项很令人不快的任务，因为清朝的官员经常掩饰他们内心的恶念，他们的想法很难预测，他们也很狡猾。韩宁镛神父写道：“但愿我不需要继续关注这些可恶的法案！”

韩宁镛神父在青岛不到一年，被称为“义和团起义”的大灾难就爆发了。那些原来比较隐秘的排外情绪和行动，开始公然表现出来。慈禧太后也支持起义者，在北京首先有仇外者的公开表现。不仅各地教堂和传教点几乎都遭受破坏，而且所有与外国人有关的中国的房子和商店都被攻击，中华帝国的造币局、海关、供电局、中国银行等等都被烧毁。驻北京的外交官也被攻击。一名日本外交官在1900年6月9日被杀，德国的公使克林德

---

<sup>i</sup> 引自《耶稣圣心小通讯》，1900年，第6、23、39页。在丘陵上的教堂后来于1934年建成，即今天的大堂。



男爵 (Freiherr von Ketteler)<sup>i</sup> 在6月20日被枪杀，使馆区被围攻。列强共同组织的小军队 (2100人) 计划从天津进入北京，去解救在首都被围攻的外国人，但他们只到达距离北京40公里的地方，后来就被迫返回天津。此后爆发了全国性的排外运动。很多传教士和几万名中国基督徒被杀死，许多财产被掠夺或破坏。外国列强必须重新组织一支规模比较大的军队 (八国联军) 来解救他们的大使馆，结束这种无序状态。

山东的新巡抚袁世凯<sup>ii</sup> 是一位比较理性的人物，他早些时候警告过圣言会传教士和山东境内所有的欧洲人，命令他们必须离开内地。袁世凯还派兵护送内地的外国人到青岛。只有五六个传教士没有到青岛而偷偷地留在内地。这样，圣言会传教士没有一个人丧生。在青岛本地，情况也不太稳定，因为守卫部队不够强大。不过，当德国增派更多士兵时——他们也向内地迈进——情况已经有所好转。

韩宁镛神父自己想陪同德国部队，因为他能做牧灵者和译员，<sup>iii</sup> 但青岛的德国指挥官命令他不可以离开安全地带。

青岛的德国人为纪念那位被枪杀的克林德公使举行宗教礼仪，韩宁镛神父准备悼词。这里，我们也听听其中的一些话。

---

i 译者注：克林德男爵 (1853—1900年)，德国外交官，1881年来华，1883年任广州领事馆翻译，1889年任代办，后到墨西哥。1899年再度来华，继海靖男爵之后为公使。克林德敌视中国。1900年6月19日，慈禧太后向所有的西方国家宣战，并要求所有的外交人士在24小时内离开北京。(然而，大多数省的总督们不理睬慈禧的命令，在国外的中国使馆也没有服从她的命令。) 6月20日，克林德男爵提出抗议，并要去与清廷谈判。他在路上被一名士兵枪杀。

ii 译者注：袁世凯 (1859—1916年)，汉族人，清廷高官，曾任山东巡抚，尽力镇压义和团。

iii 译者注：在当时的情况下，能说汉语的德国人不多，而由于误会导致的军士冲突也容易发生，因此，韩宁镛的建议本来很合理。实际上，传教士们在不同的情况中当过译者并能避免不必要的矛盾，比如法来维神父 (Froewis) 在高密时就曾如此 (*Hartwich*, vol. 1, p.433)。

韩宁稿简单地回顾北京的情况并说道：“请原谅我在这里首先表达一下我个人的感受。我是威斯特法伦人，也是公教司铎，所以我很同情克林德——他也是威斯特法伦人和公教信徒。克林德男爵的家族历来是公教的支柱，而克林德男爵的一位叔叔——埃马努埃尔·克林德（Emanuel von Ketteler）——是一位德国主教。

“这就是克林德男爵的家族情况，这是他的传统、他的教育、他的性格；而他的行为也充分地表现出，他继承了祖先的风格和勇气。

“我们同时也记得，克林德男爵是德国的公使，他是我们国王和我们国家的代表。这给我们的礼仪带来一个新的特点，因为我们都在国外，会更爱戴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利益，有一个共同的祖国，而在危险的时刻中，团结变得更为明显。这几个星期我们也体验到这份团结……

“然而，在教堂中，我们的思想还应该超越这种自然的、国家的角度。在祖国的利益之上我们还应该看到更高的真理，就是基督信仰的永恒真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位亡者和他的悲壮命运又呈现出新的意义。他躺在这里，受人殴打、践踏，是一个被战胜的人——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位胜利者。圣奥古斯丁这样说：‘因为他的牺牲，他成为胜者。’

“在我们周围的斗争到底是什么？这不仅仅是野蛮的暴动，也不只是义和拳的不文明和封闭，而是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冲突。这就是中国的古老外教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而西方文化是在基督教精神内建立起来的，唯独在基督信仰内的文化才是真正伟大的文化。当然，我们不怀疑谁会获得胜利。但是，胜利依赖于人们的牺牲精神。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真谛。如果将来的历史学家撰写中国历史，他们将会回顾一个在基督教文化影响和熏陶下被改变的中国，但这种改变的开始是许多高尚

人物的血汗。除了基督宗教复活的希望，这个念头也带给我们一点安慰。

“我们还要再次追思这位亡者。他的灵魂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没有暴动，也没有战争，他面对上主——上主是时间和永恒的主宰，他缄默不语，不再说活人的话，不再说外交官的话，但他说死亡的缄默语言，而这种语言是感动人心的话语。在这种语言面前，每一个罪恶的欲望必将消失，每一个世俗的愿望必将退缩。

“没错，就是那死亡时刻的光阴，告诉我们人生真正的特性和无限的意义。死亡时刻，判定一个人过去是什么，将来是什么。那些面对死亡有所准备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在克林德男爵身上还能看到一点，即：‘在生命中，死亡陪伴着我们。’（*Media in vita in morte sumus.*）然而，主说：‘记住！我快要来。我随身带着报酬。’<sup>i</sup>因此，你们要时刻准备！这是克林德男爵留下的忠告。我们应该让这神圣的严肃性（*mit heiligem Ernst*）充满我们的生活。我们应该谨慎地生活，应该全力履行我们的职责、义务，秉承上主的旨意。这样，最后的时刻不会让我们惊吓。我们祈求这个恩典，同时，我们也给亡者以教会的祝福：愿上主赐他永恒的安息！”<sup>ii</sup>

德国租界的一些地方也受到暴动的影响，而那时韩宁鎬神父被委派做一支小部队的译员和牧灵者。他给会长福若瑟写信道：“现在我成了一名小‘战士’。青岛的指挥官让我在高密当军事牧灵者和译员。所以，一个月来我住在高密。这里也有一些战斗。有七八百个中国人伤亡，我体验

---

i 译者注：见《圣经·默示录》22：12。

ii 见*Koelnische Volkszeitung*，1900年9月20日。

到战争的恐怖！我并没有引发斗争，相反在很多情况下我尽量替中国人说话。”

在这封信中，韩宁镐神父还写道：“德国皇帝做得好，因为他很强调基督教的立场。他向清朝皇帝写电报指出，基督徒们，包括中国基督徒，都是他的兄弟，他们的血和被杀传教士、主教、司铎们的血都在上主面前伸冤……”

“另外，我们的总会长很是可爱，他送给您钱，并指定我当会计。我想他特别信任我。”<sup>i</sup>

几个月后，教难和战争的暴动过去了，在青岛避难的传教士们——一些方济各会会士和耶稣会传教士也逃到了青岛——可以回到他们的传教区了。韩宁镐神父写道：“他们回去的过程比六个月以前的逃难经验要舒服得多了。他们现在在社会上备受尊敬。各地的官员几乎都怀着善意和友好的态度。官员们都为他们提供保安人员、住所和食物。”<sup>ii</sup>

这种态度应归功于山东巡抚袁世凯。他从一开始就不想支持盲目的排外运动。当然，他必须很小心，必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在义和拳占上风的时期，他的生命也处于危险之中。当列强的军队进入北京时，他害怕他们也会进入他管辖的省。他请求安治泰主教帮助他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基于这种关系，也出于正义感，他愿意管理教会，解决基督徒赔偿的问题。总之，山东南界的教会没有遭受太大的破坏。耐人寻味的事实是，

---

i 见1900年11月10日的信。

i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499页。

兖州和济宁，这两个大传教点和两座高大庄严的教堂没有被破坏。<sup>i</sup>但是，曹州（菏泽）市的教堂，很多小圣堂、祈祷所和基督徒的房子被毁坏。另外，很多财物被抢走。

安治泰主教这样阐述他的赔偿要求：“我们当然可以完全放弃任何赔偿，而且这样会使事情很容易得到解决。但是如果这样做，会扭曲中国人的民族感情（das Volksgewissen）。而且，放弃赔偿要求，对这些可怜的基督徒和我们的恩人也是不公平的。由于袁世凯巡抚的积极合作，我们能够很快地解决所有的赔偿问题，也不必麻烦北京的公使。赔偿款一部分来自那些犯了罪的官员，另一部分来自那些众所周知的强盗、大刀会首领和犯人。普通居民不需要为赔偿款纳税。”<sup>ii</sup>

传教士们将赔偿款分配给受过迫害的基督徒们。他们努力确保分配公平。

1900年6月，即最动荡不安的时期，斯泰尔的总会长任命福若瑟神父为山东南界圣言会的会长。在同时被任命的四个参议中也有韩宁镐神父。然而，新会长神父仍然在传教区最西北的地区，偷偷地留在坡里庄。他写的信也没有到达青岛。这场风暴过去以后，才恢复了正常的秩序。

新会长任命韩宁镐神父在德国租界和周围地区做他的代理人。这样，韩宁镐神父必须开始工作，而他也乐意接受这项新的挑战，他写道：“几年来在青岛工作，本堂神父的安宁生活带给了我太多‘圆满’（zuviel

---

i 译者注：传教士们于1898年和1899年在兖州、济宁和菏泽建立大教堂。义和拳没有破坏那些教堂大概是因为当地的官员们不支持这些行动，而这一点也许能说明，在当地的官员中也有几个人并不敌视外国宗教。然而，兖州和济宁的大教堂在1966—1976年被毁坏。

ii 见《新年祝贺》，载《耶稣圣心小通讯》，1901—1902年，第76页。

Rundung) <sup>i</sup>。”现在他必须去为所有的传教点服务，必须为司铎们讲退省，加强他们的宗教生活以及为中国传教员设立进修班。他与会长神父的面谈只能是一年一次，就是当他去济宁参加年度退省时。

他给家人写信说：“去济宁意味着骑马来回要20天。现在，经过夏季的大雨，河流都很宽，路面太软，8月份的阳光非常炽烈（气温有33℃到35℃）。因此，骑20天马，每天10个小时，并不是很舒服的事！再加上，山东省此时正爆发霍乱，有的城市每天会死去几百个人。霍乱传播的速度很快，几个小时内就能夺走人的性命，真令人害怕。如果上主想要收回我的生命，我希望他是一位宽容的审判者。我在教外人的国家已经待了这么长时间，我的责任越来越重。” <sup>ii</sup>

韩宁镐神父尽力完成他的新任务，因此他必须长期离开他在青岛的本堂。他向会长神父写了简短的报告。

1901年：“骑马13天后——雨下得太大——我到达青岛，拜访我们的人。昨天我去看望特鲁佩（Truppel）指挥官，我向他转达您的问候。他问我们能否邀请传教修女到山东来，因为如果没有修女，他就会想办法派一些德国女执事（Diakonissen）来青岛。” <sup>iii</sup>

过了一年，修女们就来了，<sup>iv</sup>韩宁镐这样描述青岛1902年的圣诞节庆祝：“我们的修女们制作了一个精美的马槽。圣诞节那天晚上，军队的乐队也来为我们奏乐。我每天用德语和汉语讲道理三四次。这里的工作很

---

i 译者注：意思是，韩宁镐神父胖了。

ii 见1902年8月4日的信。

iii 见1901年8月12日的信。译者注：无论是天主教的修女或新教的女执事，在西方都创办了很多医院，所以青岛的指挥官如果想建立一所医院，先会想到修女或女执事。

iv 译者注：头一批方济各玛利亚传教修女会（FMM）的七位修女于1902年1月18日到达青岛。她们后来创办了学校和医院。

多，但是我感到很有力量，也感到自己很健康，所以我想我能接受这一切工作。”<sup>i</sup>

1902年：“自从离开济宁，我几乎一直在外面。我住在青岛仅仅有四天，后来走遍东部地区，这真是游牧人的生活。青岛的新传教点将会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我一直想到薛田资神父，正因为他付出了自己的血汗，我们才获得了这块好地。”<sup>ii</sup>

1903年，韩宁镐神父被任命为沂州府（临沂）总堂的总本堂神父。这样，他管理的地区又增加很多。他向家人写信说：“我现在负责一个庞大的传教区，去视察这些地方需要60到80个小时。整个地区只有10位传教士，而我必须花很多时间去拜访所有的县。感谢天主，一切平安，我个人也很好。复活节的时候，我去兖州府，青岛的指挥官杜柏尔当时也正好与几个军士一起去拜访兖州。杜柏尔先生很友好，而我也很高兴能在兖州见到他们。明天我要去郯城，路上需要12个小时。”<sup>iii</sup>

“我一般都骑马出去。平均一天12个小时，约60公里路。一开始会感到很很累，但习惯了，就不会感到太累了。”<sup>iv</sup>

1903年他给他的会长写信：“我不能聚集司铎们一起来开会。他们不能离开他们的本堂，距离太远了。圣神降临节之前，我去了诸城、胶州、高密和即墨。现在，降临节后，我住在诸城，教授我的50个学生（他们是传教员和老师）。每天用一个小时讲解教理问答，一个小时讲护教学（Apologetik），一个小时讲祈祷经文，一个小时解释《圣教教理》这本

---

i 见1903年1月3日的信。

ii 见1902年3月8日的信。

iii 见1903年4月19日的信。郯城位于临沂的南边。

iv 见1903年7月7日的信。

手册，一个小时教他们练习讲道理或教给他们具体的传教方法——这样培育他们四个星期。7月底或8月初，我想举行下一次聚会。

“主教让我现在去休息，还让我完成我的辞典。传教士们在这段时间可以应付自己的法案。聚会讲道理也可以找别人。现在是完成此书的最佳时刻。因此，我会在诸城住下来，安静地进行这项工作。顺便还可以给当地人一点儿帮助。”<sup>i</sup>

一个月后，他写道：“我现在放假，同时撰写辞典。我应该将它写完。很多人都曾经问起过这本书的情况，我已经投入了很多精力……8月2日我想给我们的中国司铎讲一个小避静。之后，我必须马上去青岛，因为魏神父（Johann Weig）<sup>ii</sup>不在。所以，我大约8月底去兖州，在那里与您见面！愿上主协助您背十字架！不要害怕！偶尔会有闪电，但上主协助我们。全世界都处在战争中，而我们这里也必须分担这个重担。”<sup>iii</sup>

1902年年底，安治泰主教突然向韩宁鎬神父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想你应该做我的代理人。你有什么看法？”一年以来，魏若望神父任安主教的代理，但他不愿意继续担任这个职务。在他之前，福若瑟神父做代理长达15年之久。韩宁鎬神父请求主教不要作最后的决定，因为他还要与会长神父谈论这件事。主教也同意了。

关于这个问题，韩宁鎬神父给会长神父写信说，他本来不情愿接受这

---

i 见1903年6月24日的信。

ii 译者注：魏若望（1867—1948年），德国人，是安治泰的侄子。1891年来山东，曾在坡里、济宁、王庄、滕县传教，1900—1902年在国外休息，后回到青岛。1907—1910年在日本传教，1910—1913年任圣言会在亚洲的视察员，1913—1922年在欧洲，1923—1948年在青岛传教。

iii 见1903年7月17日的信。



个任务。为了证明他不能当代理，他以尽量贬低自己的口吻写道：“我的意志力很薄弱，我太软弱，我没有消除私人的欲望。另外，我脾气不好，容易发怒，作决定不谨慎。我的优点只是表面上的优点——虽然人们多次以为是真正的优点，但没有深层的效果。您只要看我过去的工作就会发现，我在哪里都没有圆满完成我的任务。除此之外，我在青岛还感觉很舒服，所以也不愿意在兖州府当主教的代理。”<sup>i</sup>

会长神父的回答没有记录下来，韩宁镐神父向安治泰写的信也没有记录。但是，主教于1903年1月再次任命福神父当代理，魏若望神父当青岛的本堂神父，而韩宁镐神父当临沂的总本堂神父。1903年秋天，主教去了罗马教廷，后来没有再返回山东，这是天主的计划。这样，韩宁镐神父没有当过代理主教，但一年多后，他直接当了山东南界地区的主教。

1903年8月，韩宁镐神父离开临沂，回到兖州。他开始指导兖州的修道院，培育本地的司铎。原来的修道院院长福神父在主教不在的时候一直是整个传教区的管理者。他最好的助手就是韩宁镐神父。韩宁镐神父除了在修道院的工作，还为修士们和神父们讲避静。他做福神父的秘书，帮助他编写一些稿子或写信，当福神父在外面服务时，韩宁镐神父是他的代理人。1904年春天，山东巡抚第一次来拜访公教的传教中心兖州府。这当然是很大的荣耀，同时也表明社会态度的彻底转变。这位总督通过安治泰主教给教宗赠送了礼物。<sup>ii</sup>

韩宁镐在青岛工作的这段时间还发生了其他的事情，我们简单地介绍

---

i 见1902年12月12日的信。

ii 译者注：“这位巡抚”可能是1902年就任的周馥。

一些他的德国亲戚的情况。

他姐姐的儿子若瑟·巴特（Joseph Bathe），于1900年被祝圣为神父。韩宁镐神父很关注这位青年的发展。他祝贺自己的姐姐，因为她为教会奉献了一位司铎。他写道：“天主对司铎的降福回归于他们的父母。旧约中，亚纳（Anna）将自己的儿子撒母耳（Samuel）献于圣殿。<sup>i</sup>这就是基督徒母亲的榜样，一位优秀的妈妈将自己的儿子奉献给教会和圣所。司铎的奇妙尊荣不仅提升司铎本身，也照亮所有培育司铎的人——这个尊荣不仅是现世的荣耀，更是永恒生命的荣耀。”<sup>ii</sup>

韩宁镐神父给家人写信时，询问若瑟的情况，表示热切的关注。在祝圣司铎典礼后，他给姐姐写信道：“现在你见到了你的孩子站在上主的祭台边。几个月来我经常想到这一幕。你应该感谢上主，因为他降福给你和你的家人。我很高兴，我希望你的家庭将会继续扩大并成为一個强有力的支柱，即教会的支柱，因为教会似乎正面临着不安宁的时代。”<sup>iii</sup>听到他的外甥参加进修，将拿到博士学位，韩宁镐神父也很高兴。“他应该成为一名虔诚的司铎和有为的学者！现代的教会需要这样的人。”<sup>iv</sup>

韩宁镐神父得知另一个外甥通过了小学老师的考试，他向这位外甥的父母表示祝贺，写道：“我非常高兴，因为你们的罗伯特现在也达到了目标。成为一名有基督信仰的老师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他的工作可能会产生司铎一般的效果。”<sup>v</sup>

---

i 译者注：见《旧约·撒母耳纪上》第1、2章。

ii 见1896年11月18日的信。

iii 见1900年12月27日和1901年1月13日的信。

iv 见1902年8月4日的信。

v 见1903年1月3日的信。

罗伯特的妈妈很担心，因为罗伯特必须服兵役，但韩宁镛神父回信说：“如果他必须当兵，这也不是很糟糕的事。我在这里当了三四年军队牧灵者，有半年的时间也曾住在军营中，我觉得士兵的生活也没有那么恐怖。若依赖上主的恩典，便可在军营中保持信仰、保持纯正的心。我那时也认识一些士兵，他们令人佩服。当然，不好的人也会有，这就是生活的考验，这就是试探的那棵树，<sup>i</sup>然而谁也不能逃避这些考验。”<sup>ii</sup>

1901年5月9日，韩宁镛神父81岁的父亲去世。前文提到，他父亲是一位很杰出的人。他一生坚持他的原则，始终活出自己的公教信仰，他以崇高的责任感为家人工作、牺牲、祈祷，他在喜乐和痛苦中不断地仰望上主，并指导家人走向上主。

韩宁镛的外甥女亚纳·巴特博士（Dr. Anna Bathe）这样描写他：“他最大的快乐就来自于他最小的儿子奥古斯丁。他也在很大程度上参与着儿子的工作和使命。有的朋友说：‘为什么要去外国传教？德国也需要好的司铎！’此时他会很激动地回答：‘这是圣召，这是圣召！’在他去世之前，斯泰尔修会的创立人和总会长阿诺尔德·扬森神父来看望他，给他讲述有关他儿子奥古斯丁的故事，并让他写下作为父亲对儿子奥古斯丁的问候。当然，老父亲感到非常快乐和荣幸。

“后来，上主还给了这位老父亲另一个恩典，因为他的外孙若瑟·巴特被祝圣为司铎。作为外祖父因体弱不能参加祝圣典礼，所以若瑟·巴特特意去他的医院举行弥撒。让若瑟感动的是，当他去看外祖父时，那位81

---

i 译者注：见《圣经·创世记》3：3。

ii 见1903年4月19日的信。

岁的老人慢慢跪下，要求这位23岁的新司铎降福于他。

“几个月后，上主召他回天乡了。每天去教堂望弥撒是他的习惯。去之前，他在客厅的椅子上做一个早晨的默想。就在这时，他的时候到了。他轻轻地走入永生。一个丰富、完满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再见，虔诚的灵魂！”

韩宁镐神父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便向家人写信：“我们应该感谢上主，因为他赐给我们的父亲如此安宁的晚年和死亡。上主给人最大的礼物就是最后时刻的平安。谢谢你为我描写具体的过程。我前一个月已经得到了讣告。我几乎每天为父亲举行弥撒。这里的信徒也为他祈祷，一些会士也为他奉献弥撒。你们肯定也会在德国为父亲祈祷。我现在有些后悔，因为我给父亲写信不多。我听说，他每次收到我的信都很高兴。

“邻居家的儿子费里茨·蒂格斯（Fritz Tigges）也在青岛，他是士兵。他来看我，也告诉我很多家乡的事。那时我很渴望再次见到父亲。然而这不是上主的意愿，愿他的名受赞美。”<sup>i</sup>

“愿父亲的精神在全家人中继续结出美好的果实：我们都应该有热切的公教信仰、虔诚的信心，都要身体力行，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上主和教会而努力！”<sup>ii</sup>

---

i 见1901年7月22日的信。

ii 见1903年1月3日的信。



### 第三章 韩宁镐主教



## 第一节 主教权杖和主教帽子

安治泰主教经由西伯利亚铁路线返回——这条铁路刚刚修建完工，这样他比坐船快四个星期到达。他发电报给在华的会士报告他到达了罗马。但不久之后，另一个电报通知他们，安主教在罗马去世。他于1903年11月24日因脑溢血而逝世。前一天他还朝见教宗，因而感到很高兴。在许多新计划和期待当中，死亡那无情之手夺走了他的生命。

那时的安治泰主教才52岁，他在中国工作了24年，担任山东南界的教会领导22年，并做主教18年。他与那些乐于牺牲的同工一起创立这个传教区，并使它发出美妙的萌芽。韩宁镐神父这样描述他的贡献：“他为山东南界做了很伟大的事，他面对很多冲突，经历了很多外在和内在的挑战，以及无数的折磨、辛苦，他坚强地、永不气馁地面对一切反对势力，克服一切阻碍进展的力量，不断为教会的进步工作。他在艰苦的条件下接受一个拥有158个信徒的传教区，当他去世时，这个传教区有26300名受过圣洗的人、40300名望教者、12座大教堂、118座圣堂、538处小祈祷所、1所大修道院、1所小修道院、3所德汉双语学校、1所男传教员学校、1所女传教员学校（总共有125名学生）、146个教理问答学校、16所小学、6所孤儿院（一共有561个孤儿）、4所养老院、2间印刷厂。教区的工作人员包括36位欧洲司铎、11位中国司铎、11位传教修士（圣言会的）、3位圣母仲昆会修士（Maristènbr ü der）、10位传教修女和650名男女传教员。虽然这个传教区经历过许多挑战，但教会扎下了坚固的根基，所以教区自身是主教最



优美、最宝贵的纪念碑。”<sup>i</sup>

韩宁镐神父也提醒人们，安治泰主教曾经获得过许多高级勋章或奖励：德国皇帝为他颁发了两枚勋章，巴伐利亚王子也以两枚勋章奖励他，而清朝政府给他三个高位——其中第三个相当于一个巡抚的地位，这样高级别的职务近两百年以来没有给过任何外国人。与安治泰一起获得这种荣誉的人物是北京和河南南部的主教们<sup>ii</sup>——这是义和拳运动以后的事情。

当安治泰主教突然去世时，很多人向教会发送电报表示哀悼，这一点也表明他广受人们的尊敬。他在罗马的德国院子“圣院”（Camposanto）的苦路之上的第12个站边被安葬。那里的教堂也有他的铜像。根据他的遗愿，人们用防腐材料来保存他的心脏，将它安放在他的主教座堂——兖州府的圣神堂。这样他可以在他的传教区中心安息，那是他奉献了一生的地方。

若望·洗者·安治泰早在1875年便进入刚刚建立的斯泰尔传教修道院，那时他是雷根斯堡（Regensburg）大修道院毕业的执事。他是斯泰尔修院的第一个神学学生、第一个被祝圣的司铎、第一个外方传教士、第一个传教区的主教。他的传教精神始终给圣言会传教士带来一些启发。

福若瑟神父从一开始就是安主教的忠贞助手。他在安治泰主教的讣词中写道：“当他在最后的时刻要闭上眼睛时，他真可以说：‘我不会完全死！’（Non omnis moriar!）<sup>iii</sup>他在自己的传教区给自己建立了一座巨大的

---

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567页。

ii 译者注：河南南部的主教指安主教（Simeon Volonteri, PIME, 1831—1904年），意大利人，1884—1904年任河南南部代牧（主教）。北京的主教指樊国梁（Alphonse Favier, CM, 1837—1905年），法国人，1898年任北京主教。

iii 译者注：拉丁语的典故“我不会完全死”表示亡者留下他一生工作的成果，比如文学作品或建筑物等。

纪念碑，而这座纪念碑比铁制的纪念碑能更好地保留他的名字，将它传入永恒。”<sup>i</sup>

谁来继承去世主教的权杖和主教帽呢？这是山东南界传教区的重要问题，而所有的人都能想到主教的代理人——福若瑟神父。他不仅仅是年龄最大和最能干的传教士，而且也是司铎和修会会士们最尊敬的人，他也是最受民众爱戴的人。

罗马教廷传信部有主教提名权，但每一名山东传教士必须建议三个人。后来他们发现，所有的人都首先选择了福神父。然而，虽然如此，他却不能当主教。

因为德国的租界是山东南界的一部分，所以德国政府要干涉这次主教选择。德国政府通过科普红衣主教（Kardinal Kopp von Breslau）在罗马和斯泰尔声明：福若瑟神父不可能当主教，因为他是奥地利人；在山东应该有一位德国籍的主教。

这样，大家都很尴尬。圣言会的总会长扬森神父向德国红衣主教说，他可以很乐意地放弃在德国租界的传教活动，这样，德国政府可以在那里有一个他们所希望的教会领导，不过关于山东南界的传教区，他自己必须要有充分的自由，不应该受外在的干涉。然而，这也无济于事。

罗马传信部决定选择第二个候选人作为山东南界的宗座代牧主教，即奥古斯丁·韩宁鎬神父。1904年8月4日的电报就是向山东传报这个消息。

那位受不公平待遇的福若瑟神父会怎么样呢？对于这样的结果他竟然感到高兴。当他听到德国政府的意见时，他向斯泰尔的总会长（扬森神

---

i 见《耶稣圣心小通讯》，1904年，第178页。

父)写道:“您不要担心我,要看上主的意愿和具体的条件,这就行。”<sup>i</sup> 韩宁镐神父刚刚当选后,福神父又写信给总会长:“感谢天主!这个选择是最好的。韩宁镐神父是很合适的。他拥有头脑和心灵方面的很多恩典<sup>ii</sup>,在山东南界他是独一无二的。因此,这里的传教士几乎都很拥护他。我们应该赞美上主的恩佑,它给了我们的传教区一位非常好的主教!我向所有的会士和中国司铎宣布选择的结果,并请他们感谢上主以及为新主教祈祷,同时信赖我们的新主教。我自己也愿意在信仰的精神内向新的主教表示拥戴、孝爱和乐意的服从。”<sup>iii</sup>

福神父一年以前曾经赞美过韩宁镐神父,那个时候没有人想到安治泰主教会那么早去世,他曾这样写信给总会长:“照我的看法,韩宁镐神父在各方面都是山东南界传教士中的‘第一名’(princeps)。他在各方面都有那么多贡献,真可以将他视为修会会士和传教士的榜样,这个榜样也很值得效仿!如果要我在他身上找毛病,我需要找很长时间。他也爱好各方面的知识,是一位杰出的演讲家,拥有拯救灵魂的热忱,个性非常好,而且他有深厚的、实在的宗教感情(Froemmigkeit)。”<sup>iv</sup>愿上主让他长时间为信仰工作!”<sup>v</sup>

这个愿望成真了。我们又能见到上主微妙行动的一个例子——他用人的策略来实现他最神圣的旨意。韩宁镐神父当主教是符合上主的计划的,

---

i 见1904年1月24日的信。

ii 译者注:原文是“Gaben des Geistes und des Herzens”,即是说,韩宁镐有知识和思想,也有同情心。

iii 见1904年8月10日的信。

iv 译者注:德语的Froemmigkeit(相当于英语的piety和拉丁文的pietas)难以译成汉语,多译成虔信、虔敬、虔诚、虔忱、恭敬、孝顺。

v 见1903年9月23日的信。

因为福神父3年半以后就去世了，而韩宁镛后来当主教达35年之久。

他们两个人之间没有一点冲突或嫉妒，一个是教会的长上，而另一个是修会的长上。他们的总会长向他们写信祝贺：“两位到现在能够彼此尊敬，你们是优秀的会士和忠实的修会成员。我希望，两位将来也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教会长上的力量来源也属于修会，所以他应该与修会保持良好的关系。”<sup>i</sup>

韩宁镛主教后来回顾说：“我想，创始人扬森神父的愿望实现了，像福若瑟神父那样善良的人很容易合作。他是最忠厚、最心甘情愿的合作者。他几年以来对我怀着友好和信任的态度，而现在他肯定也不会收回他的善意。这样，我们一起开始一段共同建设、共同计划、共同背十字架、共同承担的时期。当然，我们也会有担忧，在传教区始终不缺乏这一点。一位年轻的传教士在派遣礼中接受十字架，这也有其深远意义。这尊十字架要陪同传教士，并在耶稣张开的手手下，使他的一生和一生的工作都能找到归属。在十字架里有救恩（In cruce salus），救世主接受了十字架，而他的仆人也必须接受十字架。但是，如果以甘愿牺牲、忠贞的爱负起这些重担，忧虑就不会那么重，在福若瑟神父那里就有这样的爱。”<sup>ii</sup>

韩宁镛神父尊敬和爱戴福神父，后来他撰写了《圣言会福若瑟神父》，即第一部福若瑟传。通过韩宁镛主教的推动，福神父册封“真福”的备案才开始受到支持并在罗马教廷取得进展。<sup>iii</sup>

因此可以说，德国的外交官那次并没有犯错误。

---

i 见1904年8月4日的信。

i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587页。

iii 译者注：《圣言会福若瑟神父》是韩宁镛于1926年写的书，罗马教廷于1939年开始起草祝圣真福的法案（*Schlagsprechungsprozess*），而福神父于1975年被册封为“真福福若瑟”。

不过，那位被选的人有什么反应呢？他在那个时候也写过几封信，向总会长表达他的感受。总会长在选择之前一个月就告诉他，德国政府反对福若瑟神父做主教，所以韩宁镐很可能会当选。总会长这样结束他的信：“这三个候选人中，我喜欢每一个人，因此也喜欢您——可敬的韩宁镐神父。我写这封信来谢谢您为我们修会所做的一切，同时也求您，无论选择的结果如何，继续做一个忠贞的会士。您一直都很忠诚，并受到其他会士的欣赏。”<sup>i</sup>

韩宁镐神父在回信中提出很多理由来说明他为什么不应该当主教。他求总会长不要考虑他。然而，他不能逃避这个荣耀和重担。教宗比约十世（Pius X）<sup>ii</sup>于1904年8月13日指定奥古斯丁·韩宁镐作为山东南界的宗座代牧和希贝巴（Hypaepa）的名义主教。

当他被选中后，他向总会长写信道：“最后的结果是我当选。我一开始很沮丧，如同遭受沉重的打击。后来我与会长神父商量，问我是否必须接受这个选择，如果我抗议，会不会成功。他说不会成功。我自己也这样想，因为我早就向您说明过我的看法和我不应该当主教的理由。另外，我也明白，政府会找麻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因此，我如果拒绝会引起重新选择，这也会带来很大的麻烦。虽然如此，我还是把这个问题放在您的手中，如果您想推翻这个选择的结果，我就接受您的决定。

“我从17岁开始就是修会的孩子，也是您忠诚的儿子，虽然我不一定都完成了我的任务，但我想继续做修会的忠实儿子，直到最后的时刻。

“我很明白山东南界的主教地位会带来多大的责任、忧虑和多少十字架。继续在比较低的职位服务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因此，我认为我接受

---

i 见1904年6月25日的信。

ii 译者注：比约十世（1835—1914年），意大利人，1903—1914年任教宗。

这个崇高的职位并不是一种荣誉，而是一种重大的牺牲。我愿意作这种牺牲是因为我爱修会，爱传教事业，而且我想这是上主的旨意。

“我阅读您的信时，内心也很感动。谢谢您对我的关爱，我也请求您继续支持我。我向您保证，我愿意为修会和传教事业工作、生活。

“我当然肯定这个立场：修会必须完全自由地管理它在传教区的会士，而传教区的主教不应该约束修会决定的自由，也不应该干涉修会的内部问题或反对修会的长上。

“我可以在上主面前说，我怀着最好的意愿。但是，在别人看到的却是另一种现象，即‘地位改变一个人的原则’（Honores mutant mores）。如果我反省我的软弱，我也很害怕——我当主教会不会为我和传教区带来灾难？愿上主保护我们免遭不幸！

“尊敬的总会长，我求您多为我祈祷，也让别人为我祈祷，这样可以让圣神的恩典辅助我。我此前就写信同您讲过，我缺少三个最重要的恩典：明智、力量和虔信。就是在那些困难的时刻，当一切取决于正确的决定时，当所有的人依赖于长上时，我就没有力量，没有明确的判断能力。那时，只有上主能协助我们。因此，我求您，尊敬的神师，请您向上主为我求这些恩典吧，也让别人为我祈求！”<sup>i</sup>

他当时还向亲友写信表明他内心的感受。我们在这里只引一封韩宁镐给他的老同学亨利·波格尔写的信——那位同学已经成了帕德博恩大修道院的圣经学老师：“现在我已离开门登25年之久。我的道路是走进外面的世界，而来自四面八方的风使我东奔西跑。我们这可爱的中国在25年前

---

i 见1904年8月12日的信。

还没有加入世界的快速发展进程中。后来发生一拨一拨的骚乱：运动、盗劫、义和拳和之乱。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一瞬间我就感觉老了。

“上主引导人走的道路是很奇妙的！你找到了一个很安静的使命和工作，而我却被卷入动荡和不安中——虽然我本来很胆怯、忧虑。然而，上主的手也与我同在，虽然我有时候会面对重大的挑战。上主大爱的阳光一次又一次穿破黑云，一步步照亮我的职业。愿他的旨意继续成真！”

“我刚刚想我能在我们小小的中国司铎修道院中找到一个最后的、安静的‘港口’，但人们又叫我离开。现在我必须踏实地工作，必须承担很多事。我必须当主教！对欧洲来说，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位。在那里，主教们都是‘身带尊荣者’（Wü rdentraeger）；然而，一个穷困的传教地区的主教则是一个‘背重担者’（Lasttraeger）。他不仅仅在胸前佩戴主的十字架，而且在背上也负起十字架的巨大和沉重。”

“我们的山东南界就是一个充满希望，但也遍布荆棘的地区。在我们这个时代，古老的东亚要脱离它的陈旧轨道，形成一个新的形象。我想家乡的人们都低估了远东传教事业的重要性。我们生活在这千百万人当中，他们拥有一个伟大的过去，面对着一种不可预测的未来。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请求你的协助和支持。你们在帕德博恩大概也忙着谈论卜尼法斯协会（Bonifatiusverein）<sup>i</sup>的工作。血浓于水，所以你们也许更注重德国教友的需要。但是，这不应该让自己的视野变得狭窄。教会在世界上还有一

---

i 译者注：卜尼法斯协会是1849年建立的德国教会组织。它的目标是帮助德国天主教教友，后来也注意到分散在各地的德国信徒。卜尼法斯（Bonifatius，亦译为“博义”、“波尼法爵”，公元675—754年），原名Wynfried，英国本笃会修士，曾在德国传教，被任命为主教，后升任美因茨（Mainz）总主教，754年殉道。卜尼法斯被称为“德国的使徒”（Apostel Deutschlands）。

些重大的使命。也许你可以通过一句话帮助传教区，特别是帮助我们的山东南界。无论如何，我请你为我祈祷。”<sup>i</sup>

祝圣主教的典礼于1904年10月30日举行，而且是在中国举行的。有的传教士想去欧洲举行主教典礼，但韩宁镐主教说，旅行的费用很高，而他不愿意给传教区的恩人一个不好的印象。他向总会长神父报告他祝圣典礼的情况：“我祝圣主教的伟大日子过了。这几天我十分想念您。如果不是因为那么贵，我也会给您发一封电报，让您在精神上与我们在一起，为我们祈求圣神的恩宠。

“真是一个隆重的、充满感情的典礼，我们必须感谢上主给我们那么多内在的恩典和外在的和谐。

“我邀请这些宗座代牧：山东东部的常主教（Caesar Schang, OFM）、<sup>ii</sup>济南市的申主教（Ephraim Giesen, OFM）、<sup>iii</sup>上海的姚主教（Prosper Paris, SJ）<sup>iv</sup>——后者因去欧洲不能来，所以我请了河间府（Hokienfu）的马主教（Henri Maquet, SJ）<sup>v</sup>——不过，他生病了，所以我们的代理福若瑟神父必须充当第二个副祭。我很高兴，因为这样他给我副手——他为我们的传教事业作了那么多的贡献。

“来参加典礼的贵宾是我们几乎所有的传教士、德国政府和青岛指挥官代表、道台（我们地方的最高官员）——他代表山东省的巡抚、将军、

---

i 见1904年9月27日的信。

ii 译者注：常明德，德国人，1894—1911年任山东东部（芝罘，即烟台）主教。

iii 译者注：申永福，荷兰人，1902—1919年任济南主教。

iv 译者注：姚宗李，法国人，1900—1921年任江南主教，驻上海。

v 译者注：马泽轩，法国人，1901—1919年任直隶东南（献县）主教。



县官和副县官以及兖州府所有的一般官员，仅中国官员就有40名左右。后来，70位来宾一起用餐。

“我们的外国客人11月2日去戴家庄，在那里我们隆重地安葬了三年前遇难的两位神父，即能方济神父与韩理神父。他们的棺材之前安放在地面上的砖制石椁之内。我们就这样结束了祝圣主教典礼。

“这样，我成为主教以及一个如此大的人群的牧者，尽管我不配享有这个地位。当我观望主教杖和戒指，我想这是一个梦。不过，这是上主的意愿，我并没有抢夺这个地位。因此我说：靠上主的名，靠他的恩典，我应该勇往直前！

“我想当一个好的主教，要为耶稣基督服务，因为我手拿他的牧杖。我要忠于罗马，忠于教宗，因为我也他的代表；我要忠于圣言会，因为我是修会的儿子，将来也要做它的好孩子。我将我自己奉献给上主并经常求他：如果他看到我做不好一个主教，求他让我死去。因为他接受了我，从尘土中提拔了我这样的穷人，我求他让他的恩佑协助我、照亮我！

“我选择的徽章是圣神的画像（这是山东南界的传统徽标）。围绕着它我只写了耶稣和玛利亚的名字并画了十字架和锚，还写了这个标语：‘我知道我所信赖的是谁。’（*Scio cui credidi.*）<sup>i</sup>因我性格软弱、不稳定，缺少可靠的基础，圣神的恩典——耶稣和他神圣的母亲所内蕴的——必须是我信仰和希望的基础和锚。在仰慕圣神时，我希望我能获得内在的力量和内心的基础。

“尊敬的总会长，您引导我走到这里了，现在也求您继续给我您的祈祷和支持。我感谢您对我们传教区所做的一切，也感谢您给我的帮助。愿

---

i 译者注：见《圣经·弟茂德后书》2 Tim 1: 12。

上主，万能的天主，恩赐我们一个丰硕的收获！

“这里的会士好像很满意我被选为主教。俗世的人——无论是德国政府的人员或中国政府的人员——也都很喜欢我。我收到了很多祝贺信和电报。愿天主为此受赞颂。

“我希望，这个主教典礼会给我们的传教区和传教修会带来丰富的恩典。尊敬的神师，我希望您将来不会因您的主教儿子在永恒审判者面前感到羞愧！”<sup>i</sup>

在后来的信中，韩宁镐主教说：“德国皇帝也给我写了一封美好的信；他也提到那位‘难忘的安治泰主教’。科普红衣主教和布里克森（Brixen）的埃格（Egger）主教送来祝贺。埃格主教还送我1000马克。先有荣誉后有十字架吧！”<sup>ii</sup>

“孔子的后裔，32岁的孔令贻——他因其祖先而享受很大的尊崇，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也开始与我们交往。他请我吃饭，我也请他来我们这里。以前他根本不理我们，不想与我们有任何来往。”<sup>iii</sup>

“当我完成了最重要的信件后，我正式去拜访人们。我去拜访驻北京的德国和奥地利公使、袁世凯巡抚、济南和青岛的指挥官。所到之处很受欢迎，而我也希望，有关的官员和机构能够信任我。”<sup>iv</sup>

此后，新主教可以转向职责的内部任务部分。他首先向他的传教士和忠实合作者发表了一份牧函。1905年2月初他发布了两个通讯，一个用德语

---

i 见1904年11月6日的信。

ii 见1905年3月19日的信。

iii 见1905年3月5日的信。译者注：关于韩宁镐与孔公的交往，请参见附录。

iv 见1904年12月15日的信。

写给欧洲神父，一个用汉语写给中国传教士。在这份内容丰富的牧函中，一开始他谈论传教身份的意义和精神，后来说明一些具体的传教问题。特别在第一部分能见到他崇高的职责精神（Berufsethos）。<sup>i</sup>他写道：“尊敬的、可爱的会士！愿天主圣父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我带着这个古老的宗徒们的问候第一次站在你们面前，我要在这通讯中告诉你们我的想法和忧虑。

“在谈论日常生活的具体问题之前，我想先讲解我们共同圣召的崇高理想。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山东南界的那种超自然的伟大任务。

“我很自然地继续引用宗徒的话：‘我为了你们不断感谢天主，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内获得了恩宠。’（《圣经·格林多前书》1 Cor 1: 4）真是这样，我们的传教身份是一个巨大的恩宠，而我们的心思和生活也都属于它。当然，对肉身来说，这个传教士身份没有提供一条舒服的道路。当我们离开故乡时，别人将十字架放在我们胸前。那时候，我们并没有想到，这个象征性的动作会预示着何等辛苦的体验；我们没有想到，从此以后我们的生活就是十字架下的生活，而我们必须担起工作和忧虑，必须接受各种各样的内在和外在牺牲。我不想谈论我们工作的困难，每一个人自己能感受到这些考验。荆棘多，而玫瑰少。我们很少获得可以摸到或可以感觉到的赏报、赞扬和满足感。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肯定也都有在灵魂深处感受到传教士十字架痛苦的时刻，但是这种痛苦只是因为我们从世俗的角度来思考和判断这些情况的结果。

“如果从我们信仰的超自然角度来看——这个角度似乎是一座高山，而这是唯一的适合我们的角度，我们的两只脚应该始终在这个立场站稳，

---

<sup>i</sup> 译者注：Beruf指“传教士身份”和“传教士的圣召”，而ethos指“理想原则”、“伦理态度”、“精神”等。Berufsethos指对于自己身份的重视，对身份理想的注重和追求。

我们会感觉到，没有比传教士的使命更荣幸的、更美好的事。这样，我们能轻易地、慷慨地忽视日常生活的麻烦，能超越环境的各种穷困和不足之处。事奉上主等于是统治这一切！

“实际上我们是最崇高、最好的主人的仆人。我们要完成一项很重大的任务，再没有比这更伟大、更崇高的责任。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如果我们在圣召的精神内完成这个工作——都为最高的目标而服务：愿上主在天国受光荣，愿世人在世享平安！<sup>i</sup>愿一切人一听到耶稣的圣名都屈膝叩拜；<sup>ii</sup>愿人类获得真正的和平，因为人们渴望天上的和平；愿所有的人在信仰和圣爱内合而为一！

“我个人的工作和努力只是巨大的福乐浪涛中一滴小小的水珠——在耶稣的圣名内，全世界都受这个浪涛的影响。但是仅仅意识到这一点，即我个人的生命在上主的伟大救恩计划中也有一个实际存在的地位，就能带给一个有信仰的心灵喜乐和兴奋。

“如果一个人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在耶稣马槽前跪下，观看我们主的仁慈及关爱——他选择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如果一个人看见耶稣的神圣并见到灵魂的无限价值；如果一个人见到耶稣的热切渴望，即拯救这些灵魂进入永生——这样的人必然认为，我们这个圣召和工作是至高无上的使命。

“说到最后，只有这一点才能让人感到快乐：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没有碌碌无为；意识到‘我不会完全死’；我为自己和别人建造了一所永恒的房子，我这样做就是一个仆人，但成为上主的仆人是最高的荣誉和最大的

---

i 译者注：《圣经·路加福音》Lk 2: 14。

ii 译者注：《圣经·斐理伯人书》Phil 2: 10。

快乐。

“我们这些传教士必须怀着这种超自然的理想主义。它会帮助我们克服一切困难，并以一种内在的精神热火激励我们的工作，使我们的工作变得有趣和轻松。

“如果我们内在有这种对传教工作的爱好，我们也会努力追求我们身份的崇高标准。当我们还有时间时，我们要行善！<sup>i</sup> 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短暂！几十年来我们为自己作准备，这样才能为上主和灵魂们工作。留下的时间不多。我们自己也很清楚地感觉到，时光如流水，我们一生的日子将很快进入黄昏。

“如果一个人认真面对自己的任务，他就不会浪费一分钟。无论我们的任务是多么重大——我们要向全世界宣布福音，对普通人来说，这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无论我们的力量是多么微小，我们还是应该投入我们所有的力量，投入我们所有的时间，一步步接近这个艰巨的、遥远的目标。

“当前这个时刻对中国的传教事业提出了最大的挑战。身处新潮流之中的人很清楚地看到，神州一直在漂浮，它正走向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已亡的安主教经常说：中国正在离开它的旧轨道，它原来陈旧、僵硬的形式正转变为灵活多变的形式。这句话是真的。然而恰恰也是在这个时刻，中国人能更好地接受新的因素。

“不过，谁不能适应这个洪流，谁就没有影响力。

“因此，我们生活在中国历史上很关键的时刻。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重要性，尽力参与工作，应该尽量利用这个时刻来拯救灵魂们，确保人民的真正幸福（das wahre Glück des Volkes）和建立神圣的教会。

---

i 译者注：见新约对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期待，比如《伯多禄前书》1 Petr 4: 2。

“我们首先应该成为真正的传教士。如果想长久地影响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就不能采取强制性的措施。真正的影响力只能来自人格的力量，或者说来自严肃的工作、任务、过一种具有美德的生活，而这一生活应该受圣神恩典的指导和照亮。

“我们已亡的安主教多次说过：‘我们必须用超自然的方法来进行工作！’我也这样说。这样，决定性的因素不是人的意愿和人的努力，而是上主的仁慈。<sup>i</sup> 山东南界的恩典在于它被奉献给了圣神/圣灵。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努力成为圣神的好儿子。我们的宗教生活是最迫切的责任。如果我们自己在这方面有进步，我们也能引导别人走向天国。

“如果我们认真改进自身的生活，我们也会很严肃地完成我们的工作。这两项任务是不能分裂的，它们是一体，正如灵魂和身体是一体。

“因此，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应该充分完成自己的任务，做基督的忠贞士兵。不同的地位也包含不同的职责。也许一个人会觉得，他目前的任务不太有吸引力。不过，一个真正的士兵不在乎这些。我站在哪里，这是不重要的，但是我如何站在这里，如何完成我的岗位职责，这才是重要的。

“因此，我们要以严肃和男子汉的精神工作，要完全投入我们所承担的任务，而我们也不用关心世俗的人会不会欣赏和赞扬我们的工作。

“我们现在在山东南界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工作范围远远超过工人的数量。有很多传教士管理着很大的地区，而有许多信徒团体同时渴望着他们的司铎服务、教导和培养。

“当然，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有人会懒散地坐在家里。司铎的时间都

---

<sup>i</sup> 译者注：见《圣经·罗马人书》Rom 9: 16：“蒙召并不在乎人愿意，也不在乎人努力，而是由于天主的仁慈。”

是很宝贵的，那些将获得永生的灵魂需要司铎，所以一个司铎不可以虚掷光阴。

“每一个人都应该在年初、月初作一个回顾和反思：我如何能最好地帮助那些托付给我的灵魂，我如何能最妥当地完成交给我的任务？”

“我们应该忠实地施行我们的义务，但成功与否取决于上主的安排。”<sup>i</sup>

新主教也给他的中国司铎写了一份牧函，是用拉丁文写的。其中他谈论了同样的问题，表示对司铎们的爱护，支持并鼓励他们追求司铎的美德和圣德，呼吁他们努力工作，利用司铎的宝贵时间来拯救灵魂。

他也通过传教士们向基督徒和传教员发表一些牧者的讲演，劝信徒们珍惜信仰的宝贵恩典，活出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人生，却仰赖信仰的超自然动机。

在他的第一个“年度报告”（Neujahrsgruss，一译“新年祝贺”）中，他向欧洲的朋友和恩人作了一番自我介绍。他写道：“当我介绍我自己，说我是安治泰主教的接班人时，当我向你们问候时，我一方面感到害怕，另一方面又感到我可以完全地依赖你们。

“在我被提名为主教的那天晚上，在我的小房间里，我在地图上观望我的工作地区——很大的一块地方，居住着1200万个外教人，有一个广大的传教网络，有许多需要，有众多新任务——新的时代不断产生新的问题。当我想到这一切时，我感到自己如此渺小，如此无力，我甚至感觉到这些任务几乎会压死我。

---

<sup>i</sup> 见1905年2月10日的牧函。

“不过，那时我抬头观望远处的山脉<sup>i</sup>——一个老传教士很自然会从上面、从上主那里求助，因为救助来自上面，当时在我心中突然涌现出两个念头，而这些想法都带给我安慰和勇气。

“我想到安治泰主教——他18年前担任新的主教，而我当时是一个很年轻的传教士，与他一起来华。我们坐一辆颠簸不宁的车慢慢走近当时的核心传教点——坡里庄。我再次想到那些寒陋的土房——它们的屋顶挡不住夏季的大雨；我想到那时的小小圣堂，它的祭坛很简陋，但仍然是可爱的，我看到圣堂杂草丛生的屋顶和光秃秃的砖墙——在墙缝里有蝎子和蜈蚣的巢窝。那个时候<sup>ii</sup>只有826个基督徒，他们分散在几个团体中，几乎都是新信徒，他们刚刚进入信仰生活的‘前厅’。

“在别的地方都是没有希望的外教人社会，他们对我们是冷漠的、敌视的；所有城市的门对我们都是关闭的；除了一些电线杆，看不到一点人家的文化；从我们的坡里到最近的港口要走14天。我们这样生活在中国的怀抱里，在陌生的、外教人的国度，与世界隔绝了！

“那个时候我们真的自问：我们的神圣教会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新的家园？我们传教士在这里会不会有栖身之地？我们能不能以信仰的光照亮这黑暗？

“没错，这并不是容易的事。如果当时有一个人告诉我们，我们将必须承受多少苦难，付出多少努力，我们必须经过多少不眠之夜和多少充满风暴的日子，可能我们会更加缺乏勇气。

“然而，结果超过我们的一切期望！曾说过‘你们不要害怕，我与你

---

i 译者注：见《圣经·圣咏》Ps 121: 1: “我举我目向圣山瞻望，我的救助来自何方？”

ii 译者注：指1886年的情况。



们同在’的那一位，<sup>i</sup>也真正陪同着他的小团体，所以山东南界的教会不断发展。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从沿海到西部已有许多基督徒团体（总共有600个团体）！几乎在所有的城市中都有教堂或圣堂。外教人对教会不再怀有敌意，教会也不再是一个陌生的事物了。我们甚至感觉到，家乡离我们也不那么远了，因为铁路和邮局在交流方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如果对照一下1882年和1904年的统计，我们能一目了然地看出我们工作的进步。1882年只有一个团体，只有158个信徒，而现在有26300个信徒和40300个望教者……”

“如果一个人当时——筵路蓝缕中——向我们展望现在的发展，我们会说这是天方夜谭。因此，回顾过去的发展会带给我们勇气：我们在这里难道不能看出，上主与我们同在？”

“同样给我勇气和鼓励的是我对许多恩人和朋友的回忆。他们在这几十年中以祈祷和捐献的方式，忠诚地协助我们在山东南界的传教活动。”

“如果仅仅看我们这几个传教士，好像只是一支迷失的小部队在敌对的地区活动。但是，在这些先驱者背后有庞大的、强有力的军队：<sup>ii</sup>很多小孩子为小耶稣婴孩运动捐钱；成千上万个助手在传播信仰方面成了我们的同工；在那些助手当中也有你们——山东南界的尊敬恩人，你们也多次以伟大甚至英雄式的牺牲协助我们传教士的工作，并通过祈祷为我们打开上天的恩典洪流——我们传教士在这方面确实有动人的体验。”

---

i 译者注：在圣经的许多章节中，上主（或耶稣）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与你们同在。”

ii 译者注：韩宁镐用“军队”的比喻来描述传教事业与迷信的搏斗。在当时来说，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敌人”不是华人或中国文化，只是“迷信”、“不文明”、“不开放”和“无神论”。当时的传教士们认为，他们的“战争”是一个精神性的“攻击”。

“我以感恩的心向所有长期支持山东南界的恩人表示谢意。

“我希望，我对你们的问候不会落空。我希望，这个问候的回音是：  
‘我们这些山东南界的老朋友会继续支持你。主教也许会去世，时代也许会改变，但我们的友谊不会消失，也不会改变！’

“如果真是这样，我敢拿起主教牧杖。虽然我很小很软弱，虽然我不配承担如此大的责任，但如果有那么多人协助我们，如果他们的爱戴如同一条强有力的河流承载着我们的小船，那么我会说：靠上主的名让我们启程吧！这样，上主的保护和上面的降福不会少。”<sup>i</sup>

---

<sup>i</sup> 见《耶稣圣心小通讯》，1905年，第175页。

## 第二节 托给他的葡萄园

当韩宁镐主教上任时，罗马公教在东亚地区或在中国或在山东南界的情况如何呢？我们要简单地了解一下他的判断，我们也想知道，他以什么样的态度和眼光看待上主的葡萄园<sup>i</sup>——他也为这个葡萄园担负一部分的责任。<sup>ii</sup>

回答是：他以广阔的眼光和开放的胸怀，以使徒的意愿和冲动看待这个葡萄园。在他每年向传教区的同工和恩人写的《年度报告》以及他的《圣言会福若瑟神父》中，他从很高的角度作了一种鸟瞰式的判断，也充分地表达了他对众人得救的渴望。让我们听听他的声音：

“东亚有千百万人！而其中有外教人那种不开化的文明。外教传统就像外教人的神庙那样宽广，它是一个庞大的、历史性的巨人，与这些民族的政治、社会和精神生活具有密切的关系。再加上，一种不太妥当的哲学思想几千年里培养了人们的物质主义。<sup>iii</sup>现在，从各方面侵入的新文化又进一步肯定了这个物质主义倾向。传教士们只是一个很小的群体，同时他

---

i 译者注：在《圣经》中，“上主的葡萄园”指“以色列选民”或“教会”，见《圣经·撒意亚》Is 5: 7。

ii 关于这一章，见P. Joh. Thauen SVD, “Die Missionen in Schantung mit allgemeiner Einführung über China und die chinesische Mission.” Steyl 1931。关于山东南界头30年的传教活动，见P. Anton Freitag SVD, “Die Missionen der Gesellschaft des Goettlichen Wortes”, Steyl 1912。

iii 译者注：“物质主义”（Materialismus）在此指“实用主义”、“享乐主义”、“世俗主义”，即以现世的物质享受为主，不考虑精神价值和伦理价值的态度。

们因为缺乏资助到处受到限制。这个东亚国家何时才会成为基督教的国度呢？我们离这个目标还非常遥远，而我有时候想，我们的传教工作似乎是一个自不量力的尝试。

“然而，‘你们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天父喜欢把天国给你们’。<sup>i</sup>在我们打的旗帜上面写着：‘在这个记号内，你将会赢得胜利！’<sup>ii</sup>真是这样，十字架是我们的胜利记号，基于这个记号，罗马公教的传教士不会沮丧，而他的乐观态度是有深厚的根基的。

“不过，十字架也是一种呐喊，是向基督教国度的呼号。它是我们教堂中的呼声，要呼吁所有的信徒参与传教工作。这是最动人的传教演讲：十字架上的救世主伸开双手，以无限的爱吸引所有的人，他也想吸引千百万个东亚的外教人——他们一直是处于迷惘中和被丢弃的人。

“让所有的人皈依是耶稣基督的最后嘱咐，而这个嘱咐针对教会和教会中所有的信徒。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完成这个任务，不然我们就意味着不负责任的人。我们是公教信徒（Katholiken），而这个名称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去传教的劝告。<sup>iii</sup>传教的理想是我们神圣宗教的活力根源（ein Lebensgedanke），而这个念头必须渗透整个公教会。”<sup>iv</sup>

他说：“实际上，我相信我们无论怎样强调在华传教事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不会太过分。”<sup>v</sup>

---

i 译者注：见《圣经·路加福音》Lk 12: 32。

ii 译者注：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us Magnus，公元288—337年）曾依靠“这个记号”（十字架）获得胜利。

iii 译者注：“公教徒”来自希腊语的kata和holos，意即“为所有的人”、“普世的”、“公开的”，所以韩宁镛主教说“公教信徒”应该都有传教的责任，即普及信仰的责任。

iv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原来的《耶稣圣心小通讯》），1910年，第87页。

v 见1904年12月15日的信。

“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民族，他们拥有几千年的历史和高度发达的文化。如果这个民族接受真理和信仰，对天国和对世界的宗教发展会有什么影响呢？数万万，即全人类的1/4，在基督诞生1900年后还是处在外教文化的阴影之中。在华传教的历史也证明，如果传教士们在这里努力工作，就会有相对丰富的结果。”<sup>i</sup>

当然，韩宁镐主教也会质问：他所热爱的中国为什么几千年里不能突破外教文化的樊篱？外教文化不能从古代的种种限制里走出来，其原因是什么？他简单地回顾了中国的传教历史和教会史——始于公元635年，并叙述基督教传教活动几次发端，每次都有发展的希望，但每次都因教难和迫害而夭折。这样，韩宁镐主教得出结论：“当时的基督信仰不能深入渗透进中国社会，否则它的足迹不会消失无遗。我们在这儿面对的是人类历史的重大问题。地中海的海岸地区都已经在古代接受基督信仰之光，全欧洲在十字架面前屈膝叩拜，后来又与伊斯兰教进行搏斗，但黄海海岸地区一直到现在仍然处于外教文化和迷信之中。

“对中国来说，一个朝代过去，一个朝代来到，人们经历一场场革命、政变、内战、国际战争等；一代代的哲学家、诗人、政治家登上了舞台；释迦牟尼佛的思想从西南（印度）隆重地传入中国，到处建立起自己的莲花宝座。人们不断地建立新的神庙，不断有新的神明登上神庙的祭坛，但是那位独一无二的，那位自己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sup>ii</sup>的神，

---

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21页。

ii 译者注：见《圣经·若望福音》Jn 14: 6。

即各地的人民所期待的那一位、永世的山岭所渴望的那一位——他没有来临，他仍旧在远处。这是上主上智的奥秘，对于这些我们只能谦逊地低头反省。”<sup>ii</sup>

中国人的外教旧文化和迷信在本质上是窒息精神的，它没有生命力。虽然这个民族的文化在别的方面很发达，但它的迷信就像几千年的北极冬天阻碍着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发展。

韩宁镐主教继续写道：“中国的疾病之源是它的外教旧文化。这个土壤产生了中国人的冷漠态度和物质主义。孔子的教导统治中国那么长时间，但他能带给这个民族的只是一套枯燥的日常道德体系。这种思想没有更高精神世界的视野。他的原则基本上是好的和适用的；<sup>iii</sup>但是，他的思想没有永恒的根基，也不会使人心感到满足。

“中国人对于宗教概念都非常不清楚：天堂、地狱、死后的生命、鬼怪——种种类型的鬼怪、轮回说或涅槃。这一切在外教人的头脑中飞来飞去，真是一个混合的思想大杂烩。传教工作是这样的工作：将光明带入这种混浊不明的状态，将外教人的孤独沙漠转为基督信仰、希望和博爱的绿洲，向那些快渴死的心灵指引十字架边的水井——真理和恩宠的水源，打好一个信仰的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才能建立真正的精神文化。总而言之，要拯救那些人的灵魂并引导人们走向天上的大父和圣父所派遣的那一位——耶稣基督。这就是传教工作的伟大任务。”<sup>iv</sup>

---

i 译者注：见《圣经·创世记》Gen 49: 26（雅格伯祝福他的儿子们）：“上主的祝福……远超过古山岳的祝福，永远丘陵的愿望。”

i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56页。

iii 译者注：虽然韩宁镐主教对孔子的思想不太欣赏，山东南界的传教士们（比如安治泰主教）也印刷并发行《四书》等儒家著作。他们认为，这样至少能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

iv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54页。

中国处于僵硬状态已经有几千年，这个僵硬状态是普遍的，但尤其是精神上的和宗教上的。这100年里有一些变化，而且这个变化还在逐渐加快。当然，唤醒这个沉睡的巨人需要很大的冲击和震荡。清朝政府五六次与英国、法国和日本交锋，被打败后才与世界交流，打开了它的门扉，同时也向基督宗教传教士开放自己。当然，清廷实行开放政策是很不情愿的，它曾多次想回转时间的巨轮，特别是在教会方面。

不过，自从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居住在中国的沿海城市以来，欧洲的现代思想潮流——好的和坏的——都流入国内，发挥酵母的作用。特别是日本的快速发展——在欧洲的影响下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取得巨大的进步，对中国的青年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并具有吸引力的榜样。因此，从新世纪以来，青年人要求中国也走同样的道路。老一代人的抵抗在1900年义和团暴动中已经被镇压，而在清朝灭亡和新共和国1912年成立后，前辈的抵抗也销声匿迹了。

然而中国的新发展还没有获得一个清楚的方向。它的转化和社会的新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充满痛苦的过程。我们还看不到这个过程的终点。从那个时候以来，不断地发生内战和重大的社会震荡。在精神生活方面，各种现代世界观的黑暗势力都企图夺取华夏民族的灵魂，但这些世界观不重视宗教，还认为人们即便反对神也仍然可以得到幸福。

不过，自从1911年的革命以来，所有的党和派别——包括强盗在内——都同意，不应该再一次迫害外国人，以免列强再一次干涉中国内政。韩宁镛主教写道：“1911年的革命极大地阻碍了我们的传教工作，但是上主的上智很明显在保护我们。革命党的领袖——他们有政治头脑——在革命的开始就宣布：‘保护外国人！保护传教士！’皇帝的党派也更遵守这个原则，而强盗们似乎都保持了类似的态度……这样我们可以说，教会

在革命时期获得了更好的名声，它的精神影响加深了。”<sup>i</sup>

当时，没有人想到清朝会那么快倒台。韩宁镐主教就共和国的建立写了这样的观察报告：“一年前，有四千年历史的中华帝国还在享受它的尊荣，虽然是陈旧的和空虚的尊荣。今天的官员却在庆祝中华民国建立一周年……人们慢慢习惯于共和国这个事实，但多数人还不太了解，这意味着什么。我们首先看到的只是老官员被调走，官僚们失去影响力，而文人和军人获得更高的地位。很多官员和学生剪掉了辫子，人们开始穿上新式服装。”<sup>ii</sup>

后来，主教这样呼吁家乡的公教信徒：“全世界逐渐意识到，我们在东亚的变化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进步。罗马公教的传教工作能在这个过程中开展很多工作，获得新的发展机会。陈旧的形式开始动摇，那些迄今仍那么封闭的民族已经打开了它们的边界，它们让外来的文化进入。我们传教士特别意识到这个任务的重要性，甚至可说因这个任务而负重担，因为我们将十字架的旗子带给人们。我们知道，这个旗子应该在各种潮流中保持中立的状态并带给人们祝福和指导。

“我们知道，我们每天感觉到，这种新文化也许能带给我们所热爱的中国更多幸福，但其前提是欧洲文化的基础，即基督教的真理和基督教的道德也必须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础。

“人们在教会的宗教活动中经常说：‘今天是最最后的机会！’我们也听到这个说法。我们不要过分强调‘最后’这两个字，因为只有上主知道将来的事，但我们很明确地感到‘今天’这两个字的迫切性。的确，东亚

---

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13年，第56页。

i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13年，第56页。



的民族现在进入一种恩宠的时代——他们迈向救恩的日子。上主的安排给了我们一个独特的机会，几百年里我们都没有过这样的机会。”<sup>i</sup>

在这个报告的结尾，韩宁镐主教写道：“我们传教士们怀着期望，我们祈祷并希望一切会平安地过去，而整个改革过程将会带给这个伟大民族幸福。中国人很爱护自己的国度，我们公教的传教士们也同样爱护这个国度，因为中国早已经成了我们的第二个家乡。我们也看到中国民族的缺点，但我们喜爱这个民族，不仅是因为我们是司铎和传教士，而是因为我们也体验到和知道它的优点。我们知道，用这种原料可以雕塑无数美好的东西，在这些人中可以为上主的光荣和人类的利益培养出很好的人才。”<sup>ii</sup>

韩宁镐主教认为，很多青年在外国的无信仰大学——特别是在北美和日本的大学——受教育，<sup>iii</sup>他们不能接触基督宗教的精神，但唯独基督宗教的精神让欧洲各民族成为伟大的民族。虽然如此，韩宁镐也认为，中华民族会有很多健康的力量。尽管内战期非常长，韩宁镐主教一直保持这种乐观态度和对中国人的信心。

他于1928年写道：“就中国而言，我不怀疑它能克服目前的内战和混乱状态。它在四千年的历史中克服了更可怕的困难。不过以前的问题大概是比较外在的问题，比如权力斗争，而今天的中国必须同时面对内在的和外在的问题。今天还要注意中国在外交上的地位、在世界列强中的地位、

---

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11年，第71页。

i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09年，第72页。

iii 译者注：1896年后，特别是1898年后（戊戌变法后），每年有几千中国人去日本留学，其中有很有影响的文人，比如周作人、鲁迅、郭沫若。他们也的确很少接触基督教。然而，这种留学传统的开始意味着中国在思想上封闭状态的结束。

内部混乱的管理、寻求坚定的目标、经济和社上的重建或者是调和古老传统的遗产以使它与新的方法、新的工具、新的挑战相配合。

“另外，中国也需要谈论新的理念，无论是科学的、世界观的或是宗教的——这些新观念在三四年里一拨拨地流入中华，健康的和不健康的都进来了。当然，这些新的因素与传统的保守主义混为一体，产生了一个在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酝酿过程。可怜的中国因发高烧而受到很多影响。不过，我们可以相信，中国拥有一个坚固的结构，它会顺利地通过一切交锋。我们也相信人民的健康意识和常识会排除那些明显是危险的和无道理的想法。不过只有上主知道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sup>i</sup>

对传教事业来说，古老政治结构的解体和新共和国的宪法带来更大的活动范围，这一点很明显是有利的。

但仍然存在很多重大的阻碍和不足，比如孔教和儒家、潜在的排外势力、青年华人反基督教的态度，仍在发生的很多内战、强盗暴动、流行病、水灾和饥荒，但罗马公教在这三十年内获得了扩展和坚定信念，这个发展应该给我们一些希望。韩宁镐主教回顾这个发展阶段说：“在革命党（国民党）的胜利后，教会面临新的危险、问题和任务。它将来还必须处理这些新的问题，无论是内在的或外在的。

“幸运的是，教会对时代的转化也有一点准备。教会自身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个新阶段的特征是内部和外更大的统一和本地圣职人员对教会领导的更大影响力。

“这个新发展的动力是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XV）于1919年写的传教通谕《夫大之》（*Maximum illud*）和教宗比约十一世（Pius XI）

---

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28年，第66页。

于1926年写的通谕《教会大事》(*Rerum Ecclesiae*)。另外,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总会长光若翰总主教(Erzbischof Guebriant)于1919年进行教务巡回,1922年教廷任命一位驻华的宗座代表,<sup>i</sup>1924年夏,中国教会举行第一届全国性的主教会议,<sup>iii</sup>而教宗于1926年祝圣第一批中国籍主教——六位中国主教。<sup>iv</sup>同时,公教在华的传教事业获得了新的力量,因为很多新的传教修会来华。

“这种力量的统一、集中和内部的强化使得教会有能力面对新的危险和困境,即由清朝的解体和革命所带来的新的问题。”<sup>v</sup>

一些数字能给我们说明这些发展和进步。当韩宁镐主教于1904年被提名为主教时,全国有80万名中国公教信徒,他们分散在40个传教区。1940年则是330万人,分布在138个传教区。每年新加入教会的人数大约是15万,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本地神职人员的增加更明显、更重要。在华的5000名传教司铎中有2000名中国人,而在100个传教主教中有30个中国人。本地的修女已经有4000个,而外国的修女仅有2400个。

公教传教事业的最好专家施米德林教授曾写道:“从数字来看,这个

---

i 译者注:光若翰(1860—1935年),是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1885年来华,在四川传教,1910—1935年任江西建昌主教。1919年他受教廷委托,任教务巡回使,对全国各教区进行教务调查。

ii 译者注:即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 1876—1958年)主教。

iii 译者注:指1924年5月至6月在上海举行的主教会议。参与会议的人是42名主教、5位监牧和苦修会会长、13名传教区代表、各修会代表24名以及中国神职人员。大会的主题是建立一个自由的、正常的、中国化的天主教会。其决议中有这样的说法:“决不可让头脑简单的人,视天主教为某一国家的教会,要使由神圣的创教者所昭示的大公无私的特征,显耀于大众之前。”(见《圣教杂志》1924年7期)

iv 译者注:这六位主教是:孙德楨(河北安国教区)、朱开敏(江苏海门)、赵怀义(河北宣化)、陈国砥(山西汾阳)、胡若山(浙江台州)及成和德(湖北蒲圻)。他们与刚恒毅一起赴罗马祝圣主教。

v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30年,第68页。

成就是如此之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是所有的传教区中结出的果实最丰富的地区。”<sup>i</sup>

比这些数字更重要的是那位学者关于中国基督徒素质的评估。他虽然提出一些问题，但最后说：“绝大多数的信徒一方面有良好的道德水平和修养，另一方面也拥有坚定的信仰，他们定期去教堂领圣事和望弥撒，这说明他们是虔诚的；他们有一些协会、兄弟会和修会，参与教会的灵修活动和祈祷会，也为教会作奉献并传播他们的宗教。这是很多传教士和外来人士所确认的事实。”<sup>ii</sup>

关于中国所说的这些也适用于山东南界的传教区，即韩宁镛主教的传教地区，25年后（1930年）他有过这样的回顾：“当教廷于1904年任命我当山东南界教区的牧者，我们的传教区已经进入了比较平稳的阶段。创立教会的困难和义和拳的痛苦时期都过去了，政府和人民对教会都有好感，都怀着友好的态度……当时我们有希望可以平安地发展。这个希望也没有完全落空。我必须感谢上主，因为他保护我们不再遭受像义和拳时期那样的毁灭性风暴。”

然而，韩宁镛主教指出，中国几乎处于不断革命的状态，不断发生内战和强盗的骚乱，后来发生世界大战，传教士们被驱逐出境，又有水灾、饥荒、伤寒症，所以他必须这样结束他的话：“这25年里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和改进，但人们仍然经历了很严重的灾难，这也是充满苦痛的时

---

i 施米德林：《远东目前的传教事业》（*Das gegenwaertige Heidenapostolat im Fernen Osten*），Muenster i. W., 1929年，第125页。

ii 同上，第127页。

期，并不都是阳光和安宁。”<sup>i</sup>

虽然山东南界与全国有一些共同点，但它也有其特殊性。它比德国的巴伐利亚州还大，人口（1600万）是巴伐利亚人口的两倍。韩宁镐主教曾写道：“如果一个人看到这些拥挤的村子与蜜蜂般的群众，他也许会害怕起来。”<sup>ii</sup>

这些人似乎完全以务农为生。因此，一旦庄稼收成不好马上就会出现饥荒。然而，恰恰在这个地方，有时下大雨，有时天气特别干燥，有时有蝗灾或其他虫害。而经常发生的是黄河水位上升，洪水毁灭庄稼。水灾的结果是饥荒和致命的流行病。

除此之外，山东南界在中国的所有省中是“神圣之地”，因为中国最出名的人物出生、生活在山东，也在此去世。首先是孔子这位哲人和教育家。这些贤人和文人的豪华坟墓也建在山东，而他们的后裔，七十多代后人还生活在这里。孔圣的后裔也享受至高的尊敬。

韩宁镐主教告诉我们：“这些哲人曾创造出中国的经典文献；中国的精神培养应归功于他们，而这种精神培养凝聚并统一全国人民，提供一个共同的形式。全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都植根于一些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来自古代的哲人。的确，这些人一直到今天都还属于人类历史中最独特的人。无论你对他们作出什么样的判断，但他们的影响、他们所享受的尊敬、人民对他们的感恩意味着他们应该属于那些伟大的人物——他们像高山一样超越任何时代的短暂潮流。他们的冷静思想太过于注重现实生活，这种文化传统对那些非基督徒中国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sup>iii</sup>

---

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30年，第68页。

i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49页。

ii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47页。

“由于这些国家英雄的存在，山东南界在中国人的眼里始终是一个神圣的地方，而基督宗教的传入在这里也遇到最强烈的抵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传教士也真切地感觉到这种抵制。只有像安治泰主教那样的坚韧之士才能长期忍受这个压力并最后克服种种困难。”

“然而，一代代的改革运动和革命，以及外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韩宁镐主教继续说，“腐蚀了中国文化中那些古老的权威。古代的哲人已经褪色，但孔子和他的官僚们还没有下台。”<sup>i</sup>

而对孔子的强制性崇拜是中国人皈依基督信仰的重大阻碍，特别是文人皈依的阻碍。崇拜孔子属于祖先崇拜——中国人很敬仰祖先。罗马教廷禁止中国信徒参与孔子崇拜和祖先崇拜，因为这些崇拜都有宗教性质并体现出外教人的旧文化。但是，在中国拒绝崇拜孔子的人不能通过官方的考试，因而也不能当官。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阻碍，公教也因此的建立高等教育制度方面遇到困难。

1939年12月，罗马教廷传信部决定取消对孔子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禁令，因为它们已经逐渐失去宗教性质，而中华民国的政府几十年里也几次说过，这些礼仪只是社会性的礼仪，不是宗教性的礼仪。

就山东南界人民而言，他们在中国没有特别好的名声。人们说，山东南界的人很直爽、敢打，甚至是强盗，因为他们性格粗暴。但是，天主教恰恰在名声最坏的地区获得了最好的成就。总而言之，传教士们在山东地区的工作还算成功，比较有希望。

韩宁镐主教于1904年就写过：“如果从各方面来看，在中国的传教工

---

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48页。

作比在其他地方更有成就。如果我们能在外界和内心促进我们可爱的山东南界的发展，我会很高兴。很多很多灵魂在等待着我们。”<sup>i</sup>

在上主天主的降福之下，韩宁镐主教也成功了。我们能在每年的统计数字里看到这个伟大的发展。韩宁镐主教于1904年接管这个传教区，当时有2.6万名信徒。当他退休时，信徒数已经是15万人，而领过洗的人数超过40多万。在那个原来只有一个主教的地区，罗马教廷于1928年规划了五个宗座代牧区和五个主教。<sup>ii</sup>

如果一个人知道将一个灵魂从外教旧文化的荆棘中解放出来是多么艰难的工作，他才会意识到，这么多新信徒代表多大的工作和多大的成就。

韩宁镐主教解释这些数字：“当然，这些新信徒并不都是很完美的基督徒。我们也不能向他们提出太高的道德标准，因为他们的生活多半时间处于外教旧文化的土壤之中，而在他们进入教会之后，他们周围的环境仍然是外教人的社会。他们不能与那些生长在基督宗教环境中并受基督宗教教育的人相比。但是，在上主的恩宠之下，信仰生活将会一步步地扎根，而他们的后代，孩子和孙子将会越来越多地接受我们神圣宗教的精神生命——如果这是上主的旨意。

“这个希望也是有根据的。它一方面依赖于上主的承诺和他的恩宠，另一方面也据于传教工作现在已经建立的坚实基础。”<sup>iii</sup>

这是托给韩宁镐主教的葡萄园，他以活力和深厚的关爱面对这个新任务。在1909年的《年度报告》中他表达他如何珍惜中国和中国人，这是

---

i 见1904年8月12日的信。

ii 译者注：这五个代牧区是：兖州（韩宁镐主教，后来是舒德禄主教）、青岛（维昌禄主教）、临沂（万宾来主教）、菏泽（何方济主教）与阳谷（田耕莘主教）。

ii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07年，第69页。

在他第一次去欧洲之后写的：“我去了欧洲很多地方，一年多后再次来到我的传教区山东。德国诗人说：‘虽然外国很漂亮，但它总不会变成自己的家乡。’我在这里把这个意思倒过来说：‘虽然欧洲很漂亮，但它总不会变成我的家乡。’的确，虽然我也很热爱欧洲的祖国，很看重那里的文化水平，但最后还是要说，我们的生命属于中国，我们的工作就在这块土地扎下了根。这里有我们的精神性孩子，我们可以说：‘我通过宣传福音而诞生了你们！’我曾带给他们宗教生活。因此，我的家乡就在这里。虽然中国的外教人一直说我们是‘洋鬼子’并看不起我们，我们还是会感觉到，这里是我们的家乡。

“我们的中国基督徒感觉到，我们之间有深厚的关系。他们不再视传教士为外国人，因为传教士成了他们的神师和精神导师。他们以孩子般的喜乐和尊敬欢迎传教士来到他们中间。虽然这些中国人很穷，缺乏教育，没有文化；虽然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或住在简陋的土屋中，但他们是我们的孩子，他们是我们所关爱的，我们的生命属于他们。”<sup>i</sup>

---

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09年，第70页。



### 第三节 对同工的照顾

韩宁镐主教完全清楚地知道，如果要完成他的任务，他必须有足够多能干的同工，需要他的传教司铎、传教修士、修女，同时也需要能干的华人信徒、传教员和老师来完成这个使命。因此，他不断努力培养这样的人，在职业精神、灵修生活和使徒工作方面支持他们，始终鼓励他们。

他最关怀那些在农村传教的司铎，即欧洲神职人员和中国神职人员。他一次又一次请求总会长派遣好的司铎来华。他在上任第一年就对斯泰尔传教会的创始人扬森神父写信说：“我由衷地感谢您派遣来这些新的人员。我希望他们是很能干的人，因为在传教区中，人员的素质比数量更重要。对文明的国度来说都是这样，而中国就是属于文明国度的。再加上，我们的时代很特殊，这里的人都要求改革，他们更注重精神上的东西，这种愿望超过以前的任何时期……”

“在华的传教事业似乎走向一个困难的时期。外在的支柱，比如治外法权，大概不能长期保留在我们手中。这样，个别传教士的成就将来将取决于他的榜样力量、沟通能力、才华和理解能力。”<sup>i</sup>

他同一年还向总会长写信说：“就今天的结果而言，我们应该感谢上主。受过洗的人数从来没有那么多，而我们可以说，受洗者大多都经过充分的准备……”

---

i 见1906年7月18日的信。

“不过，尊敬的总会长，您从我们的信徒和机构的数字中能看出，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工作人员。大部分的传教地区没有足够的传教士，经常一个人要照顾2000个信徒，而信徒团体是很分散的。在此之外还有很多需要教育的望教者。因此，请派遣工人进入你的葡萄园！<sup>i</sup> 请您送一些虔诚的、能干的、有使徒精神的人……我很高兴，因为我们逐渐获得了一些真正有修养的人物，我们的传教事业就需要这样的人。在那些比较偏僻的堂口也可以用一些不那么能干的人，只要他们的头脑和心灵健康，也有好的灵修和好的性格。

“我们也需要一批有领导才能的人，需要一些能照管整个事业的人，特别需要一些能指导各个文化机构的人，需要一些可以当总本堂神父的司铎以及能处理传教区的科学性工作和文献工作的人。”<sup>ii</sup>

三年后他写道：“今年我求您派六位司铎来，我希望他们是将来能当领导的人（我们这里也有一些人，但年龄已经太大了），求您派一些健康的、正常的人——绝对不要一些‘古怪’的人——他们应该有一点儿才华，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应该是虔诚的、善良的、受人欢迎的、温良的、不僵化的、不暴躁的。在中国当传教士也许比在别处更难。某些传教区的进步完全依赖于个别传教士。”<sup>iii</sup>

这样，他每年请求，每年提出新的需求，几乎在整个任期都是这样。他多次指出，个别的传教士承担的工作压力太大。“我们在传教区有2000个团体，有的地区一个传教士照顾着3000个信徒。”<sup>iv</sup> “贾兰伯神父（P.

---

i 译者注：见《圣经·玛窦福音》Mt 9: 38。

ii 见1906年10月26日的信。

iii 见1909年1月19日的信。

iv 见1911年10月25日的信。

Krampe)<sup>i</sup>照顾3300个信徒和2000名望教者。那位很年轻的林福宣(P. Lenfers)<sup>ii</sup>必须管理2000个领过洗的人。”<sup>iii</sup>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更强调中国传教事业需要年轻的、能干的司铎。

“我们很需要好的接班人！我们需要一些精神和身体健全的、能干的人，请派遣工人到主的葡萄园！不要那些认为传教是一种运动的人，不要那些因小细节而感到失望的人，不要那些因某些不理想情况而处处抱怨的人。我们也知道，这几年来山东的人都饱受战乱之苦。但是，我们需要一些能够并愿意工作的人，一些坚定的、有精力的人，一些自愿投入不够舒适的环境的人，一些能接受艰苦工作、具有牺牲精神的人。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只有最好的和最能干的传教士才是够胜任的人。如果没有工作者，分开传教区也没有用。新的传教士也不应该拒绝牺牲，不应该拒绝一些没有活力的本堂，也不应该批评他们的前任本堂司铎。如果传教士们不工作，那些没有活力的团体就会越来越多。批评很容易，但工作和牺牲比较难。我也很愿意减轻传教士们的负担，我想在他们的道路上撒玫瑰花，但具体条件就是这样艰苦。

“因此，我再一次求您：请您今年派给我们几个能干的、虔诚的、有牺牲精神的传教士，请您选择一些优秀的人。山东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传教区，来这里的人必须接受这个事实。”<sup>iv</sup>

---

i 译者注：贾兰伯（1858—1925年），德国人。1878年入会，1884年祝圣司铎，1892年来山东，1895年在鱼台传教，1900—1904年在单县，1910—1912年在成武，1925年在济宁去世。

ii 译者注：林福宣，德国人，1873年生于德国，1898年入会，1910年祝圣司铎，同年来山东，大部分时间在薛城传教，1925年回德国。

iii 见1913年8月5日的信。

iv 见1928年5月7日的信。

在另一封信的后面，他写道：“我决不想赞颂以前的老传教士们和贬低年轻的传教士，这是不公平的。以前也有一些感到十字架太重的人。但我想说的是这一点：来这里传教的人都需要有一定的牺牲精神和灵魂力量。”<sup>i</sup>

由此可见，虽然主教一再强调传教士应该是能干的和勇敢的工作者，但他最重视的条件是传教士们的虔诚信仰和美德，他们应该是具有良好人格的司铎和修道人。在他的年度避静——他经常亲自讲这些避静——以及退省讲道，在牧函、各种书信和视察演讲中，他都强调，信仰是最重要的。

他写道：“人们说了很多，说需要钱、需要政治界的合作、需要这样那样的机构和组织。这一切都是对的，但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那个充满耶稣基督精神的传教士——这是教会的核心，这颗心的脉搏激活和管理一切。”<sup>ii</sup>

“传教士们应该拥有实际的知识 and 能力，他们应该明智地利用自然条件和机会。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传教士的精神，这个精神会激活整个传教工作，它是基本的前提，一切其他的都依赖于这个精神……传教事业必须基于耶稣基督，这活的葡萄树，而他的精神必须充满和激活所有的分支，只有这样，传教事业才能结出高尚的、丰富的天上的果实。”<sup>iii</sup>

这种真正的传教精神来自耶稣圣心，而传教士在为人和对中国人的关爱中首先表现出这种内在的精神。

韩宁镐主教继续写道：“我希望，每一个传教士通过上主的恩宠和

---

i 见1925年5月12日的信。

i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647页。

ii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284页。

个人的道德努力能经常效法‘我们的救主天主的良善和他对人的慈爱’（《圣经·弟铎书》Tit 3: 4）。这样的人会吸引小孩子，而所有的负重担的人和受苦的人会在他那里找到鼓励。

“这是所有伟大传教士的秘密。圣方济各·沙勿略本身也拥有这种使徒们的慈爱，他向一位会士这样写道：‘你要知道，讲道理的成功与否不取决于口才，也不取决于教训的能力，不取决于华丽动听的言辞。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获得听者的爱戴和尊敬。因此，你应该先拥有进入他们内心的钥匙，而后再打开他们的耳朵。如果你的听者喜爱你，你将会获得一切其他的；而如果你不得罪他们，你将会引导很多人与上主和好……你要在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中表现出对那些罪人的关爱、仁慈及和蔼，因为友谊使他们感到快乐，无论在哪里都是这样。’”<sup>i</sup>

韩宁镐主教强调：“一个真正的中国传教士必须爱慕中国人。这个原则当然也适用于其他的传教区：每一个传教士必须关爱他周围的人。如果他为他的信徒辛苦工作但不爱慕他们，他将仅仅看到不好的一面，他将会感觉到他的工作很辛苦、艰难。他失去原来的兴趣和快乐，他变得悲观，又经常生气。这种心态对他本人不好，对托给他的羊群也不好。

“的确，对信徒们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传教士必须以爱慕和尊敬之心与他人接触。如果你想赢得一个人，使他进入教会，你必须表示你关心他并在某种程度上尊敬他。这种关爱和尊敬会唤起对方的爱慕。反之，负面情绪、蔑视和傲慢必然导致抵抗和异化。

“因此，一个传教士不应该始终批评、抱怨周围人的缺点。批评他人，对他们的风俗习惯或做法以及生活环境方面吹毛求疵，这不是好传教

---

<sup>i</sup>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80页。

士的表现。他也不应该始终赞扬自己国家的优点，因为这不符合传教士的精神，而对工作效果只有负面的影响……

“中国人可以安心地继续做中国人，他们可以保持他们固有的习惯和风俗，只要不违背伦理道德。来华的传教士的目标并不是使中国人成为德国人或法国人，而是使中国人成为好的基督徒。当然，在那些本身没有文明、没有文化的民族那里，一个传教士也可以带给他的新信徒两方面的文化：他可以与宗教信仰一起，向他们介绍一些先进的文明知识和道德标准。<sup>i</sup>

“然而，东亚的古国自己也拥有很高明的文化，它们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是好几代相传的、固定的。而在这些文化当中，传教士仅仅要消除那些有罪的、不正当的因素。

“不过，如果人民自己要求接触外面的文化——现在的中国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如果他们自己想掌握外国的知识和技能，传教士也可以在这方面予以帮助，可以教育人们（如果这样做不影响传教工作），因为传教士很乐意参与一切真正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然而，传教士的主要任务是这个：传播天国福音、拯救灵魂、使灵魂有机会去感受圣教会的价值和恩典。

“如果人们要求传教士为国家服务，为自己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目标而服务，那就是歪曲传教的使命。如果人们仅仅从这方面评估传教士的工作，那是错误的。

---

i 译者注：传教士如何面对“没有高级文化的民族”的问题是耐人寻味的难题。与信仰一起带进“现代文明”（“西方文明”）被称为“文明传教”（*mission civilisatrice*）。一个问题是，基督教中有很多现代性的因素，然而，它在什么程度上需要一种现代化的、开化的社会环境？一些传教士认为，为了理解基督教，人们需要一定的文明基础。具体来说，为了理解基督教信仰可能需要学习阅读，甚至要学习外语（拉丁文、古希腊语）来研究基督信仰的传统表达。

“每一个好的、完成任务的传教士也会间接提高自己国家的名声。他在国外进行善良和高尚的工作，所以他赢得人们的尊敬，而这种尊敬也会影响别人对他的祖国的评价。另外，在教会的学校和修道院中，传教士的家乡，家乡的教育、家乡的学校会很自然地发挥它们的影响。但是，在这一切关系当中，我们始终保持这个原则：中国基督徒将来也应该继续是中国人。”<sup>i</sup>

传教士的目标是，他的信徒成为圣教会的荣耀。“教会的荣誉对我们是最高价值，我们应该珍惜教会的荣耀如同珍惜我们的瞳仁一样。”<sup>ii</sup>这个荣耀首先在于基督徒的善良生活和美好的名声。”<sup>iii</sup>

主教要求传教士维护教会的荣耀、名声和公平正义，而一位老传教士——曹州府（菏泽）教区的主教何方济（Franz Hoowaarts）<sup>iv</sup>补充了另一点：“如果韩宁镛主教看到传教士们与基督徒有很友好的来往，他会很高兴。但是，他对女性的态度是比较严肃和冷淡干脆的，如果他看到传教士们对中国女性太客气或与女孩交谈很长时间，他就不太高兴。他始终要求所有的传教士们在接触女孩或小男孩时都必须谨守‘不要拉住我！’（Noli

---

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154—158页。

ii 译者注：“瞳仁”是最宝贵的东西。见《圣经·申命纪》Dtn 32: 10。

iii 1905年2月10日给传教士们写的牧函。

iv 译者注：何方济（1878—1954年），德国人。1893年入圣言会，1905年祝圣司铎，1910年在坡里庄，1919—1920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被驱逐出境，1925—1930年在单县，1935年2月24日祝圣为菏泽的主教，1935—1949年在菏泽，1951年回德，在斯泰尔去世。

me tangere!)<sup>i</sup>的原则。”

有一次，一名外国传教士在谈话时说：“我们当然更喜欢与妇女们谈话，这是很自然的。”然而，韩宁镐主教以严肃的表情回答：“没错，这是自然的，但并不是超自然的。”<sup>ii</sup>

韩宁镐主教认为，最理想、最好的传教士就是福若瑟神父，而福若瑟神父也曾做过韩宁镐的榜样和导师达20年之久。韩宁镐主教在他讲的避静中多次引导他的传教士们留意福若瑟这位真正的使徒。他撰写了《圣言会福若瑟神父》，在这部传记的序言中，他说，他之所以下那么大的功夫写650页的《圣言会福若瑟神父》，是为了帮助其他的传教士。

他写道：“当我写这个传记时，我首先想到你们，没有想到更多的读者。我以兄弟的关爱把这本书献给你们。在这一活生生的榜样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一位好的传教士——他在我们中间工作过，很多人还记得他。我们似乎可以相信，上主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在修会的开始就赐给我们这样一位充满使徒精神的司铎，上主引导他走入我们的修会和我们的传教区，因为他成为我们的光荣榜样。我也尽量多地描述他的传教观点、传

---

i 译者注：意思是说，传教士与孩子不能有身体接触，不能随便拍拍孩子、抚摩孩子的头，也不可以让孩子接触传教士。Noli me tangere（拉丁语）或me mou haptou（希腊语），即“不要接触我”，来自《圣经·若望福音》Jn 20: 1—10。在那里，玛利亚想接触复活的耶稣，但耶稣说：“不要接触我。”这样，玛利亚同时体验到耶稣的临在和祂的距离。耶稣与玛利亚的相遇也是欧洲艺术的著名题材。另外，根据古希腊传说，古代的数学家、发明家阿基米德也曾说过这句话：当一个罗马士兵威胁他，他说：“不要动我，不要打乱我的圆圈。”这个传说表达的是，一个学者不太注重自己的生命，更注重科学研究。

ii 译者注：“超自然”（*übernatürlich*, *supernatural*）也意味着“符合信仰的”。公教神学强调人的“自然理性”，肯定自然的基础（理性、合理生活、法律和一般的道德规律等），而在这个自然的基础上还必须信仰的“超自然之光”和“超自然的力量”（包括超越“自然”的道德理想，比如自我牺牲、为天国的缘故不结婚）。神学家也多次认为，古代文化（古希腊、罗马或古以色列）主要是“自然的”，它有好的因素，但仍然需要基督教信仰的超然性。



教能力。”<sup>i</sup>

我们在这里仅仅引用这本书的一些简短的观点：“他（福若瑟）一生不乏危险、受难、忧虑、负担重和痛苦的时刻，但是他始终保持一贯的人格和态度，因为他的整个存在和努力都根基于上主，唯独以上主为目标。他在上主内找到他的支撑和力量，在上主内有他内在和外在生活的核心和终点。因此，他的整个形象和他带给人们的印象都是一个整体，一个合一的整体。

“福若瑟表现出一位真正的、作为使徒的传教士的特点：他的信仰坚定如磐石，他对上主的爱慕（Gottesliebe）是内在的、能作出牺牲的，他的谦逊（Demut）<sup>ii</sup>是深厚的、真实的，他不考虑自己的好处。他有无私、禁欲、刻苦的态度，但他首先有一种永不满足的灵魂热忱（unersaettlichen Seeleneifer，即拯救灵魂的热忱）。拯救灵魂，引导他们走向真正的信仰、走向真正的基督徒生活，为了这个目标完全牺牲自己，不回避任何艰苦和努力——一句话，他的生活理想是他要当一个不折不扣的传教士，他全面投入，到最后，身体和灵魂都投入了。”<sup>iii</sup>

“他一直想深化和圣化整个传教工作。他与山上的摩西一样很长时间地为他的人祈祷、祝福。他在一切困难和危险中都以乐意牺牲和不沮丧的态度走在人们面前。他通过他的教训和劝告不断指出传教士们需要的东西：牺牲精神、不懈怠地工作、跟随耶稣基督、重视超自然的能力

---

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序。

ii 译者注：Demut即英语的humility（拉丁语humilis），可以译为“谦逊”。

ii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642页。

(Hochschaetzung der ü bernat ü rlichen Mittel)。<sup>i</sup>他首先通过他自己这个活生生的榜样向我们表明一位好的传教士是什么，一位好的传教士是什么样的。这就是他生活的特殊意义。”<sup>ii</sup>

韩宁镛主教这样结束他的传记：“请你们给予我们像福若瑟那样的人——拥有纯正美德的人，爱好谦虚的人，珍惜贫穷和刻苦的人，充满牺牲精神和灵魂热忱的人，充满高尚的、司铎式爱慕的人。给我们很多这样的人，我们的教会就不会有很大的困难，无论外在的条件如何。救世主自己也强调这一点，因为他劝我们：‘你们求葡萄园的主人派遣工人到他的葡萄园！’传教区的第一个需要是使徒工作者，热心的、能天天接受牺牲的‘人的渔夫’。”<sup>iii</sup>

韩宁镛主教的心愿是为传教区培养本地的司铎。他说：“传教事业和教会一直强调，培养本地的神职人员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唯独通过本地圣职人员，教会才能真正在一个民族中扎根。在传播信仰方面，能干的本地圣职人员也会提供最好的服务。他们了解本地的语言、本地的习惯，理解人们的特点。外国的传教士虽然很辛苦地学习这一切，但也许一辈子也不精通这些，而本地人自然就懂这一切。

“如果一个民族由衷地转向基督教信仰，它也就应该有在教会内服务的自己的圣职人员，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耶稣的‘遗嘱’，对教会

---

i 译者注：“超自然的能力”或“超自然的手段”指祈祷、依赖上主。人的“自然工具”（人的工作、能力、外在的好条件等）有局限性，所以人应该给上主空间，意识到信仰本身的力量。

i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644页。

ii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647页。译者注：关于“人的渔夫”，见《圣经·玛窦福音》Mt 4: 19。

的爱、感恩与博爱的精神都构成这样的任务：天主教国家必须传播信仰，必须努力工作使尽可能多的外教人皈依，这是他们的责任。这些国家应该派遣自己的子女到全世界传播信仰，但是每一个民族——包括那些新皈依的民族在内——也都有责任在自己国家中，在自己的同胞中传播并培养信仰。所以它们应该为这个职责提供工作人员，即圣职人员。

“罗马公教也一直毫不犹豫地走这条路，在外教社会这种环境中也可以培养本地司铎。而在许多本地人皈依基督信仰的同时，在中国也很快出现了本地的圣职人员和修道人……”

“山东南界的传教区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安治泰主教虽然一开始只有很少一些信徒并面对许多困境，但他很早就建立了一座修道院。<sup>i</sup>他召集本地老教友的孩子、济南传教区的一些男孩子，开始在坡里培训他们，不久后也有新信徒的孩子加入。最初只有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同时是教室、阅览室、食堂、休息室和卧室。修道院的院长住在隔壁的小土房里。”<sup>ii</sup>

上主开始降福这个贫困之地。这个修道院发展良好，它扩大并结出美好的果实。当它迁移到兖州后（1897年），它获得了更多房间，大修道院和小修道院被分开。几年后他们凭借恩人的资助，建立起正式的校舍和教室。

安治泰主教早就祝圣了十多位本地的司铎，韩宁镐主教进而祝圣了48位本地司铎。应该注意到的是，这些修道生大多数都是第一代或第二代基督徒，他们的学习过程需要15到18年，而他们又都是小班讲授，这样，

---

i 译者注：坡里的修道院建立于1884年。

i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334—336页。

老师们和受教育者都必须下很大的功夫。因此，培养如此多的本地司铎真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而这个成就需要很大耐心，甚至是英雄般的工作！所以，传教主教祝圣一位本地的司铎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当韩宁镒主教祝圣第一位中国司铎时——这位司铎是张伯多，<sup>i</sup>他后来陪同韩宁镒去欧洲，他在《斯泰尔传教通讯》中作了如下的报告：“一位司铎被祝圣并举行第一台弥撒在德国来说不是一件新鲜事，因为在家乡每年有一批一批的新牧者进入圣职人员的行列。然而，对传教区来说，这是一件伟大的事，虽然这仅仅是一位本地司铎的祝圣典礼。这位司铎能在外教地区建立教会，播下种子，能打开人的心扉。这样的本地司铎也是传教士的荣耀。

“对那些新信徒来说，成为司铎不容易，因为在他们的身体中还流淌着很多代外教旧文化的血。对很多修道生来说，他们逐渐发现，公教对司铎的要求非常高。因此，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修道生，那些接受15或16年辛苦学习的人后来证明他们都是能干、有用的司铎，他们很可靠，身体力行，为上主和教会进行工作。

“我在这里也想说几句关于中国圣职人员的话。中国人的性格与欧洲人的不同。他们远比欧洲人平和、冷静镇定，中国人没有那种主动的、激情的性格，相对而言西方的民族都比较主动。但是，华人的优点是他们的安宁，他们在困境中的耐心，他们的那种顺从精神。我们不应该随意判断不同民族的人，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有其优缺点。

“总而言之，中国司铎是教会的荣幸。中国司铎一般都忠于自己的职

---

i 译者注：张志一（伯多禄），1879年生于沂水县（？），于1906年4月16日在兖州祝圣司铎，1907—1908年与韩宁镒主教一起去德国，后来在寿张、郟城、胶州、高密传教，最后养病于青岛，1944年2月10日死于青岛。他翻译了两本默想书，写了一本道理问答解释公教进行会的手册，撰写了两本道理书和翻译了德国人Pichler的两本宗教书。

守，他们在道德上很纯洁，也懂得服从，所以中国司铎在圣职人员的大团体中一定能占有杰出的地位。中国司铎以弟兄般的心与他们的欧洲同事合作，对教会的发展作出不朽的贡献。如果一个民族能产生这样好的司铎，它不会永远拒绝基督信仰。”<sup>i</sup>

韩宁镐主教对本地圣职人员的欣赏首先归功于修道院中的老师和导师，另一方面也归功于他自己对本地圣职人员培育的重视和关怀，因为他一直想提供给修道生一个完好的知识性培养和灵修方面的训练。

在接受修道生方面，他很宽容，因为他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考验他们。然而，在准许修道生升司铎方面，他相当严格，并且在晚年变得愈发严格。每学期的期末考试，他都亲自在场并直接问问题。当一位老师生病时，他会亲自替代他，所以70岁的他还偶尔教书。他将一些中国司铎派往北京新建立的公教大学（辅仁大学）<sup>ii</sup>深造，另一些人则派遣去罗马深造<sup>iii</sup>。

他最注重的是良好的灵修教育：深厚的信仰、爱好祈祷和美好的道德。他经常给修道生讲信仰方面的道理，而且，在高级祝圣典礼<sup>iv</sup>之前的避静<sup>v</sup>都是他亲自讲的。

他给家乡的亲友写信说：“我们的候选人今天获得五品圣职，我给他们讲了避静。我一般都自己做这种工作，因为我想告诉青年们，这些神圣

---

i 《斯泰尔传教通讯》，1906年，第6页。

ii 译者注：即1929年正式创立的公教辅仁大学。

iii 译者注：伏开鹏与孙振之于1931—1934年去罗马读书。

iv 译者注：指祝圣“六品”（“执事”）和祝圣司铎的典礼。

v 译者注：天主教的“避静”指一周（或更长时间）的退省，即在安静、缄默、祈祷的气氛中反省自己的生活。每天都有一位避静导师提供一个或两个演讲来唤起参与避静人的信仰热忱。

品格是很重要的。”<sup>i</sup>

韩宁镐主教也很欢迎中国修道生和新司铎进入圣言会传教会，因为他们在修会内能获得更好的灵修训练，也可以为整个司铎生活获得更大的灵性支持和支撑。<sup>ii</sup>

为了更好地认识大修道院的修道生，他在每一个主日和节日的弥撒后让他们来到主教府，像仁慈的父亲一样和他们交谈。另外，每一个人必须在自己的主保日去主教那里接受一个小礼物。当主教进行视察旅游时，他也尽量去探访每一个修道生的家人并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

韩主教也很乐意接受其他教区的修道生，如果他们的教区没有自己的修道院的话。驻华的教宗代表（刚恒毅）早于1924年规定兖州的修道院为所有斯泰尔传教区的总修道院，目前有十个斯泰尔修会管理的教区。<sup>iii</sup>不过，那些在别的修道院被开除的修道生，韩宁镐主教原则上也不接受。

本地的司铎多在偏僻的传教点服务，韩宁镐主教始终如一地关心他们，像父亲照顾自己的孩子那般。人们曾经多次说过，他对本地的司铎更仁慈，也更大方地支持他们，但他对欧洲司铎和欧洲的会士有时候却过于严厉。当一个会士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中国司铎没有朋友，只有他们的主教。欧洲的会士也应该知道，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总是比较客气，所以我对中国司铎也照顾得比较多。在自己的家中，一个

---

i 见1924年4月12日的信。

ii 译者注：圣言会于1924年开始接收本地司铎入修会，第一批初学生在山东戴家庄开始入初学。在20年代末的初学生中有田耕莘（后来的北京总主教）。

iii 译者注：斯泰尔修会目前（1940年）管理的传教区，即圣言会在华管理的教区，包括兖州、菏泽、临沂、青岛、阳谷、信阳、新乡、兰州、青海、新疆。

人也许会随便一点儿。另外，欧洲司铎能自己办理某些事，但中国司铎不能。”

主教也曾多次给中国司铎讲避静，召集他们参加退省和小避静，让他们说出他们的问题。韩宁镐主教偶尔也让他们加入讨论共同的话题并在那个时候向欧洲司铎提出要求，要求他们说汉语，这样也给了本地司铎参与的机会。他从来不吝啬，尽量送给本地司铎一些弥撒用品、圣牌等圣物。

当韩宁镐主教于1935年因耳聋辞职时——在他的司铎金庆后——他曾对本地司铎们写过一个拉丁语的“告别通函”。这个通函实在很感人。我们在此引用一部分：

“我可爱的儿子们！”

“在我当司铎50年大庆的日子里，我的思想和我的祈祷，我的希望和我的渴望都转向你们。

“我曾在神圣的祝圣典礼上给你们覆手，并且，通过这个典礼，你们在特殊的意义上成为了我的精神性儿子。因此，我首先称你们为我的儿子和同工。如果我不久后要站在上主的面前，永恒的审判者将会对我提出严格的要求，即要求我提供关于你们的说明和报告。我多次给你们讲过避静，在避静中，每次我都给你们讲过你们的尊严、工作任务和义务。

“你们肯定还记得我在祝圣典礼之前以圣教会的名义对你们说的劝告：‘你们的教训对上主选民来说应该是精神的良药，你们生活的芬芳应该是基督教会的喜乐，这样，你们要言传身教，要通过言辞和自身的榜样建立上主的大家庭，即教会这个伟大的楼房。愿上主不惩罚我们——惩罚我因为我祝圣你们，惩罚你们因为你们接受了如此重大的任务；愿我们可堪接受上主的赏报。’当我们举行避静的时候，我曾多次提醒你们反思这些话。

“我也经常问自己：‘神圣的牧者和灵魂们的至高监督者——耶稣基督——如何看待我的司铎们？他能因他们而感到喜悦吗？我本人能不能因你们而感到安慰？’我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而我很是担忧这样的问题。

“要当一位好的司铎还算是容易的，但是，持续做一个好的司铎并一生完满无缺地保持和培养司铎的独特尊严和恩典，这就不容易了。但是，我们应该保持这个恩典，培养它，并通过多次使用恩典增加它，使它结出天父期待我们结出的丰富果实。

“这当然不容易，我们都知道。我们生活在世界当中，每一个人都面对许多危险和诱惑。我们每天在夜祷中这样祈祷：‘你们要节制，要醒悟，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巡游各处，寻找可吞食的人。你们应以坚固的信德抵抗他！’<sup>i</sup>

“我们多么容易堕落，多么容易掉入这个仇敌的陷阱！‘肉体的欲望、眼睛的欲望和生活的傲慢’都会使我们沉陷。这是所谓的‘世界’，圣若望在他的书中就是如此公开地谈论这个‘世界’的。<sup>ii</sup>

“司铎的心情很悲哀！你们很多次体验到了灵魂的敌人是多么的危险，而这些敌人又很容易引诱司铎离开正路。一个盲目地陷入迷惑的司铎将会无限地损害他自己的不死灵魂，同时也会无限地损害圣教会。

“如果我能够想到这么多危险，如果我能看到、感觉到或者能估摸到这个难度，即忠诚地、勇敢地完成司铎义务的难度，我的内心将受到极大的震撼。

“我想以父亲的关爱拥抱你们、保护你们，劝告你们每一个人：做一

---

i 译者注：见《圣经·伯多禄前书》1 Petr 5: 8。

ii 译者注：见《圣经·若望一书》1 Jn, 比如“要克服世界”（5: 5）。



个忠诚的人，抵抗魔鬼，保持纯洁的名声，保持良好的司铎的名誉。不要让上主无所不知的眼睛在山东的司铎中发现一件不愉快的事，发现一件使上主感到悲痛的事。恰恰相反！‘上主应该因他的仆人而受安慰！’让我们悦乐天父的心，不要让他感到悲痛！

“但是我们能不能诚心地说：我们一直是上主的喜乐和安慰？我们是不是在他的葡萄园中认真地工作？上主要求我们当葡萄园的工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如何利用我们的时间？我们如何努力？我们如何使用恩典（我们拥有那么多司铎的恩典）？我们如何施行司铎的神圣权力？我们如何管理那些宏大的恩宠宝库——弥撒和圣事的宝典？讲福音的道理对我们来说是不是我们的心愿？我们都被派遣宣讲天主圣言！我们是不是努力为个别灵魂和托给我们的信徒团体工作？我希望我们不会受批判，我希望我们不是那些懒惰的仆人——孩子们向我们求面包，而我们不给予他们！

“可爱的兄弟们，生命短暂。你们要相信我，因为上主赐给了我一个很长的生命。工作的日子很快过去，浪费的时间也总不能回来。‘当你们有时间，你们应该行善！’所以，我们不要当一个懒惰的仆人，他虽然不做什么坏事，但他也不利用他的才能，他将自己的财宝原封不动地还给他的主人。<sup>i</sup>

“如果你们懒惰地、随便地完成你们的任务，将来以空空的手在永恒的审判者面前出现，你们将是非常可怜的人。愿上主保护你们！如果你们不建立而破坏，如果你们因你们的生活、名声或者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Mangel an Lebensernst）<sup>ii</sup>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成为别人的灵魂的阻

---

i 译者注：见《圣经·玛窦福音》Mt 25: 25。

ii 译者注：表示缺乏严肃性。

碍，成为圣教会的悲哀，那是很不幸的！虽然主说‘引人跌倒的事是免不了的’，但他也说‘引人跌倒的人是有祸的’。<sup>i</sup>但愿上主——我们全能的圣父保护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从永恒审判者的口中听到这个可怕的‘祸哉’。上主，不要让我们当中任一个人迷路，求你眷顾你的这些可怜、无用的仆人！”

后来，这位年老的主教还提醒他们要遵守具体的规定：时时努力工作，将弥撒和日课视为主要的任务，每天做默想。他说没有祝圣礼不能成为司铎，没有默想不能成为好的司铎！另外他劝他们每天去朝拜圣体，念圣经，念玫瑰经，作每天的反省和忏悔，经常念苦路，每一周或至少每两周办一次告解圣事，定期参与司铎们的小避静和年度避静。

为了忠诚完成这一切任务和灵修活动，韩宁镐主教建议：司铎们应该有固定的生活规律，即应有一天的固定时间表，应该乐意投入神圣的职业，避免懒散的生活（Müssiggang）。<sup>ii</sup>他说：“一个不做什么正规工作的人将会做坏事。”他也强调，与妇女接触时要谨守规则，在金钱方面必须很仔细地算账，同时司铎也应该保持清贫的生活方式。

主教这样结束他的信：“我想引用圣保禄的话：‘天主的一切计划，我都传告给你们了，毫无隐讳。圣神立你们为全群的监督，所以你们要对你们自己和整个羊群留心。现在我把你们托付给天主和他的恩宠之道，他能成就你们并在一切圣徒中赐给嗣业。’（《圣经·宗徒大事录》20：27—32）。因此，我恳切祈求上主，但愿他保护你们——我的儿子们——留在他的恩宠内，让你们在各种圣善中成长并使你们在人生的朝圣旅途之

---

i 译者注：见《圣经·路加福音》Lk 17：1。

ii 译者注：德语的Müssiggang来自拉丁语的otiositas，即“闲散无事”。圣本笃说：“闲散是灵魂的敌人。”（otiositas est inimica animae.）

后享受永恒的福乐——与所有司铎一起享受真福！”<sup>i</sup>

韩宁镐主教认为，教宗比约十一世1926年10月祝圣头一批本地的主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那时他写道：“中国的年轻教会从来没有得到过比这个更大的外在荣耀——教宗在去年的耶稣君王节于罗马圣伯多禄大堂中祝圣六位中国主教。这引起全世界的注目，同时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教会在这个国家已经扎下了如此深厚的根基。那些在华工作的传教士们都感谢上主，他们可以说，他们和其先驱者的努力和受苦并非徒劳。”<sup>ii</sup>

“通过祝圣本地的主教，罗马公教强调教会的国际性，这就与现代的国家崇拜有所不同。这个事件证明，公教并不是一个外国的、反华的事业，而是世界的公教，每一个民族可以感到公教是自己的家乡，众口赞美上主，而每一个民族可以保持和培养它最宝贵的价值、它的‘国粹’。”<sup>iii</sup>

从以上的说法中，我们能看出，韩宁镐主教很注重司铎的职位，也很尊敬司铎的尊严。

在许多视察旅途<sup>iv</sup>上，他一直坚持一周一次的告解圣事。那个时候，他也在很年轻的司铎面前跪下并为他们求教会的赦免。

他不轻易接受人们针对司铎提出的抱怨或控告。如果这些控告是匿名的或来自不善良的人，他经常会忽视这样的怨言。然而，如果他知道这些

---

i 见1935年6月8日的通函。引自1939年9月的*Mitteilungen für die Region Taihiachwang*，第139页。

i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28年，第66页。

iii 同上，1930年，第68页。译者注：韩宁镐的说法也许受到当时对中国文化和“国粹”问题争论的影响，因此在这里译为“国粹”。当然，韩宁镐主教认为，中国的“国宝”是宗教信仰和精神价值、道德价值。

iv 译者注：“视察旅途”指主教对自己教区进行的视察，他去每一个堂口探望各地的传教士和信徒。

控诉的根据和实际背景，他就对该司铎有所怀疑。

关于司铎们的总评估，他对此一般都很乐观，但他也向司铎们提出很高的要求。他曾向总会长写过这样的评估：“在我们的传教士当中也有很多善意和努力。在我们今年的聚会和避静中，我再一次很具体地意识到这一点。愿上主为此受赞美！”<sup>i</sup>

在革命和内战的危险时期，<sup>ii</sup>当一伙又一伙的兵痞和强盗大量冲入山东地区时，没有一个传教士因恐惧而离弃他的传教点。韩宁镐因此感到喜乐，并且写道：“这种忠贞态度必然会有所赏报。欧洲的传教士们和他们的本地兄弟在困难时刻都坚守了他们的岗位。连这里的英语报纸也赞扬了这种勇气。它们几次报道说，几乎所有的公教传教士们都留在自己的地区，虽然他们因此经常会面对重大的不便、侮辱和危险。如果我们忍耐到底，我们的恩人也不会离弃我们。”<sup>iii</sup>

如果韩宁镐必须告诉一位修会会长某位传教士犯了什么错误，他会选择最谨慎的话语，同时指出这个人的一些优点。如果他必须写别人表现不理想的报告，他会说：“我不太知道这些是不是真的符合具体的情况，我自己对此没有足够的了解。”

然而，韩宁镐主教也很少赞美或夸奖一个传教士。他认为，所有的人

---

i 见1921年10月2日的信。

ii 译者注：指1926—1927年。

ii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28年，第66页。译者注：1927年的“北伐”在很多地区引起排外运动，国民军侵占教会财产，几千个美国新教传教士那年因害怕而回到美国。中国天主教受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本就应该完成他们的任务，这是理所当然的。在完成任务后，按照基督的说法，我们还是“无用的仆人”。<sup>i</sup>韩宁镐主教说：“这有什么可以赞美的？”

在特殊的节日和庆节，他的精神就表现出来。比如当一个欧洲司铎过他祝圣司铎25年银庆时，韩宁镐主教写给他这些：“上主在司铎圣召内赐给了您许多恩典和爱。我还记得，当彼得·许尔斯教授在斯泰尔当我们的教师时，他告诉我们，他曾经见过法国布瓦·得·艾纳（Bois de Haine）的路易丝·拉投（Louise Lateau）女士，而这圣洁的女士传告他救世主的话：‘如果我的司铎们知道我多么爱他们，他们就会因这种极大的喜乐而无法平静，这是如此大的喜乐！’阿尔斯的神圣本堂神父（der heilige Pfarrer von Ars）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

“然而，上主不仅赐给您这个圣召，他也让您生活在这个圣召之中长达25年之久，您将这个恩典保存无缺，并每天体会到司铎的恩宠，每天感到这些恩典的泉源。25年里您忠诚地完成司铎服务工作和使徒工作，为灵魂们的得救不断地作出牺牲，同时也领受了降福。这样，您的确可以在这个庆祝的日子向上主天主奉献从内心发出的‘赞美颂’。

“我自己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向您表示诚挚的谢意。我欠您很多恩惠，而我将这个债务交给那位最高者，一切赏报都来自他。您这25年在我们的传教区服务，一直是最忠诚和快乐的同工之一。您作为一名司铎，在您的指导下，出现了一些良好的精神果实，也出现了几座可观的教堂。您没有回避牺牲和努力，在困境中也抬起头来，在这几个传教年度也曾经经历阳光和风暴。

---

i 译者注：见《圣经·路加福音》Lk 17: 10。

“我为了您作为使徒的投入、为了您对我个人表现出的关爱感谢您。但愿‘我们灵魂的监牧’<sup>i</sup>赏报您一切，但愿他在您的庆节时赐给您圣神的丰富恩典——来自安慰之神、神圣喜乐之神、力量之神的恩典，这样您能继续为灵魂们工作，为灵魂们服务和受苦。

“为了表达我的感恩之心，我送给您一个圣爵。这是一个适合于司铎的礼物吧。”<sup>ii</sup>

在传教区中，辅理修士（Missionsbrüder）是重要的协助者。中国的传教事业不需要太多欧洲来的辅理修士，只需要一些技术人员和指导工作的人，因为在中国的年轻人中可以培养很多能干的和报酬较低的工人。

山东南部从一开始就拥有一批能干的和甘愿奉献自己的辅理修士，这真是一个大的喜讯。几乎所有比较大的教会建筑物都证明了修士们工作的努力程度和他们的能力。除了恩博仁神父（P. Erlemann）——他是建筑师，岳文成修士和费德勒修士也是监督各种建筑工程的人。岳修士、费修士和费好思修士是木匠。兰乐敏修士（Br. Adolf Glaremin）和白修士（Br. Felix Beushausen）<sup>iii</sup>是印刷厂的指导者；海恩修士（Br. Ulrich Heyen）<sup>iv</sup>与何修士（Br. Romanus Horstmann）<sup>v</sup>是农场的建造者；李修士（Br.

---

i 译者注：指上主。

ii 见1930年2月9日的信。

iii 译者注：白修士，1859年生于德国，1882年入会，1900年到山东，1905年在青岛指导印刷厂；1925年死于山东。

iv 译者注：海恩，1870年生于德国，1892年来山东，在坡里工作；1910—1928年在戴家庄；1928年死在山东。

v 译者注：何修士，1860年生于德国，1901年来山东，在戴家庄和坡里的农场工作；1912年死在山东。

Richard Bieger)<sup>i</sup>和卢修士(Br. Rudolf Poetter)<sup>ii</sup>以及其他一些人是医院的大夫和医护人员。隋德明是钳工和铁匠，他照顾整个家院。这些人和其他的辅理修士都是诚恳、虔诚的修道人，也是可靠的专家，他们无私地、不懈地为传教事业服务。

韩宁镐主教很欣赏和尊敬修士们，他曾多次给他们讲避静，高兴地在主教府欢迎他们，还亲自每周给他们讲小避静。虽然有时候只有两三个修士能来听他的避静演讲，他仍然会讲他的修灵道理。在个别辅理修士去世时，他还写温存的讣告赞美他们，比如当隋修士去世时，他这样写道：

“我们的中国人说：‘他真是一个好人！’他们没有说错。他刚刚过了他的来华25周年庆日。隋修士在这25年中很忠诚地、努力地、无私地和纯朴地在很多工作岗位上为传教事业服务。他本来是钳工，一直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在这里的人都必须承担各种各样的工作，特别是在开始的几十年里。隋修士真是‘众仆之仆’，他帮助传教士们，也在很多问题上帮助中国人。他是个很虔诚的人，如果有时间，他就去朝拜圣体柜中的救世主。在困难时期，在所有忧虑和风暴中，他都保持了内心的平和与圣召的喜乐。他在他最后的日子曾好几次对我说过：‘公教中的生活是多么美好，而在修会中去世是多么美妙！’”<sup>iii</sup>

上面已经提到了中国的平信徒，特别是男传教员和女传教员的重要性；下面，在关于慈善工作的章节中，我们将会描述传教修女们的贡献。

---

i 译者注：李修士，1882年生于德国，1903年来山东，在青岛当印刷工；1907年到兖州的诊所，一年内治疗了5420个病人（1910年）；1911年死于兖州。

ii 译者注：卢德福，1872年生于德国，1898年来山东，曾在兖州、汶上、蒙阴进行医疗工作，大部分时间在兖州的诊所；1949年回德，1952年死于斯泰尔。

iii 见1911年5月1日的信。

## 第四节 牧灵者

在第一封于1905年写给司铎们的通信中，韩宁镐主教强调：“这个时代与所有时代一样，每天的食物与传教工作本身是一切其他的事情的基础。对今天的山东南界来说更是这样。我们的传教事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似乎可以说，这超越了我们的能力。结果是，我们地区的很多基督徒没有得到充分的教育，缺乏修养。很多人是不冷不热的，他们并不会提高基督宗教的名誉。我每天从传教士的口中听到这样的事实，并且我们不可以回避这些。我们必须让我们的新基督徒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当然，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开展牧灵工作，进行教育和举行圣事。”

同样，他也给斯泰尔修会总会长阿诺尔德·扬森写信说，他要特别强调牧灵工作本身。总会长也在这方面支持他并回信说：“我们欣赏您的想法，您想更加重视培养教会的内在生活。为此，举行避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不仅仅给司铎们和修士们讲避静，也向男女传教员讲避静——您也已经开始这样做。我祝福您获得上主最丰富的降福！”<sup>i</sup>

所有的传教士都肯定，韩宁镐主教的这个观点并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长期的纲领，而韩宁镐主教在30年的任期中都施行着他的计划。所有的人都认为：“他百分之百是一位牧灵者，是一名真正的传教士，是头号传教

---

<sup>i</sup> 见1905年1月17日的信。



士！”

然而，他也许片面地强调具体的牧灵工作而忽略了其他的传教任务？有人曾给出这样的评论，而韩宁镐主教也知道这个问题。不过，我们不能说他没有远见，不能说他没有看到全局。他很清楚地知道直接传教和间接传教的差别，而他很负责任地思考和反省了这两种任务——我们下面将会看到这一点。他所走的道路并不是出于片面的爱好，而是出于信念和良心的决定。

他于1910年至1911年冬天在他的《年度报告》中叙述中国的重大转变、传教任务的迫切性和良好机会以及公教传教事业的严肃任务，同时他也提出这样的问题：“然而，我们有没有能力来利用这个时机呢？我们不能回应这个挑战？”

“两种任务属于传教工作：第一，直接照顾灵魂们，拯救灵魂，牧灵。这是传教士的本分，是精神工作。传教士是善牧的使者，所以他必须寻找每一只迷途的小羊，必须接收它，无论它在哪里，甚至要将它从尘埃中拉出来。这是使徒们的爱，而这份爱不在于一个人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是有文化的还是没有文化的；这种关爱向穷人宣布福音，因每一个灵魂的得救而欢喜——这种欢乐是天上的欢乐，而‘浪子回头’的故事就表达出这个欢乐。<sup>i</sup>

“在这方面，公教无疑占优势。<sup>ii</sup>新信徒和望教者的数字都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个任务同样重要，就是间接的传教工作，也就是所谓的文化传

---

i 译者注：见《圣经·路加福音》Lk 15：22等。（天父因浪子回头而欢乐。）

ii 译者注：意思是说，公教在这方面超过新教各会。

教，或说传教工作的文化任务，即教育事业、出版事业、文字事业、医疗工作和慈善工作。这方面的工作一开始不能拯救个别的灵魂，但传教士能创造一种基督信仰的气氛，使基督教在公共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有一定的影响。

“新教的传教士，甚至西方各国的政府特别注重这个领域，他们很清楚地看到时代提供的机会，并从很高的角度来评价目前的情况……”

“然而，我们在这方面做什么呢？当然，我们也有学校和医院，而我可以这样说，我们的传教区也会尽一切努力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在出版和文化方面也是这样。就无私的慈善工作而言，公教毫不逊色，甚至超越其他的组织。传教士和传教修女不追求世俗的赞扬，但他们全心全意为基督宗教文化和慈善事业服务，投入他们的年华和精力。但是，如果来比较我们的机构和那些非公教传教士的机构或外国政府的机构，从房屋、教材、教师的数字和学生的数字来看，差距太大，我们公教的机构太落后，我真感到悲痛。

“但是公教为什么不能更多地参与这个重大的文化任务呢？它为什么不能更好地理解时代的要求，并把握住机遇呢？为什么？”

“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不能谴责传教士们。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的资金很有限。虽然公教传教事业的目标始终是以有限的资源做尽可能多的工作，但是如果创办符合现代要求的学校和机构，那就需要很多很多钱。如果想在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赚来这个钱，那是不可能的事。让基督徒们自己捐钱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多基督徒都很穷。只有很少一部分资金来自传教地区本身。

“因此，传教士和传教主教都必须一边工作，一边向海外的恩人要钱。一个传教士一年要写多少信——祈求的信和感谢的信呢？只有上主和

恩人们知道。但是，如果这个主教通过艰苦努力而获得了最基本的资助，他就很高兴，这样他能给传教士们最需要的支持，给孤儿、男女传教员们所需要的钱——这些传教员一个月只拿到五六德国马克，但仍然是很忠诚的助手。传教士还要给病人和老人一些钱，需要资助小学和种种机构，还要建立最需要的小教堂和祈祷所。

“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区的主教面对一个严肃的问题：他是否应该用这些钱来建立一些比较大的机构来促进间接的文化传教？然而，这个资金一般来说不充足，它不能满足直接的和一般的传教工作的需要。

“主教必须在内心考虑具体的情况。他也明白这一点：如果新信徒的数字增加——这些信徒似乎都属于平民，如果几千人进入教会，我们在公共生活中仍然不会获得决定性的影响。

“然而，我是不是应该拒绝那些求助的外教人？他们因外教的旧文化而几乎无法过精神性的生活，他们处于外教旧文化的精神和物质困境中，他们向教会这艘救灾船求助，他们想抓住这救人的船只。他们是望教者，他们的灵魂追求真理之光，虽然这个灵魂自己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些新信徒分散居住在外教人中间，他们渴望和祈求精神食粮，他们是一些穷困的、患病的、没有家乡的平民，他们因没有办法而走到我们的门——我应该拒绝他们吗？我是不是应该放弃这些灵魂们？现在可以直接引导他们进入教会——我是不是应该弃绝这些灵魂并同时建立一些学院和学校？我是不是应该命令这几个传教人员离开牧灵工作，使他们在印刷和出版事业方面下工夫呢？然而，我如此迫切地需要这些传教人员，需要他们来拯救灵魂们。

“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自问：我们在这场文化运动中能不能做旁观者？这真是一个关乎良心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会沉重地压在传教主

教的心头。

“一些人说要‘双管齐下’。当然，这是唯一正确的办法。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传教士，而为了提供他们的生活费并发挥他们的能力，我们需要更多资助。如果想这样做，我们需要特别多的资金，这个数额将会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收入。

“在1910年的爱丁堡传教大会上——160个新教传教会参与这个会议，坎特伯雷的圣公会大主教就说出了这句有胆识的话：‘在教会的生活中，传教工作应该占有首要的地位！’这句话也是真实的。

“我们也很感谢上主，因为这里的年轻公教会越来越注重传教任务，公教信徒也越来越意识到这个任务和使命——这是救世主在升天之前亲口告知给我们的使命。”<sup>i</sup>

这是韩宁镐主教30年前写的话。<sup>ii</sup>总的来说，公教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教事业仍然面临同样的限度和困难，然而，其中也肯定有上主上智的一些因素。

在这些年代，主教认为，牧灵工作是主要的任务，不但对传教士们是这样，对他自己也是这样。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做牧灵工作的。我们在下文会描写他在慈善、教育、印刷和出版等方面做的事。

他拯救灵魂的热忱具体表现于他每年的视察教务旅途，这同时也是施行振兴圣事的旅途。为了这些视察旅途，他要花三四个月甚至五六个月的时间，即每年的冬天。这是因为农民在冬天比较有空闲，另一方面也是因

---

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11年，第71—74页。

ii 译者注：本书1940年出版。

为夏天太热，进行这样的旅行不太可能。这样，他两年或三年内看望了所有属于他的教区的地方。实际上，他的牧灵活动遍及他的整个羊群。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视察旅行，我们可以从韩宁镐主教给家乡写的信中引录一些章节：

1900年：“冬天和春天我几乎都在视察旅行中。这是一个特殊的、不单调的工作，既见到光明，又体验到黑暗。今年，我们受洗过的信徒会超过5万人。但是这里也有很多不令人满意的现象。这些在传统上属于外教旧文化的人将要变成真正的、好的基督徒，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再加上，这些人住得很分散，所以牧灵工作做起来确实很难。”<sup>i</sup>

1911年：“我刚刚结束了几个月的视察旅行。这几乎占据了整个冬天的时间。我走遍山东东南部的山区，大多数时间里我骑着马。这四年以来我没有骑过马，所以很不习惯，但是我还能坚持。中国的小马很有耐心。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路上。我大概拜访了100个教友团体。虽然这次旅途那么辛苦，但现在我感到很健康、非常好。这种传教生活本来是很美好的。在主教府，我必须长时间地坐在书桌边。今年的圣诞节我是在王庄的圣母山<sup>ii</sup>过的，这是在山谷里。元旦我在一个很穷的山村，而在主显节（1月6日）我骑马去了很远的地方。在山东南边的边境又发生了饥荒，我必须通过这个地区，真是令人感到悲痛，很多居民已经去别的地方讨饭了。”<sup>iii</sup>

1913年：“在我的教务视察中，我经过传教区的西部地区。去年夏天，有很多强盗严重威胁这个地区的安全。在这里有5000名基督徒接受了坚振圣事。我一直很好。虽然很多农民还是很害怕，他们不敢打开村子

---

i 见1909年6月10日的信。

ii 译者注：王庄位于山东沂水县西部的山区，是一个教友村。

iii 见1911年1月27日的信。

的大门，但我自己没有看到强盗。军队已经控制了那些强盗，逮捕了很多人，他们或被枪毙或入伍当兵。”<sup>i</sup>

1914年：“圣诞节前几个星期，我在很多山路上东奔西跑。虽然相当累，但是每天能够出去呼吸新鲜的空气，真是一种享受……这几年里，我们的受洗者每年增加5000人，并且很稳定地发展。在视察旅行中，我向大约8000个新信徒施行坚振圣事——他们特别需要这个恩典的支持。这算是很丰富的收获，这个收获就是我辛苦旅行的最好赏报。”<sup>ii</sup>

1915年：“这两个月里，我每天进行很辛苦的视察教务旅行。感谢上主，传教工作一直在平稳地进行。这是很好的现象。当然也有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如果一个传教士必须照顾2000个信徒，而这些信徒分散在100个村子中，结果不会很好。传教士需要巨大的拯救灵魂的热忱，同时也需要很大的才干，这样才会保持信徒团体的水平不下降。”<sup>iii</sup>

1924年（给总会长写的报告）：“我最后的视察旅行是去在东南山区的传教区。我用的交通工具是您去年来山东时所体验过的手推车（独轮车）。推车的人一再述说当时的体验。这次用了推车是因为我没有很好的马或驴，而我也不想买新的马。我的老马已经不太好，它经常失足跌倒。上一次我去山区的时候有几次从马上掉下来并受轻伤，所以我现在不太信赖那些不可靠的马匹。在圣母山的本堂那里，教友们很隆重地欢迎我，我从来没有获得过如此隆重的欢迎仪式。徐德励神父（P. Seidel）<sup>iv</sup>在村子前

---

i 见1913年1月2日的信。

ii 见1914年1月13日的信。

iii 见1915年1月26日的信。

iv 译者注：徐德励（1878—1943年），德国人，1894年入会，1906年来山东，1910年在临沂兰山传教，1919年被驱逐出境，1920年回到山东，在沂水地区传教，1931年任青岛会院院长，在青岛去世。

用几条松树桩搭建‘凯旋门’——这些穷困的农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西式牌楼！

“在东南边的城市里，我也看到了新教传教士们的庞大机构。<sup>i</sup>这些人有多少钱啊！真是一个奇特的奥迹：全世界都在上主的手里，但他在物质上不给我们更多机会。也许，这也是上主的计划，是他的神圣旨意吧。

“在我现在所看到的地区中，传教工作能有如此大的进展，一切都取决于传教士的热忱。当我看到F、L和S的努力，我很感欣慰。”<sup>ii</sup>

1929年：“我这样年龄的人——我现在已经66岁了——还必须东奔西跑！这两个月里，我一直在路上，有时在比较大的传教站，有时在很小的、穷困的传教点。这几天我还在一间很破旧的土房过夜。感谢上主，我还能继续工作，感谢上主，强盗们到现在还没有干扰我们。”<sup>iii</sup>

1932年（韩宁镐那时已经70岁了！）：“3个月里我巡视了传教区的大多数地区，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身体也有些不适……我坐我的推车去了28个传教县。几年里我们建立了10个新的比较大的教堂。这些都是很简陋的圣所，但它们都可以容纳300到400个信徒。在这次视察教务中我祝圣了4个圣堂。我由衷地向恩人们表示感激——他们捐了钱，所以我们能建立教堂。恩人们以这样的方式为自己在在中国建立了一座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宣扬上主的荣耀，而它将成为现在和将来几代人福乐的泉源。

“更令人喜乐的是很多新信徒团体的出现。这个进展在悄悄地发生

---

i 译者注：这些“庞大机构”可能指临沂市美国北长老会创办的“临沂基督教学校”（Lin I Christian Academy）、“华美医院”（Floyd White General Hospital）、护士学校和“慧英女中”。

ii 见1924年4月3日的信。

iii 见1930年1月的信。

着——一个新团体产生另一个新团体。在传教地区偶尔会有这样的体验：在长期的冬天后突然会有春风，会有一个转变。新信徒来报名，同时他们主动带来很多想入教的人的名单。传教士们在这些发展上会看到上主的恩典，这是他们最快乐的体验。

“我也必须承认，去西部看一些新的信徒团体，这是最令我高兴的时刻。这样的旅途——有时候我一天内探访五个或八个信徒团体——当然很辛苦。新信徒准备了一些小型的迎接会，他们还打着旗子。在迎接会后，我们一起去祈祷所祈祷，然后我向聚集的信徒和外教人作一个小演讲。此后我与男女老少进行对话，最后也许有一份点心或甜点。接着我们就以同样的方式去下一个团体，也许要走三五公里或十公里的路。就这样，一天内从一个地方到第二个地方，而在傍晚时我们就回到一个比较大的传教点去。

“长期进行这样的旅途当然很辛苦，很不好受。但是，这些经验仍然是最美好的体验之一。”<sup>i</sup>

如果想知道这些视察教务的旅行对传教士们而言意味着多大量的工作，我们可以听听其他教区传教士的一些报告。

“从11月到第二年春天，我们的主教进行他的视察旅行，无论天气多么冷，甚或下雪，他都不会放弃视察。有时候他还短期回到兖州市的主教府，但一般的时候，他三四个月不回来。他一般用一辆中国式的小车（独轮车）——这种车没有缓冲设备（避震簧），或者骑马。在坐车时他不喜欢说话，他念日课和玫瑰经，看很多书，尽管他的车在坎坷不平的路上始

---

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34年，第114页。



终摇摆不宁。在路上他会带一个相当大的箱子，箱子里有很多书。

“在各地的传教站一般都有隆重的迎接会，主教也喜欢这样。如果人们很顺利地举行这些仪式，他就不反对很长的仪式。对他来说，这就表明一个地方确实有丰富的信仰生活。传教士和信徒们很尊敬主教。在教堂的迎接仪式后（他在教堂就作一个小演讲），他问当地的传教士或总本堂神父关于工作的进程。他也很遵守当地的工作程序。虽然他坐了十多个小时车，忍受了剧烈的颠簸，但他一到某个教堂就说：‘让我们马上开始工作，这样我们今天至少能有一点点进展。’这是他经常说的话。

“视察工作包括下面的项目：监督准备坚振的人和学生的考试，听很多人的告解，每天讲三四个道理——主教似乎都自己讲道理，给男女传教员和会长们讲道理，同个别教友谈话。当他看到周围有很多人时，他就不会感到累。他很平易近人，并尽可能与所有的人谈话，如果他叫他们的名字，人们就会像孩子一样高兴——他的记忆力真令人佩服。

“他往往在告解亭中待很长时间。他常问：‘还有办告解的人吗？’在晚年他有点重听，所以他选择教堂的更衣室作为他的告解亭。如果告解亭太偏僻，他让人们将它搬到教堂的中间并在那里听告解。他也经常去拜访当地的官员，注重与地方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

在住宿和饮食方面，他在视察旅行时只有很低的要求。主教府的厨师一般给他带一点儿干粮。然而，如果一些传教士来主教府，韩宁镐就让仆人端上所有的菜，鼓励传教士们：“吃吧！这样的东西你们很少能吃到吧！”不过，在工作压力很大的日子里，他一整天都不吃饭，陪同他的传教士们同样也忍饥挨饿。

一个传教士叙述道：“有一次，我与他一起去拜访七个乡下的团体。我希望我们中午能回家，但到处都有隆重的迎接会，他在信徒团体中要花

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在天黑后才回家。我们很累，也很饿，因为我们从早餐以后没有吃过任何东西。但是，主教要求先举行晚上的圣体降福典礼和讲道理，因为当地的信徒们也都等着这些礼仪。礼仪完毕后，我们才吃晚餐。当一个传教士抱怨说今天没吃午餐时，主教笑了一下并说：‘一个真正的守斋日对身体和灵魂是非常好的！’他当时已经68岁！”

另一个传教士报告说：“他在任何一间土屋中都能睡觉，他不会不满意或发牢骚。有一次我与主教一起拜访四个乡村团体，这些地方都很简陋。他必须和我睡在同一间房，而这间小房间在白天是祈祷所、教室和客厅。主教很早起床，他穿上衣服后就在床前的一张草席上跪下，做了一个小时的默想和早祷。后来他在这间小房间举行坚振典礼，整天都有人进进出出。主教不断地给人们考试、讲道、指导。他挂上一张草席，在后面听人们的告解，以父亲一般的耐心和友谊接待信徒们。因为他很和蔼、平易近人，所以他赢得了基督徒和外教人的心。但是，在弥撒结束后，他就不继续接待客人了。”

另一个传教士的报告是这样的：“当主教已经七十多岁时，我与他坐中国式的车（独轮车）去一个堂口，用了七个小时。那天是12月7日，天气很冷，一路都是迎面而来的雪风。我们的主教当时患上了很难受的病，他浑身冰冷，手发抖，牙齿打颤。我们大约五点到达了那个堂口，当主教看到在教堂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一下就忘记了一切艰苦，马上讲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然后欣赏学生们的歌唱表演，还很和蔼地与老教友们交谈。第二天早上他举行坚振仪式，后来给50个学生考试。考试的结果非常好，所以主教给了老师20元墨西哥银钱。

“虽然外面很冷，主教那天还是去看望了八个小堂口。那里的传教士很努力地准备一切，他们吩咐信徒们，在主教进入教堂时，大家都必须唱

一首在讲道理时用的圣歌。果然，老主教在那天讲了八个道理。他晚上很高兴地回到总堂口去。一位很热心的中国神父有一次陪同主教几天，他们去很多地方施行坚振仪式，但这位神父几天后就抱怨说：‘我不能继续，我受不了这些辛苦，我太累！’”

当他出去时，他让兖州主教府的人送给他所收到的信——他在兖州经常收到很多信。他在视察教务的旅途上也写一些信。如果来的信太多，他会休息一天，用来整天写信。

当然，视察教务也是为了监督传教士们。主教的目光很敏锐。他尊敬他人的成就，也欣赏人们忠实完成任务的态度。不过，主教很少直接赞扬一个传教士。如果主教发现传教士在一个地方努力工作，他会很乐意回应传教士的要求和愿望。如果传教士们通过恩人的帮助努力建立小教堂和学校，他会很高兴，并尽量提供协助。

他也很严肃地劝传教士们传播福音，特别劝年轻的传教士们：“您要讲道理！您就开始讲吧！尽管人们一开始会不太理解您，这里还是有特别的降福，因为您被祝圣为司铎就是为了宣讲福音，而且您还有圣神的额外协助。”如果他在视察教务时看到一批信徒站在传教士那里，他就劝告传教士：“您要给他们讲道理，不要让他们空手回家！”传教士的回答可能是：“教友更希望主教可以给他们讲道理！”韩宁镐主教却说：“好，我一会儿也会讲道，但是您现在就开始讲吧！”

无论在哪里，他都尽量鼓励那些新来的传教士们，促使他们在牧灵工作方面有所行动，这样也能够克服他们内心的惧怕和害羞。一位老传教士说：“他一般都用很圆通客气的方式待人，但如果需要的话也利用主教的权威，给予对方一定的压力。”

他说，讲道理不应该超过半个小时，最好是20分钟。有一次他在年度

的大聚会上向传教士们说明关于讲道时间的这个观点。第二天——那是一个主日——一位神父在弥撒讲道理时说，他今天只讲两点。然而，一个小时后，他还没有讲完第一点。主教有几次站起来表示他的不满，但那位神父没有发现，还一直讲着。70分钟后他说他现在会讲解第二点。那时候主教给主祭一个提示，要他去祭坛，开始唱“我信唯一的天主”。这样，弹管风琴的人也开始弹奏，讲道理的神父必须结束。当天午餐时，主教严肃地说：“我昨天已经表明了我的看法，而今天还有这样的结果？！”

他很直接地批评堂口中的缺点，首先在牧灵者那里找出这些缺点的来源。他会斩钉截铁地说：“你这个堂口不会改善你的名声。”如果本堂神父指出特别的问题和阻碍，主教很快反问：“但是，你做了什么？你有没有认真祈祷？你有没有守斋？有没有刻苦和补赎？你有没有给穷人钱？你看，阿尔斯的神父（der Pfarrer von Ars）曾用这些行动让罪人们悔改！”他多次劝神父们向穷人施舍，也批评他们在这方面的吝啬态度。不过根据他的看法，传教士们不应该向主教申请这方面的钱，他们应该在自己的生活中省吃俭用。

主教最不喜欢一个传教士抱怨他的教友是多么坏、多么差。这时候，主教会不耐烦地说：“如果基督徒们是坏人，你就应该改变他们，使他们成为好人！你为什么来中国呢？我们应该最同情这样的人并表现更大的拯救灵魂的热忱！”

如果主教发现一个传教士长期居留在他的核心堂口而不出去拜访乡间小堂口的信徒，他就会表现得非常不客气。他认为，拯救灵魂的热忱应该会促使传教士们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无论刮风下雨，无论要有多少牺牲。一位传教士这样说：“有一天天气恶劣，下了大雪。我站在兖州府主教府里向窗外观望。我想，我应该回到我的堂口去——我也很

愿意回去，但这需要24个小时的跋涉，而天气又如此恶劣！这时，主教的老仆人面带笑容对我说：‘雪和雨怎么能阻挡一位传教士呢？’我们都知道这句话是主教经常说的。那时我感到惊讶，便马上出发。三天后我安全、健康地到达了我们的传教点，而我又体验到了一点：寒冷的天气能净化血液！”

在主教的讣词中有这些话：“主教的视察旅行绝不仅仅是快速地经过很多地区的堂口，不是敷衍了事，他有时在某一个堂口会居留比较长的时间，因为他会给会长或传教员们讲避静或给他们讲课。他总是能讲很多新的知识。由于他对上主的深切爱慕（tiefe Gottverbundenheit），加之他有渊博的知识，他能讲出很多东西，而且每次都能让人获得一种新的灵感。”

另一位传教士报告说：“在我患伤寒症卧床时，主教几个星期都住在我这里。他代替我去各个堂口，并每天两次来我的病房看我。”

尽管韩宁镐住在兖州主教府，他也愿意做一点牧灵工作。讣告写道：“他定期地给修士和修女们讲小退省和避静，更经常地为中国的司铎和各种传教员讲避静……直到最后的日子。他很喜欢讲主日和节日的道理。如果他几个星期都没有讲道理的机会，他就会抱怨。

“他也是听告解司铎的好榜样。在兖州主教座堂和孤儿院的小堂里都有一个他专用的告解亭。他在那里听了许多人的告解，直到他耳聋为止。他也要求他的司铎们拥有类似的热忱。如果一些听告解的司铎在大节日前没有准时到告解亭去，他就亲自去找他们或派人去叫。

“当兖州会院一位新的院长神父上任时，韩宁镐主教就以这样的言辞

---

i 译者注：德文原文Gottverbundenheit指“与上主的关系”、“与上主的联系”，难以译成汉语。

来欢迎他：‘我们特别需要一个牧灵者……你应该让我们可爱的兖州府成为一个理想的本堂，就像阿尔斯的神父让自己的堂口成为一个理想的本堂一样！’

“每逢盛大节日时，主教都举行大弥撒，他自己讲节日的道理。比如在马槽礼仪、圣体游行、祝圣棕榈枝、祝圣蜡烛、举行圣周等等隆重礼仪时他都给教友、司铎和修士们讲很多道理。虽然年事已高，在圣周四的圣油弥撒中，他还举行洗脚的礼仪，为12个老年人洗脚。信徒们都看到这位白头的老主教跪在地上，谦逊地完成这个动作，艰难地从一个人移向另一个人，此时人们都很是感动。在这一切辛劳后，他也会在复活节继续举行大弥撒并讲一个杰出的道理。”

一个年轻的传教士写道：“72岁的老主教还能以年轻人的热情和兴奋态度讲道。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是，他在那个年龄，连续三天一连串地祈祷，呼求圣神降临到我们中间来。他的祈祷是如此热忱，内心是那么火热，以至于所有的司铎们和信友们都受到感动和鼓舞。”

他很喜爱人们把教堂装饰得美观一些，也劝告人们：“你能做多少，就应该勇敢地做！”他也要求教会圣乐有高的标准；每当人们唱多声部的歌曲或弥撒时，他都会作出评判，对教会合唱团和其指导人提出直截了当的批评或赞扬。

每天与男女老少的来往也是主教开展牧灵工作的机会。他让人们自由地接触他，不允许别人阻挡教友们去找他，并每次以父亲式的教训、劝告和安慰给人们一些鼓励和启迪。

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提到他的信，特别是向传教士、恩人和亲友写的信。他一年大约写了两千封信，甚至更多，这还不包括无数的卡片，几乎

都是亲手写的，也是用普通的笔<sup>i</sup>写的，他不习惯用钢笔或打字机。似乎所有的信都充满牧灵方面的思考和思想，而韩宁镐主教通过这个渠道也播出了一些好的种子。由此可见，他一旦与一个灵魂接触，就想为这个灵魂服务。

他拯救灵魂的热忱也远远超越了他自己的传教区。他自己工作压力很大，但他很乐意给其他的传教士们讲避静，比如给山东北部的方济各会会士讲年度的避静。

他对圣言会在亚洲东部的传教地区的态度更为重要。当韩宁镐成为主教时（1904），圣言会的传教士仅仅在中国和在新几内亚（Deutsch-Neuguinea）工作，但今天（1940）已经有18个传教区了，其中一部分是新的传教区，而另一部分是通过分划新教区而成立的。

韩宁镐主教必须为这些新创立的传教区（比如日本、菲律宾、费洛里斯、甘肃西部、新疆和河南）提供自己教区的人员。这样，他失去了许多杰出的传教士。他无私的牧灵精神表现于这一点：他一直派遣优秀的、能干的传教士任那些新教区的会长，虽然这意味着相当大的牺牲。他自己也始终急切需要很多好的同工，但对他来说，天国的传播和灵魂的拯救是最高的价值。他曾从山东派出十位传教士到甘肃与河南，当时他向总会长写信，要求他派遣更多的新传教士，因为他现在严重地缺乏传教士。他这样结束他的信：“虽然如此，我很高兴我们接受了这些新的传教区，而我也很喜欢您的信仰和传教精神，尊敬的会长神父。”<sup>ii</sup>

当他自己的教区（山东南界）被分为五个教区时，他表现出同样的慷

---

i 译者注：指鹅毛管剪成的笔。

ii 见1921年9月26日的信。

慨和大方——这种划分主要也是他自己推动的。另外，当圣言会接管北京的辅仁大学时，他也很大方地提供了一些良好的人员和教师。<sup>i</sup>

瑞士的伊门塞（Immensee）<sup>ii</sup>传教会于1923年派遣第一批传教士到中国，他们的院长神父问韩宁镐主教，他们是否可以先去山东南界的传教点，以接受一些基本训练。此后，韩宁镐主教向斯泰尔的总会长写了这样的信：“瑞士的传教士们可以来，我不反对。我们乐意伸出兄弟之手，很愿意协助他们，当新的传教士来华时，我们都很高兴。但是他们会发现，我们这里也不是处在很理想的境况中。这是事实，谁也无法改变。因此，以上主的名，让瑞士人来吧！”<sup>iii</sup>

所有在中国服务的传教主教和修会会长们于1924年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为了准备和促成这个会议，韩宁镐主教也投入了很大精力。他想加强与其他的公教传教会会长们的来往与合作。韩宁镐主教很早就意识到，这种合作和沟通是很重要的。

他早在1906年便向斯泰尔的老总会长写信：“在华的各个公教传教会（修会）之间没有很多来往。但是在这个现代化的世界中出现了很重大的问题：现代学校的问题、法律问题、新学校中的孔子崇拜、传教区的治外法权，等等。人们应该就这些问题好好交换意见，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连一个沟通工具都没有，而新教传教士们有很多这样的工具。<sup>iv</sup>我曾经向耶稣会提出了这个意见，劝他们开始面对这些问题，但直到现在仍没有

---

i 译者注：圣言会于1933年开始管理北京的辅仁大学。在此之前，美国本笃会是该学府的创办机构。

ii 译者注：即白冷外方传教会，后在中国东北传教。

iii 见1923年9月8日的信。

iv 译者注：指教会内部的刊物。



结果。我们自己没有人员，也没有资金。”<sup>i</sup>

韩宁镐主教一直为此努力。一年后他写道：“正如我之前给您说过的，罗马教廷决定举行一次谈论中国传教区的主教会议，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主教会议。我很想参加这个会议，特别是因为我自己催促了一些人举行这个会议。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举行这次会议。”<sup>ii</sup>

这个中国主教会议本来要在1907年11月1日召开，后来推迟到1908年3月1日，而最后被取消。<sup>iii</sup>

韩宁镐主教因这个失败而感到失望，但他没有放弃这个计划。然而，几年后的变局、革命、皇帝下台、政治改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给传教事业带来许多急迫的新难题。同时，韩宁镐主教也意识到，只有一个具有权威性的人物才能克服这些障碍，实现一个全国性的主教会议的理想。

罗马教廷也认识到时代的特性并在战争后（1919年）派遣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光若翰总主教（Erzbischof Guebriant）当全国的宗座视察教务员。他是很好的人选，具有丰富的知识和使徒的精神。

1919年他来到山东南界，与韩宁镐主教和一些传教士进行对话。在这几天的谈话中，主教向这位宗座视察员提出建议说，为了协调在华的公教传教事业，迫切需要采取两方面的行动：第一，派遣一位宗座代表来华；第二，举行一次全国性的主教会议。光若翰总主教后来尽心尽力促进这方面的发展。

中国各地的天主教主教们不久后收到罗马传信部的问卷，问卷上面有许多讨论话题，而这些话题都是将要在全国会议上谈论的。这样，每一个

---

i 见1906年2月18日的信。

ii 见1907年2月13日的信。

iii 见1907年5月21日和1907年7月13日的信。

主教应该先与自己的神职人员们讨论和回答这些问题。

韩宁镐主教很认真地对待这个任务。他利用每年在戴家庄举行牧灵会议的时间——这些牧灵会议是接着年度避静举行的——在两个星期的时间内彻底讨论一切问题。每天用四个小时的时间来谈论牧灵话题，而参与的人组成几个委员会专门讨论某一个具体问题；他们准备的问题后来也在大会中讨论。这些日子是艰苦工作的日子，但同时也有很好的效果，一方面是对传教士们本身而言，因为他们很全面地认识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也是全国大会的准备。

罗马传信部认为，韩宁镐主教寄回去的问卷上的回答是最好的回答之一，罗马的神学家们也复印了他的回答，还在准备大会时多次讨论它。这些准备大会的小会议在香港（华南地区）、汉口（华中地区）和天津（华北地区）举行。韩宁镐主教参加了在天津的会议，陪同他的是他的代理人齐恩来神父（P. Ziegler）<sup>i</sup>以及兖州修道院的院长维昌禄神父（P. Georg Weig）。<sup>ii</sup>

罗马教廷在华的宗座代表处建立于1922年8月，很多人早就渴望这样的代表来华。被提名的第一位宗座代表是刚恒毅总主教。他很努力地推行全国主教会议的大事。他于1923年5月底到6月底在湖北武汉召开了一个神学家会议，这个会议规定全国会议的谈论内容。韩宁镐主教派遣当时兖州修道院的院长（维昌禄神父）去参加那次会议。在武汉的会议上，人们也多次讨论韩宁镐主教寄给罗马传信部的问卷。

---

i 译者注：齐恩来（1864—1925年），德国人。1892年祝圣司铎，1895年来山东，1900年到1906年在曹县，1910年任兖州修道院院长，1915年任会长，在兖州去世。

ii 译者注：维昌禄后来任青岛主教。生平见前文。

全国主教会议于1924年5月15日开幕，宗座代表是该会议的主席。陪同韩宁镐主教的圣言会会士是史培禄神父（P. Schoppelrey）<sup>i</sup>和修道院的院长维昌禄神父——他是该会议的秘书（Lektor）。韩宁镐主教是参加会议的唯一的德国主教，因为山东北部的瑞主教（Schmücker）<sup>ii</sup>刚刚去欧洲，在那个时候全中国没有第三个德国主教。<sup>iii</sup>

维昌禄神父——他后来成为青岛的主教——这样描写韩宁镐主教在全国会议上的地位：“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说：‘动物很多，但狮子只有一个。’我陪同我们的主教，而我在会议上见证了他的影响力。他多次举手要求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时刚恒毅宗座代表及其他参与会议的人都愿意听他说话，因为他在全国的主教当中已经享有很高的威望。”<sup>iv</sup>

“韩宁镐主教参与一个工作委员会（总共有五个这样的委员会）。然而，他在大会上的影响更重要。在大会上经常发生热烈的争论，各方面的意见壁垒分明，而韩宁镐主教多次参加讨论。他能澄清人们的思想，很会协调人们的不同意见。他先总结相互抵触的意见，以简单、清楚的话概括它们，并以超然的实际性和冷静态度促进人们之间的理解和沟通。通过他的圆通方式及友好精神，他对这次重要的主教会议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这是所有参与的人都承认的。”以上是一位与会者的评价。

主教们对韩宁镐的尊敬还表现在另一方面的结果。当他们举行会议

---

i 译者注：史培禄（1876—1940年），德国人。1900年祝圣司铎，任神学教授，于1909年来山东，后来在青岛；1923年在戴家庄成为会长，1933年成为河南信阳教区的代牧，1934年被祝圣主教，1940年5月25日因患疟疾在河南驻马店去世。

ii 译者注：瑞主教，德国人，方济各会士，从1920年到1927年任山东北部主教（主教府：济南）。

iii 译者注：当时的主教大多是意大利人或法国人。

iv 见*Kaomi Regions-Korrespondenz*，1939年第8期，第200页。译者注：这个会议的官方语言当然是拉丁语，所以韩宁镐主教的讲话应该用拉丁语。

时，主教们委任韩宁镐主教撰写一封牧函，宗座的代表将来要以全国主教的名义向中国神职人员和信徒发表这封牧函。韩宁镐主教写的稿子也获得了大家的赞成。

韩宁镐主教后来给总会长写了他自己对那次主教会议的印象：“关于我们在上海举行的大会议，我不想写很多。维昌禄神父在会议上是‘秘书’，而他早就写过一个很好的、比较长的报告，在德国的《公教传教》（*Katholische Missionen*）杂志上发表了。真是一个美好的、鼓舞人心的会议！我相信，这也是圣神引导的会议。我因感受到主教和传教士的虔诚信仰、简朴精神和拯救灵魂的严肃热忱而受到鼓舞。宗座代表刚恒毅主教也圆满地、以真正的使徒精神领导了这次大会。上海耶稣会团体的接待也令人佩服。上海天主教那些美丽的机构和当地教友丰富的教会生活都为我们的会议带来一个舒适的环境。最后，我们将中国教会奉献给圣母。”

在另一封信中，韩宁镐主教说：“举办这样的大会议真是一件伟大的事。在这里能感觉到很多人在信仰、意愿和努力方面都是统一的。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语言，但是他们能彼此和谐相处、互相关怀。那是多么具有意义的讨论会、隆重的典礼！真是激动人心的体验！还有那些公教机构和事业以及真正的教会生活……这一切都留下难忘的印象。无论这次会议将来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参与会议本身就会有丰富的收获。有的主教也公开地表达了这一点。我很高兴能认识那么多传教士和主教。他们的虔诚生活，谦逊、简朴的精神，严肃的作为，使徒的努力和兄弟般的友谊，这些都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无论如何，在华的主教团中有很多如同使徒般的人物。”<sup>i</sup>

---

i 见1924年8月3日的信。

在他寄给总会长关于大会的文献资料时，他写道：“您在其中不会找到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们也不能期待一次这样的会议会结出丰硕的果实。但是，这些文献还是一个相当好的成就，它们给中国的传教和牧灵工作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基础和符合时代的指导。”<sup>i</sup>

上海的全国大会于1924年6月24日闭幕，而韩宁镐主教还要继续为这次会议工作。宗座代表刚主教要求他提供一位司铎——苗德秀（P. Theodor Mittler）<sup>ii</sup>——成为大会所创立的“教育、教科书和统计委员会”（*pro scholis, libris et diariis*）的成员。苗神父成为新创办的月刊《公教教育丛刊》（*Collectanea commissionis synodalis*）的编辑，在他的指导下，这份杂志迅速获得重要的影响。韩宁镐主教自己成为“全国统一教理问答及祈祷经文编写委员会”的主席。

在1924年的大会上，主教们计划出版三种教理问答：一种是为孩子们和老年人写的；一种是给小学生和望教者写的；第三种是给老师们、传教员、中等和高等学校的学生编写的。

中等程度的《教理问答》是最重要的，韩宁镐主教马上开始与小型的《问答》一起编写它。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辛苦的工作，因为人们提出了无数的要求和建议。主教与一些司铎一起编写一篇稿子，在兖州的印刷厂印制并寄给所有的中国主教，同时请他们提出改进的建议。后来他们也尽量考虑了他们收到的指教和建议。他们这样写成的《教理问答》也获得

---

i 见1928年12月5日的信。

ii 译者注：苗德秀（1887—1956年），德国人。1903年入会，1913年来山东，指导兖州的小修道院，后来在北京任会议委员会的成员和编辑。1936年在山东戴家庄任新来华传教士的语言、历史和地理老师，兖州大修道的拉丁语老师。1949年到菲律宾，1956年去世。

了宗座代表的许可和赞同。

为了这个项目，主教投入了七年的精力和相当多的资金。因为这个《教理问答》完全是出于他的努力，他本来可以专门在兖州的印刷厂印刷（并保留自己的版权），有的人也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然而，他马上放弃这个权利，允许全国的教会印刷机构印发他的《问答》。不过，主教一直不能编写那部大型的《教理问答》，因为他年事已高。所以，迄今为止没有一部“大的”《教理问答》。<sup>i</sup>

韩宁镐主教在30年的任期中一直为拯救灵魂而任劳任怨、努力工作，直到“追求灵魂的渴望”耗尽他的精力和心血。

如果我们钦佩这种孜孜不倦的努力和牧灵工作中无私的自我牺牲，假如我们想到他不仅仅是一位虔诚的司铎，也是一位认真的、堪为楷模的修道人，我们就能够意识到，作为榜样，他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传教士。

他们说：“通过他的身体力行和榜样力量，他带动我们所有的人！”“他是葡萄园中的理想工人。”“他的牧灵工作不仅仅是某一个地区里的工作，而是涉及整个教会的传教事业。”

他的一些司铎也许希望他能给他们更多指导。不过，他不太重视这方面的要求，他认为，每一个人应该需要很大的空间来发挥他的圣召。

一位老传教士说：“在他的性格中有一个很好的层面，就是他给每一位负责某一个范围的传教士相当大的自由，只要他不违背基本的秩序的话。有的人很想牢牢控制一切，他们觉得每件事都需要他们的干涉，不然就不会有好的发展，但韩宁镐主教不是这样的人。在这方面，他相当能放

---

i 译者注：“迄今为止”指1940年。意思是说，当时没有共同的大型的《教理问答》。实际上有很多比较详细的《教理问答》在一些教区发行。

开手。”

主教认为，过分的指导干涉和管理将会消灭人们的创造精神（den Geist toeten）。<sup>i</sup>这样，人们将不会自主思考、自主行动、自己勇往直前。他的风格是这样的：通过自己的榜样力量管理和鼓励他的同工。

---

i 译者注：见《圣经·得撒洛尼前书》1 Thess 5: 19：“不要消灭神恩！”

## 第五节 慈善精神

在我们家乡的牧灵工作中，基督宗教的慈善工作占有核心的地位。在传教区中，慈善工作似乎是更重要的。

外教人对基督宗教的教义（信仰内容）一开始没有很好的认识、好感或需求。有的人也许会想，这些外教人会意识到他们的精神困境，他们内心不安并迫切地渴望知道真理，很殷切地追求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但是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偶尔也会有这样的人，他们主动地追求真理，但这绝对不是一个经常发生的现象。外教人感兴趣的東西几乎完全是现世的享乐，而为了介绍基督宗教的思想世界，人们也必须从世俗的角度开始切入。

在这方面，只有那种无私的、服务性的、帮助人的爱能在外教人的心灵中铺平一条去往天国的路。基督宗教的使者（传教士）也早就明白这一点，他们从他们的神圣老师（基督）那儿学到了这一点。

虽然救世主的言辞具有说服力，但同时他也以很多善行配合这天国的道理，他多次帮助那些“劳苦的和负重担的人”。<sup>i</sup>这样，人们对他的判断是：“他是好人！”<sup>ii</sup>他不采取任何别的措施，因为他的门徒和传教士都以这爱的方式来传播天国的福音，将爱的国度扩散到地极。这样，基督教的

---

i 译者注：见《圣经·玛窦福音》Mt 11: 28。

ii 译者注：见《圣经·若望福音》Jn 7: 12。



慈善工作在传播基督教信仰方面是先驱和宣布者。

每一个名副其实的传教士都知道这一点，并采取了这方面的行动。韩宁镐主教也同样深信慈善机构对传教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深切关怀中华民族，感受到它的众多需要，很想予以帮助。在他的《年度报告》中，他写道：“我对群众充满同情！<sup>i</sup>多少次我也想这样说，想重复说耶稣这位人类的神圣朋友（goettlicher Menschenfreund）<sup>ii</sup>说过的话，因为我经常看到一大帮群众——我看到那些在物质和精神上贫困的中国人，他们是一个很大的群体。然而，我们这个东亚的外教社会被古代文化的光芒照亮，所以，即便处于贫困之中，也没有那些野蛮民族的可怕表现——那些没有文化的民族生活在野蛮的偶像崇拜中。

“然而，一个外国人在华生活的时间越长，对具体情况的理解越广，对这个民族的同情越深，他也就会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外教文化阴暗的一面，也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这里穷人的困境——这些穷人没有十字架的降福和保护。这样，人们也就会有同情心，还有帮助他们的渴望。上主恩赐给了这个民族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财富，它在世界上应该享有重要的地位，因而在物质和精神上帮助这个民族就成为人们内心的愿望。”<sup>iii</sup>

安治泰主教早期虽然没有获得很多资助，但他还是创办了一些慈善机构——两所孤儿院和两所老人院。韩宁镐主教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行。他认为，最迫切的需要是创办一所医院。第一年任主教时，他就向斯泰尔修会的创始人写信：“对教会来说，建立医院很重要。新教的传教士在青岛、沂州府（临沂）、济宁都已创办了医院，而且他们正在计划创建曹县的医

---

i 译者注：见《圣经·玛窦福音》Mt 9: 36：“耶稣一见到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

ii 译者注：见《圣经·若望福音》Jn 15: 14：“我叫你们朋友。”

ii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11年，第56页。

院。他们希望，这个慈善工作会给他们带来好的名声。有人曾经问我们：‘你们做了什么呢？’外教人更多因慈善工作而受到感动，这就超过听道理的影响。办孤儿院也是一件好事，但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业，所以孤儿院没有很大的威望；而且，中国人也许还有一些顾虑和怀疑。然而，医疗事业是一个具体的、能亲自体验到的事。当然，由于中国人固有的怀疑，这种慈善工作也有一些风险。但是，救世主开始通过治病传播福音，而那些传教圣人也曾多次去医院传教。愿上主恩赐，让我们在这方面也能有所进展！”<sup>ii</sup>

一年后他就在青岛创立了一家小型的教会医院。当地的德国政府提供了一位医生，即马克·利恩大夫（Dr. Mac Lean）。一些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会的修女负责护理工作——从1900年开始，这些修女在青岛指导一所德语女子学校和一所汉语女子学校。这家新医院在半年内接收了1144名病人，医生和修女们很快赢得了病人的信任。主教高兴地写道：“我们的目标是一个理想的目标。我们帮助那些在痛苦中的中国人，而我们本来就是为他们的得救而生活的。我们获得了外教人的同情，因为修女们的服务、奉献和医生的体贴治疗给病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在具体践行基督信仰的精神。”<sup>iii</sup>

1907年韩主教在兖州建立了一家小型诊所，他也为此更感到高兴。在青岛的德国官员这次为诊所派遣了德国的德尔大夫（Dr. Doerr），而他也

---

i 译者注：韩宁镐提到“中国人的怀疑”，指华人对慈善工作的怀疑。这些怀疑也引起了许多关于基督教在华创办的机构的谣言。有的华人想，孤儿院中的孩子受折磨或基督教医院中的病人被害死。其中一个因素是不理解西医，但也有无法理解“慈善工作”或“博爱精神”的因素。

ii 见1905年10月9日的信。

ii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06年，第117页。

很努力地工作。为他服务的工作人员是一位斯泰尔护理修士、三个斯泰尔护士修女以及一些中国护士。因为一支德国部队要从中国回到德国去，所以他们能从部队那里低价购买一些医疗器械和药品。

在开幕典礼那天，兖州所有的高级官员穿着他们的传统服装来到诊所。道台早些时候发了一个通告，向人们介绍诊所的好处。这家诊所第一年治疗了8138个病人。

后来他们又在坡里庄和阴岛<sup>i</sup>创立了一些比较小的医疗机构。在此之外，他们还创办了很多药店和小诊所。1914年他们接待了42115个病人，而这个数字很快超过了10万。有的病人从很远的地方由担架抬到教会医院，需要在路上花20个或30个小时！这种医疗服务确实给当地人带来了许多方便。

韩宁镐主教因此也感到很开心。他写道：“虽然没有很多人因为医疗而皈依教会，但我们肯定能播下很多好种子，也许也能感动某些外教人，而且一些垂死的孩子也能接受圣洗。”<sup>ii</sup>

主教始终想扩大这些慈善事业，想建立新的慈善机构。这里应该提到他创办的一所残疾儿童院和一所麻风病院。<sup>iii</sup>建立一所麻风病院是他多年的梦想。他向总会长写过这样的报告：“受具体需要和基督博爱的催促，我们愿意肩负新的担子。我们愿创立一所麻风病院，位于兖州府南边（兖州东关），离兖州1.5公里。这是一项美好的事业。几年里我一直有这个计划，也多次向恩人们请求一些资助。虽然我们获得的资助不够，但我们也开始建立这所麻风病院了，因为那些可怜的麻风病人来到我们的门口。这

---

i 译者注：在青岛附近，亦名“黄岛”。

i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10年，第86页。

iii 译者注：1928年建立于兖州市东南的冠庄堡。1928年到1951年圣神会修女们在那里工作。

个星期他们会搬到他们的新家园，护理他们的修女们也与他们一起搬家。我们接收了24个病人，但申请的人更多。我将于1928年10月26日祝圣这所麻风病院。

“我想，这种慈善服务将会带来特殊的恩典，因为我们付出的代价特别大。这样的机构里也应该有很多祈祷。患病的人必须耐心地接受他们的痛苦，其中的降福也会是特别大的。”<sup>i</sup>

几年过后，他在麻风病院那里祝圣了一所小教堂。“这所教堂的两座尖塔上的十字架宣布基督教对病人的关怀和博爱。建立这所教堂的钱——6500德国马克——来自一位德国女士，她是来自德国萨尔州（Saarland）的恩人。”<sup>ii</sup>

主教始终特别关注这家麻风病院，他多次去拜访那里的病人。一位传教士报告：“他进入那些臭气扑鼻的病房，去看望那些卧床的病人并安慰他们。病人以热心的祈祷感谢他们的恩人。

“有一次，韩宁镛主教带青岛的主教维昌禄去探望这家麻风病院。当他们回去时，韩宁镛主教很严肃地说：‘您的斯泰尔永祷会修女们为您的教区所作的贡献是她们的祈祷，而在我这里这些病人为我们祈祷！’<sup>iii</sup>十年后，在麻风病院的墓地上已经有100座坟墓，病人的亲戚偶尔也会接收病人的遗体，在家乡安葬他们。所有的这些病人通过韩宁镛主教和护士修女们

---

i 见1928年10月24日的信。

i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36年，第143页。

iii 译者注：维昌禄主教在青岛教区建立了“斯泰尔永祷会”修女院，即“圣神永祷会修女院”。韩宁镛主教非常强调这个苦修会的重要性并劝维昌禄主教找一个适合的地方。1932年10月18日，七位永祷会修女来到青岛，进入她们的新修女院，它位于青岛附近的湛山。在那里，她们一边祈祷，一边凿铸蜡烛。1949年1月，青岛湛山的圣神永祷修女离开中国。韩宁镛主教说，麻风病院中的祈祷等于隐修院修女的祈祷。

获得痛苦中的帮助和一个幸福的死亡。我想这个麻风病院和众多其他的慈善事业带给主教很大的安慰。”

不过，主教的慈善工作并不限于这几个慈善机构。他认为，整个教会应该是一项慈善事业，因此，他劝告传教士们要经常施舍穷人。他也这样劝勉修女院的院长修女。在拜访修女院时他偶尔会突然问院长修女：

“修女，您给足够多的施舍吗？”如果修女的回答使他感到不满意，他就以严肃的语气说：“你要知道，这也是你的身份和任务的一部分！”当他看到一个正在施舍的修女或传教士时，他突然会问：“你给这个乞丐多少钱？”如果那个人给得不多，他直接批评他。

有一次，一个比较大的修院团体的院长神父说：“我去年在施舍方面花了150马克。”主教回答：“这么少？这不能算有什么功劳！”过了一段时间，韩宁镐主教派遣那位神父在坚振旅行中代替主教施行坚振礼。那位神父说：“哎呀，这样做，那个地区的穷人就得不到主教的施舍了！”他没有想到，主教马上拿出150马克施舍钱给他。

在牧灵工作和慈善工作方面，主教是传教士们的杰出榜样，也表现出他仁慈和善良的性格。在修女团体中流传着很多关于韩宁镐的仁慈和慷慨的感人故事。

“在主教的心中，年迈、病弱、孤儿、病人、麻风病人、穷人和乞丐占有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如果他面对穷困的人，他的东西和财物都会‘不安全’。他最好的东西也会送给人家！我们修女们为他保管、清洗衣服，而我们有时候必须用一个诡计：我们请主教的老仆人把主教最好的衣服藏起来，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它们早晚会落到乞丐的手里。不过，虽然用这

个诡计，有的衣服仍然失踪无影。

“我们也为传教士做中国式鞋子（布鞋）。有一次，我们制作了一双很精美的黑色丝绒拖鞋，将它当作一个礼物送给主教。我们充满期望，很想看到主教穿这双拖鞋。然而，过了一天，我们看到，老人院中的老郝努——他已年老，有点儿痴呆——穿着这双拖鞋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我们在主教面前不得不发牢骚说，我们感到很失望。他回答说：‘啊呀，这个老郝努也很高兴有机会穿上一双好鞋子！’

“主教好像认为我们有一大堆棉絮衬填的大衣，因为他不断地向我们要这些大衣，都是为了送给穷人。有一次，他又为一个穷困孩子要求我们给他一件冬天的衣服。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从我们一个孤儿那儿拿走了他的唯一一件衣服，将它送给了主教。我们叫我们的孤儿躺在床上，然后在一天内给他做了一件新衣服。恰恰在那天，主教对我们说，他很高兴，因为我们总是会有一件可以交出去的衣服。我们当时就向他说明了真实的情况，说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应付他的要求。他说：‘你们做得好！你们就应该这样做！’

“当他出去施行坚振时，经常会送一些孤儿到我们这里，还写信诚恳地要求我们：‘修女们，请你们为了神圣耶稣婴孩的缘故接受这个婴孩。请你们不要因为我送给你们那么多穷困的婴孩而生我的气。’在他回来之后，他经常问我们这些新孩子的情况。

“他对穷人和孤儿很大方，对病人也怀有特殊的关怀。他多少次来看我们的病人！他去看一个个卧床的病人，安慰病人，并问他们需要什么。如果他能送给病人一些小东西，他会很高兴，而且他会想出很多让他们愉快的方式和手段——这表现了他带着挚诚爱心的创造力。

“传教区多次严重缺乏资金，我们修女们会看到，传教士们的脸越来越

越瘦——粮食非常紧张。在这些困难时期，主教也很难过，因为他不能再帮助穷人、不能再施舍了。

“我们的修女们也多次体验到他的深厚仁慈和父亲般的关怀，特别是在我们一个修女生病的时候。”

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听听另一位传教士的记录——他几年来一直陪着主教，也很了解主教的慈善工作。“人们称他为‘穷人和苦难人之父’，<sup>i</sup>而这个称号是恰当的。他始终让穷人接近他，甚至让他们进入他的卧室。他的一些仆人就不喜欢这一点。当一些穷人来到这儿，他都会抽出时间接待他们，都会说些安慰他们的话，也送给他们一些东西。当他出去时，他也始终与穷人交谈，无论是教友或外教人，都向他们表示他的同情。有一次他在街上扶起一个患病的乞丐，带他到那个本来就已爆满的传教点，并且不懈地照顾这个乞丐。我们的护理修士告诉我，他亲眼看到，主教有一次在晚上处理了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的大便。

“主教将自己的衣服和鞋子送给穷人，所以他自己只有最必需的日常用品。我有一次看到，主教给老人院的一位老人一双丝绒拖鞋，而我当时忍不住说：‘主教，您送给这个老郝这些漂亮的鞋子，真是有一点儿过分！’主教笑着说：‘什么漂亮的鞋子？老郝还认为不够；他还想拿一件衬衫。您送给他您的衬衫吧！’当面对一个穷人时，主教就不能控制他的钱包了。

“在传教区被重新规划时，他也表现出他的慷慨态度。为了帮助那些新教区的主教，他很乐意地交出很多东西。他送出他的主教祭披、他的胸十字、他的戒指。而当每一个传教区的财物被规划分配时，他会无私地帮

---

i 译者注：见《圣经·约伯传》Job 29: 16：“我成了穷人之父。”

助那些‘新手’。最后，他自己只戴一枚普通的戒指。他只有一枚主教戒指，而且仅仅在教会节日、坚振或特殊的日子才会戴它。”<sup>i</sup>

山东地区多次发生水灾、歉收、饥荒和伤寒病等灾害，而韩宁镛主教每次都因乡下民众的急需而动情。他同情灾民，因他们受苦而发愁，并昼夜想方设法帮助灾民。1911年和1912年的情况最可怕，因饥饿或饥饿引起的伤寒症而死亡的人数达到几万。韩宁镛主教向欧洲和美国发出震撼人心的呼吁，请求他们捐款救灾。那时他也的确收到了很多钱，所以他帮助了很多人。他在第一年写道：“到现在我花了4.5万马克，这是很大一笔数目，而这些都是德国公教徒因关爱所捐献的钱。”<sup>ii</sup>

公教的许多慈善工作对其他人也有很大影响。比如，青岛的德国居民也捐献了3000块墨西哥银钱。最后，中国政府也有反应，并提供了更多钱。传教士们用这些钱买粮食，向灾民分发。这个灾害延续到第二年。只有天知道，韩宁镛主教通过他的报告和书信获得了多少钱款，救助了多少灾民。

这样的灾难还发生过几次，而韩宁镛主教一次又一次发动慷慨的救灾活动。有一次他写道：“我想在各方面帮助这些穷人，但力不从心。特别是我们的新信徒，他们有权利获得我的这种父亲般的爱。因此，我马上向美国和德国发出一个求救呼吁，我认为，这是我的神圣义务。”<sup>iii</sup>

在众多慈善工作当中，主教的助手是传教司铎、辅理修士——在这些修士中有一些能干的护理修士和大夫——以及传教修女们。修女们也许

---

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32年，第115页。

i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第193页。

ii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第115页。



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她们，就不会有这些慈善工作和服务。因此，韩宁镐始终希望在他的传教区中能有很多能干的修女。有的传教士甚至认为，他支持女修会的力度有些过头了。但是，如果想到主教对穷人的深厚同情，我们就会理解他的想法。

韩宁镐神父1904年当主教，当时已经有“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sup>i</sup>在青岛活动，斯泰尔传教修女会（“圣神会”）<sup>ii</sup>已经发展得很好，所以这些德国修女也可以去远东的传教阵线。

因此，他马上向斯泰尔创始人扬森神父说：“我请您让修女们赶快来吧！我们在坡里庄有很多地方，而且在兖州也很容易找一个地方或建一座房子。这个项目必须有自然的发展，我们不能作长期的计划。修女必须先学习汉语，必须适应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这大约需要一到两年。在这个时间后才可以委托给她们一些工作，让她们自己承担。

“这里也并不是阿非利加（Afrika，非州）——在阿非利加必须先创造一种文化。但是在中国这里，在我们来以前就有古老的文化。我们适应这个传统文化后，必须从里面给它注入一种基督化的元素。

“修女们的任务将是：教育女婴儿、指导贞女的学校、管理教堂用的衣服（祭披）、教妇女们一些手工技巧。她们也许很快就能指导一个本地修女会的初学者，最后她们也可以在医院中当护士——德国的医生们提出过这个建议。

---

i 译者注：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Franciscan Missionaries of Mary, FMM），亦称“白衣会”，1877年成立，1886年来华，在山东烟台建立第一所会院，1902年到青岛，后在中国各地（山西、湖北、东北等）服务，办女子学校和慈善机构，1886—1949年间来华的外国修女共有789人。

ii 译者注：扬森神父于1889年创立了“圣神婢女会”（Dienerinnen des Heiligen Geistes），即“圣神会”，一个传教修女会。圣神会的母修院也在荷兰斯泰尔。

“当修女们来的时候，她们需要一些中国贞女当她们的助手，所以我派遣五个比较大的女孩子到芝罘（烟台）的修女院，而另外派遣五个女孩子到河北河间府<sup>i</sup>的学校。修女们来得越早越好，因为她们将需要一定的时间学习，在适当的时期后，她们才会有办事的能力。”<sup>ii</sup>

第一批圣神会修女同年（1905年）夏天到达上海，她们一来就遇上夏天的酷热天气，所以一开始就体验到传教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和牺牲。她们在上海待了四个星期，获得第一阶段的训练，<sup>iii</sup>然后坐火车到济南。<sup>iv</sup>当主教亲自来接她们时，她们感到受宠若惊。后来她们坐两只小船——一只是修女们的，一只是主教的船——沿着黄河到达坡里。主教一再地劝修女们：“修女们，你们应该祈求圣母，让她保护我们！”一个修女勇敢地说：“我们不怕！”此时主教回答：“孩子们，你们还没有经验，只有祈祷才能救我们，不然我们都会丧命，而你们的所有大箱子也会丢失！”主教和修女们也不敢出去，虽然天气酷热，但他们必须坐在舱房内。后来，主教才告诉她们说，他们通过的地区充满强盗，而她们应该感谢上主给予她们特别的保护。

在修女们开始工作后，<sup>v</sup>几乎每年都有来自斯泰尔的圣神会修女。她们的工作范围后来包括基督宗教慈善工作的许多方面，涵盖整个山东南界地区。她们的服务带来很多降福和祝福，而主教也尽量支持她们的传教事业。

---

i 译者注：河间府（属献县教区）曾创办医院和学校，有外国修女会和本地的献堂会贞女。

ii 见1905年3月5日的信。

iii 译者注：修女们本来想直接坐船通过上海—北京的运河而到达济南，但因夏天天气太热，她们不能坐船，所以先在上海徐家汇的炼灵中保会（Auxiliatrices）修女院住了四个星期。

iv 译者注：修女们先从上海坐船到青岛，后来从青岛坐火车到济南。

v 译者注：圣神会修女们先在坡里庄和兖州工作，后来在济宁、临沂、曹县、薛城、信阳、新乡、天水、武威、兰州、西宁等地工作。

如上所述，主教早就有创立本地修女会的计划，而他于1910年实现了他的计划。他创立了“圣家会”（Oblatinnen der Heiligen Familie），并将这个修女会的指导和培养工作交给圣神会。后来，也有一些本地的妇女加入圣神会。<sup>i</sup>

韩宁镐主教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在华的守贞生活》（*Jungfraulichkeit in China*）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基督教在华的有利条件和障碍。他写道：“正如在其他的外教地区一样，在中国，贞洁理想少有，也很少受到尊敬。中国女孩子很早——多数是在婴儿时代——与一个大约同岁的男童订婚。婚姻很早，一般在14到16岁之间。因此，人们想，婚姻是女孩子天经地义的使命和任务……”

“中国社会中的贞洁或不婚仅仅在某种很特殊的环境中获得肯定，这是因为中国人的家庭感情很深。在中国内地很容易在许多公共场所见到宏伟的牌楼。这些牌楼很高，超过一般的平房，它们是中国建筑艺术的结晶，有的是用巨大的石头做的，有的有精致的雕刻。这些牌楼是伟大的纪念碑。你可能会问：它是给哪一个英雄建立的牌楼呢？牌楼上面的横石板会回答你的问题：‘这个牌楼是皇帝敕造的，它表彰某某孝顺的或德性贤淑的寡妇。’”

“一个富有、年轻的妻子在丈夫去世后守寡，一个新娘在新郎死后照顾她的老公婆——她们就是贞洁的女性，而家族的成员们为向她们表示感谢而建立了这些几百年都不会腐朽的牌楼。”

“基督精神的贞洁与这些完全不同。基督精神的贞洁对外教旧文化来

---

i 译者注：“圣家会”全名为“圣家献女传教会”（Oblates of the Holy Family, OHF），是中国本地的修女会，会员都是中国人，1948年共有321名修女在山东、河南、甘肃服务。

说是全新的。但是这个新理念恰恰在中国的老教友和新教友那里受到热烈欢迎。当那些年轻的女孩子——她们来自外教文化——听到基督教贞洁的生活方式时，当她们开始尊敬那些模范的女传教员时，她们很想守贞，而且父母们几乎不能说服她们去结婚。当然，传教士们努力地以正当的宗教戒律来培育女孩子们热情奉献的精神。在那些早已规范好的教区中，主教们建立了特殊的修女会，而这些修会中的本地修女被认为与欧洲的修女一样能干——这是一个良好的现象。

“大多数妇女因家庭的需要不能进入一个修女会，但主教们也早为她们建立了一种规范。她们18岁时开始初学——初学者的记号是蓝色的头纱。如果她们表现好，20岁便可获得黑色头纱，这是她们守贞的标记。到25岁时，她们就能宣发简单的暂愿。她们的工作是祈祷、家庭中的杂务以及为教会服务。她们中有很多被雇为传教员和祈祷老师。她们会对传教事业作出杰出的贡献。一个好的守贞的姑娘经常是信徒团体的灵魂人物或领导者。这种守贞生活是中国传教事业的福源，而已经显示出来的益处是不可估量的。”<sup>i</sup>

很多妇女加入了“圣家会”，而这个修会也经历了非常好的发展过程。圣家会是一个教区修会，修女们发的圣愿是简单的愿。主教是修女们的指导者，她们就像传教区的本堂传教员姑娘那样工作。她们“在小堂口、在医疗方面、在学校和新信徒的教育方面努力工作并获得杰出的成就”。<sup>ii</sup>

在比较大的城市中也有规模较大的慈善机构，而在那些机构中，会有

---

i 见Katholische Familienblaetter, *Beilage zur Frankenstein-Münsterberger Zeitung* 1898, Nr. 47, 48。

ii 见韩宁镛在1928年的《斯泰尔传教通讯》中第68页的信。

欧洲的修女们。她们在中国贞女中培养出一些助手，并叫这些助手为“加入团体者”（Aggregatinnen）。韩宁镐主教于1927年集中了这些本地贞女创立了第二个本地修女会，即“在俗贞女传教会”（Helferinnen bei der Verbreitung des heiligen Glaubens），或“协助会”。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圣神会修女的工作，努力使自己将来能够独立地指导比较大的慈善机构。

1935年，当韩宁镐主教退休时，他的监牧区兖州已经不包括新立的四个教区——青岛、菏泽、临沂、阳谷教区，且仅仅包括300万人（原来是1600万人），但那时的兖州教区拥有173名传教修女，即72名圣神会修女、88名圣家会修女和13名协助会修女。

韩宁镐主教的接班人舒德禄主教（Theodor Schu）<sup>i</sup>曾写道：“韩宁镐主教创立的许多慈善机构表明他做了很多的慈善活动。他创办了一所麻风病院、几所老人院、一家残疾儿童院、几家孤儿院、几所医院和诊所。从比例来看，在华的任何一个教区都无法比得上兖州教区的慈善机构。”

这些慈善机构一方面减轻了无数人的物质困难，也默默地拯救了许多灵魂；另一方面，它们也创造了基督宗教的良好名声。

早在革命年代，在1912年，韩宁镐主教便观察到：“在这几次动荡当中，各个党派——甚至包括强盗们——都没有干扰教会。张勋将帅<sup>ii</sup>甚至派了一个高级军士来告诉我们，他们可以给我们在这里的传教点提供一些卫兵。我说不用，因为我们真的不需要这些卫兵。不过，这是上主的保护，

---

i 译者注：舒德禄（1892—1965年），1892年生于德国，1906年入圣言会，1916年领受铎品，1920年（？）来华，1925年为圣言会初学的初学导师，1933年为圣言会区长，1937年为兖州教区的主教，1952年到菲律宾，1955年到德国，1965年死在德国。

ii 译者注：张勋（1854—1923年），清廷江南提督，后被袁世凯提拔。1913年率领军队入徐州。

是引人注目的。”

在后来几十年的政治混乱时期中，韩宁镐主教曾多次发报告称教会能够继续它的和平事业。他也一直怀有希望，甚至在内战最激烈的时期，当南方和北方的军队于1926年进入山东地区时，韩宁镐主教还是充满希望的，虽然1926年的内战几乎破坏了一切法律和秩序的约束力。他这样描述这些无秩序和恐怖的时期：“教会被视为和平的避难所，而实际上，教会也的确扮演着这个角色。我们不受甲方或乙方的干扰，虽然我们没有别的保护，只有带着十字架的旗子——我们将这个旗子挂在教堂屋顶上。我们在战争一开始就宣布：‘避难的人，我们接收；但我们不能保护你。’

“的确，很多心里害怕的人来了。在我们这里的女孤儿院中，修女们清理一切可以用的教室和工作室，并且在那里准备了170张床。床铺中间挤满了小孩子们和妇女。城市中最华贵的妇女——官员、将军和商人的妻子——在这里住在了穷人中间。在男人那里也是这样。几百个人寻找避难所。

“这些人也同时带来了他们的贵重财物，有无数的箱子和包，而我们因此很担心——如果军队想抢劫财物，他们就会来我们这里，在我们这里他们会轻易地获得全城的全部贵重物品。人们也带来了许多车、牛、驴和马，都放在我们的院子里。这儿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家畜市场。

“的确，在教会内有安全。无论那些通过兖州的军队打着什么旗子——那时候有几十万士兵经过兖州——他们都没有干扰我们。其自然的理由是，双方都不想与外国人有冲突。更高级的将领严格命令不可以侵犯教会。一位将帅发行的这类公告几个月里挂在我们门上。

“另外，对传教慈善事业和宗教的普遍尊敬也影响了人们的态度。首先，我们的医院对伤员和病人的协助给人们留下良好的印象。在战争最激

烈的时期，每天有几千个受伤者来到城里。我们也没有足够好的设备，房间和医生们也都不够。看到这些可怜的人真令人感到悲痛。他们都来到我们的医院，门前有许多民众。那位护理修士<sup>i</sup>与他的助手们每天都必须照顾400个受伤者。

“那些粗暴的士兵也会因这种博爱精神而受感动。一次我必须进入战争地区，在半天时间里我进行了这方面的观察。我们的车被挡住30次，而那些士兵每次都问：‘你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但是，他们每次都以客气的话让我们通过。

“那些在我们这儿避难的难民对我们有感恩之心。教会也的确拯救了一些人的性命。一位相当高大的将军曾经在告别时进入教堂，通过九次跪下和鞠躬感谢了上主。”<sup>ii</sup>

我们还要叙述那个时代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在难民中有一位妇女，她请院长修女与她谈话。她说：“我是某某太太。我对公教的传教事业一直有敌对态度。当安治泰主教想进入兖州时，我就传播了很坏的谣言，我曾煽动民情，都是为了驱逐这个可恶的宗教。因为我们家很富有且具有影响力，我曾让很多人接受我对你们的敌对态度。我也教我的儿子恨你们这门宗教。但是现在，多少年后，我必须来这里，寻求那些我们以前如此憎恨的人的庇护。主教也知道这些，但他给我们如此好的待遇！我的儿子在男人们那里有最好的房间，而我在这里也一样！公教的人照顾我们这些敌人，就像父母照顾孩子一样。我原来都没有想到，公教做了那么多好事，

---

i 译者注：这位修士大概是卢德福修士。

i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27年，第66页。

在这里我看到了，也体验到了。”

当院长修女向主教说起这件事时，主教微笑着说：“上主知道他如何指导我们。我们应该从内心爱那些恨我们的人。十字架上的主也是这样做的。”



## 第六节 创办学校

有人曾经批评韩宁镐主教说，他对学校，特别是对高等学校的注重和支持是不够的。德国的施米德林教授（Joseph Schmidlin）<sup>i</sup>曾这样批评过整个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也向所有主教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在《目前的远东传教事业》一文中写道：“与印度或日本的传教事业比较，在华的教育远远落后，而且很少有人投入其中。总而言之，在华的传教事业对学校和学生所作的努力的确不够。这种落后现象的深层原因一方面在于外在的贫困，即缺乏资金和老师；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许多传教士对于这个重要问题的理解不够深入。”<sup>ii</sup>

在中国的传教士都承认，当地公教的学校机构是不够的，这方面的发展非常落后。韩宁镐主教也曾多次痛心指出这种缺陷，说在华教会缺少资金和老师也是真的，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比如说，在上海的

---

i 译者注：施米德林，1876年生于德国，1944年死在Schirmeck的纳粹集中营。1899年领受铎品，自1910年开始教传教学，是公教传教学（*Missionswissenschaft*）的创始人，1911年创办《传教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1925年写成《公教传教史》一书。

ii Jos. Schmidlin, *Das gegenwaertige Heidenapostolat im Fernen Osten*, Muenster 1929, p.134, p.137。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创办了唯一的公教大学——上海的震旦大学。<sup>i</sup>他们一定有足够的资金和老师，再加上也享受法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虽然如此，在头25年中，学生的总数不超过500人——虽然当时的上海人口早就超过100万，而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度！如果说，传教士们的“理解不够深”是这种失败的深层原因，这是不合理的。因为，在中国、印度和日本的传教机构（修会）都是一样的，而传教士们为什么在一个国度中很重视教育，而在另一个国度中就“不理解”教育的问题呢？

更确切地说，深层的原因是政府给教会学校提供的条件不理想。这些条件在印度和日本相当好，但在中国却面临不同的局面。

教会在华创办的高等学校几乎不能获得政府对其毕业文凭的承认。因此，教会学校在吸引学生方面面临很大的困难。在有的地方，政府还想办法来破坏和消灭教会已经办起的高中。比如，圣言会的传教士们在兖州、<sup>ii</sup>济宁<sup>iii</sup>和胶州<sup>iv</sup>建立了三所高中，当时的官员们也协助他们。但是几年后，同样的官员们在这三个地方开办国立学校，这些国立学校不收学费和教材费，甚至连食宿都是免费的，所以它们构成一种不能克服的竞争优势。教会的学校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它们必然会因为没有学生而被淘汰。

---

i 译者注：震旦大学，1903年开学，耶稣会（与马相伯一起）创办的大学。校址开始时设在徐家汇土山湾北，1908年迁卢家湾吕班路。开办时有学生24人，为蔡元培所介绍，一年后则达到200多名学生。1905年，李问渔任校长，而马相伯因冲突而在吴淞另创新校，名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的前身。1912年，获毕业文凭者12人；1932年，震旦大学院改称为震旦大学；20世纪头十年设立医科，至1937年，医科毕业生共有200多人，法科毕业生至1937年有100多人。震旦大学于1952年被兼并。

ii 译者注：1902年，兖州的彭道台与安治泰主教一起开办了一所“中德中学”。

iii 译者注：1902年，圣言会在济宁创办了一所“中西中学”（Franz-Xaver College），见下。

iv 译者注：1902年，圣言会在胶州创办了一所“德华中学”，司鼎铭神父（Jos. Schrouff, 1866—1921年）任校长。1903年有30名学生。

政府允许教会办学校，但政府也会派遣一位中国籍校长，而这个校长的指导也曾多次阻碍教育建立起统一标准。

另外，在公开的教育机构中，天主教学生也被强迫参与对孔子的祭拜活动。但公教认为，这是一种外教旧文化行为，是违背信仰的表现，所以教廷禁止信徒参与这样的活动。罗马会廷于1939年才取消了这个禁令。<sup>i</sup>

在此之外，我们也应该指出，在那些教育落后的地区，办学校对传教事业提供了很大的好处，但对在华传教事业并没有提供很大的帮助。而且，清朝时期的中国人不太重视教育，90%的人都是文盲。韩宁镐主教就这一点写道：“学校在中国的传教工作中从来没有起过什么重大的作用。比如说，教会学校在阿非利加很重要，在那里的原则是‘先赢得小孩子，通过他们吸引父母’。但是在中国呢，家庭的纽带很强，父母的权威也很强，而传教士们应该反过来说：‘先吸引父母，再赢得孩子！’如果能赢得父母，也能吸引孩子。因此，传教士们要首先面向成年人。

“在中国的教会创办学校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一些传教人员（司铎和平信徒传教员），另外也是为了给予信徒的孩子一种良好的宗教教育，或尽量提供中国式的教育<sup>ii</sup>。

“因此，我们在山东南界也创办了一些教育机构：一所司铎修道院，一所传教员学校，几所念经学校（Gebetsschulen）以及一些小型的中国式的学校。这当然不太多，但在中国其他教区中也没有更多的教育机构，除了一些比较大的和古老的教区。

---

i 译者注：袁世凯于1915年想恢复儒教为国教，但从1916年后，儒教的宗教性日益衰退，所以罗马教廷于1939年可以安心地允许对孔子的“敬礼”。

ii 译者注：“中国式的教育”即当时传统的教育，比如学习四书五经等。

“那些小小的学校始终都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农民一般都很穷，他们不太重视教育，因为他们认为，这不是挣钱的事。如果想在那里教孩子们一些新的知识、外语或外国的学科，那是不可思议的。中国人比较保守，他们认为这些纯属胡说八道。当然，在这样的条件下，教会也不想浪费很多金钱、时间和精力来创办这些没有成功希望的事业。同时我们还有那么多别的重要工作。”<sup>i</sup>

施米德林教授于1914年亲自去东亚，他尽力支持在华教会的教育工作。他在香港、汉口、济南和上海与各地的传教主教们谈话、筹划，也作出了一些决定，但他也没有成功。

如果说，当时的条件不够成熟，这样的观点肯定是比较接近真实情况的。政府提供的条件非常不利，所以公教不能建立很多高级教育机构。换言之，时机还没有成熟。这也可以作为一个主要的理由去说明，为什么韩宁镛主教的许多努力在这方面几乎都落空了。

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也应该指出，公教方面也曾有一些疏忽（Unterlassungen）。<sup>ii</sup>虽然条件不利，但如果它更努力地工作的话，教会也许还能有一定的成就。我们这里要特别指出两方面的不足。

第一，人们认为，一位公教司铎也能够很自然地成为老师和教育者，因为他学过很多哲学和神学课程——虽然这些司铎们没有学过教育学或教书的技巧。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教会也没有引进一些教育方面的专家。

---

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541页。

ii 译者注：德语的Unterlassung和英语（拉丁语）的omission都无法译成汉语。“忽视”指那些没有做的工作。根据基督教信仰，这些没有做的工作也会构成“罪行”（sins of omission），参见《玛窦福音》Mt 25：45。

第二，创办学校的任务多次被托给当地的个别传教士，而这就意味着，当地学校受很多偶然因素的影响，缺少一个核心的指导和对整个教育事业的管理。这两个因素导致了教育事业进展不稳定和无计划。很多教区的教育事业遭受这些因素的不良影响，包括韩宁镐主教的山东南界在内。不过，他始终对开办教会学校有兴趣，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他第一封写给传教士们的牧函中（1905年2月），他就已强调：“我们需要创办一些学校，因为我们应该掌握对青年人的教育，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安主教以他的远见就意识到这一点了。”

在同年的《年度报告》中，他又写道：“去年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无疑是科举制度的取消。几百年里控制中国教育精神的枷锁因此被突破。政府施行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和学校制度，这意味着一种新的精神发展是可能的。到处能看到革新的努力。不过，一位具有智慧的官员最近对我说：‘只有一个深入内心的改革能带给人民幸福，只有这样的革新才有价值。’

“因此，我们面临一项巨大的任务。几百个传教士和几十万个基督徒算什么！我们要面对4亿中国人！就像一个女人拿一把酵母放在三斗面里。<sup>i</sup>实际上，我们相对于中国人口的比例远比这个比喻更低。

“然而，我们不可以垂头丧气。我们坚信，上主的严肃旨意是拯救人们，让他们认识真理；我们和圣教会的神圣任务是寻找所有迷途人并引导他们走入基督的羊群。”<sup>ii</sup>

---

i 译者注：参见《圣经·玛窦福音》Mt 13: 33。

ii 见1913年1月17日的信。

韩宁镐主教清楚地意识到，他需要一些真正的教育家来创办教会的学校。安治泰主教早于1900年就因为这个缘故去了德国巴伐利亚州梅登（Metten）的本笃会（他自己在那里读过书），后来又去欧林山（Oelenberg）的特拉普苦修会（Trappists），而最后又去了直隶的特拉普会修院。然而，只有主母会（圣母昆仲会，Marist Brothers）<sup>i</sup>于1903年送给他三位修士。他们在兖州的高中任教。人们也很快发现，这三个专家的影响很好。

韩宁镐主教继续努力。但是他没有成功，反而于1907年失去了那三位圣母昆仲会的修士。他们被派遣去日本，因为他们的修会在那里创办了很大的学校，所以日本迫切地需要他们。他们向主教说，他们将来会送去更多人——如果他们在德国也能建立一座修院的话。

在他第一次回欧洲时（1907/1908年），韩宁镐主教也在柏林政府那里提出主母会在德国创立修院的事，同时也请科普枢机主教推荐这个项目。主教已经认为主母会在德国的修院不会有问题，但文化部的部长发现：近几年以来，公教的传教修会在德国创立了那么多传教修院，所以新教落后了。因此，主母会的申请与类似的申请被推迟。

韩宁镐主教毫不懈怠地继续寻找新的人员加入他的教育事业。他去了瑞士的一所很大的本笃会修院，又去了德国的一所本笃会修院，后来去了一所特拉普修院，去找那些拉萨尔的学校修士（Schulbrueder von La Salle）和圣母昆仲会的修士。他们都给他一些希望，有的人甚至给他很具体的希望，但他们都说要等几年，而最终都不愿意合作。他一次又一次地都失败了！当然，韩宁镐主教更迫切地在自己的修会那里寻找协助。他每

---

i 译者注：主母会于1817年创立于法国，1891年传入中国。该修会在许多国家创办学校并指导教育工作。修会的成员以修士为主。

年都要求总会长派遣一些具有良好的基础教育专长的司铎，因为这样的人物才能够管理他的学校。他也的确获得了一些杰出的人才，特别是在修道院任教的神父，但能在高中任教的神父不多。在那几十年中，圣言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欧洲创立了许多高中，在南美洲和菲律宾接管了一些修道院和学院，所以圣言会在国外也很缺少学校的老师。

然而，主教没有放弃他的原则。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年，他发出劝告和呐喊。他给斯泰尔的总会长布卢姆（P. Nikolaus Blum）<sup>i</sup>写信说：“目前的革命活动又提醒我，我们应该更加投入于教育工作。但是，我们缺少受过训练的人才，也缺少资金。驻济南的德国领事曾经几次劝我们：‘你们应该在德国建立一所培养老师的学院，然后派遣这些人才去传教区。’不过，实现这个计划大概很难。我想，您应该每年叫一些传教士上一些教育学的课程！我在这里送给您济宁的高中的课程表，您可以看看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司铎修道院和高等学校也需要教师。我们在戴家庄的师范学院<sup>ii</sup>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我们修会也特别照顾这个学院。岳立仞神父（P. Joergens）<sup>iii</sup>也是一位优秀的校长。但是，我们必须在那里造一座房子。我认为，建立这所学校比建立传教士的养老院更重要。”<sup>iv</sup>

他得到的回答是：“教会在传教区创办学校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任

---

i 译者注：布卢姆，德国人，从1909到1920年任圣言会总会长。

ii 译者注：戴家庄的学校创办于1906年，最初有80名学生。目标是给传教员、修道生和老师们提供基本教育。

iii 译者注：岳立仞（1879-1946年），德国人，1905入圣言会，1906年来华，1910年任戴家庄学校校长，1925年任济宁师范学校校长，1935年后在青岛。著作有《心理学纲领》和《算数》等教科书。

iv 见1913年1月17日的信。

务。但是我们在这里也不能有特别的行动。”这样，发愁的韩宁镐主教一直缺少一些合适的能管理学校的教师。

资金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布卢姆总会长向韩宁镐写信说：“我认为学校是很重要的，但这些学校需要很多钱。”

那位穷困的传教区主教也明白这一点，他一生都在为办学校向恩人们要钱，但他也没有获得突破性的进展。有时候他希望北美洲能提供更多的资助。他就此向斯泰尔写信：“我不用说学校的重要性。但我们没有钱。我想派遣顾思德神父（P. Joseph Koesters）<sup>i</sup>去美国，让他在那里募捐，行不行？目前驻青岛的美国领事是一位好心的天主教徒，他说他要在美国主教团——特别是在吉本枢机主教（Kardinal Gibbons）那里——推荐我们。通过这个办法，我们可以进入美国的公教界。”<sup>ii</sup>

布卢姆总会长赞同并且说：“我们也能提供一点小小的资助。一切剩余的钱，我们奉献给传教事业，因为我们这里的不动产，我们可以借一点儿钱。修会们不应该给国家这个巨魔（Staatsmoloch）<sup>iii</sup>募捐。上主天主是仁慈的，他将会协助我们。”<sup>iv</sup>

然而，对美国的期望也没有实现，缺少资金的主要问题一直阻碍了教会学校的发展。

---

i 译者注：顾思德，1870年生于德国，1894年领受铎品，1906年来华，先后在青岛、坡里、菏泽传教，1922年死在坡里。著作有《中国革命与它对传教事业的影响》（1911年），《中国的教育界》，见《传教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1912年，第49—64页。

ii 见1911年10月25日的信。

iii 译者注：Moloch指一个巨大的恶劣力量或权威。参见《圣经·肋未记》Lev 20: 2中的“摩肋客”。总会长的意思是，如果欧洲的修会们募捐而获得很多钱，它们将还要给国家纳税，但如果他们没有钱，反而自己向人借钱，就不必纳税。

iv 见1912年1月29日的信。



另外还有一个阻碍的因素：传教士们没有一个明确的程序和规章来建立教育制度，而在几十年的革命状态之下，他们也许无法进行任何计划。主教征得好多建议，但这其中包括很多极端的因素和想法。

比如说，柏林政府航海局有一位军官——福勒滕船长（Kapitaen Vollerthen），他曾经在东亚工作过几年，也尊重公教的传教士们。但是他说，传教士们走错了路。他的经验是——许多专家都同意他的看法——中国人对基督教不感兴趣，当传教士们强调宗教的东西时，中国人不会来。传教事业要成功，教会必须把文化放在最高的地位上，这样才可以赢得中国人，而将来可以为信仰做更多事，超过现在教会学校的影响。那位军官说，中国人是不折不扣的物质主义者，当他们获得现世的利益时，他们才会进入教会。因此，首先必须创办一些文化机构！这也是美国新教传教士们的方法，而他们成功了。所以，他们又获得了如此大的资助。当人们把宗教和传教放在头等地位时，那些传教士仅仅会获得穷人的几分钱，而富人会为文化事业捐钱。

斯泰尔的布卢姆总会长与夫乐登船长谈过话，他告诉了韩宁镐主教这些观点。韩宁镐主教这样给总会长回信：“很多人说：‘一方有文化，一方有宗教！’<sup>i</sup>这是一个老话题。我始终强调：我们的任务是宗教上的传教。如果其他的努力——文化上的或社会上的——有助于推动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也不排斥它们。我想我们这种立场正好是中间的立场。某些人几乎已经担心，我的路线太‘左’；<sup>ii</sup>夫乐登船长认为，我们还太‘右’。这

---

i 译者注：即“中国的新教有文化，中国的天主教有宗教”。

ii 译者注：韩宁镐主教用了“左”和“右”的观念。这里可以反思这些说法的复杂性：“文化传教”比较“左”，因为它暂时放弃宗教传统，但它也比较“右”，因为它强调精英分子；“宗教传教”可说是“左”，因为它走群众路线，但又可说它“右”，因为特别强调宗教传统。

样，我们的路线大概是恰到好处的：我们尽量创办很多宗教学校和宗教机构，其他的机构如文化机构，我们不要排斥，但我们必须注意时代和具体的情况。”<sup>i</sup>

一些传教士也有类似的看法。比如，那位长期指导济宁“中西中学”的薛田资神父曾经去欧洲，还做了许多演讲。他认为，公教在华的传统传教方法是不对的，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办学校、进行印刷事业以及面向社会的高等阶层。

韩宁镛主教就这个看法写道：“没错！我们都同意，公教的传教事业在这几个方面应该做得更多；我们只是力不从心。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新教的发展。最近有一些新教的人士说，他们太过忽略乡下的人民，而公教恰恰在乡下的人中取得最大的成就。所以，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公教的传教方法是正确的。我的看法是：我们应该双管齐下。但愿我们有足够的人员和资金！”<sup>ii</sup>

但是，德天恩会长便持反对意见，而他的前任会长福若瑟神父——这位神圣的传教士——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德天恩神父在总会长那里支持韩宁镛主教对受过训练的教师的要求，但他也说：“我觉得，只有那些提供良好宗教教育的学校才是好的学校。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山东南界的教会学校会有害处，不会有多少好处。我们曾经办过没有宗教的学校了。我没有发现这些学校对教会和宗教有什么好处。我甚至认为，这样的学校对任教的传教士们的信仰影响也不好，除非他们是很虔诚的、实在的人。但是，那些很虔诚的人不乐意在没有宗教的学校任教。因此，我认为，我们

---

i 见1913年3月17日的信。

ii 见1923年12月11日的信。

的传教士应该仅仅在公教的学校任教。但是，他们应该接受好的训练。请你们多多训练一些神父，给我们一些高等学校毕业的教师！”<sup>i</sup>

韩宁镐主教针对这种看法说道：“我基本上也站在会长神父的立场。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实现它。创办一所学校必须有政府的许可。但为了获得政府的许可，我们必须排除宗教教育。据我所知，圣母会修士在日本创办的学校，耶稣会在上海办的大型学校以及耶稣会在印度办理的学校都没有宗教教育。另外，在这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然而，我并没有发现老师们受了很坏的影响，无论是在我们这三个教会学校那里任教的人，或是在国立学校教德语的老师那里。”<sup>ii</sup>

关于学校的种类，人们的意见也不一致。总会长布卢姆认为，办小学好，因为他在阿非利加传教时发现小学的重大好处。然而，韩宁镐主教知道，在华的基督徒团体一般都很小，所以不能办一些纯粹宗教性的小学。因此，他认为，办小学对传教事业不会有很大的好处，虽然他也很希望所有的基督徒孩子能接受一些基础教育。

另外，政府办的高中也没有固定的课程表。革命后的中国陷入精神混乱状态，而国立学校课程表不断改动的现象也反映出这种混乱状态。因此，教会学校也没有良好的基础。

当施米德林教授于1914年来华时，他建议创立一所师范学院。当时的计划是，两个在山东传教的德国传教会（方济各会和圣言会）在省会济南创立一所“法律和政治学大学，包括一个农业系”。这所大学应该接受信

---

i 见1912年1月20日的信。

ii 见1912年4月4日的信。

徒和外教人的孩子，将会有住校和不住校的学生。很多人欢迎这个计划，还不断就此讨论。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布卢姆总会长说：“这两个团体将要合作，但他们也许很快会说：‘啊呀！我招来的伴侣却在限制我！’”最后，人们放弃了这个计划，说它“太理想化了，太复杂了”。

也有人建议创立一所工业和手工技术学校，这样可以给基督徒家庭的失业青年提供一些训练和工作的机会。韩宁镐主教向布卢姆总会长写道：“假如办这样的学校，我们将需要资金和具有能力的修士。我们能获得这两样吗？”总会长回信道：“我们派遣一些懂手工的修士们，他们可以先在戴家庄的修院里建立一些作坊，然后可以从此开始继续考虑这个项目。”他们也这样施行这个计划。后来有很多青年在戴家庄的作坊中受了训练，特别是在印刷厂那里。

扩大和发展纯粹的教会学校比创办世俗的高等学校容易多了。这样，传教士们首先注意到那些学校：司铎修道院和备修院（“小修道院”）、两所传教员学校<sup>i</sup>以及戴家庄的师范学校。韩宁镐主教也始终关怀那些学校，设法使它们有良好的发展。在他的领导下，这些学校也带给教会很大的好处。在这方面，韩宁镐主教的传教区完全可以与其他的地区媲美。

韩宁镐主教为北京公教大学<sup>ii</sup>于1927年创立而感到非常高兴。美国本笃会回应教宗比约十一世的邀请承担了这个重大的项目。这所大学两年后就获得政府的认可。韩宁镐主教马上派遣三名山东学生在北京公教大学就读，还不断叫一些山东南界的中国人去那里进修。

---

i 译者注：两所传教员学校都在济宁。

ii 译者注：北京公教大学即辅仁大学。

格兰德尔 (P. Joseph Grendel)<sup>i</sup> 总会长于1933年春天告诉他, 本笃会退出辅仁大学, 教宗委任圣言会继续管理这所天主教大学。韩宁镐主教这样回信: “我最感兴趣的当然是那封关于大学的信。不可思议! 我几乎不能相信! 如果上主加给我们他的降福, 这个事业将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我们应该将这个重大的事业托给圣神/圣灵、圣母玛利亚——她是‘智慧的宝座’——以及我们的创始人。您可以想象, 我一听到这个消息, 内心就有很多计划、想法、期望和问题。但是, 我还没有具体的资料, 所以我还不会对别人说什么, 我当然期待更多的消息。”<sup>ii</sup>

他从北京和罗马获得一些消息后, 向总会长神父写信: “您可以想象, 当教宗请您接管北京的辅仁大学时, 我对这件事具有极高的兴趣。我事先完全保密, 但这两星期以来, 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北京的苗德秀也给我写信说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4月底, 一家中国报纸也发表了关于那所大学的文章。根据这篇文章, 本笃会不能继续管理这所学校, 而问题出在美国。中国人无法接管这所大学。因此, 教宗须选择另一个传教修会, 便委任圣言会继续办这所大学。当然, 本笃会会士很悲痛, 因为他们为这所大学的创立和扩大付出了很多精力。

“然而, 苗神父告诉我, 北京的本笃会会士对我们没有怨恨。我曾为此担心。因此, 我很高兴我们与本笃会的良好关系没有受到影响。

“别处的人好像也没有反感。北京的满德贻主教 (Bischof

---

i 译者注: 格兰德尔, 德国人, 1932—1947年任圣言会总会长。

ii 见1933年4月5日的信。

Montaigne)<sup>i</sup>也曾说：‘这样好，圣言会是一个真正的传教修会！’那些目前在大学任教的中国教授大概也不会反对，而我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苗德秀神父也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和支持。

“如果这所大学拥有能干的宗教和科学教师，它对中国的传教事业和我们的修会将会有重大的影响。别人对我们怀有很高的期望，我们不应该辜负他们。

“我给您写这封信只是表明我关注您目前的重大任务。”<sup>ii</sup>

新的学年开始于1933年9月18日，韩宁镛主教亲自去了趟北京，考察这所公教大学。这样，他能够向总会长写报告说：“我承认，现实还超越了我的梦想。那里的恭王府，那些宽广的院子，很多平房以及本笃会建立的中国式大学教学楼，这一切带给人深刻的印象。我们必须承认本笃会的贡献很大！我在开学典礼上也作了简短的演讲，表示我对教授们和学生们的敬佩和感谢，因为他们在这几年里大大地促进了这个机构的外在和内在的发展，虽然一开始有很多困难。这样，我们的修会获得了一项伟大使命，而我可以想象，本笃会会士的牺牲是多么的大。

“关于学校的内在发展，我不太了解。辅仁中学有370名学生，它的房子在恭王府那里。人们可以看到这些男青年去上课或下课。听说，他们一般都是比较守规矩的人。

“虽然昨天正式开学，但他们几天后才开始上课。据说，学生的精神

---

i 译者注：满德贻，1883年生于法国，1901年入遣使会，1907年领受铎品，同年来华，在保定大修院任教，后在东吕，任小修院院长，于1924年被提名为主教，是林主教(Jarlin)的副主教，自1930年起任北京主教。

ii 见1933年5月11日的信。

面貌很好，比北京其他的大学好一些。我本来担心教授和学生们对我们会有某种冷漠的态度，所以，当我发现他们的态度是合作和友好时，我很高兴。人们好像并不反对我们。我们现在必须通过行动来加强这种信任。”

主教后来还谈论了教师和新的助手的问题。新教师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他说。另外，这项事业也需要很多资金，如果它要成长和发展的话。他这样作结：“我们现在肯定需要对上主有最大依赖，就像我们的创始人一样。”

在第一个学年即将结束时，南京政府向北京公教大学提供了1万美元的资助。韩宁镛主教就这件事写道：“我因此而感到万分高兴，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政府会提供这样的支持。我们在济宁市的高中也获得了政府的正式认可。这两个信号表明，政府是以友好的态度看待我们的教育工作的。”<sup>i</sup>

对圣言会来说，在北京的新任务并不容易开展。欧洲的情况（战争）大大阻碍了工作，截断了最重要的资助来源。日本侵华战争很快就给大学带来很大的问题，因为日本人占领了北京。虽然如此，辅仁大学仍发展良好。

除了辅仁男中，圣神会协助圣言会建立了一所女中。辅仁男中和女中都有300多名学生，一共是625人。这些高中很重要，因为它们为大学提供了足够的生源。

1939年共有1262名学生进入辅仁大学，其中有306名女学生。另外，辅仁大学还为那些在大学进修的司铎们创立了一所“阿尔贝图斯学院”

---

<sup>i</sup>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35年，第118页。

(Albertus-Kolleg)，<sup>i</sup> 整个教育机构大约有2000名学生——对于一个如此年轻的教育机构来说，这算是很多人了。

韩宁镛主教直到逝世一直对北京公教大学保持着非常高的兴趣。在主教去世后，雷冕教务长 (Rektor P. Rahmann)<sup>ii</sup>曾写道：“在山东的会士当中没有一个人在对北京团体的关注度方面超过韩宁镛主教。自从我来北京 (1936年) 后，我前后三次去山东，而他每次要我叙述北京团体的问题，想听每一个细节，他会因每一个好消息而感到高兴。”

主教写给大学教务长们的信也表明他多么关心这个项目。他先给穆尔菲神父 (P. Murphy)<sup>iii</sup>写信，然后于1936年给雷冕神父写信。他在四年内给他们写了15封信，在信中表示了对大学最热切的关怀。

1935年，一个政府视察团给辅仁大学很高的评价。韩宁镛主教遂给穆尔菲神父写信：“我刚刚听说，视察团的考察顺利结束了，而他们给您和我们的颜师神父 (P. Jaensch)<sup>iv</sup>很多赞颂和肯定。愿上主赞美！”

当辅仁大学第一位圣言会教务长穆尔菲神父于1935年患病去世后，韩宁镛主教不顾他的年老而去往北京，在主教座堂（北堂）那里为他举行了一台大弥撒。

---

i 译者注：即后来的“中国司铎书院”（1938—1950年）。该书院培养本地的司铎，给他们上大学的机会。1940—1948年，圣言会神父富施公 (Friedrich Fuchs, 1899—1983年) 为司铎书院的指导神父。

ii 译者注：雷冕 (1902—1985年)，德国人，1915年入圣言会的学校，1929年领受铎品，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民族学，1935—1936年在奥地利任教，1936—1946年任辅仁大学教务长。1949年回德国，后在菲律宾任教，做人类学研究。

iii 译者注：穆尔菲 (1895—1935年)，美国人，1921年领受铎品，1933年来北京，任辅仁大学教务长，1935年9月5日因病去世。

iv 译者注：颜师，1882年生于波兰，德国人，1908年领受铎品，1934—1948年在辅仁大学进行研究和教学。



当辅仁大学的《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于1936年创刊时，韩宁镐主教也感到非常兴奋。他向教务长神父写信祝贺道：“我这几天获得《华裔学志》第一期。我向您，可敬的教务长神父，表达我的谢意，同时也祝贺您，因为这个期刊非常成功。我看了内容后感觉到，这个期刊符合我们大学的标准，而各位编辑也应该以此为荣。我也想再订另外一本，因为我们的传教士们都对这个期刊感兴趣，所以一本是不够的。”

## 第七节 印刷事业、撰写书籍、科学研究

山东南界的传教士们很早就在坡里创办了一家小小的印刷厂，而这粒微小的种子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幸运的是，兰乐敏修士（Br. Adolf Glaremin）<sup>i</sup>成为这家企业的能干的指导者。在其他德国修士的协助下，他训练一些中国男孩儿，为自己培养了一批助手。在那位耐心的、积极的修士的领导下，印刷厂的产量逐年增长。通过33年的忠诚工作，兰修士使这家企业达到很高的效率。<sup>ii</sup>

韩宁镐主教也参与其发展。在主教那里，兰乐敏修士获得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主教建了新的厂房，又开始利用电力设备代替早期的手动印刷机和油灯设备。他购买新的机器并改进设备，确保了印刷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几年后，产量翻了六倍，而他们的印刷品也送到山东南界以外的许多教区。取得这些成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几乎整个印刷厂都完全符合传教工作的需要。大部分的书都是本教区的传教士写的。

在第一封牧函中，韩主教就鼓励他的传教士们多写书。他说：“一

---

i 译者注：兰乐敏（1865—1925年），德国人，1886年入圣言会，1892年来山东，先在坡里，1900年后在兖州，有一段时间指导青岛的印刷厂，后来回到兖州。兰修士在兖州去世。

ii 译者注：圣言会在山东南界的印刷厂于1903年搬到兖州并在兖州建立新的厂舍。同年，兖州的“圣保禄印书馆”开始印书。该印刷厂后来获得良好的发展，一年最高的发行量是25万册。1940—1944年，顾若愚神父（Hermann Koester，1904—1978年）指导兖州的印刷厂并出版了很多书，比如《中小学公教道理教科书》（15册，1941年）、《小学公教道理教科书》（14册，1941—1945年）。

个特殊的时代也需要特殊的工作方式。那种直接的传教工作——针对个别的灵魂——现在已经不够了，我们也应该努力建立一个基督化的气氛和环境。我们也应该影响那些与我们没有直接关系的阶层。我们在这方面有三个途径：办学校、做慈善工作、科学研究和著书。”

关于科学研究和著书的工作，他这样解释：“我们司铎们必须进行很多奋斗和搏斗，但在这些搏斗中，只有用精神的武器<sup>i</sup>才能赢得胜利。对于在中国传教的人来说更是这样，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文明的古国，这个国度正在迅速地转向精神的的活动。我们应该尽一切力量，在我们的传教工作之外，也要做真正的科学工作，这是我们的重要责任，只有这样才可以面对中国人和欧洲的无神论者。

“因此，如果其他的工作允许这样做，我请神父们尽量注意学习和研究。如果你们中有人觉得，自己能完成一个科学项目，或者是有谁想写一些东西，我很支持。

“我们都应该多写一些。我们在斯泰尔的杂志已经很长时间不报导我们山东南界的事情了。<sup>ii</sup>但是，我们也应该为《公教传教丛刊》（*Katholische Missionen*）以及其他的杂志写一些文章。写作的人才有长期的影响！（*Wer schreibt, der bleibt!*）<sup>iii</sup>我们当中有那么多能够写作的人，我们为什么不行动？当然，我们所写的东西必须经过检查，这是上面规定的。但是这个规定不应该压抑我们写作的热忱。”<sup>iv</sup>

---

i 译者注：见《圣经·厄弗所》Eph 6：10-17。

ii 译者注：“我们在斯泰尔的杂志”指扬森神父创办的杂志，如《耶稣圣心小通讯》、《斯泰尔传教通讯》和《上主之城》等。

iii 译者注：韩宁镛主教改用拉丁语成语*Verba volant, litterae manent*。（“话语消失，文字存留。”）

iv 见1905年2月10日的通信。

此前不久，他就同样的问题向斯泰尔的总会长说过：“我请您给我推荐一些有学问的神父，他们应该从事学术工作，或到高等学校那里工作。这是我的心愿。我的理由是：第一，公教的传教事业对于自己的名声和对于教会具有这样的责任。您看看在华的公教书籍和关于中国的书！除了耶稣会的著作，几乎没有书。其他的一切都是新教的人或无信仰的人写的。这是应该的吗？在这里有很多机会，也有很多未定因素。

“第二，我们对中国人也有这个责任，我们欠他们这类服务。未来大概会属于黄种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知道，您在欧洲能感觉到这里的人是如何追求进步的。中国人很佩服科学成就。如果我们不进行研究，我们将被完全拒绝。大炮不能说服人们。决定性的因素是我们在精神上的优点——当然要与恩宠结合起来。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中国有它高度发达的一面，日本也一样。因此，我们需要一些杰出的人物。当然，部分传教士不是这样的绝顶天才，但一些比较有能力或有名气的人物可以提供一個招牌。如果我们想扩大和加强我们的影响，我们必须从这里着手。

“第三，我们的学校也需要这样的人才。如果这些学校将要发展的话——我们希望，上主给它们这样的机会——我们需要一些知识渊博的人。但是这样的人不能一下子从国外送进来，他们必须慢慢学习汉语。因此，我们应该现在就着手培养这样的人。

“第四，对传教士而言，这也是必要的。如果一个传教士长期没有精神上的刺激，将变得很悲观和心酸。我始终相信：对传教士来说，学习是第八件圣事。几个能干的人将是整个团体的酵母。还有其他的理由，但这些都很多了。

“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应该留意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地理学、绘图学。我想我们应该自己来科学地研究山东。外面来的地质学家和

军官们早已在东奔西跑了，但我们没有做什么研究。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另外，汉学很重要，需要研究中国历史、宗教学、民族学、汉语等等。”<sup>i</sup>

韩宁镐主教始终坚持他的这些看法。他认为，科学工作和写作是传教事业的重要部分。他多次就此写信给斯泰尔的会长，请他派遣一些经过特殊训练的司铎。他一次又一次地强调这项工作的迫切性和它对宗教与传教的重大益处。他经常鼓励他的传教士们进行研究和写作，也在这方面支持他们。他最喜欢与传教士们谈论一些科学性的问题，还想办法唤起他们的兴趣。当他找到了几个愿意谈论这些问题的人时，他喜形于色。直到晚年，他也偶尔会与一些科学人士讨论深刻的问题。他能连续谈论几个小时也不感觉到累，一直兴致高昂。

我们已经看到，他很支持本笃会在北京创立公教大学。但是，他也马上意识到，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促进山东南界的传教工作。在辅仁大学第二年开学时，他已经向总会长写道：“我们的修道生中有三位在北京上高等学校（他们学习汉学），<sup>ii</sup>而我们还会派遣两位。我们需要一些能干的、具有科学修养的人，特别需要一些精通汉语的人，一方面我们需要我们学校的老师，另一方面需要创立基督化文学。”<sup>iii</sup>

韩宁镐主教希望，山东南界的传教士们会创立某种“人类学机构”，希望传教士们怀有圣言会的伟大人类学家施密特神父（P. Wilhelm

---

i 见1904年9月25日的信。

ii 译者注：“学习汉学”即是说，学汉语、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

iii 见1929年2月21日的信。

Schmidt)<sup>i</sup> 般的精神。因此，他也一直要求一位受过这方面训练的司铎到山东来。最后，他确实获得了一位具有杰出汉学修养的司铎。但是，这位学者虽然受过许多年的专业训练、拥有自由时间和丰富的资源，但没有结出很多果实。伟大的学者有时候不是多产的作家。<sup>ii</sup>

因此，山东南界的传教区不能参与《人类学杂志》的编辑工作，有的人曾批评过韩宁镐主教说，他在这方面的兴趣不够。他听到这些声音，便向总会长解释道：“是真的，我们这里为《人类学杂志》做得不多。在中国这样的古老文化国度，民族学研究也不是很容易的。因此，我很早就说过，应该培养一位司铎学习汉学。后来也这样做了。但是，那位神父的工作成果不多，这很遗憾，但不能怪我。我也叫另一位神父开始学习汉学，但也没有成就。因此，我们这里就不能加入人类学研究。但是，我对施密特神父的研究确实有浓厚的兴趣。我看到他的研究带来很大的福祉。然而，在世上也有不同的意向，连天上的天使也因他们神圣的意向不同而争吵。”<sup>iii</sup>

韩宁镐主教常以具体行动代替抽象的言辞，但他在科学研究和写作方

---

i 译者注：施密特（1868—1954年），德国人，重要的人类学家，于1906年创立“人类学机构”（Anthropos Institut），这是一所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机构 and 图书馆。史米特神父研究了原始文化的民族。著作包括《“神”概念的起源》（Der Ursprung der Gottesidee），12卷，1912—1955年。

ii 译者注：这位学者是鲍润生神父（Franz Xaver Biallas），1878年生于波兰，1901年入圣言会，1905年领受铎品，1905—1919年学习汉学，1920年后在山东兖州进行研究，1925年到青岛，1926—1933年在上海，1933—1936年在北京，于1936年5月28日因患伤寒症去世。他创立了《华裔学志》，著作仅有《孔子与对孔子的崇拜》、《曲阜与中国文化》（一篇文章，1935年发表）、《屈原，他的生活和诗》（一篇22页的文章，1928年发表于上海）、《屈原的〈远游〉》（50页的文章，1927年发表于莱比锡）。

iii 见1923年11月6日的信。

面也做了不少。他本来是一位完全投入于牧灵工作的司铎，是一个“旅行传教士”和“旅行主教”，但他同时也不断地写作，并以真正的对知识的追求投入研究和阅读科学著作当中，直到晚年他仍有这种追求——这真令人佩服。

自从他踏上中国国土那天起，他便耐心地学习汉语这种复杂的语言，而在所有的传教士当中，他也是在这50年内掌握汉语最好的人之一。他不仅精通普通话，也知道各个地区的方言，同时也精通书面语和文言文——这个难度就更大了。中国的高级官员恰恰佩服他的这个能力——一个欧洲人能如此熟练和文雅地使用他们的文言文。

通过不断学习，他也深入地理解了中国人特殊的思想世界、习惯和风俗、心灵、性格和历史。他坚信，一位传教士必须充分掌握所在国的语言，必须深入了解当地人民的生活和思维环境。

他的众多著作都与传教事业有关系。他并不是一位“天生的作家”——也许有人曾说过这样的话。他早期的著作仍然是比较生硬的，很明显不是一个老练的作家写的。他确实有丰富的才能，但正是经过他的努力才获得的。

他自己大概也感觉到他早期的作品是不完善的，因为他没有以自己的名字发表它们。有一次，他的亲戚对他说，他们感到奇怪，因为韩宁镐没有定期地给他们写信。韩宁镐神父的回答是：“实际上，我写的东西也不少。比如说，我与《科隆人民报》有定期的来往，而这个报纸曾经发表过我写的一些文章，但没有署上我的名字。另外，你们也许看过一些我写的东西，不过，以别人的名义写的。我不一定每次都会署我的名字。你们如果看不到我的名字多次在出版物中出现，也没有害处。你们知道我还活

着，始终精神饱满，这就够了。”<sup>i</sup>

通过他的勇气、努力、学习精神，又参考优良的书籍，他在写作方面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的风格和言辞都很优美、生气勃勃，而他写的文章总是文不加点。他可以不断地写几个小时，只要他一直有新的灵感，就不必在每段停顿来考虑风格的问题。

《德华辞典》（两卷）是他所有著作中编写最艰难的一本书。他付出几年的业余时间来完成这部著作，甚至当他已经任主教时还没有完成它。他在信中也多次提到这部辞典，指出这需要很多时间、精力和耐心。连在他的长途旅行中，他也投入于编写辞典的工作。

他第二本比较厚重的著作是长达653页的《圣言会福若瑟神父——他的生活与工作，同时包括关于山东南界教会史的资料》一书（兖州，1926年，第2版）。

他偶尔会告诉总会长他正在写这样的书：“我利用休息的时间来完成这本福若瑟传记，但很多别的问题会让我分心。另外，我还怀疑我的这些文章有没有价值，因为我的记忆力很差。”<sup>ii</sup>

《圣言会福若瑟神父》这本书充分表达了韩宁镐主教对于福神父的尊敬，同时也表现出他对外方传教工作的热忱。具有30年传教经验的韩宁镐总结他的各种观察，其目的是鼓励他在上主葡萄园中的同工以及那些对传教有兴趣的青年。

韩国的本笃会主教绍尔（Sauer）热情支持了这本书，他促成了《圣言

---

i 见1890年的信（不带日期）。

ii 见1918年8月15日的信。



会福若瑟神父》的第二次出版。他向韩宁镐主教写信道：“没错，我鼓励你们再次出版这本书，而我决不会后悔这个行动。我向您——主教——表示感谢，您给了我们这本美好的著作。‘他虽然死了，仍然在说话。’<sup>i</sup>这句名言将不仅仅适用于福若瑟神父，也将适用于您。最好的书只会慢慢发挥影响，但它们的影响更长久。我相信，您写的这本《圣言会福若瑟神父》在传教界将会有很大的影响，而每一个德国传教士将来都会从这本书得到熏陶和教训。至少对我的传教区来说，我想达到这个目标……这就是最好的传教牧灵精神。您也可以用我这些话作一点宣传，也可以用我的名字。您也可以告诉别人我买了50本，因为我想给这里的每一位神父一本。圣奥特利修院的总院长（Erzabt von St. Ottilien）<sup>ii</sup>也买了100本。

“我的一切传教士都表示很感激，因为我送给他们这本书，他们说这是最美好的圣诞节礼物。他们都想努力学习和效法福若瑟神父的精神。

“这本书也能给在家乡的年轻司铎很多启迪，能够纠正某些不正确的看法，阻碍人们的幻想，同时也能激励人们培养一个真实的、结实的灵修精神。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对修道人和传教士的有机结合——福若瑟神父实现了这种结合。如果那些在我们家乡的修道生接受了这种真实的、内心的修道精神，他们可以避免日后在传教区遭受许多失望。”<sup>iii</sup>

韩宁镐主教写的最普及的著作是他的《问答释义》。这个《问答释

---

i 译者注：见《圣经·圣咏》Ps 115: 17：“死人们不能够赞美天主”，以及《新约》对复活的希望。

ii 译者注：奥特利是本笃会在德国的大修院。

iii 见1926年10月8日和1927年2月12日的信。

义》总共有5卷，韩宁镐主教撰写了其中3卷。<sup>i</sup>他在书中表现出他对汉语的精通以及他在解释公教信仰方面的卓越才华。同时，这本书也表明，韩宁镐是一个实际的牧灵者，他能与平民沟通。这些小册子的特点是它们很精确、通俗，信仰热忱，它们在大部分的中国教区都拥有读者。到现在（1940年）已经有了第10版。

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韩宁镐主教的任务是编写一部全国统一的《教理问答》——1924年的全国主教会议委托给他这个工作。宗座代表刚恒毅主教于1929年3月23日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而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六位主教和六位司铎，韩宁镐主教是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于1929年4月和5月在上海召开会议，他们规定，《小问答》中的问题应该是87个，《中级问答》中的问题应该是372个。另外，他们还决定《教理问答》的章节分配。这些规定基本上都符合韩宁镐主教所建议的模式。

这些问答的编写、修改、重写和修订都由韩宁镐主教负责，他邀请了他教区的一些神父帮忙。这无疑是一份艰苦的工作。每一个问题的回答必须是“本质上的”、<sup>ii</sup>针对要害的、清楚的和简明的。因此，编者们的琢磨了很长时间才感到满意。四年的努力工作后，这部著作获得宗座代表的批准。

除了其他比较小的宗教著作，比如《敬礼圣母月》，<sup>iii</sup>主教还出版了一系列《牧函》。这些《牧函》在别的教区中也很受欢迎，因为它们为传教

---

i 译者注：《问答释义》5卷，第1卷200页；韩宁镐著，第2卷202页；福若瑟著，第3卷204页，赫德彰著；第4卷272页，韩宁镐著；第5卷274页，韩宁镐著。《问答释义》在20世纪20到40年代曾多次于兖州印刷厂印刷出版。

ii 译者注：德语的 *wesenhaft* 指“与本质有关的”、“包括问题的本性”。*Wesen* 即哲学中的 *ousia, essentia*，“本质”、“本性”、“性质”。

iii 译者注：《敬礼圣母月》，兖州，1900年，第74页。

士们提供了一些资料，使他们有能力讲一些关于复杂问题的道理。这些著作都是汉语著作。

韩宁镐主教的德语著作除了《圣言会福若瑟神父》之外，还包括许多在《斯泰尔杂志》、《科隆人民报》、《法兰克福斯坦因—孟斯特山报》（*Frankenstein-Münsterberger Zeitungen*）、《东亚报》（*Ostasiatischer Lloyd*）、《公教传教丛刊》（*Katholische Missionen*）、《传教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上发表的文章。在斯泰尔创立50周年的祝贺书《为圣言服务》（*Im Dienste des Goettlichen Wortes*）中，韩宁镐主教也发表了一篇长达20页的文章。

他向山东南界的恩人和朋友们写的《年度报告》也很值得一提。安治泰主教早就写过这样的报告，但在安主教任期的最后几年中，韩宁镐主教替他写成了这些报告。这些报告在斯泰尔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行——每一本册子长达16到20页，在德国和美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很多教会报纸也引用这些《年度报告》的部分或全部资料。

这些著作的目标是赢得人们对他传教工作的兴趣和支持，感谢那些忠诚的协助者。不过，这也不是一般的“乞丐书信”（*Bettelbriefe*）。他的信呈现出一位使徒般的司铎和主教的远见和宽大胸怀——天国和灵魂的救恩对他来说是最高关切，而他的羊群的困难就是他自己的痛苦。因此，这些通信都获得很大的回音，唤起很多传教热忱。

他的接班人舒德禄主教还说：“除了这些已经出版的著作，韩宁镐主教还留下了很多手稿。我们希望还能出版其中的一些东西，特别是他的讲道稿和避静文稿。”

最后，我们也应该认识作为“书虫”的韩宁镐主教。虽然他的生活那

么动荡不安，但他确实是一个书虫，是一位非常杰出的书迷。

如上所述，他在视察旅行中始终带着一只很大的书箱。书本是他的精神食粮，是他安静的好朋友。在最孤独的旅途上，在最简陋的茅屋中，他感觉到，书本带给他快乐，书本是他的家乡。有人寄给他书，他回信说：“一本好书始终让我为自己一生有这个爱好而感到高兴。”<sup>i</sup>

吉尔神父（P. Gier）和格兰德尔神父这两位总会长都知道韩宁镐主教有这个爱好，所以他们偶尔也送给他一些新的神学著作。对这些书，主教都表示真诚的感谢，比如他曾说：“一系列新书来到了。人们说这是一个礼物。愿上主降福您！您知道，我会因收到书籍而感到特别高兴。”

韩宁镐主教在德国的外甥若瑟·巴特教授（Dr. Joseph Bathe）（他也是司铎）寄给他很多新的科学著作。当主教1907至1908年第一次回欧洲时，巴特提出这个计划，韩宁镐主教高兴地同意了。巴特博士也在几十年里逐步兑现这个许诺。他也问过他的舅舅最喜欢什么书，而韩宁镐主教回答：“我对于所有的书都很感兴趣，因为我总想与家乡保持精神上的联系。谢谢你送给我巴特曼（Bartmann）的教义书，我读这书很高兴。”<sup>ii</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迫使韩宁镐主教在精神食粮方面“守斋”几年，但当他的信重新到达德国时，他就对他的外甥请求：“你能不能寄给我一些有关教会和神学的新书？我会很感激您。幸亏，我收到了新的《教会法典》，<sup>iii</sup>但在此之外我一无所。我们这几年完全与家乡的

---

i 见1924年8月3日的信。

ii 见1913年12月25日的信。

iii 译者注：19世纪的教会以1751年编写的教会法规为标准，梵蒂冈第一次大会议（1870年）决定修改法典，但于1917年才颁布新的《教会法典》；第二次梵蒂冈大会议（1962—1965年）又修改了法典，于1983年颁布新的《天主教法典》。

精神生活隔绝了。”<sup>i</sup>

他从别的朋友那里也获得了一些学术书，如果他自己有钱，偶尔也会买一些比较重要的书籍，所以在主教府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可观的、出色的图书馆。兖州修道院的教授们也从这个图书馆那里获得很大益处。舒德禄主教写道：“他经常去图书馆那里。他对这个图书馆很照顾，一直想获得最好的著作。实际上，兖州府图书馆里大多数的书也来自他本人。很多参观者因主教图书馆里的丰富藏书感到惊奇。

“如果有空，他就会去看书。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图书馆的好些书还在他的房间——这是我们神父私下的说法。他去世前几个星期有一位神父去看他，发现在主教写字台上还有那么多书。他说：‘蒙席，您还看那么多书呀！’不过，主教只是笑一笑，摇头说：‘这只是门前的风云！’虽然他知识渊博，但他很谦虚，而且总是高度评价别人的知识。

“他看过很多书，还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研究很厚的科学著作。他有敏锐的洞察力，当他快速浏览完一本书，他就知道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对于书中的小细节和不重要的东西，他并没有兴趣。”

---

i 见1918年12月30日的信。

## 第八节 返欧之旅

对大部分公教传教区来说，照顾传教事业的物质需求是一枚很沉重的十字架。公教的外方传教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它完全依赖于信徒的奉献。虽然罗马教廷的传信部每年会送一批钱，但靠这些资助仅仅能维持几个月的传教工作。家乡的传教协会也会提供一些资金，但也不太多，所以传教区的主教始终需要为了天国而成为一个乞丐。

在传教事业中，钱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如果没钱一定不行。韩宁镐曾写道：“年轻人也许想，一位传教士会像方济格·沙勿略那样一手拿着日课、胸间戴着十字架踏入一条船并且不顾一切地去外教人的地区传教。

“孩子们会有这样的概念，但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个概念是不符合现实的。古代的使徒们能够‘不带口袋不带鞋’<sup>i</sup>地出去，因为他们到处可以遇到好客的古代东方人。圣方济格·沙勿略当时也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因为葡萄牙政府当时很慷慨地支持传教事业。但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是不行的。

“传教士们也不要以为，外教人将会很慷慨地欢迎他；如果他认为，那几位因上主恩宠而入教的新信徒能够担负起正在扩张中的庞大传教事业的重担，这也是错误的。这个工作是整个普世教会的责任，所有的人都应

---

i 译者注：见《圣经·路加福音》Lk 10: 4。

该通过祈祷和奉献参与这个任务。普世教会也必须这样完成耶稣基督的嘱托。”<sup>i</sup>

为了让普世教会参与传教工作就需要不断激励人们，不然他们就没有兴趣。安治泰主教在德国有很多朋友，但在他去世后，来自这个阶层的资助便越来越少。韩宁镐当主教两年时就发现：“我们入不敷出。虽然我们想节俭，但一年的开支总比收入大。当然，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状态，我们必须尽快找一个出路……”

“最适合而有效的做法，似乎就是我自己去欧洲，去亲自拜访认识我们的老传教朋友，激励他们支持传教工作。”<sup>ii</sup>

他也向总会长汇报了 this 计划。“在我向罗马传信部写的最后一封信中，我请他们允许我去欧洲——这封信是我为了我们学校的缘故写的。去欧洲的理由很简单。在我当主教之前，所有的传教士们都曾说应该有人去欧洲。我应该亲自认识我们的恩人，这真是一件迫切的事情……另外，我很想再见到您，想与您谈论问题，听听您的意见，特别想谈论传教区的管理问题，因为教会长上和修会长上必须一起管理这个教区。这几天您会收到会长神父和我一起写的文献。最后，我也必须去罗马，去谈论教会学校的重要问题。”<sup>iii</sup>

总会长回信说，他期待韩宁镐主教不久后的到来，也希望韩宁镐能在维尔茨堡（Wuerzburg）的公教大聚会上作演讲。几个月后，韩宁镐主教写道：“传信部的许可来了。我希望，我能在春天或夏天走。当然，我也

---

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620页。

ii 见《圣言会福若瑟神父》，第621页、623页。

iii 见1906年4月2日的信。

很想在维尔茨堡讲话，但是我在这些场合一般都比较害羞、胆小。”<sup>i</sup>

陪同主教的人是他刚刚祝圣的新司铎张伯禄。他们经由西伯利亚铁路，1907年7月11日到达维也纳附近的圣佳伯尔修道院（St. Gabriel）。在这里韩宁镐获知，总会长正在罗马。他马上报告他的到来：“我在这次旅途中一直在想，我有幸在那么多年（21年）后再次见到您。您是我们爱慕的神师，您给了我们那么多。因此，我想尽快去您那里。不过，我先要去拜访维也纳的枢机主教……靠上主的旨意，我将后天出发去您那里。我反正必须去罗马，我要拜访一些人，还得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在罗马见面是很方便的。”<sup>ii</sup>

总会长也马上回信说：“我很诚恳地欢迎您。愿上主天主降福于您。我也很高兴能在那么长时间后再次见到您。”<sup>iii</sup>

关于这次相遇，我们在斯泰尔修会创始人的传记中读到：“当扬森神父听到主教来了，他跑到门厅，而在韩宁镐主教进来时，他在他面前跪下并求他降福——这位主教原来是他修道院的学生。不过主教也跪下并要求先受总会长的降福。这两位有地位的人一起跪在地上，面对面，而在场的斯泰尔修道院的学生观看到这种谦虚的榜样，深受感动。”<sup>iv</sup>

总会长也简单地向在华的福若瑟会长汇报韩主教给他留下什么样的印象：“我发现，韩宁镐主教是很简朴、谦逊与和蔼的。我想，他能影响很多人的思想。您知道，他很想在华举行一次全国性的主教会议，但

---

i 见1906年10月26日的信。

ii 见1907年7月13日的信。

iii 见1917年7月15日的信。

iv 见P. H. Fischer著《扬森神父：斯泰尔传教事业的创始人》，斯泰尔，1919年，第399页。



直到现在还没有很多人支持这个项目。不过，根据教宗、石泰恩胡伯枢机（Kardinal Steinhuber）和维伊枢机（Kardinal Vives）最近所发表的话可以看出，他们的态度很积极。”<sup>i</sup>

主教马上开始他的宣传工作，四个星期后已经从总会长那里获得了这样的邀请信：“您能不能今年秋天在我们的一些修道院给我们的司铎们讲避静？我听很多在中国服务的传教士赞扬您的避静讲演。所有的神父都很高兴，您将会有机会说很多有益的话，并且能激起我们在欧洲修院的传教兴趣。

“因此，我很希望您不会拒绝我的要求，请给我写信。主要的修院首先是：在维也纳附近的圣佳伯尔修院、波兰尼撒（Nyssa）附近的圣十字架修院和斯泰尔的修院……不过，我也不想给您压力，如果您觉得不合适，我就收回我的请求。”<sup>ii</sup>

主教同意在四个地方主持八天的避静。他的避静讲演都很实在，他说话很果断，他也带来温暖的气氛。人们几十年后还赞扬那次避静。就这些避静，总会长向福若瑟会长写道：“主教很努力地讲演和描述山东南界的传教工作，他要提高人们的传教兴趣。我们也非常支持他。他有一种神恩，就是他的话语是一个福源，他在这里的活动肯定会结出很好的果实。他在我们四个欧洲修院的避静也很受降福。他使更多的人关注和爱慕我们修会。”<sup>iii</sup>

---

i 见1907年8月19日的信。

ii 见1907年8月15日的信。

iii 见1907年10月26日的信。

主教偶尔也向总会长写报告，比如他写他参加了维尔茨堡的公教大聚会：“在维尔茨堡的日子很辛苦，因为人们带我去很多地方演讲。但是，会不会有具体结果，只有上主知道。我也不能做很多，在妇女传教协会那里做了一个演讲，也在内部的聚会中发表讲话。我的演讲不长，但人们很感谢我。主席接着说的话大概更有影响。不过，人们也会记得一点吧。我也能认识一些主教。班贝格（Bamberg）的总主教很赞赏我们的杂志《上主之城》。”<sup>i</sup>

关于去柏林政府的经历，他写道：“我昨天去见皇帝<sup>ii</sup>了，大约与他谈了半个小时。他在窗户边站着和我一个人谈话。他很和蔼，提到了各种各样的话题。我对他给予我们的保护和支 持表示感谢。后来他谈到中国的铁路建设以及人们对这种发展所怀的期望。接着他谈到胶州殖民地的未来发展和他在这方面的计划。他说他想保持中国发展的完整性（er wolle die Integrität Chinas bewahren），<sup>iii</sup>他希望，胶州可以给中国人树立一个好榜样。他说，我们教会也会因此受益。

“此后，他谈到山东的基本情况：气候、农业和庄稼、强盗的威胁、基督信仰的发展、中国人对基督信仰的态度，还有传教活动所遇到的困难。他说，基督信仰的不同团体<sup>iv</sup>应该彼此合作，特别是在国外。

---

i 见1907年8月28日的信。

ii 译者注：“皇帝”指威廉二世（Wilhelm II，1859—1941年），德意志帝国皇帝（1888—1918年），于1918年被迫退位。1890年后，德国上流阶层的部分人士有“成为世界强国的冲动”，而威廉皇帝没有阻止这些渴望，他发展德国的海军和陆军。这为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准备了条件，而威廉皇帝为德国的扩张政策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iii 译者注：德语Integrität指“完整性”，即国家领土的完整性。从历史背景看，德国人占领胶州时的一个目标是抗衡日本的势力。按照这种思想，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对中国有一定的益处。

iv 译者注：指公教和新教的不同团体。

“皇帝很开朗，经常笑，也很和蔼，在告别时他祝我一切顺利，还和我握手。他没有谈到任何特殊的问题，因而我也没能提到任何重要的事。

“今天晚上我去拜访比洛（B ü low）总理，并与他交谈了一个小时。他非常客气地接待了我，也问了我很多关于中国和日本的事，其中也提到了我们的福传事业。他也同样祝贺我们上主的祝福，也表达了他的合作意向和支持。他还说，他希望在华的德国大使能周到地关照我们。在这里也没有谈论其他的问题。总理先生还送我到前室，很客气地和我告别。”<sup>i</sup>

在文化部长那里，韩宁镐主教提出一个请求，即允许“玛利亚会”（Marianiten）——“玛利亚小弟兄会”（Kleine Gesellschaft Mariens）——在德国建立修院。部长说他会处理这个问题的。就同样的事，他也去拜见了布雷斯劳（Breslau）的科普（Kopp）枢机主教。因为枢机不能见他，韩宁镐主教只好给他写了一封信。枢机后来也说他会支持这个计划，写道：“我很遗憾当时没能见到您。当我后来去柏林时，我又获悉您已经不在这儿了。愿主的恩宠保佑您！科普枢机敬上。”<sup>ii</sup>

柏林的公教徒举行了一个大的传教聚会迎接韩宁镐主教的到来，而他通过一个充满热情的演讲唤起了很多人的传教热情。<sup>iii</sup>

这几个月，韩宁镐主教努力地进行传教活动。他不断地在许多教堂中讲道，同时利用每一个机会来赢得山东传教区的新恩人和支持者。

当然，他也回家待了几个星期，其间住在他家的老房子里。门登的人们也为“他们”的主教而感到自豪，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喜乐。

---

i 见1908年1月31日的信。

ii 见1908年3月1日的信。

iii 见*Germania*杂志1908年2月2日的附刊。

他们也很欣赏韩宁镐那种平易近人的性格。他用家乡方言和那些老朋友说话。门登的人们在火车站迎接他；当他在那里见到一个老朋友时，他叫他：“哎，老乔治，你也戴一顶大礼帽？”当群众拥戴他时，他笑着说：“你看，现在你们称我‘阁下’，而以前你们都说我是一个‘红毛小伙子’！”他也去看老提格斯师傅，对那位老铁匠说：“小狐狸，走开吧！”他见到很多亲朋好友，还和他们一起回忆过去的很多事。

1908年3月底，韩宁镐主教经由美国回到中国。他在美国也进行了几个月的宣传活动。关于这段经历他曾向他的外甥写道：“我们还去了美国很多地方，大概还需要等一个月才能离开旧金山。我今天没有工作，因为火车和电车工人罢工。工人切断了电缆，如果有人开了一辆车，其他的人就向它扔石头。

“美国是一个奇怪的国度，它给了我各式各样的印象，而我还不能作出一个总结性的判断。我一直与伯多禄在一起，和他去看了很多地方。我几乎每天给人讲道。虽然来望弥撒的人不是太多，但他们也捐了一些钱，是价值很高的美元。虽然目前的情况不太好，但我希望我可以赢得更多人心。他们一般都很友好。美国的神职人员非常好客，而我也结识了很多可爱的先生们，我不会忘记他们的。”<sup>i</sup>

在一封写给姐姐的信中，他写道：“我写这信时观望着船外的太平洋。当我眺望这无边无际的海面时，心中就浮现出家乡的景色，因而我也开始思念故乡了。虽然我不可以轻易地随从这些软弱的想法，我还是会经常回忆家乡的美好生活。我到过美国很多地方，我站在很多讲演台上演讲，也曾多次因害怕我不能继续讲下去而出冷汗。我们去的地方包

---

i 见1908年5月17日的信。

括纽约（New York）布鲁克林区（Brooklyn）、纽瓦克（Newark）、奥尔巴尼（Albany）、布法罗（Buffalo）、伊利（Erie）、克利夫兰（Cleveland）、托莱多（Toledo）、哥伦布（Columbus）、费拉德尔非亚（Philadelphia）、密尔沃基（Milwaukee）。在这所有的城市中我都讲过道。我在芝加哥（Chicago）停留了四个星期。我也尝试过用英语讲道和做演讲。虽然我的英语没有那么好，但我仍然能表达我的意思，而且人们也能理解我要说什么。”<sup>i</sup>

不过，这一切努力的成果仍然相当有限，所以主教不得不写道：“我虽然作了一次乞求旅行，但仍然不能募集够慕道班今年所需要的钱。结果是，今年能领洗的人将不会很多，比去年少。虽然我的传教士们有抱怨，但我不能给他们资助。”<sup>ii</sup>

关于他怎么回到中国来的经历，他给他的外甥写道：“我在8月14日到达了我要去的地方——兖州。我先到青岛，在那里停留两天，去看望了德国的特鲁佩（Truppel）指挥官和一些其他的官员。后来我去了济南一天，在那里坐中国式的轿子觐见中国的巡抚和省府的高级官员。接着来了一段与此相反的经历：坐车三天，走经由山区的路，忍受可怕的高温，还翻了车，并遭受了暴雨，而且还有桥被洪水破坏了。

“8月14日我终于进入兖州府了。人们来迎接我，派了一支马队、一些士兵和一支乐队，他们也送来一顶轿子接我。教堂和我们的房子布置得很漂亮。第二天我在教堂举行大弥撒并讲了一次道。

“当然，我不能休息，虽然我们这里的高温真让人难以忍受，连晚上

---

i 见1908年7月24日的信。

ii 见1909年1月9日的信。

也会出汗。不过，我回来了，感谢上主，而我也已经感到这是我的家。现在应该勇往直前，靠上主的恩佑！”<sup>i</sup>

是的，主教必须勇往直前，他不能休息。在第二封信中，他就写道：“自从我回到这里来，我没有休息。我马上去了青岛，待了三个星期，为了处理那里的事务。后来我去芝罘（烟台）祝圣了一个新的主教。然后我又去视察了我们传教区的西南地区（菏泽）。在那里我与新基督徒一起过了圣诞节和新年，我给几千人施洗，并举行了坚振圣事。那时我也回忆起，我去年与你们一起度过了这个美好的时光。

“如果一个人没有时间追想那些伤感多情的梦想，那才是最好的。我们这些伟大的节日内在的本质——人们在心中很恳切地体验到这些节日的本质——无论在哪里，都是一样的。虽然这是些穷困的新教友——他们以不老练的声音模仿我们的圣诞歌曲——但是他们也能感受到圣诞节的内在精神，感谢上主！

“圣诞节前的那天，我听了一整天的告解，圣诞节那天我亲自发送圣体，施行坚振圣事。在12月31日我走了八个小时的路，去拜访几个教友团体。回到兖州后，我又给中国司铎们讲了一个避静。就这样，我不断地工作。”<sup>ii</sup>

在那次的《年度报告》中，他向所有的新老恩人写道：“我回顾我的欧洲之旅，这令我感到兴奋不已；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些美好的经历！”

---

i 见1908年8月24日的信。

ii 见1909年1月21日的信。

我去了很多地方：德国、奥地利、北美洲。我在很多教堂和协会会所中演讲或讲道。无论到哪里我都发现：神职人员和一般教友几乎都对传教事业有浓厚的兴趣。每次讲演都有很多人来听，而且他们一再地表示对我们和我们工作的支持和鼓励。

“没错，我体验到了，我们传教士并不是孤独的人！公教的教友都支持我们，特别是工人和自己负重担的人。司铎们也启迪人民的传教精神，使信徒们爱戴和尊敬传教士，也尊重传教士的工作。教友们也很乐意地捐献挣来的钱，将一块一块的小硬币都给那些传教士——他们出去，将主的十字架带到外教人的世界中。

“我在欧洲有机会认识了传教事业的恩人，因此也很感动。他们是：善良的工人和守贞的女士，学生和劳工，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在教育界和社会上有杰出地位的先生和女士。我们的祖国是有福的，因为它这儿有那么多实际的公教精神。不认识主的国度也是有福的，因为很多人为他们作祈祷。那些有传教精神的人更是有福的。‘你们对我最小的兄弟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sup>i</sup> 这句话是耶稣说的，他的圣心充满热切的渴望，他渴望获得更多的灵魂，而他也将赏报每一个传播福音的人。<sup>ii</sup>

“我回到这里的经历让我甚感欣慰，因为中国官员很友好地接待了我。兖州的官员还派了一些士兵和另外几个人来迎接我；济宁的官员甚至亲自来到城外迎接我。这是很光荣的情景，与18年以前的经历大不一样！那时人们还向我们扔石头，将我们驱逐到城外。上主应受赞颂，他引导这

---

i 译者注：见《圣经·玛窦福音》Mt 25：45。

ii 译者注：见《圣经·玛窦福音》Mt 10：42。

些人的心思正如引导水流<sup>i</sup>一样。”<sup>ii</sup>

在1930年——22年后——韩宁镐主教才决定要进行第二次欧洲旅行，那时他已经是一位老人了。吉尔（Gier）总会长邀请他去欧洲，而他这样回信：“我揣摩您给我写的信，并听取了区长神父和其他神父的意见。依赖上主的名，我想回应您的邀请。如果没有重大阻碍的话，我也许会在下个月出发，依实际情况选择去西伯利亚或经由海洋路线。我这几天将会做一些准备。不过，我先必须祝圣四位中国执事，他们将要当司铎，其中也有我们修会首次接受的两位修道生。”<sup>iii</sup>

“就这次旅行而言，我公开承认，如果不是您的劝勉，我不会去。我曾想过要不要去罗马见主教们和圣座，但我总下不定决心去，因为都有一些麻烦，也不能保证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但是，您因修会和传教事业的缘故叫我去，所以我就说：看，我在这里！”<sup>iv</sup>我想这也正是上主的旨意吧。”<sup>v</sup>

他又通过西伯利亚回欧洲，又从欧洲经过美国回中国。这样，他第二次环游了整个地球。陪同他的人是柯德利（Keidel）<sup>vi</sup>神父。他们只在莫斯科停留了五个小时，转而从华沙直接赶赴罗马，4月中旬到达罗马。

---

i 译者注：见《圣经·箴言篇》Prv 21: 1：“君王的心在上主手里，有如水流，可随意转移。”

i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09年，第70页。

iii 译者注：这四位司铎是：陈百瑞、刘德雨、傅开鹏、张维笃，都于1930年3月16日晋铎。后两者是圣言会会士。

iv 译者注：见《旧约·依撒意亚》Is 6: 8。

v 见1930年3月4日的信。

vi 译者注：柯德利神父1898年生于德国柏林，1926年被祝圣司铎，同年来山东青岛，但因身体健康问题于1930年回德国。



韩宁镐主教在罗马待了两个星期。他本来对朝见教宗怀着很大的期望，但后来却感到相当失望。传信部的部长罗苏姆（van Rossum）枢机主教早对韩宁镐主教说过，他将会预先通知教宗，并将韩宁镐主教的传教报告提交给教宗。然而，他显然忘记这件事了，所以当教宗<sup>i</sup>见到这位年迈的传教主教时，他对于韩宁镐主教一点儿都不了解。教宗开始在他的书桌上找一些资料，找兖州教区的传教报告，但什么也没有找着。虽然教宗很和蔼地跟他说话，不过韩宁镐主教感到十分尴尬。他必须自己介绍自己，也告诉教宗一些关于他工作的情况。当他回到圣言会的会院时，他仍然有点儿沮丧。他叙述道：“当我见到教宗在这些书籍中寻找关于我的报告时，我就想，在教宗那里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正如发生在我的办公室里的一样。”

一到4月底，他就去了奥地利、德国与荷兰。关于这次旅行他留下了一些简短的报告。两个星期之后，他向总会长写信：“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做多少工作。在佛罗伦萨（Florenz）和米兰（Mailand）我没有停留几天。但是，我很高兴我参观了米兰外方传教会。这个传教会拥有一个非常好的传教学图书馆，里面的书涉及各种各样的内容和传教问题。我们的修会没有这样好的图书馆。在瑞士我去拜访了伊门塞（Immensee）的白冷传教会，还为那些青年做了一个小演讲。巴塞尔（Basel）的主教、弗赖堡（Freiburg）的主教和总主教都不在，他们出去施行坚振圣事了——真遗憾！

“在弗赖堡我拜访了克雷布斯（Krebs）教授。他充满喜乐，而且

---

i 译者注：即教宗比约十一世（Pius XI，任期1922—1939年）。

第二天带我去拜访了布赫霍尔茨 (Buchholz) 的本堂神父——他很支持传教工作。另外，我还去看望了芬克 (Finke) 教授，他是哥瑞斯协会 (Goerresgesellschaft)<sup>i</sup> 的主席，也是我们创始人的学生和韦格纳神父及艾肯博克 (Eikenbrock) 神父的同学。他请我和其他的人一起吃了晚餐。我也去看望了代理主教，他很友好。在此之外，我还去拜访了朔费尔蒙席 (Schofer)。当然，这些人都对传教和中国的情况表现出很强的兴趣。”<sup>ii</sup>

两个星期后，他继续写他的报告：“在罗滕堡 (Rottenburg) 我见到主教代理，他带我去小修院，在那里我给学生们做了一个演讲。在蒂宾根 (Tübingen) 我去拜访了施陶费尔博士 (Dr. Stauffer) 和卡尔·亚当 (Karl Adam) 教授，这是个美好的经历。

“在我们因戈尔施塔特 (Ingolstadt) 的修院中，我受到热烈的欢迎。艾克施泰特 (Eichstaett) 的老主教真是一个和蔼的人，他经常与我一起出去。在慕尼黑的卜尼法斯修院中，韦尔穆勒 (Woehrmueller) 院长 (他曾写过一本书叫《王子的诫命》) 和其他的神父都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在这里也认识了默林神父，他是一位有名的奥古斯丁专家。我去看望福尔哈贝尔 (Faulhaber) 枢机，他请客；我还见到了梵蒂冈的代表托雷格罗萨 (Torregrossa) 使节，他们俩后来也都来看望我。福尔哈贝尔枢机很客气；他去美国旅行时，曾在我们圣言会的特克尼 (Techny) 修院住过，他在那个会院有很美好的回忆。奥夫豪泽 (Aufhauser) 教授请我吃饭，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圣欧梯利亚修道院 (St. Ottilien) 的院长韦伯 (Weber) 和

---

i 译者注：该协会创立于1876年，在“文化斗争”中力图提出宗教信仰和公教传统的重要性。它是一个私立的学术协会并想以学术研究保持基督信仰的理想，进行研究和出版工作；1990年有3000名成员。

ii 见1930年5月14日的信。

格拉布曼 (Grabmann) 教授。晚上, 他想召集在大学上课的中国留学生过来, 但他们都没来; 只有三个印度人来了。”<sup>i</sup>

四个星期后, 他又从斯泰尔修院写信道: “这一个月以来, 我几乎没有一天是安静的。我从巴伐利亚去了西里西亚 (Silesia/Schlesien), 去看望了我们圣言会在那里的传教修院, 即圣十字架 (Heiligkreuz) 和雷欧布施茨 (Leobschütz) 的修院, 也拜访了枢机主教、主教和代理主教。我想陪同我的穆神父 (P. Marquardt)<sup>ii</sup>写一个报告。我的老朋友韦伯神父 (P. Joseph Weber) 还是照样思考很多问题, 安安静静地准备让自己进入永恒。老传教恩人尼切 (Nitsche) 女士见到我非常高兴, 她有一个乐于牺牲的灵魂。

“梅尔撒克 (Mehlsack) 城的圣阿达尔伯特 (St. Adalbert) 修院也是一个好地方。我很高兴, 因为弗饶恩堡 (Frauenburg) 的主教和神职人员都很同情传教中的问题。

“柏林外交部的文化局准备了宴席, 梵蒂冈的使节也在场。不过, 这里的主教也同样外出施行坚振了。我去看望了总理、中国的大使和一些其他的人。

后来我去了西部, 到德里堡 (Driburg) 的圣言会会院; 在帕德博恩 (Paderborn) 我了解到克莱因 (Klein) 总主教、主教和主教的代理都很慷慨地支持我们的传教工作。从斯泰尔那里, 我去看望了荷兰鲁尔蒙德 (Roermond) 的主教和亚琛 (Aachen) 的主教, 他们都关注传教事业,

---

i 见1930年5月28日的信。

ii 译者注: 穆神父 (Jacobus Marquardt), 1879年生于德国, 1912年被祝圣司铎, 1913年来华, 曾在曹县、即墨、高密等地传教, 1938年返回德国。

对此很感兴趣。”<sup>i</sup>

此后，韩宁镐主教也回到他自己的故乡。在那里他显得有点孤独，他青年时期的老朋友几乎都已去世。不过，他在他的外甥若瑟·巴特神父和若瑟的姐姐亚纳·巴特博士那里休息了几个星期；这是一段美好的、安静的且能够体味家乡气息的经历。

他很快就思考回远东的事了。他向总会长报告他的计划：“我刚刚从慕尼黑来到奥地利的圣佳伯尔修院，今天晚上将会开始讲避静。我还会停留几天，也许还能去看我们在斯洛伐克的修院。8月20日后我就要去德国的圣温德尔会院（St. Wendel），希望在那里能见到您。8月28日波恩圣奥古斯丁的圣堂将要祝圣。之后还有明斯特的公教日（Katholikentag）和亚琛的聚会。我希望我大约能于9月20日离开。”<sup>ii</sup>

这次要陪他的人是达麟干神父（Dahlenkamp），<sup>iii</sup>因为他也要回到中国去。最后，他去看望了科隆的枢机主教。“星期五我去见科隆的舒尔特（Schulte）枢机。我发现他像两个月前一样，非常和蔼、友好。他说我一定要再从中国回来一趟。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事。”<sup>iv</sup>

仅五天后，他就在轮船上给他在帕德博恩的外甥写告别信了。正如22年前，在字里行间一样能感到一些思乡的情绪：“我们的轮船已经驶进

---

i 见1930年6月24日的信。

ii 见1930年8月6日的信。

iii 译者注：达麟干（1883—1966年），德国人，1910年晋铎，1911年来华，曾在峰县、泗水、季家山、莒州、诸城、沂水、于家村、青岛传教。1930—1950年在青岛，1953年回德国。

iv 见1930年9月21日的信。

大海。你们的告别信都放在我舱里的桌子上。是的，你们说得对，我们不仅仅有血缘关系的连接，我们之间的纽带更多的是思想和信仰上的。我很高兴，因为你们在思想、言谈和行动上还是很简朴和直接的，你们没有受现代虚伪精神的控制。你们保存着我们家族的最美好的回忆和传统。我们的父母并不是很富有的，但是他们是很高尚、诚实、忠厚的，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信徒。有一次你们说，我们的父亲是一个‘有高尚风度’的人，我想，这个词完全符合他的人格，我特别怀念他。

“另外，我们当然是‘精神亲戚’，我们有那么多共同的兴趣，受过类似的教育，有共同的理念。而在最深的地方，在最决定性的层面上我们也是合一的——在我们的神圣宗教方面，在我们与上主的关系、恩典和恩爱那里，在他的圣教会和教会的利益方面。

“我也能感受你们的忧虑和痛苦，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收获，我希望对你们也是一种安慰。我们这些离开故乡的人就是这种命运，而在轮船上我特别清楚地感觉到，我们这些人会从超自然的角度、从永恒的角度来面对一切。因此，我希望，我在家乡的短暂居留能让我们所有的人上一个台阶——导向天堂的梯子上的台阶。<sup>i</sup>

“我们船上有三位主教，很多司铎和修女以及很多公教信徒。这里也有很漂亮的祭坛和圣物。每天从6点到8点都有弥撒，而今天——星期天——甚至有大弥撒。乘坐这艘船真是一段很好的经历。这几天我所处的环境是完全平静的。外面的世界远远地在视野之外，无际大海的波涛都会深深影响一个人的灵魂和内心。这样可以更深地理解‘永恒的大海’这典

---

<sup>i</sup> 见1930年9月26日的信。

故是什么意思。”<sup>i</sup>

韩宁镐主教还去了美国，他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努力寻求传教事业的资助。他从那里向总会长神父写信道：“我旅行的第二个阶段很快就要结束了。我必须诚心地感谢上主，他这几个月时时处处保护了我。同时，我也必须感谢您和修会，因为修会在各地为我铺平道路。无论我去哪里，我们的人都很客气地接待我，都给予我弟兄般的协助。

“在上主的照顾下，我们的修会成长起来，已经成为一棵大树，而来自遥远地方的飞鸟也能栖息在这棵树的枝条上。”<sup>ii</sup>愿上主报答一切东道主们的无私协助。

“我在美国还去了很多地方。收获不是特别大，但通过兄弟们的协助，我获得了几千美元。现在的经济不景气，美国也是一样。

“在明德莱因（Mündelein）枢机主教那里，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中国留学生的的问题。在美国有几千名中国留学生，而他们经常在那些没有信仰的大学受教育。枢机主教想，如果他在芝加哥能建立一所公教大学，一切都将会变好，但这个项目目前还没有眉目。”<sup>iii</sup>

圣诞节后两天，主教到达他的主教府兖州。教区《通讯》上的报告写道：“对主教的迎接非常隆重。修道生、学生和基督徒们手拿旗子在火车站迎接了主教，还陪同他到主教府那里。他进入城市的过程好像是一次凯

---

i 见1930年9月28日的信。

ii 译者注：见《圣经·马尔谷福音》Mk 4: 32。耶稣用大树的比喻来说明天国。这样来看，韩宁镐主教暗示修会的团体是天国的萌芽，同时也将自己说成一只“远方来的飞鸟”。

iii 见1930年11月18日的信。

旋游行。他发给每一个传教士一支钢笔。”<sup>i</sup>

一位传教士报告道：“他刚回来不到一个小时，就开始发放那些质量很好的钢笔——有一百多支（大概有一个美国人送给他这些钢笔作为礼物）。我们很惊喜，也很感激，而他像一个小孩那样高兴。他也开始叙述旅行中一些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因为他的重听而发生的。”

主教向总会长写道：“我还是很高兴回到这里，因为这里是我的老家，这里有我的好会士。在这里我找到了那种真正的‘家乡感’，而在这次漫长的旅途中我始终没有找到它，虽然我受到了那么多关爱。”<sup>ii</sup>

他在《年度报告》中还告诉他的恩人：“我安全地回来了。当我从上海坐火车到兖州府时，自从进入我们的传教区，在每一个站都有我们的传教士和信徒，他们热烈地迎接我。每次我问他们：‘你们怎样呢？社会平安吗？’他们的回答并不都是令人感到安慰的：‘这里有很多强盗；几个村子被烧毁；有的信徒团体没有人；去旅行很危险！’

“南部几个县都是这样的，因为那儿近几年里都有强盗。但是，在北边的地区比较安定。最后我还可以说，我们的传教地区一般还比较平安；几乎所有的传教士都能够安全地施行他们的牧灵和传教工作。”<sup>iii</sup>

---

i 《戴家庄区通讯》（*Mitteilungen für die Region Taikiachuang*），Nr. 8, Dec. 1930年，第174页。

ii 见1931年2月3日的信。

ii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32年，第61页。从南往北的主要火车站是：韩庄、沙沟、薛城（当时称“临城”）、官桥、滕县、邹城。教会在这些地方都有传教点和外国传教士。

## 第九节 喜乐的时日

年老的人们可以享受各种周年日的庆祝活动或回忆过去的事。韩宁镐主教也有这样喜乐的日子，当然一个传教士也会遇到别的快乐。尽管他的生活方式不那么优雅，尽管他必须牺牲很多，又面临穷困、劳累和失望，但上主总会给予他赏报的，这个赏报便是喜乐。他给他的仆人们展示了永远的喜乐，他也在现实生活中给予了他们很多可贵的、真实的喜乐——连最富有的人都没有这么大的喜乐。

有时候，传教士会有一些有成就的日子，比如当他组织了一个新的教友团体，或当他建成一所小教堂或祝圣一所教堂时，或当他建立一个圣体柜时，施洗一些新信徒、施行坚振、头次开圣体、举行信徒的婚礼、祝圣本地的司铎等，这一切都是传教工作的成熟果实。这些日子带来的喜乐超过传教士所付出的劳苦。另外，一位传教士始终会意识到，他奉献自己的力量和生命是为达成一个有永恒价值的目的。传教士知道，耶稣基督的诺言首先是对他说的：“谁若因我的名放弃一切，将会得到百倍的赏报，并在来世获得永生。”<sup>i</sup>

这些经验，这种职业的稳定的财富，这种伟大的许诺和希望，都是传教士内心平安和喜乐的源泉。每一个真正的传教士都能从中汲取力量。

---

<sup>i</sup> 译者注：见《圣经·马尔谷福音》Mk 10: 30。



圣保禄早就说过：“在苦难中，我充满了喜乐。”<sup>i</sup> 圣方济各·沙勿略曾说：“主，不要在这个世界上给我那么多安慰！”韩宁镐主教经常说：“一位快乐的传教士一般也是一位好的传教士。”这些喜乐让每一位传教士珍惜他的职业和身份，那些快乐的经验也不断使他鼓起勇气，使他更加努力。韩宁镐主教也体验到这些喜乐。在上主的葡萄园工作的人们会遇到很多荆棘和困境，这些喜乐是传教士的赏报，喜乐的日子正如高山一样，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平原”。

1907年1月是韩宁镐任主教的第三个年头，也是他的传教区创立25年的纪念日。圣言会的总会长扬森神父告诉主教，他在罗马请圣座向传教士的长上发出一封祝贺信。韩宁镐主教回信说：“我诚心感谢您在罗马想办法纪念我们的庆节。福若瑟神父大概不想要这一种‘奖励’，我也不要——‘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sup>ii</sup> 如果我们在天上的仁慈大父不称我为‘恶仆’，<sup>iii</sup> 我就很满意了。但是，如果圣座要祝贺整个传教区，我会很高兴，因为我的传教士们会很高兴的。为此，我感谢您。

“我自己对这个纪念日的庆祝活动是视察旅行。我去了诸城——法来维神父在那里。我在诸城聚集了10个神父。我用汉语讲了一次道理，举行了大弥撒，接着我朝拜圣体，直到晚上。在同样的日子里，兖州有160个新信徒领洗，他们举行了一个持续了13个小时的祈祷。我们那天也特别地想念您，会长神父。”<sup>iv</sup>

---

i 译者注：见《圣经·格林多后书》2 Cor 7: 4。

ii 译者注：见《圣经·路加福音》Lk 17: 10。

iii 译者注：见《圣经·玛窦福音》Mt 18: 32。

iv 见1907年2月13日的信。

1909年11月5日，尼克劳斯·布卢姆被选为圣言会的新总会长。韩宁镐主教以前是这位总会长的同学，因此也认识他。他寄给他一张贺卡说：“我们感谢上主并祝贺你，因为你是新的总会长，是上主选定的领导者。愿上主降福你的工作并协助你保存和发展我们创立的事业。我们明天将会举行一台大弥撒，我们将求三位一体的上主降福我们的修会和新会长，支持他，给予他光明和力量。你大概也明白你的任务，因为你已经当管理者一年了；十字架虽然一开始看起来很巨大，但你后来还是能往前走的。慈善的上主协助我们。如果有时候一个人感到有某种挫折感，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这是为了不让我们太骄傲了。因此，祝你时时处处有上主的降福！请你在内心关怀传教区！这是我们修会的主要任务！”<sup>i</sup>

1910年1月30日是韩宁镐主教司铎银庆的日子。在传教区以内，这种节日不会太隆重，但从欧洲寄来了很多贺卡。新的总会长也写了一张贺卡，还送给山东传教区2万马克。韩宁镐主教回答道：“我很衷心地感谢你，因为你给了我们传教区2万马克，另外你也取消了我们尚未付清的老账。我恰巧在25年银庆的日子收到了你的信，这封信也令我感到更高兴。当然，这钱不是为我自己的，但是，如果我们的传教区好，我个人也会好。愿上主帮助我们好好地利用这笔钱。这是我们的难题和我们的重大责任。

“我们很隆重地庆祝了我晋铎的日子。我敬爱的邻居，方济各会的申永福蒙席 (Msgr. Giesen)<sup>ii</sup>也来了，领事馆也派来一个代表，中国的官员也都来了，他们都很热心。我们的信徒捐了钱和物品。另外，罗马和柏林

---

i 见1909年11月6日的信。

ii 译者注：申永福（1868—1919年），荷兰人，方济各会传教士，1894年来华，1902—1919年任济南（山东北界）主教。

[梯尔皮茨 (Tirpitz)] 也寄来一些电报。”<sup>i</sup>

尼克劳斯·布卢姆的接班人威廉·吉尔 (Wilhelm Gier) 于1920年9月29日被选为新的总会长。韩宁镐主教向新的总会长写信道：“我今天早上收到了电报，获知您是我们的新总会长。我马上举行弥撒，祈求上主协助您。我也送上我最诚恳的祝福。愿上主的圣神以他的恩典和安慰协助您，愿他成为您的光明和力量，愿您的任期成为一个福源。您的十字架肯定不轻，但是上主会帮助您的。”<sup>ii</sup>

从1922年8月到1923年2月底，新的总会长去视察山东南界的传教区。这是第一次有一位总会长亲自来华，人们也非常欢迎他。韩宁镐主教在视察结束时向斯泰尔的代理人写道：“尊敬的总会长给我们讲避静，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有长久的益处。愿仁慈的上主报答他的辛苦和忧虑。进行这样的视察绝对不容易；我深信，这次视察对传教区而言是一种福气。”<sup>iii</sup>

1926年夏天，即7月31日，韩宁镐主教回顾自己40年的传教生涯。总会长向他表示祝贺，还给他一些资助，他回答他说：“我这40年的传教工作只能归功于上主的仁慈和他的宽恕慈爱，因为他的恩惠始终引导着我。上主的仁爱会陪伴我一生！”<sup>iv</sup>

为了纪念韩宁镐传教40年的庆节，著名的传教学家若瑟·施米德林

---

i 见1910年6月21日的信。

ii 见1920年10月4日的信。

iii 见1923年2月1日的信

iv 见1926年7月20日的信。

教授在《科隆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说到：“在外邦传教和牧灵工作之余，在很多教堂和传教点之外，韩宁镐主教——这位具有远见和现代思想的牧者，也建立了一些文化机构，这些间接传教机构在中国几乎比直接的传教工作更重要；韩宁镐主教在很多方面支持这些文化机构，并很完美地建设它们：在教育方面，他创办了大修院和小修院——它们在他的指导下培养杰出的本地神职人员；还有修道生初学和修女们的初学、男女师范学校、男女传教员学校，一所男子学院和一所女子学院；在此之外还有一系列初中和高中、小学、经学班<sup>i</sup>和冬季学校；为了印刷书籍他办了一所印刷厂<sup>ii</sup>（它每年都会扩展一点），他自己有许多著作，印刷厂也印刷传教士的学术研究成果；在慈善工作方面，他建了八所孤儿院、两所老人院、两所医院和十一所穷人诊所，还提供门诊服务。山东南界的政府官员多次听取主教的想法并请他作一个谈判者；<sup>iii</sup>另外，他也参加了上海（1924年）的全国主教会议，并被委托撰写主教团的共同牧函。”<sup>iv</sup>

1929年10月30日是他当主教25周年的纪念日，也是主教一辈子最高兴的日子。在这个日子显示出了人们对主教的敬佩及爱戴。来兖州的人中有四位主教、一百多名司铎、圣言会总会长的视察者科斯特神父（Th. Kost）、兖州市长以及其他的高级官员，同时还有德国使馆的代表。在兖州大堂举行弥撒时，人们宣读教宗亲自写的祝贺信；韩宁镐主教几乎收到了来自全世界的贺卡，德国的明斯特大学还颁发了一个荣誉博士学

---

i 译者注：“经学班”是一些学习祈祷文和经文的简单学校。

ii 译者注：即兖州的“圣保禄印书馆”。

iii 译者注：韩宁镐主教在德国政府和本地官员中间起了一个桥梁作用。

iv KV（《科隆人民报》），1926年7月31日。

位给他。

他们在一个帐篷里举行宴会——中国人用一些草席搭起这个帐篷。在这个帐篷里韩宁镐主教接受了兖州各个协会代表的奖章和幅条、礼品、匾额及贺辞。声音越大，荣誉也就越大！连兖州的回民也送给他一块漂亮的荣誉匾。

最让韩宁镐主教感动的是基督徒对他的爱戴。他们有一个由30人组成的乐队：为了参与这个节日，东明县的老师、传教员和学生用五天的时间步行了200公里。这些基督徒都相当穷，但他们送给主教4400马克、三面很大很漂亮的绣花的教会旗、主教帽和弥撒经本。主教府的中国仆人提供了两只公羊，这也是一份很特殊的礼物。

最后，韩宁镐主教感谢人们，他用德语、拉丁语及汉语发言。他向他所爱的中国人说：“我旁边的老神父——总会长的视察者神父——请我再次去拜访欧洲，但我最大的忧虑是，这样我也许不能死在中国，不能埋在中国的国土上了。”中国人听到这句话后非常激动！他后来接着说他深爱着中国和中国人，他祝中国安定和万岁，他这次演讲又一次赢得了中国人的爱戴和欢心。<sup>i</sup>

后来他在《年度报告》里感谢远在欧洲的朋友们：“我也知道，你们这样的赞美和关心并不是对我自己的支持，而是对传教理想，对伟大、神圣的传教理想的支持，而一个传教区的主教只是这个理想的代表。你们的祝贺也是祝贺整个传教事业，在这几十年里你们中有那么多朋友和恩人通过祈祷和奉献建立了这个传教区。你们的祝贺也是对这些努力的传教士们的祝贺和鼓励——他们心甘情愿地作了牺牲，他们奉献他们的劳动、他们

---

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30年，第119—121页。

的力量，甚至交出他们的生命。这样，我才敢接受你们从许多地方寄给我的祝贺和礼品。‘上主，光荣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只愿意光荣完全归于你的圣名。’<sup>i</sup>

“传教工作在于人的努力，但它更多的是上主的行动和上主的工作：‘保禄播种，然而使之生长的是上主。’<sup>ii</sup>当我回顾这25年时，我也有这样的感想。”<sup>iii</sup>

在他进入斯泰尔修院50周年的那一天，即1929年11月11日，韩宁镛主教又收到很多贺信。关于这个节日，他给总会长写信道：“我认为，我50年前能够进入圣言会是上主赐给我的最大恩典。我这几天多次感觉到，我们修道人家庭般的关系是一个共同的纽带。那么多人向我表示出兄弟般的关爱、同情，还提供了祈祷方面的协助和物质上的资助。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愿上主赏报修会这一切；修会为我们和传教区做了太多！愿上主使我们成为更好的工具，让我们为主和在世的灵魂们服务！”<sup>iv</sup>

1932年1月18日是建立山东南界传教区50周年的纪念日。然而，他们仅仅是在小范围内庆祝了这个节日，并且是与文安多神父（P. Anton Wewel）的晋铎金庆一起庆祝的。<sup>v</sup>

教宗秘书帕切利（Pacelli）建议教宗比约十一世颁发给韩宁镛主教“宗座副祭”（Paepstlicher Thronassistent）的荣誉称号；这个荣誉也意

---

i 译者注：《圣经·圣咏》Ps 115：2。

ii 译者注：《格林多前书》1 Kor 3：6。

ii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30年，第67页。

iv 见1929年11月9日的信。

v 译者注：文安多（1857—1938年），德国人，于1882年来华，比韩宁镛神父还早。

味着，韩主教成了罗马贵族。教宗的信这样结束：“我们也充分地理解神圣传教区的服务的艰苦和成就。我们通过这个机会向你和你的传教修会表示敬意。因此，我们决定要接纳你成为我们圣座副祭的一员。”<sup>i</sup>

慕尼黑的“德国科学院”也利用这个机会提名韩宁镐主教为他们的荣誉成员。

吉尔总会长首先祝贺韩宁镐主教获得教宗的荣誉，韩主教这样回信：“这样的荣誉在我的心中引起一些矛盾的感受。我几乎担心我的永生，因为上主现在就用这样的黄金纸（Goldflitter）挂在可怜的肉体上，但他所喜爱的人经常会受到折磨和灾难。但这是上主的意思。不过，这一切荣誉也没有多大的意思，因为我一生的黄昏临近了。不过，我还是感谢您和所有为这事操心的人——你们这样地支持我。”<sup>ii</sup>

1931年秋天举行的教区会议也是喜乐和安慰的日子。韩宁镐自己说，这个会议是教区创立50周年的礼物。他在1932—1933年的《年度报告》中写道：“我们的教区会议也是上主给予的礼物。我们为这个会议作了长期准备并在去年9月举行了它……众多传教士用10天的时间一起讨论了很多问题。在内心的祈祷和努力工作的精神中我们能够讨论所有与传教工作有关的问题，同时我们也改写了《手册》——我们传教活动的准绳。这份工作在我们看来是一份贺礼，是传教士们给传教区的礼物，是将来工作的福源，我希望在书中写下的决定、规律、劝告和指导原则受到圣神的激励，

---

i 见1931年12月2日的教宗书信。

ii 见1931年12月23日信。

而传教士们将会实现它们。”<sup>i</sup>

在这些以外还有纪念日！韩宁镐主教还能活到他金庆晋铎典礼和传教礼的时候。1935年5月30日是他晋铎五十周年纪念日。那次来了七位主教，中国的官员们也再次积极地参与了这个庆节。教宗又写了一封信，而德国的老皇帝也从荷兰的杜尔恩（Doorn）<sup>ii</sup>发来一封贺信。

韩宁镐主教向他的总会长格兰德尔写信说：“您的祝贺信，我在庆日的前夕从潘院长神父（P. Rektor Pley）<sup>iii</sup>的手中收到了。我可以说，您的信深深感动了我，这也是喜庆的最大喜乐之一。我感谢您，而仅仅能重复我们司铎在每一台弥撒所说的话：‘主，我当不起！’<sup>iv</sup>”<sup>v</sup>

在下一个《年度报告》中，他感谢全世界的朋友和恩人，他这样写道：“在我的五十年金庆后我没有向你们表示谢意，所以现在必须感谢大家！我这几天又感到了这传教生活中多次体验到的情况：上主，仁慈的天主，很周到地照顾他葡萄园中的仆人，他很慷慨地报答他们那些微不足道的牺牲，即传教士们为了主的缘故离开家乡的牺牲。我体会到，上主的爱让很多人——无论在附近或遥远的地方——对我们有关怀；这些人挂念

---

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33年，第142页。译者注：韩宁镐主教在1904年后曾写过一本这样的拉丁语的《手册》（*Manuale in usum Missionarium*）。这本《手册》详细地规定传教士们的生活、他们的待人接物、传教方式和具体的问题。比如，它规定，外国传教士不可以允许华人向他跪拜，传教士与妇女必须保持一米的距离等。这种《手册》对理解当时的传教情况具有很大的研究参考价值。

ii 译者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死于1941年）于1918年被迫退位并在荷兰隐居。

iii 译者注：Pley神父，1882生于德国，1908年来华，从1929年起任兖州院长，1951年被驱逐出境，1953年死在德国。

iv 译者注：见《玛窦福音》Mt 8：8。

v 见1935年6月5日的信。



我们，也很同情我们的命运。我从世界各地收到了祝贺信和礼品。我求仁慈的上主——他是一切真爱、一切美善和高尚的根源——愿他报答一切恩人！”<sup>i</sup>

1936年7月31日那天是他完成了在传教区工作50年的时日，他对总会长仅仅说道：“昨天是我来到传教区的50周年纪念日。我必须感谢仁慈的上主，因为他时时帮助我，始终对我很大方，宽容我的不足。同时，我也必须求他赦免我的一切过错和失误。愿仁慈的上主在审判的日子也宽待他可怜的仆人吧！”<sup>ii</sup>

在1936年夏天，宗座代表蔡宁蒙席 (Msgr. Zanin)<sup>iii</sup>来视察山东各地的传教工作。他两次来兖州府，从他的表现能看出，他多么重视韩宁镐主教。在一次主日道理中他说，他特别高兴地看到，兖州地区的教会与世俗权威有很好的关系。宗座代表在这台弥撒后还有一场宴席，参与宴席的人中也有孔子第77代后裔、县长、公安局局长和当地的军官。在宴席开始前和结束后，军队的乐队演奏了欧洲的进行曲。<sup>iv</sup>

这样，老主教得到很多荣誉。另一位老传教士——老斐好思修士 (Br. Ambrosius Vierhaus)<sup>v</sup>有一次很诚恳地说：“韩宁镐主教真的很谦虚，不然他会变成一个很骄傲的人。”

---

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36年，第141页。

ii 见1936年8月1日的信。

iii 译者注：蔡宁 (Mario Zanin, 1899—1958年)，意大利人，1934—1946年任宗座驻华代表。

iv *Mitteilungen für die Region Taikiachuang*，第8期，1939年，第176页。

v 译者注：斐好思，1858年生于德国，1887年来华，1900年后一直在戴家庄工作，1934年在戴家庄去世。

然而，上主保护韩宁镐主教，没有使他成为一个骄傲的人，因为他也送给他很多忧虑和痛苦。

## 第十节 苦路

每一位真正的传教士都在心中有一道伤痕，而这道伤痕会疼痛一辈子：这是因他时时处处看到外教旧文化而的疼痛。广大的民众曾经根本就不认识他们的真神，他们的天父，也不认识他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这是传教士内心的痛苦。他认为，这种情况意味着上主的光荣在遭受极大的损失，而对灵魂们来说这是一种无可言说的灾难。

韩宁镐主教有一次写道：“在传教地区始终有某种降临期的感觉，因为：‘看啊！黑暗笼罩着大地，阴云遮蔽着万民。’<sup>i</sup>传教士意识到黎明快要到来了，因而他盼望着曙光……我希望，以后依撒意亚先知说的话也能在我们这儿应验：‘但上主却照耀着你，他的荣耀要彰显在你的身上。’<sup>ii</sup> <sup>iii</sup>

1912和1913年间，很多地方举行了“君士坦丁庆节”（Konstantinfeier），<sup>iv</sup>韩宁镐主教就这个机会写道：“中国的君士坦丁尚未出现。人们还必须有更多的祈祷、牺牲、奉献和工作，通过这一切才能松动土地、消除阻碍并获得上主的恩宠，直到十字架的生命树也在这个地区发芽，使

---

i 译者注：见《圣经·依撒意亚》Is 60: 2。

ii 译者注：见《圣经·依撒意亚》Is 60: 2。

ii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20年，第139页。

iv 译者注：即纪念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颁布容忍基督徒的《米兰敕令》（313年）。

这个国家的数万万人能聚集在十字架的护佑下。我们会坚持不懈地向这个目标迈进。”<sup>i</sup>

我们在此不想提到这些传教士共同的十字架，因为这是属于他们职业的，但是，每一位传教地区有自己的特殊困难，而中国的传教区还有特别多的困扰：伤寒症、极度的穷困、洪水、旱灾、缺乏粮食、饥荒、可怕的炎热气候、革命和内战——这些灾难曾多次严重地危害中国。关于这些灾难，韩宁镐主教有一次写道：“我们在中国生活的人好像住在维苏威火山（Vesuv）<sup>ii</sup>的山坡下，我们都没有安全感。也许青蓝的天空让我们一时感到高兴，但在我们的脚底下同时可能有一座火山在预备灾祸和毁灭。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好的，这样，传教事业才真正是上主恩佑的结果，让我们完全依赖于他。这样，我们为了每一个好日子感谢上主，将我们及我们工作的前途完全托付给他的仁慈。”<sup>iii</sup>

这的确是真正基督信仰的态度，而对灵魂来说，这种态度是一种力量。但是，当那些严重的灾难真的来临时，每一位传教士的心都会流血，都会疼痛得哭泣，因为传教士很孤独，所以他们遭受的打击更严重。韩宁镐主教也同样经历了很多考验，他也曾吃过很多苦。

上面刚刚提到，中国的第一大灾难是伤寒症。这个流行病夺走了非常多的传教士及传教修女的生命。1907—1908年是山东南界遭受伤寒症打击最严重的时期，那时有三位司铎、两位辅理修士和四位修女因此而去世。主教曾写过这样的报告：“伤寒症侵袭了我们的中心兖州府。这几个

---

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14年，第61页。

ii 译者注：维苏威火山位于意大利的西南部，是欧洲唯一的活火山。

ii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11年，第56页。

月，孤儿院和女传教员学校的房子都变成医院，始终有二三十个妇女患病卧床。很多德国的修女和司铎也染上了疾病。当这种致命的疾病威胁着住在外教民族的人们，这真是一个令人难受的境况。我们很少获得医生的协助，也很少获得良好的治疗，而那几个自己也感到他们同样染上了疾病的传教士还必须抬起头来协助别人。修女们在这些悲痛的日子里以英雄式的牺牲精神去完成她们的任务。12位修女中有3位去世了，其中有我们能干的药品专家利伯亚（Liboria）<sup>i</sup>修女以及这个小团体的第一个院长——多罗若萨（Dolorosa）<sup>ii</sup>修女。

“伤寒症最后给我们造成了最大的牺牲，因为伤寒症夺取了那位最重要的人，就是我们最可爱的、永远被垂念的福若瑟神父的生命。他去世以后，伤寒症再也没有伤害任何人。”

在斯泰尔修会的创始人扬森神父告诉韩宁镛主教福若瑟神父去世的消息时，韩主教正在欧洲。扬森神父这样写道：“上主给了我们很大的考验。我必须向您报告一个很悲伤的消息，也求上主安慰您。昨天晚上，您刚走不久，我们从中国收到了一封电报：‘福若瑟神父去世了，伤寒症，1908年1月28日。’福若瑟神父，那位善良、热心、作出了那么多牺牲的福神父，他始终是所有人的榜样，然而他也因伤寒症去世了。我本来要写‘他不再生活在人间’，但我应该写：‘他从朝圣和泪谷的地方进入了永生的世界，加入了天上圣人安逸和喜乐的队伍。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

---

i 译者注：利伯亚（Liboria Antonia Ruhrt, 1876—1907年），德国人，1876年生于德国Dortmund，1901年入圣神会，学习药物学和医学，1906年夏天来华，在兖州的药店工作，1907年12月5日因病去世。

ii 译者注：多罗若萨（Dolorosa Luise Schottenroehr, 1875—1907年），德国人，1875年生于德国Paderborn，1897年入圣神会，1905年率领第一批修女到山东，在兖州当院长，1907年12月27日逝世。

们还是要为他祈祷……我们应该想：他是进入天堂的成熟果实，而他将成为传教事业的代祷者，也是我们修会的代祷者。因此，我们应该有所安慰，我们应该接受上主的安排，不可反抗他的手。”<sup>i</sup>

主教这样回答：“我刚刚收到了您的信。愿上主的旨意奉行！我不想抱怨，尽管我的心很痛，这个人的去世对我来说比最亲爱的哥哥或弟弟去世更让人难受。”

“最让我难过的一点是，福神父的死亡对我们传教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已故的韩理神父有一次说过，福若瑟神父是‘传教区的母亲’。他与传教区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几乎所有的地方团体都感受到了他充满恩宠的行动。他是忠实的、像黄金一般高尚的，他是仁慈的、充满博爱的，他是我们一切人的榜样，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和指导，他无私地交出了自己，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私利，始终注意着上主的光荣、灵魂们的好处和众人的公共利益。我们在华的兄弟们会很悲痛，我们的中国信徒也会哀悼他！因为他获得了所有人的信任和新信徒的爱戴。我自己现在也损失了最忠诚的支柱、最好的朋友和顾问、最虔诚的祈祷者……这个损失几乎无法弥补。我们在很多方面会感到他不在场，这将是一个损失。”

“请您也让会士们为福神父祈祷，他应该获得这些祈祷。他的生命全都交给了传教事业和我们的修会。他作的牺牲超过所有人的牺牲。我们的修会和传教区在很多方面都必须感谢他。我必须早一些回到中国去。可怜的孩子！他们正处于何等的困境和悲痛之中！”<sup>ii</sup>

---

i 见1908年1月29日的信。

ii 来自柏林的信，1908年1月31日。

主教向传教区的恩人和朋友们传报福若瑟神父逝世的消息，在这封信中他也表示，这位亡者对他来说是多么宝贵的人。他写道：“我们传教区的朋友们早就听说过福若瑟神父。他的生活、他完成的工作、他美德的光芒，这些都是一座座纪念碑，超过人手制造的纪念碑，他的名誉跨越各种界限。

“他是斯泰尔传教修院前两位传教士之一，也是山东南界传教区的奠基人之一。他从一开始就分担了一切痛苦和忧虑。通过他的热忱，他创立了很多信徒团体，还有其他的团体因他的关爱而成长。在最艰难的时期，他是主教的代理人，是教区的管理人，也当会长和主教的主要顾问。他的司铎灵修（priesterliche Froemdigkeit），他的高尚无私的精神，他的传教热忱，这一切还被他和蔼的性格及精神修养所净化和升华，所以他是一位真正为理想而传教的传教士。

“‘义人必要受到永远的纪念！’<sup>i</sup>对他来说，山东的人会永远纪念他。他的墓碑在我们戴家庄苦路的第十二处下面，真是一个美好的、安静的地方，而这块墓地对我们的司铎和新信徒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尊敬和爱慕的地方。愿上主赐给他永远的安息！他为这个传教区如此努力，曾受过那么多苦。愿他在天上做一个强有力的代祷者，为这个传教区求福！”<sup>ii</sup>

我们上面已经提到，韩宁镐主教自己也推动了福若瑟神父在罗马册封真福的过程。<sup>iii</sup>

在福若瑟神父去世一周年之际，1909年1月15日，圣言会哀悼了创始人

---

i 译者注：见《圣经·圣咏》Ps 112: 6。

i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09年，第171页。

iii 译者注：福若瑟神父于1975年被册封为“真福”，2003年被宣布为“圣人”。

和总会长阿诺尔德·扬森神父的逝世。韩宁镐主教一直很尊敬他，如待父亲般爱戴他，因此，这个消息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打击。当人们告诉他总会长病情严重时，他这样回答总会长代表尼克劳斯·布卢姆神父的信：“这样我更高兴我去了欧洲，因为我有幸与他说话，从他那里获得了一些很好的鼓励。”<sup>i</sup>

听到总会长去世的消息后，他写道：“前天我们收到了你的电报。这个损失将会影响整个修会。我那时刚刚给中国司铎们举行了一个避静，我们马上为这位可敬的亡者作了祈祷并举行了弥撒。我今天早上还要举行隆重的追思弥撒。我请所有的人一起为他祈祷，也要通过一份通讯牧函要求外面的信徒做祈祷。我们都是那位父亲的子女和子孙。”<sup>ii</sup>

“现在你是我们修会的指导者和代表，我请你理解我的悲痛，也接受我的谢意，因为你为这位亡者做了很多事情。你曾站在他的床边，陪同他走完了最后的路程，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誉，你以他所有孩子的名义给予了他关爱和陪伴。

“愿上主仁慈的天主帮助你和其他人一起指导我们的修会，继续培养和发展我们已亡总会长留下的宝贵遗产。愿他那种完全信赖上主的精神、深切的信仰、虔诚的态度和那种充满智慧的传教热忱（erleuchteter Seeleneifer）也进入你们——特别是你——的心。愿修会在你的忠诚照顾下继续成长……”

“我在这封信中没有说‘您’，只说‘你’，因为我们的关系比较

---

i 见1909年1月9日的信。

ii 译者注：这里的“父亲”不指上主，而指圣言会创始人扬森神父，他被称为“父亲和奠基人”，所以韩宁镐主教说，我们（传教士）是他的子女，而（山东南界的）信徒是他的“孙辈”。



近。你不会在意吧。”<sup>i</sup>

韩宁镐主教还给他的外甥巴特教授写了一封信说：“上主召回了我们的总会长扬森神父。他曾向我写过一封告别信，只有一位圣人、一位有和父亲一样的关怀的人才会写出这样的信。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符合上主的旨意。<sup>ii</sup>人能安然地面对死亡真是一件美好的事！”<sup>iii</sup>

卢国祥神父的死亡对韩宁镐主教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位司铎突然于1909年7月24日因中暑而去世。主教这样回忆他：“卢神父仅仅48岁，很健康和强壮。我们本来想他还能工作很长的时间。在旅途上，他成了酷热夏天的牺牲品。他孤独地死在一家小餐馆，有一位边哭边祈祷的传教先生照顾他。‘我们在生活中突然遇到了死亡！’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重重的提醒，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卢神父是山东南界最能干的传教士之一，他有丰富的传教经验，也以工作为乐，他是一位忠信的同工和可靠的顾问。我想他的死亡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因为他曾是我们传教区的‘传教作家’，而因此也成了我们的‘养父’。<sup>iv</sup>这样，很多人认识卢神父，他为传教区、中国人和自己赢得了很多的朋友和恩人。上主仁慈的天主赐给他‘笔墨之神恩’，而他很忠诚地利用了这个神恩。他写过许多文章，其中那本杰出的《杂草、萌

---

i 见1909年1月18日的信。

ii 译者注：“上主的圣心”指“上主的圣意”，就是说，扬森神父的生活符合上主的神圣旨意。

iii 见1909年1月22日的信。

iv 译者注：意思是说，他通过他的著作能使德国恩人捐钱，而因此给传教士们提供“面包”。

芽和花朵》和最近出版的《新的花朵》<sup>i</sup>——这是他的第二本书——是非常杰出的著作，在有关中国的书籍中拥有独特的地位。一位在《远东杂志》（*Ostasiatischer Lloyd*）写过这本书的评论的人这样写道：‘我们认为，卢国祥神父的著作是德国人所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籍中第一流的作品。这本书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资料，每一个研究中国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很多相关知识。’

“但是，对卢神父来说，他不是一位追求虚荣的作者。他要为灵魂们服务，他要为传教事业和伟大中国人民的皈依服务。他一生的使命是为这个工作获得祈祷者和支持者。如上所说，他完成这个任务并成为‘传教区的养父’。如果没有他和他的著作，山东南界绝对不会有这么快的发展。他催促建立各种基金会——为修道生、传教员、养老院、孤儿院、冬季传教学校、首次开圣体的孩子们服务的基金会。他通过他的文章和他的信函来往，来支持和发展这些基金会。通过他的言语，他在很多天主教徒的灵魂中唤起了大家对传教事业的热忱。通过他的文章，传教区更好地完成了任务。

“在我们会士的坟墓旁边，我再次以传教区和我们所有的恩人的名义向他表示感谢。我毫不怀疑，他将在上主的圣座那里为我们祈祷。他虽然去世突然，但并不是没有准备地走了。在他的床边，他始终挂着一位亡者的图片，在下面写着：‘也许是今天晚上！’他也经常提到死亡的事，还在我们坡里庄的墓地早就为自己选择了一块地方；现在他在那里休息。

---

i 译者注：这两本书是：《中华帝国的野草、萌芽和花朵》（*Unkraut, Knospen und Blüthen aus dem blumigen Reiche der Mitte*），共728页，Steyl, 1900年；《新的野草、萌芽和花朵》（*Neue Bündel. Unkraut, Knospen und Blüthen aus dem blumigen Reiche der Mitte*），共419页，兖州，1908年。这两本书里有许多关于当时农民生活、风俗、传教工作和教会生活的观察，也有插图和照片。

上主天主这位宽容的审判者将会在永远的家乡赏报他的传教工作和使徒生活——这是我们的希望和祈祷。”<sup>i</sup>

这样，死亡太早夺去了韩宁镐主教的能干同工的生命——多次是因伤寒症的缘故。比如，德天恩神父和齐恩来神父这两位杰出的区会长很早去世；山东南界传教区的“建筑师”恩博仁神父，能干的教育家薛田资神父，以及那些特别成功的传教士如布恩溥神父、贾兰伯神父、顾思德神父也未满天年就离开了人间。这样，韩宁镐主教必须派其他的人来弥补因同工逝世而造成的损失。

山东本来是一个良好、有益于健康的地区，不过，黄河偶尔会发生洪水泛滥，而那些可怕的水灾也会引发流行病。夏天的炎热也是难以忍受的。我们已经说过的卢国祥神父就是因为中暑而去世的。有一次韩宁镐主教提到了这个困难：“我们今年的夏季特别热，有时候气温会高达42摄氏度。对我们来说，夏天是最可怕的时期。那些来自菲律宾和新几内亚的传教士们说，这里的炎热比赤道地区的炎热更难以忍受。”<sup>ii</sup>

主教也多次报告水灾所造成的损失和灾区的困境，同时他也请求人们的资助。1911—1912年、1926年、1932年和1936年发生了最严重的水灾。对于1911—1912年的那一次，他写道：“在灾区出现了我们从未见过的困境，这是洪水与歉收引起的恶劣环境。人们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卖给别人，拆除自己的房子，当建材出售。很多人完全靠树叶和田地的野草充

---

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09年，第24页。

ii 见1911年1月27日的信。

饥。因此也出现了很多疾病，特别是饥荒引起的伤寒症。到处能看到堕落的乞丐，他们时时缠绕着你，从他们的面孔就能看到他们的苦楚。在路边也经常能看到饿死者的尸体。”<sup>i</sup>

主教呼吁德国和美国的公教信徒一起帮助灾难中的人们，因此他也获得了一些资助。这样，他能帮助一部分人。他很感动，并向恩人表示谢意。他说：“我一直叫传教士们告诉我们的信徒，他们应该为他们的恩人祈祷。中国的报纸也向德国的公教信徒表示了谢意。”<sup>ii</sup>

关于1926年的水灾和饥荒，他写道：“我们传教区的西部好像完全被这次灾难毁灭了。在兖州这里，大多数的老房子和围墙倒塌了。秋天的庄稼几乎都被洪水淹没了。在菏泽地区，黄河的堤坝被冲破了，700个村子被破坏，很多人淹死了，而幸存者也面临很大的困难。在所有的传教地区我都收到了很多类似的报告。

“我现在必须再次发出‘救命’的呐喊。我感到很可怜，因为我已经多次向你们请求帮助了。但是，上主再次让我们落入这些灾难中，所以我必须再次求你们帮助我们。”<sup>iii</sup>

关于1932年的水灾，韩宁镐主教在报告中写道：“几千个村子遭受部分或全面破坏，几十万人没有了房子，没有了财产，洪水淹没了庄稼。好在很多人幸运地得救。那些人几个月前那么热情地接待我，向我表示他们的爱戴和孩子般的热情。我曾做去他们那做客，他们给我食物。现在他们

---

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12年，第170—171页。

i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12年，第170—171页。

iii 见1926年8月20日的信。

没有家，没有农场，没有衣服，没有足够的食物，很多人病了。他们面临的是秋天和冬天的寒冷天气，没有衣服，没有房屋。为了帮助这些可怜的人，我想做很多事！”<sup>i</sup>

1936年发生的灾难最严重。那时，黄河改变了河道。主教写道：“我不能不说，我在中国传教这50年以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况。这次不是一个一般性的堤坝的破坏，那条可怕的河流几乎想毁灭一切，它想走出一条真正的新路，想完全改变它的流向。这种灾难在80年前已发生过一次。巨大的水流形成了一条宽达50至100公里的河流，而这条巨河冲过山东的平原。无数的村庄被破坏，庄稼都被毁了。有500万人无家可归，没有食物。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山东省的省长发动了一次慷慨的救灾活动。他们用无数的小船努力营救灾民，到现在已经救了40万人，并将他们送到那些比较安全的地区。他们住在神庙或其他的比较大的房子里。那位善良的省长提供了他的办公厅，让很多人住在那里。每一个人每一个月接受价值三四马克的食物。对那些能吃苦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足够的帮助，这样他们可以维持生活。不过，这个灾难仍然是巨大的问题。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发生如此巨大的灾难，我们只能说，这也是上主的计划。他让这个灾难发生，他曾经多次帮助我们，那么现在他也不会放弃我们的。”<sup>ii</sup>

教会提供了五所医院，政府也提供了一些房子给教会，让教会的人进

---

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32年，第115页。

i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36年，第142页。

行医疗工作。进行救灾和医疗工作的人是传教士、圣神会的修女们以及本地的女修会，如圣家会和“在俗传教贞女会”的修女和贞女们。各种救灾委员会提供了一些物品给主教，比如他一次收到3500件外衣；他还收到了许多药品。<sup>i</sup>

韩宁镐主教感觉到，穷困和人们的各种需要是一个沉重的十字架。他这几十年里曾写过无数的信给总会长和海外的恩人，内容都是恳求别人的资助。

他自己说：“我这一生都处于缺钱的困境。我多次写请求资助的信和感谢捐献的信，直到我的手没有力气为止。我的邻区主教们从来没有这些忧虑<sup>ii</sup>……我也会很乐意地接受这个十字架，但是我不想看到我们传教区的教会有倒退的现象。<sup>iii</sup>

“我更深切地感到这个问题，因为我有责任。而且我看到，我们周围传教区的情况比我们好多了。他们的钱显然很多，但他们可以创立很多学校，可以雇用很多工作人员。某一个县我一年只能给800或1000元，但他们为类似的县能提供2500元或更多。另外，那些主教不必担心资助的问题，而我每年都必须为此担心！我这几年必须为此花很多精力和心思，虽然如此，我们的钱仍不够。我并不嫉妒，我也因别人的成就感到快乐，我描述这个情况是为了说明我们的处境和困难。尊敬的主教，您也知道，我不认为钱在传教方面有最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我也经常告诉我们的中国会

---

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36年，第290页。

ii 译者注：“邻区主教”指济南（山东北界）的主教。

iii 见1925年3月16日的信。

士们。但是，钱也是一个要素吧！<sup>i</sup>

“一次又一次请求别人，而描述困境让人感到乏味——无论是请求者或被请求的人都会很累。我曾写了那么多的申请书，所以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我也越来越老。这40年传教工作之余我还要举起手臂企求人们的协助，这让我更感到心酸。任何人都更喜欢默默地和独立地承担他的负担和忧虑，但是这是涉及别人的生命的，这是灵魂的生命，是天国！这些处于患难之中的人相信我们会协助他们。有时候我也看到，传教工作没有进展甚至有退步，因为我不能提供足够的资金——在这些情况下，乞求协助及发出救济的呼声成为一个神圣的任务。”<sup>ii</sup>

圣言会当然尽力协助韩宁镐主教。修会的成员在迅速增多，而圣言会接受了很多新的传教地区，这样，圣言会也只能提供一部分援助。因此，有人建议韩宁镐主教应该在中国开发一些资金来源：有人建议创立丝纺企业或种烟草，发展制皂工业或制造皮件。

主教回答说，那些可怜的新信徒为教会已经做了很多事。他说，在一个如此古老的文化大国中没有什么新的、尚未开发的资源。他说，他们曾经试图制造发网（为保持发型用的）和草帽，但都没有成功。他的结论是：“那些比较老的传教修会也没有找到其他的资金来源，它们只好在上海买了一些房地产，然后出租这些房子。通过这种投资，它们有相当丰厚的收入。”<sup>iii</sup>

这样，主教一直是一个贫穷的乞丐；到最后，他的穷困甚至更厉害

---

i 见1925年5月7日的信。

i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26年，第85页。

iii 见1925年3月6日的信。

了，因为在1930年后，德国人为传教区捐的钱不能送到国外了。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年中，他写道：“资金短缺也不是太可怕的；但如果这个情况维持很长时间并且很严重的话，那就不一样了。”<sup>i</sup>

我们在这里叙述一个关于金钱的故事。有一次，韩宁镛主教急切需要几千马克。那时，修道院的学生在学校的院子里玩耍，主教和一些教师也在场。突然一个学生在主教卧室内发现一条蛇。他很激动地告诉他这个消息，所有的人都去看这条蛇。主教也感到不安，他想这条蛇也许已经在他的卧室好几天了吧。因此，他叫修士们检查他的房间。他们整个下午都在寻找，拆开了床，挪动了墙边的柜子，但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藏蛇的窟窿。主教在那天晚上不敢睡在他的卧室里。第二天上午他们又仔细地寻找那条蛇，但仍没有结果。这真是一个谜。然而，在午休的时候，人们又很清楚地看到了主教卧室的窗户那里有条蛇。修士们跑了上去，主教也跟着他们。但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主教坚持说：“它就在房间里！我们必须找到它！你们真的检查了所有的东西吗？”“是的，所有的东西！”那时，一位修士指着房间里的一张小桌子说：“只有这张小桌子我们没有挪开，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什么。”主教说：“你们检查一下这张桌子。”于是他们搬开了这张桌子，拿掉它的桌布，打开抽屉。他们都很惊讶：在抽屉里有28块银锭，每一个值150马克，总共是4200马克。在上面有一张纸条，而在纸条上有17年前去世的安治泰主教的手迹：“这笔钱来自青岛的学校。在紧急情况可以使用它。安治泰。”

韩宁镛主教根本不知道这桌子还有一个抽屉，而在这17年间，没有人

---

<sup>i</sup> 见1935年3月15日的信。



发现这里有钱。现在它被发现，也正好是最需要它的时候。

而那条蛇呢？它只是一个错觉，是窗户玻璃产生的光线反应。在窗子前有洗脸盆，每当阳光以某一个角度照亮洗脸盆和水时，外面的人能够在窗户里看到一种反光，很像一条蛇的影子（潘来仪神父的报告）。

上面我们已经多次提到强盗之灾。这些不良之徒多次让韩宁镐主教感到头痛。他们劫掠了很多传教站，抢夺传教士们的财物，他们为了勒索赎金绑架传教士们，压迫中国基督徒。总之，他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在此之外还有那种不安全感，使人们始终不能放松。一般来说，这些强盗在天灾后出现得更频繁。主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1918年）写道：“过去一年在山东历史上将被称为‘强盗年’。我们几乎已经习惯了强盗们的活动，但去年的情况超过一切。各种帮派的强盗不能用百人或千人来计数，只能以万人计数。另外，这些强盗群体拥有非常精良的武器。传教工作受到了阻碍。但是，上主的上智协助了我们，强盗们没有攻击我们；我们也感到奇怪；我们感谢上主。”<sup>i</sup>

在1926—1928年的饥荒年代后，强盗又出现了很多，而他们这次也攻击教会了。主教报告道：“1928年1月中旬很多强盗占领我们在坡里的传教点。他们破坏了很多设备，还夺走一切有价值的物品。他们抓走了一位神父、两位修士、六位修女以及很多孤儿院的女孩子。这位神父三次遭受拷打，一位修士两次被拷打。他们先向我们勒索五十万墨西哥银元，后来是十万，最后是两万赎金。强盗在那里待了近四个星期。后来政府派了兵，

---

<sup>i</sup>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19年，第53页。当时被俘虏的传教士包括黄神父（Weiss）和商神父（Stangier）。

强盗们留下了他们的俘虏逃走了。”<sup>i</sup>

韩宁镐任主教32年之久，而其中有25年可以说是处于战争期。1911年之前的三年也已经受了革命和战争的影响，而清王朝结束以后，中国一直处于内战或外战之中。当然，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在某些省份发生的战争不一定会影响其他的地区。就这一点，韩宁镐主教有一次写道：“如果你看中国的报纸，你也许会想，在这里混乱局面持续不断：各地都有好战的将帅、政治斗争、放火的强盗帮派。这一切也不能说不存在，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一般来说还相当平安。如果一个地区不是直接遭受强盗或政府军队的影响，那里还是不太会感觉到政治上的不安……的确，我们生活在一个混乱的社会中，而人们几乎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但是，人民本身很少关心政治的混乱——这是一个很大的幸福。如果没有强盗，没有饥荒，没有通货膨胀，人们就不太关心政治。世界的变迁只是表面上的，因此我们仍然能享受到某种平安。”<sup>ii</sup>

中国也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牵连。在那个时期，德国的传教士没有受到家乡的资助，但他们仍然要继续开展他们的传教工作，虽然受到了一些限制。主教在战争的第四年向斯泰尔的总会长写信道：“我们的情况还算好。有时候我们面临很大的困难，但这场危机会过去，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工作了。不过，那些强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因此，我们的传教工作在很多县几乎完全中断了。强盗并不特别攻击教会，但一些传教士面

---

i 见1928年1月16日和5月23日的信。

ii 见1924年4月5日的信。

对严峻的困境。生活在阳谷城里的维加禄神父（P. Karl Weig）<sup>i</sup>遭受了可怕的殴打和抢劫。我们会在资金方面想办法来度过这个难关。美国的恩人现在在为我们努力工作。在食物和衣服方面我们没有问题。对我们这些中国传教士来说，在这方面的情况也许比别人好。”<sup>ii</sup>

韩宁镐主教想，在战争结束的时刻，他可以松一口气，但恰恰在那个时候，德国传教士面临很大的打击：他们被驱逐出境。参战的胜利国在《凡尔赛和约》<sup>iii</sup>中规定，一切德国传教士必须离开德国的同盟国和原来属于德国的殖民地。

很多德国传教士因这个规定受到影响，在斯泰尔传教会中也有545位司铎、修士和修女受到影响。比如，多哥（Togo）和莫桑比克（Mosambik）<sup>iv</sup>的德国传教士已经被逮捕，被押送到看守所。那时在山东南界的外籍传教士包括67位司铎、12位修士和54位修女。如果在那时驱逐一切德国传教士，9.3万个公教信徒几乎就没有牧灵者，而那些繁荣的慈善机构和所有的学校都将被关闭。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韩宁镐主教为什么如此受惊吓且向总会长写信道：“最近几个月几乎是我一生中最难受的时期。”<sup>v</sup>

---

i 译者注：维加禄（1876—1939年），德国人，1900年晋铎，1900年来山东，曾在郓城、即墨、济宁、坡里、阳谷等地传教。1939年在青岛去世。

ii 见1918年9月15日的信。

iii 译者注：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对德和约，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西南凡尔赛城的凡尔赛宫签订。

iv 译者注：自1884年以来，多哥地区的酋长们接受了德国的统治，而德国于1897年和1899年进一步巩固了它在多哥的影响，多哥成了德国的殖民地。莫桑比克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但在那里也有德国的传教士。

v 见1919年4月8日的信。

但是，他不会袖手旁观地让这个灾难发生。他和圣言会的总会长想方设法地避免这种灾难。韩宁镐主教很快就报告说，中国的主教们——上海的姚宗李主教（Paris）、河间府的刘钦明主教（Lecroart）、北京的林懋德主教（Jarlin）和富成功主教（Fabregues）以及烟台的罗光汉主教（Wittner）——都认为，德国的传教士们应该留在中国。另外，上海所有传教代办处的人和上海各个修女会以及很多具有影响的上海人也支持德国传教士留在中国。韩宁镐主教也特别强调上海耶稣会的支持和协助，他说：“这一点更值得重视，因为他们很多是法国和比利时的神父；他们也许会因为支持德国传教士而受到批评。”<sup>i</sup>

另外，荷兰的大使贝拉斯（Beelaert-Brockland）也很主动地表示想要协助德国的传教士，还有很高级别的中国官员也为德国传教士创办的慈善机构作辩护。

同时，总会长布卢姆神父在斯泰尔也写了很多信。他首先给教宗写信，求他帮忙。韩宁镐主教因这个消息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他写道：“我非常高兴，因为教宗也关心我们。我特地给他写信表示感谢。”<sup>ii</sup>

总会长也给传信部的秘书罗苏姆枢机主教以及传信部的副秘书长佩克拉里蒙席（Pecorari）写信。后来，比利时梅克恩（Mecheln）的枢机主教梅谢（Mercier）这样回信道：“如果在中国有一位胜利国的大使说，德国的传教士应该留在中国，他们也许就能继续在那里工作。你能不能劝一位大使支持他们？”另外，他向美国巴尔的摩（Baltimore）的吉本斯枢机（Kardinal Gibbons）写信，请他在威尔逊总统（Praesident Wilson）

---

i 见1919年5月22日的信。

ii 见1919年8月19日的信。

那里替德国传教士作辩护，而这位枢机也同意这样做。总会长还请科隆的冯·哈特曼（von Hartmann）枢机以德国主教团的名义向教宗提出这个问题，科隆的枢机发来电报说：“我们已经这样做了！”

总会长也在外交官们那里寻求帮助。德国国务卿埃茨贝格尔（Erzberger）接受总会长的劝告，他在凡尔赛会议上对驱逐德国传教士离开中国的事提出抗议。然而，福赫（Foch）将军回答：“不会有什么例外！”总会长也曾经找荷兰的外交部长以及通过别人的介绍向美国总统威尔逊求助。

这一切努力和尝试可能有很多没有任何效果，但它们为最后的成功作了准备。决定性的工作是韩宁镛主教向美国“传教委员会”发的电报。通过这份电报，委员长请美国的吉本斯枢机在外交部提出德国传教士们的问题。他们这样说：美国的公教信徒对山东南界的传教工作有很大的兴趣，因为这个传教区几乎全面依赖于美国信徒的资助。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美国的传教区，而美国的公教希望山东的传教工作能继续进行；而如果德国的传教士都必须回国，山东南界的教会将不能继续存在，传教工作将面临崩溃。

美国的外交部接受了这个理由，因此，在北京的美国使者奉命告诉中国政府，美国政府支持德国传教士继续留在中国。枢机主教很快收到一封电报说：“在华传教的传教士是例外，山东南界的传教士将不会受影响。”不幸的是，这个善意的决定来得太晚，当时已经有10位传教士被驱逐出境。<sup>i</sup>但是，后来又允许他们返回山东了。<sup>ii</sup>

---

i 译者注：于1919年2月间应该离开中国的圣言会传教士是14个人：狄神父（P. Deitmar）、何神父（P. Hoowaarts）、李神父（P. Blick）、商神父（P. Stangier）、徐神父（P. Seidel）、巴神父（P. Beyerlein）、边神父（P. Broering）、葛神父（P. Kalf）、米神父（P. Schmitt）、滕神父（P. Stork）、万神父（P. Weber）、马神父（P. Mohrbacher）、马修士（Br. Festus Mahlberg）、高修士（Br. Gordius Wiesmann）。然而，巴（P. Beyerlein）获得允许留下，而马（P. Mohrbacher）生病。其他人从上海出发，离开中国一段时间，但大多数人几年后返回山东。

i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19年，第71页。

因此，传教士们逃离了危险；如果他们都离开，将是对传教区的致命打击。韩宁镐主教向总会长写信道：“我收到肯定的回答。驱逐出境的问题解决了。上主天主将会继续帮助我们，他将会引导我们的小船通过各种巨浪和急流。我们的创始人和我们已亡的会士们为我们转求。”<sup>i</sup>

韩宁镐主教于1932年遭受重大的打击。他报告道：“1932年1月21日，我们在济宁的中学着火，所有教材和室内设备被烧毁。有人说这是一些住在附近的坏士兵干的。损失至少是15万马克。我们没有保险，并不能获得任何赔偿。这样，上主，仁慈的天主又让我们负起一个新的重大的挑战。这所学校最近很兴旺，很受欢迎，而信徒学生的数量也很多，而且还在逐年增加。如果我们想带给公教青年一点好的教育，我们不能缺少这样的教育机构。”<sup>ii</sup>

总会长后来给韩宁镐主教一次丰厚的资助，同时，主教也得到了美国方面的一些资助，所以他能重新建立这所学校。现在它有520个学生。1934年，它的毕业证书和考试证书也获得了政府的承认。<sup>iii</sup>

在他担任主教的初期，韩宁镐主教于1905年给他的忠实代理福神父写道：“我们的处境不太好，而有时候我们会感到沮丧。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但是，如果耶稣在我们身边，我们也不在乎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在

---

i 见1919年12月7日的信。

ii 见1932年2月3日的信。

ii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35年，第118页。

伯利恒、在埃及或在拿撒勒（Nazareth），都一样。”<sup>i</sup>

韩宁镐主教不能预先知道他在未来34年中还必须走多少苦路，这种“不知道”对他来说是一种幸福。不过，他从不失望，而在很困难的时候，他有这样的慰藉：“我的主保圣人圣奥古斯丁在晚年也面对了很多的黑暗，远远超过我们这个时代的黑暗。”<sup>ii</sup>

---

i 译者注：伯利恒、埃及和拿撒勒是耶稣诞生、逃难和童年生活的地方。韩宁镐暗示，他与耶稣一起逃难，一起“长大”。

ii 见1927年8月27日的信。译者注：圣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年）曾目睹北欧的部落侵略罗马帝国。

## 第四章 到达朝圣的目的地





## 第一节 他的人格

若瑟·施米德林教授曾去东亚进行研究考察，并于1914年途经兖州。他曾提到韩宁镐主教：“安治泰主教是一位热忱、活跃的主教，而他的接班人是韩宁镐蒙席。在中国主教团当中，他是一位杰出的人物，所有人都十分敬佩他的才干。尽管他身材不高，外表平平，但他有睿智聪敏的目光、果敢坚毅的神情，反对一切外在的个人崇拜。圣职人员、教友民众、欧洲官员和当地官员都很敬重他；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位主教像他这样深受爱戴。”<sup>i</sup>

10年后（即1924年7月），维特博士（Dr. Witte）——“德国新教传教协会”的领导人——也在东亚旅游并在兖州遇见韩宁镐主教。他这样回忆这次相遇：“我静候了片刻，德高望重却仍不失和蔼的韩宁镐主教就出来了。我们谈论了很多严肃和轻松有趣的话题，不知不觉两个小时的时间就过去了。当然，这位高级的教会代表是一位忠诚的公教徒，而我也没有改变我的新教立场。但是，我们两个人在内心产生了强烈共鸣。主教温文尔雅，因此我们也能在一些宗教话题中分享各自建设性的观点。不得不承认，我从这位主教身上学到了很多——他那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38年来在华艰苦生活的献身精神。”<sup>ii</sup>

---

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14年，第172页。

ii 见Dr. Witte, *Sommer und Sonnentage in China und Japan*, 1924年。

上海耶稣会的惠济良主教（A. Haouisee）后来在他的讣词中写道：“韩宁镐主教的逝世意味着中国的教会失去了一位伟大的主教。教会失去了一位一流的领袖，而我加上一点：上海教会也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

福建邵武主教王俊德蒙席（Inigo Koenig SDS）<sup>i</sup>写道：“无疑，他是我们时代远东地区中最伟大的传教士。虽然他已经逝世，但在他的机构、著作和他光辉的榜样中，他仍然活着。”

在韩国Tokwon传教的本笃会的罗德蒙席（Prior L. Roth OSB）这样说：“在韩宁镐主教的指导下，在华的传教地区曾获得惊人的发展。韩宁镐主教的逝世意味着斯泰尔的传教会失去了它最璀璨的一颗明星，而德国的传教事业也失去了它最杰出的代表。”

山东济南的杨恩贲主教（Bischof Jarre OFM），<sup>ii</sup>一位方济各会会士，简单扼要地说：“他超越我们所有人！他比我们都强！”

一位圣言会传教士很了解韩宁镐主教，因为他曾在兖州主教府当院长神父，他也曾体验过韩宁镐主教的坚强意志，他说：“30年来，我在华传教遇到过很多主教，但如果让我作一个比较，我不得不说韩宁镐主教最让我佩服。”

我们还听到了很多这样的评价，这里仅列出一小部分。现在我们来更深入地认识这位具有影响的人物的性格。

韩宁镐主教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态度和多方面的能力。他天性乐

---

i 译者注：SDS指“救世主会”。

ii 译者注：杨恩贲（1878—1952年），德国人，方济各会会士，1905年来华，1929—1952年任济南主教。

观、开朗，有清晰的逻辑、敏捷的理解力、准确的判断力、广博的科学修养、杰出的演讲才能以及对当时新思想的开放态度。

他是一个内心纯洁高尚、有深切虔诚的信仰、良善心谦、无私仁慈的人。

他也是一个性急的人，而这种性格一方面强化了他的意志力，另一方面偶尔也引发了一些出人意料的决定或者人为的失误。但如果掩盖他性格中的缺点，不仅不忠于事实，也会扭曲这个性格的特殊性，还会破坏这个性格的独特性——他的性格也是上主赐予的；这样做将会失去他性格的重要部分，而我们恰恰是在这个部分接近他，接受他的教训，发自内心地同情他。

因此，我们应该一起审视这一性格的优缺点以及它们间的相互作用。在他的生活中，我们已经观察体验到了很多特点，且在此不得不提到某方面的因素。

青岛的维昌禄主教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性格中最卓越的特点是在思、言、行上的真诚；他的判断是公道正义的；他对教会全心全力地支持，对圣座完全忠诚，对传教士的圣召全身心地投入，对上主的上智稳如磐石般地依赖。因此，他也完全印证他的原则：‘我知道我相信的是谁。’”<sup>i</sup>

一位传教士写道：“他爱真理超过一切！他一直要求自己公道地看待别人！”

在他的言辞、行为中从未有过不光明正大的地方。他从不以聪明的言辞欺骗人。他的谈吐和为人都是内在态度最真实的反映。

---

<sup>i</sup> 见《高密通讯》（*Kaomi Regions-Korrespondenz*），1939年8月26日，第211页。

恰恰也是这不顾一切的真诚让他偶尔也会失误，特别是在与欧洲传教士谈话时，因为他和欧洲人说话时不那么谨慎，有时他也给人一些激烈的回答，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太适宜的表现，因为他本可以用比较温和的说法来回答。但他说：真理在万事之上，真理是最高原则。

无论谁与主教谈话，都能明了主教思想和意图，这一点十分确定。当然，也有一些人不太喜欢这种直接的风格，但大多会士认为，还是这样更好。一次，一位德国传教士收到主教这种“毫不客气”的提示。他笑着说：“哎呀，粗俗的坦率还是比较狡猾的巧妙好啊！”他的言语中也蕴涵着些许深邃的道理。

当然，我们并非是说一切符合实际的粗俗言辞都是可原谅的。我们说话时应该真实，同时又要客气，顾及别人的感受。一般来说，韩宁镐主教也会这样客气地说话，但有时候，他的回答还是会给人们一种“铁丝刷子”的感觉。

一位与主教关系很好的传教士在主教去世后记录下很多关于他的美好回忆，但他也写过这样的话：“他有时候也会骂你，让你几天都感到心酸，甚至有的传教士会将他的批评铭记一生。比如，有一次，一位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传教士在阔别很久后到主教府拜访他，韩宁镐主教却这样欢迎他：‘嘿，你又来这里干什么？’另一位很有才干的传教士应主教邀请前来拜访，时值严冬，他长途跋涉约两百公里，带着一身凛冽的寒气，充满期望地敲开主教的门；而主教却仅花几分钟的时间与他站着谈论一件事，很快又将他送出门。还有一位传教士也遭受过类似待遇，他当即就宣布：‘我再也不来主教府了！’”

“人们告诉主教，一位传教士感到很忧郁，因为主教从未对他说过一句温和的话，但主教不耐烦地说：‘我也不能整天手拿焚香炉站在这人

面前颂扬他吧。’如果在饭桌边或在旅游车上一个人稍微碰到他，他就会大声叫道：‘您没必要这样攻击我吧！’有一次，我劝他说：‘您需要写那么多东西，应该找个秘书。’他直接说：‘哦！您要当我的秘书吗？’但是，我真的没这个想法。我心里偶尔会想：‘我们的主教有时候说话不太谨慎，甚至粗俗；他来自一个铁匠家庭，这种成长环境的印迹还能看到。’

“某位神父性格很和蔼，因此他有时候也敢劝告主教。有一次，这位神父与主教一起坐车到另一个传教站，他想利用在途的这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来提醒主教一下。他告诉韩宁镐主教他真实坦率的言辞有时候会得罪别人，并劝导主教应该更友好地对待传教士们，让他们感到更合宜。主教一路都静静地聆听这位神父的劝告，一言不发。那位神父心里很高兴，因为他认为韩宁镐主教接受了他的劝告。当他们到达了目的地，主教在下车的时候说：‘好，可爱的神父，我由衷地谢谢您，因为您陪我来这里，同时我也感谢上主，因为我不需要听您的劝训！’

“有时候，一些人认为韩宁镐主教偏心，尽管这不是他的本意。韩宁镐知道谁是可靠的人，而这些可靠的人从他那里也确实获得了一些优待。所以，神父们也开玩笑说，主教的原则‘我知道我相信谁’也同样适用于人事方面。

“有一次，我急需用钱，就想找主教帮忙。但主教的回答却极其严厉！我想我决不会再次向他求助。因此，我垂头丧气地躲了他半天。突然，主教的老仆人过来说，主教整个上午都在找我并要我过去。之后他出乎意料地答应了我的恳求。

“这也是他真诚的表现。尽管他是主教，当他发现自己对属下犯了错误时，他就想着如何去弥补这个遗憾。有时候他也给那些他得罪了的人送

件礼物，如一本书。”

韩宁镐主教不容许在私下说别人的坏话，尤其不容许说外教人的坏话。比如，在主教府中不免有一些员工是小偷。但是如果有人想告诉主教这件事，他必须提供确凿的证据，不然主教决不相信，并会冷漠地拒绝控诉者。在一切和正义有关的事情上，主教都非常谨慎。

虽然他曾多次得罪别人，但这都可以说是例外。他与人相处（包括与欧洲司铎的来往）一般都是客气、体贴、无私和热心的。很多人都赞扬他的热心、和蔼以及好客。一位传教士在报告中提到：

“视察的时候，他在工作完成后也会放松一点。晚上他喜欢与人聊天，还经常说一些有趣的事。那时他也偶尔讲一些故事，因为他有着那么丰富的阅历。他会问传教士们取得了哪些成就、遇到了哪些困难，跟他们谈论一些规划，并竭尽全力地提供协助。我对他的认识只是这一面——他就像是我的慈父。

“当你做客兖州时，他每次都会热情地接待你。如果两小时后你还没有去看他，他就会关切地派人叫你过去。他会问你的近况，表达深切的关怀。他经常会准备一件小礼物，给你温暖心灵的鼓励。如果他不能答应某人的请求，那么他一定会在另一方面想办法帮助他。

“主教待客周到是众所周知的。他很细心地让客人吃好住好，并会亲自去看客人们缺不缺生活用品，仔细叮嘱仆人们带来所缺乏的物品。每次他与客人一起谈话时都很善于进行一些指导，他会很自然地提出那些和客人有密切联系又有意义的问题。

“德国学者恩格尔贝特·克雷布斯教授（Professor Engelbert Krebs）1928年来兖州，当时主教与他一起坐在阳台边上。主教很快谈到了伊西多拉（Isidora）修女写的书，因为克雷布斯教授曾为这本书写过序

言，书名是《圣神七恩》；他们俩就很兴奋地谈论着这本书，不知不觉就过了两个小时。我当时刚好在房间听到了他们有趣的谈话。

“他最喜欢谈论的是一些科学方面和牧灵方面的话题。如果他在这方面找到一个知音，便会和他谈论很长时间。谈话过程中他从不懈怠，也不会让人感到疲惫。从主教的言谈中，人们会发现他饱览群书、博闻强识。而且他也一直关心、体谅对方，也适时地让对方说话，他自己做一个很好的聆听者。他这样做不是因为另有意图，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谦虚知礼的人。另外他也很尊重别人的知识，多次表达过他对别人成就的佩服与赞扬。”

他住在兖州主教府的时候，会定期去司铎们的共同休息室。一位传教士说：“韩宁镐主教很喜欢音乐、唱歌，总是与众人打成一片。他多次吩咐董师冕神父（P. Dransmann）<sup>i</sup>弹钢琴，而我必须朗诵勒威（Loewe）的诗……他反对人们离开共同的休息室活动，反对他们形成小群体。”

另一位传教士回忆道：“休息的时候，主教很放松，每一个人都能接近他。但是，他仍然比较喜欢一些严肃的话题。每当我们的对话落入一些无味的玩笑时，他就马上很直率地批评我们。”但是，他有幽默感，在他众多的故事和经历中，也有很多笑话。

有一次他去外面视察，在吃饭的时候他不经意间提到他喜欢吃胡萝卜。人们马上告诉厨师为他准备胡萝卜，主教因此也非常高兴。但是，“主教喜欢吃胡萝卜”的消息在视察地区传播开来，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他无论到哪里都有胡萝卜吃。在第五个堂口他说：“哦，这里的胡萝卜很

---

i 译者注：董师冕（1882—1942年），德国人，1898年晋铎，同年来华，曾在兖州修道院任教，1925年在日照传教，1930年代在兖州，1942年11月29日死在兖州。



多！”而当他在第七个堂口吃胡萝卜时，他终于说：“好，够了吧！”

有一次，山东北部的申主教（Giesen）<sup>i</sup>和翟主教（Timmer）<sup>ii</sup>来看他，他们坐在主教府阳台，边谈边喝葡萄酒。一位传教士刚好经过说：“哎，这是多好的一次聚会！”韩宁镐主教听到后马上告诉他的客人，大家都笑了起来。

在他最后一次去美国的途中，他遇到一位蒙席，很快就开始和他攀谈起来。一段时间后，他对那位蒙席说：“对不起，我仅仅听懂一点点，因为我重听。”这个蒙席回答：“啊，那正好，因为我也重听。”

在谈话或其他事情上，无论是开玩笑或是严肃的时候，主教都很敏捷。如果有人想和主教辩论，那他一定不是主教的对手。一位传教士说：“在散心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有我们的主教和很多神父。我略带戏谑地说：‘你看，主教的头最大！’他笑着说：‘没错，但里面也装着一点东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从东南亚地区来了一些嘉布遣会神父，他们在兖州住了一段时间，韩宁镐主教很盛情地接待他们。时值严冬，这些来自南部的神父们感到十分寒冷，所以，人们就在他们的房间里放了一个小炉子，虽然这有违当地习惯。圣言会的神父们都没有抽烟的嗜好，一位嘉布遣会神父开玩笑说道：“我房间中的炉子不是一个好的圣言会成员，因为它不断地吞烟吐雾！”韩宁镐主教马上说：“正因为它不是一个好成员，我们才将它与一位嘉布遣会士放在一起！”

有一次，主教与一位很温和的院长谈论青年传教士的能力。每当主

---

i 译者注：申主教，德国人，于1902—1919年任济南的主教。

ii 译者注：翟主教，荷兰人，曾任过山西潞安（长治）的主教。

教提到一个人的名字，院长都说：“哦，这个人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最后，主教不耐烦地说：“如果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卧在一张很软的床上，他也会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

在视察时，主教见到一座新建的小教堂。当地的传教士从另一个地方请人协助他修建了这座教堂。主教问：“这里的教友们信仰情况怎样？”传教士说：“他们很冷淡。”“那么，您为什么给这些冷淡的教友建了一座这么好的教堂呢？”传教士回答：“虽然人们不怎么进堂，但这座教堂还算是信仰的表现吧！”主教说：“什么？信仰的表现？您应该说它是愚蠢的表现！”

在另一位传教士的传教点那里，他发现客厅墙壁上挂着一些赞美的标语和幅条。当地的中国人在那个传教士的主保节日送给他这些锦旗。主教却说：“您真聪明，让别人将您所有的优点都写在墙上！”

主教还有很多类似的讽刺和挖苦的说法，其中一些也成为了经典名言。不过，对他来说，这只是幽默，而不是嘲笑人。他肯定不想得罪别人，只想让某些人变得更加谦虚。主教几十年来都拥有很高的地位，也很少听到反对他的声音，再加上，生活负担很重——这样就不会那么谨慎地说话。而且，人们在这样的模范人物身上更多的是看到他们的不足，而不看他们的优点，尽管优点远远超过不足。一位很理性的传教士谈到韩宁镛主教时说过：“他会发脾气，但更多的时候他表现出的是极大的自制和仁慈。”

值得注意的是，他仅仅向他的欧洲司铎和会士们表现出这些刻薄的批评。有一次他说，在自己家里一个人会更随便一些。但更深的原因是，他认为，欧洲的传教士应该具有更大的责任心和牺牲精神，要超过中国司铎，因为这些中国司铎都来自新教友家庭，所以他们还不能完全克服外教

旧文化的缺陷和不良传统。

他要求他的司铎们完全投身于他们的使命，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在传教生活各个方面都曾当过传教士们的“先驱和模范”。

一位传教士说：“韩宁镐蒙席是一位很理想的传教主教，他唯独注意天国在中国的传播。他工作能力出众，工作精神积极，若是通过牺牲和辛苦能使教会获得发展，他便不惧怕任何牺牲和辛苦。当他超过60岁时，仍然会外出视察几个月，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道路泥泞坎坷，他都充满信心地坚持，从不沮丧。视察时，他还通过言辞和自身的模范力量向传教士们传递着他那种‘以工作为乐’的精神。我经常感到，尽管他是我们传教区中最努力的劳动者，可他仍然认为他做的工作还不够。”

另一位传教士——现在<sup>i</sup>已经是主教——回忆道：“韩宁镐主教首先是一位勤奋的工作者。喝过作为早餐的咖啡后，他便立即开始他的工作，直到晚餐才结束。因为他自己一天都在工作，所以他也不允许别人不做事或闲聊。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与他共事的人也同样要求严格。无论他在哪里发现马虎、粗心、懒惰等态度，他就会毫不留情地批评这些人。特别是在文献方面，他格外仔细谨慎。为此我有几次都很不悦，因为我曾刚好写完一封信，但他后来又发现某一个细节有错误，而为了改好这个小错误，我必须重写整封信。”

还有一位传教区的主教——同样是韩宁镐主教祝圣的——说：“他反对夜间工作，因此他尽量充分利用白天的时间。据我所知，他没有午休习惯，仅仅坐在椅子上休息几分钟……在完成任务方面，他非常快捷准时。

---

<sup>i</sup> 译者注：“现在”指1940年。

他尽可能马上处理完所有的新任务，不让人们等他的回答。同时，他也要请求别人马上着手工作。如果一件事进展太慢，他会用一些强有力的言辞来催促它。如果他面对一件比较重要的事，他会一再地劝勉别人，一直问：有没有准备好？他很守时，在一天的工作、生活节奏和其他的事情上，他都是这样的。他从来不拖延。

“他尊重别人的能力和知识，所以他也很有宽容；他让传教士们自由管理好他们的工作范围，只要他们不违反秩序。”

一位老传教士说：“韩宁镐主教是最了不起的工作者。因为他从不会在空虚的闲聊中浪费他的宝贵时间。工作的时候，他就谈正事。如果完成一项任务，他也会向人们（包括司铎们）说：‘好，你休息吧！’但这句话本来是客气话，而言外之意是：‘请您离开！’他也想看到别人用同样的效率工作。然而，与他同步工作着实不易。他会骑马好几个小时去一个传教点，而一旦到达，他立刻去告解亭开始听几个小时的告解。”

当韩宁镐主教还在单县当总本堂时，有一次来了一位会士，这位会士喜欢与他谈话，这样便占用主教的时间。第二天早上，韩宁镐神父交给他房门钥匙，说：“拿着吧，你可以用这里所有的食物和饮料。而我必须去看我的教友们了。”

1930年他第二次去欧洲，当时他也路过奥地利的圣言会大修院、圣佳伯尔修院，他在那里向修道生演讲说：“可爱的兄弟们，我只能劝你们：你们应该工作，应该做很多工作，不要回避任何工作！不要担心很多工作或经常工作会影响健康。你们看，我一生一直做了很多工作，结果，我不但很健康，而且还长寿。”

每一份工作的价值取决于它的目标和工作者的意向。韩宁镐主教是

一位传教士，他的目标是最高尚的：在全世界传播天国理想，拯救人们的灵魂。他的目的是最纯洁的，且投入了他毕生的精力。当刚刚祝圣为主教时，他给创始人扬森神父写信：“上主的更大光荣——灵魂们的救恩！这应该且必须是我们的崇高目标。我请您从这个角度谈论我们的问题，请您自由坦率地提出您的看法。”<sup>i</sup>

他充满激情地告诉他的传教士们这些真理，尤其在避静的时候：“我们是基督的证人。<sup>ii</sup>那位神圣的老师曾告诉他的第一批传教士们：‘你们将是我的证人，直到地极！’这句话多么美好又意味深长，而且非常适于我们。我们是基督的证人——在最小的范围，最小的堂口也同样如此。我们传教士的圣召和身份是最美好的圣召。‘正如父派遣了我，我也派遣你们！’<sup>iii</sup>这是多么伟大的使命！基督在这个世界中的使命为救人灵魂，这也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从上面已经看到，韩宁镐主教是一位热心的牧灵者，他对拯救灵魂有着神圣的激情。他从未回避痛苦，不怕劳苦，不畏牺牲。他从未问过：“我必须做什么？”而是说：“我为灵魂的升华还能够做什么？”他向传教士们说：“那些永生的灵魂们值得我们为他们奉献我们的全部生活！基督说，每一个单独的灵魂都有无限的价值，如果我们只做到了向一个灵魂铺平通往天堂的路，为此我们还是必须要感谢上主。”

他对公教和圣座有着强烈忠贞的爱慕。当教宗比约十世（Pius X.）

---

i 见1904年12月15日的信。

ii 译者注：见《圣经·宗徒大事录》Acts 1: 8。

iii 译者注：见《圣经·若望福音》Jn 6: 57 和20: 21。

很坚决地反对了所谓的‘现代主义’（Modernismus）<sup>i</sup>时，德国教会当时也面临着一些危机。那时，韩宁镐主教给他在帕德博恩生活的外甥写信：“德国公教内部存在矛盾也有一定的好处吧。不清楚之处被革除，人们的良心被唤起。在教会内部批评的情况下，在美因茨（Mainz）举行的公教大会意味着一个很真诚的肯定，即肯定罗马，肯定公教的统一性，肯定真正的公教生活。我在远方也深深地为之动容。圣座的行动——引起诸多反对的措施——也带来很大的降福。他发表的《圣体敕令》（*Kommuniondekrete*）<sup>ii</sup>对我们的新传教地区也极为重要。我们要忠于罗马，忠于教会！遵循着这个原则，我们要生活到底！”<sup>iii</sup>

当教会的情况变得更加不安，甚至有更多人批评教会的措施时，韩宁镐主教给他的外甥写信道：“我们很担心公教内部的分裂。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分裂？我们最担心的是人们不再爱戴教宗。教宗比约十世是一个以灵魂得救为至高价值的人，他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都是牧灵关心和牧灵关怀的表现。显然，他很注意人们宗教生活的淡化。我想，德国的主教们在这方面可以叫他放心。在另一方面，这些发展也会在工人经济问题方面更强调宗教的因素。所以，我对此还是乐观的，我想这个混乱的状态还能产生一些好的结果，因为参与这个争论的各方都是善意的——教宗的意向特别

---

i 译者注：19世纪末以来，天主教反对“现代主义”，即是反对当时的某些思想潮流，如不可知主义（agnosticism）、内在主义（immanentism）、自由主义（liberalism）、“美国主义”（americanism）、进化论（evolutionism）、改革主义（reformism）和主观主义（subjectivism）。

ii 译者注：比约十世于1903—1914年任教宗。他在神职人员培养、宗教教育、牧灵生活方面都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他劝信徒更多地看《圣经》，更多地领受圣体，甚至每天可以领圣体，而“开圣体”的年龄可以降低。在此之前，很多信徒每年仅仅一两次领受圣体，而后来每主日甚至每天领圣体成为新的标准和理想。

iii 见1911年11月9日的信。

好——所以最后的结果也肯定是好的。”<sup>i</sup>

12年后，公教内部的一切危机都被克服了，主教也很高兴地给他外甥写信道：“公教会的光荣旗帜表达着一个胜利。在我年轻时曾经历‘文化斗争’时期。这很光荣，也很美好。我经常高兴地回忆那时候的事。后来，大约在1900年，迎来了一个萧条时期。人们喜欢喊‘离开罗马’的口号。他们一直对我们说，新教国家在物质生活方面有多么成功。人们几乎都唱‘公教落后’的调子……然而，现在一切都变了。世界重新开始尊重理想、真理的价值——这些价值就是我们生活的幸福。人们重新转向‘山上的城’——所有的民族都走向这座城。<sup>ii</sup>感谢上主！我们在中国的工作是在外界的工作，而且通常是很辛苦的工作；我们也经历过许多失败和挫折，因为在世的教会总会面临一些挑战的。”<sup>iii</sup>

圣言会培养韩宁镐主教成为司铎，而他的一生也都在忠诚地关爱修会。他在各方面都是一个模范的修道人。首先看他对创始人阿诺尔德·扬森的敬佩。他被祝圣为主教之后不久就给扬森神会写信说：“父亲和儿子般的关系——您和我很久以来都是这样的关系，现在尤为重要。我一切的行动都始终要服从修会的愿望，我特别要服从您——您是我们的大父和第一个长上。”<sup>iv</sup>

在书信的开头，他一直说：“在基督内最可贵的父！”而在结尾他

---

i 见1912年9月9日的信。

ii 译者注：见《圣经·依撒意亚》Is 2: 1—5中的“上主的圣殿山”、“万民都要向它涌来”。在教会的思想中，“耶路撒冷”和“圣殿”也指教会，所以韩宁镐主教说“一切民族走向（公）教会”。

iii 见1924年8月3日的信。

iv 见1904年12月15日的信。

说：“以忠诚的孝爱和敬慕，您的儿子+韩宁镐<sup>i</sup>。”

1905年，创始人送给韩宁镐主教圣座批准的新会规，主教回答：“我衷心祝贺您！这是一个光荣的成就。这样，上主给您这三十年以来的工作加了冠冕。真是一个特殊的恩典。您在您晚年还能享受这样的恩典……我们现在也应该忠诚地执行会规。我们的努力应该是尽量遵守会规，这样培养对修会的爱慕。这方面我能做的事，一定愿意去做。”<sup>ii</sup>

韩宁镐主教也与后来的总会长们保持着这种良好的关系。20年后，吉尔总会长对他说，他很高兴，因为与他合作是一件很享受的事，而韩宁镐主教回信说：“关于我与总会长们的关系，我可以这样说：这些关系都分享着彼此信任的光明和温暖。您谢谢我，而我也必须谢谢修会的长上，因为他们这几十年以来都一直提供协助，并信任我。修会和传教地区的教会必须密切合作——这种合作的根源是上主的安排和旨意，也是一种特殊的福乐。”<sup>iii</sup>

当韩宁镐神父还是一位年轻的传教士时，他是一位谨慎的修会会士，当他任主教时，他仍是这样。圣言会的史培禄主教（Bischof Hermann Schoppelrey）<sup>iv</sup>当他的副主教很多年。他写道：“在他的一切言语和行为方面，他都表现出这个原则：‘只有一个虔诚的司铎和谨慎的修会人士才能

---

i 译者注：“+韩宁镐”等于“韩宁镐主教”；用名字前的“+”表明“主教”。

ii 见1905年8月25日的信。

iii 见1926年7月20日的信。

iv 译者注：史培禄（1876—1940年），德国人，1909年来山东，曾在王庄、青岛、戴家庄等地传教，于1933年成为河南信阳的主教，1940年5月25日因霍乱症死于河南驻马店。



成为一个能干的传教士！’”<sup>i</sup>

一位曾任主教府院长多年的司铎说：“作为一个会士，他简直是一个模范，也超过我们。他非常爱慕修会，很敬佩创始人。他遵守会规和每日安排，真是一个好榜样。他在兖州时每天清晨去教堂进行早上的默想。弥撒后的感恩祷，他也在兖州的教堂做，而且经常长达半个小时。就连在最大的节日，那时所有人在大弥撒后都等待着主教，他也先去他的房间作感恩祈祷（虽然简短），而后才出来与大家谈话。

“在共同的早祷和晚祷以及在一切宗教活动时，他都准时到达，并与大家一起祈祷。在兖州大堂的一切公开的弥撒，他都跪在前面，跪在他的座位那里——所有人都喜欢他参加，但对他来说，这是相当大的牺牲。他每次都准时到，无论严寒酷暑，从不迟到。他就是兖州府堂区和主教府修会生活的核心。

“他也定期参加共同的休息活动。早饭是他一个人吃，在此之外他都来到共同的饭桌，直到他去世前十天。退职后<sup>ii</sup>他也参与共同的早餐。当时我是院长，我向他说明，他可以继续按照他的习惯在他房间里吃早餐；他对我表示感谢，也接受了建议。

“退职后，他问我——因为我是当时的院长——他是否能在他的房间保留一点钱，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穷人来，他想给他们一点东西。我那时感到很惭愧，因为我们的老主教以前给我那么多资助，而现在他在这方面还问我是否允许。他也不要再在房间放什么食物，因为他是一个修道人。但是，在收割葡萄的时期，他还是会接受修道生带来的葡萄。”

---

i 见《戴家庄通讯》（*Mitteilungen für die Region Taikiachuang*），1939年，188页。

ii 译者注：韩宁镛于1935年退职，舒德禄神父成为兖州的新主教。

韩宁镐主教很喜欢使徒般的神贫，很多人的报告都提到这一点。一位传教士写道：“安治泰主教去世后20年，韩宁镐主教有一次指着他的马褂说：‘这是我前人的遗产。我在家时每天都穿它。’他很爱好神贫，也很长时间都穿着另一些从别人那里得到的衣服。不过，衣服虽然旧，但都很干净。”

一位修女也提到同样的衣服：“当我第一次见到主教时，他穿着一件相当旧的灰色的棉茄克。我们后来多次给他补过这件衣服。六年后我们将里子转到外面，而主教依然继续穿了它好几年。据我观察，这件衣服已经穿过二十多年了。”

在避静时，主教告诉传教士们说：“所有的伟大的传教士都很爱好神贫。”

如果一个人想爱好神贫，他必须是一个谦虚的人。韩宁镐主教拥有如此高的地位，他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祝贺，那他是一个谦虚的人吗？

他的传教士们说：“在视察的时候他喜欢教友们很隆重地欢迎他。如果一切祝贺活动都进展得很顺利，他不容易拒绝这些仪式。”

他认为，这是新信徒的机会，他们可以这样公开地展现他们的信仰，可以很高兴地庆祝他们的身份，并且可以充分地表达他们对会长上的尊敬和爱戴。

他也意识到主教的尊威和他自己的能力，不过他从来没有特别强调过他是长上。本来他的才能给他很大的权威，然而，他却以质朴的方式赢得了所有人的心。

一位老传教士说：“在我一生中，最喜欢韩宁镐主教做我的长上，因为他很客观，有男子汉的风格而且有使徒的精神。”

我们在上面提到过，他的属下也会批评他，而且不是没有理由的批评。不过，他们从未说过他是一个自私的人。恰恰那位最多地批评他言辞粗鲁的传教士说：“他的一生是为上主而服务的，他为上主的光荣和灵魂的得救完全地奉献自己。”

韩宁镐主教在良心上也深感责任重大，所以他也会看到他工作中的缺点，这也使他更加谦逊。有一次他向总会长写信：“我今天读到救世主的话：‘最先的将会成为最后的！’这是对我们这些主教说的。我也感觉到，救世主的话是多么真实。到明天，我当主教就满22年了！您不知道，我曾多少次渴望死亡——但这不是出于牺牲或高尚的精神。愿上主可怜我这个罪人！”

当别的传教士颂扬他的工作或修会时，他也不高兴。有一次他向总会长表明了这样的想法：“我也知道我们修会不应该忽视自己的名声。为修会的成长和工作，这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太高估这些，而我有时候感觉到，某些会士在这方面太过夸耀自己——请您原谅我这些坦白的話。我想那些年轻的传教学专家和传教作家在宣扬进取和竞争的影响下似乎走得太远了，我可以理解这一点。我自己始终感到，我们应该谦虚。我了解我们的传教区，我也知道，如果人们说它是一个‘繁荣的传教区’，这真是没有多少根据。每当听到这个说法时我都感到不舒服。当然，如果我这样说，我也特别注意到两方面的匮乏：钱和老教友。”<sup>i</sup>

“人们太夸耀我们！”这也是他多次说过的话。

---

i 见1925年4月4日的信。译者注：山东南界没有很多“老教友”，唯一的地方是阳谷的坡里庄。“缺乏老教友”也意味着没有很多本地的圣召，没有很多本地的神职人员和修女，没有传统的力量和恒心。

韩宁镐主教不想依赖别人的支持，他更信靠上主的协助。他以优美的言辞一次次表达了对上主的信赖。在1926—1928年的灾难时期后（“洪水淹没了多半地区，再加上战争、强盗和三年饥荒”），他在《年度报告》中仍然写道：“虽然发生了这一切，我们仍不应灰心丧气。因为沮丧是违背基督精神的态度。基督精神会在艰难的日子里期盼最后的胜利，而我们可以依赖于神圣创始人耶稣的话：‘不要怕，小的羊群……我克服了世界！’<sup>i</sup>沮丧的情绪也违背传教精神，因为传教精神是勇敢地向前奔驰。<sup>ii</sup>基督宗教的乐观态度根植于超自然的信仰基础。苦难只是对传教士们的考验，而这些苦难也会带来上面的恩典和降福。”<sup>iii</sup>

他认为，传教士对上主应有特别大的依赖，所以他向总会长写道：“我想我们的传教士有更多机会来表达对上主的依赖。好景刚刚来了，马上又出现一些没有人想到的危险和麻烦。我们这半年以来就有这个体验，但同时也很实在地感受到了上主的保护。在这些困境中，教会成了外教人和基督徒的避难所，而教会的和平也受到各方面的尊重。教会能有效地进行沟通并成功地预防流血冲突。”<sup>iv</sup>

当格兰德尔总会长向他说出自己的忧虑时，主教回信说：“我们的创始人也曾经经历过很困难的时期。他是一位依赖上主的人，充满期望的人。愿他给您祈求神圣的安宁、磐石一般的依赖和足以承受一切的力量。最后，我们修会的现在和将来都在上主的手里。我们若将人间的聪明、有远见的指导与人为的努力加起来，其力量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将你

---

i 译者注：见《圣经·路加福音》Lk 12: 32。

ii 译者注：见《圣经·斐理伯人书》Phil 3: 13。

ii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28年，第65页。

iv 见1926年5月11日的信。

的忧虑托给上主吧！’<sup>i</sup>——我当然自己也知道，说起来容易，而做起来难。如果压力和黑暗来自各方面，人间的忧虑让我们感到害怕，并侵蚀我们的理性，这样做真是很难。我们将会为您祈祷。”<sup>ii</sup>

他对他的外甥，这位德国的司铎，也谈到这一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上主对我们生活的指导是一个多么有意义的问题。我们年龄越大，就越能清楚地看到上主在生活中为我们指出的道路。‘我要永远赞颂上主的仁慈！’<sup>iii</sup>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们父母和老师的印象。我经常思念我的父亲，他真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虔诚信徒！我们的母亲也多么辛苦啊！愿上主赏报他们一切所需！”<sup>iv</sup>

“明天是我初领圣体50周年纪念日，而圣神降临节将是我晋铎40周年的日子。我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犯过很多过错和罪，其中有很多艰苦和忧虑，获得过上主的仁慈和降福，也经历过阳光和黑暗。我的命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以前我有时候抱怨说：‘我的天主，你为什么引导我走这么坎坷的路？其他的人反而能在平坦的道路上轻松地迈进！’然而，现在我由衷地说：‘感谢天主！’上主安排一切。另外，我知道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有十字架，不仅仅是在传教士生活的道路上。”<sup>v</sup>

韩宁镐主教的性格中特别散发着人格魅力的，就是他有一颗感恩的心，他在一切事上都表示感谢。他一生中必定多次写过求助信，但他在表

---

i 译者注：见《圣经·伯多禄前书》1 Petr 5: 7。

ii 见1934年1月9日的信。

iii 译者注：《圣经》的话语。

iv 见1923年7月23日的信。

v 见1925年5月20日的信。

达谢意方面从未懈怠。他在几十年内确实写过几万次感谢信和感谢卡片。他愿意为每一个奉献都说声谢谢。早在第一封通信中，他告诉他的传教士们：“请你们也不要忘记向我们的恩人写感恩信；为最小的礼物也要说声谢谢。一句善良的话，一幅小画图或一个小礼物，都会保持友谊，并在将来会给我们打开门。”<sup>i</sup>

“我的《年度报告》首先是表示谢意的信。”他说。32年里，他每年都发表《年度报告》，可贵的是他每次都用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他说：“传教士——特别是传教主教——有着奇特的命运。他必须工作（这一点与一般人无异），他必须接受挑战，甚至必须准备当殉道者，准备牺牲性命——如果这是上主的意思。不过，在此之外，为了乞求资助，他还必须亲自或通过代表去很多地方，好为司铎和为传教事业获得日常的生活费用。

“‘在别人的楼梯中边走边乞求钱’——这一般来说不是很舒服的工作，虽然我在这个时候也发现过很多令人感到欣慰的事。但是，表示感谢始终是很畅快的行动，所以我很乐意说谢谢。因此，我每年向我们的恩人和朋友们写《年度报告》，这令我感到很快乐；我也真希望，我能在其中充分说出我为他们在祈祷中所祈求的降福、我的尊敬和谢意。”<sup>ii</sup>

我们能在一份《年度报告》中读到：“这真是一种令人感到安慰的体验，也许只有我们传教士有这样的体验：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人信任并协助我们。即使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所支持的事业。这是慷慨的爱，它在被奉献的礼品中得到彰显——这些礼品因人们的辛劳和牺牲而升华，而恩

---

i 见1905年2月10日的通信。

i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10年，第69页。

人的关爱有时候是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关爱——这是跨越时代的、神圣的忠实。这种无私的牺牲和爱，我们恩人的奉献——只有上主知道这些牺牲的超自然价值——是一个福源，而这个福源能激励传教事业的推动，能促进传教士们在遥远地区的工作。我的《年度报告》向这些朋友和支持者们表示感谢。”<sup>i</sup>

我们再听听《年度报告》中的一小节：“如果中国大城市中或在火车车厢中的外教人老盯着一个年老的传教士或讽刺他一下，他偶尔也会感到孤独。他在几十年前为了这个民族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也为这些人奉献了整个生命，而现在仍是一个‘老外’，不太受重视。但是，这个感受仅能持续片刻，因为这个传教士马上会说：‘不，我不是一个孤独的人；我有我的上主，他永不离开我。我有我的羊群，我为了上主召集他们；更多的是：我在全世界有很多朋友，可能很少人会有那么多朋友。在家乡有多少可爱的小孩子，他们在为我祈祷，他们举起他们稚嫩的小手，为我捐献一点点钱；有多少热心于公教的男人和青年，有多少善良的妇女，他们的关注和照顾围绕着我！愿上主报答您一切所需，我们只是他的穷困仆人，他是无限伟大的，而他许诺那些帮助使徒的人将获得丰厚的赏报。”<sup>ii</sup>

韩宁镐主教也一直要求他的传教士们为恩人祈祷。他认为，一般的建议还不够，所以他作了具体的规定。他要求各个机构（如老人院、孤儿院、大小修道院和麻风病院）做一些祈祷。他给修女们写道：“孤儿们应该每天上午和下午为我们的恩人至少念一遍玫瑰经。我们欠他们这些

---

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27年，第65页。

i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23年，第37页。

祈祷。我们有那么多孩子，他们也应该是祈祷的人，应该为那些给他们吃的、穿的的人和所有的恩人作祈祷。”

他一直向修女们说：“修女们，如果你们能多在圣体面前朝拜，这是我最大的快乐。修女们和院子里的贞女们应该专心致力于主教交待的任务、为传教士们和我们的恩人祈祷。”

修女们说：“韩主教多次吩咐我们做特殊的祈祷，尤其是为去世的恩人。他也向修女们表示感谢，因为她们为传教工作奉献了自己。他最后在向修女们写的信说：‘我只是一个无用的、卑微的工人，主的工人，我也没有赏报，什么也不能给你们。不过，我在每天的弥撒和祈祷中都祝福你们。请你们为我祈求上主的恩宠，让我在最后几天弥补我在上主葡萄园中所犯的错误，并让上主的恩典保护我，直到死亡的时刻。’”

在祈祷方面，他也重视榜样的作用，超过了教训。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他在修院和公开的弥撒中几乎是宗教生活的核心，是一个榜样。在此之外，人们经常看到他在教堂中祈祷，所以基督徒们称他为“念经主教”。

人们曾这样描述他：“他始终在教堂念他的日课。人们从来没有看到他走着念日课。下午两点以前，他去教堂念第二天的日课。他能在圣体前跪着祈祷好几个小时，他很专心地做默想。他在圣体面前的姿态都很庄重，从不随便。他每次做屈膝礼都很专心，甚至在高龄时仍然点地，接着他就小声地念“吁，神圣的筵席”这首圣歌，然后开始在圣体前的祈祷，他为此用祈祷本。在那些隆重的、能获大赦的节日，他经常去教堂很长时间，祈求炼狱灵魂的赦免。他最喜欢念玫瑰经和连祷（Lauretanische Litanei）。”



他举行弥撒时都很谨慎和严肃。在遵守礼仪和细节方面（如在教会法律方面），他几乎有一点过于拘泥，他害怕犯错误，因此，一切都必须是准确无误的。那些在大弥撒中当副祭的司铎们经常会体验到这一点。但是，他们都十分肯定他的专心态度。弥撒后的祈祷，他也谨慎对待。一般都是半个小时，如果有人等他，他还是至少会念经15分钟。有一次，他在外面一个传教点举行大弥撒并去他的房间做感恩祈祷。教友们来了，并要求见主教。当地的传教士叙述：“因此，我就进去，发现那70岁的老主教跪在他的床前，他专心地祈祷。我说‘对不起’，因为我打扰了他，并说教友们想见他。然而，他说他要先念完他的感恩祈祷。后来他才去见教友们。”

他曾给他的外甥写信道：“你在上一封信中关于神圣弥撒所说的话，我很欣赏。我们司铎们应该始终意识到，我们手中的奇妙宝库是什么。我特别谢谢你，因为你为我举行了一台弥撒。

“我前几天给我们的中国修道生讲避静。他们今天接受了第五个铎品。我一般亲自讲这些避静，因为我要让这些年轻人知道，司铎的铎品是多么重要。”<sup>i</sup>

在这一节的开头，我们看到了韩宁镛主教性格中的坚韧，而我们将以他的仁慈来结束这一章节。虽然他有时候得罪人，但在他的个性中也有另一面：他拥有坚强的意志，能不懈地工作，还能奋不顾身地牺牲自己，同时也对别人表达出慈母般的关怀。他在内心中想安慰别人，让他们感到舒适愉悦，这是他的渴望，他很自然地做着这些。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听到很

---

i 见1924年4月5日的信。

多例子，这里只补充一点。

在他的传教旅行之前，韩宁镐主教叫他的传教士司铎、修士和修女们给他写下他们家人的地址。当他后来去德国时，他尽量去见传教士们的亲戚或者通知他们在哪里见他。他向那些亲戚致以问候，也马上与他们一起写卡片给山东的司铎、修女或修士。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但传教士和他们的家人都很高兴。

每一位传教士也都获得过主教亲自写的主保节贺卡——尽管当时在山东传教的会士有时候达到一百多人！这些贺卡的内容不是一般的标语，主教为每一个人写了一些适合他的东西，一些劝告和鼓励。一位传教士说：“30年以来，他给我写了117封信。通过大量的信件来往，他在传教士中有着良好的影响。”

这也是他写信的一个高尚之处：他在信中始终要对收信人说一句安慰的话、悦耳的话或令人振奋的话。当他给罗马教廷写信时，他也同样写这些话。他在兖州教区的接班人舒德禄主教曾写道：“他写信的风格非常好，他也到处给别人留下很好的印象。他能顾及他人最微妙的感受。我们以前的总会计卡尔·弗里德里希神父（P. Karl Friedrich）——韩宁镐主教通过他向罗马当局提交了一些申请——曾经就这一点向主教写道：‘您给传信部写的文件，我交给了他们。您的文笔有一个好处，就是，您一边很清楚地说明问题，同时也说一些动人的话，所以读者感到很舒服，并将答应您的申请——圣奥古斯丁也有类似的文笔。我将很快能将您的问题告诉传信部的总秘书。那位枢机也很尊敬您和您的工作。我们因此也感到慰藉。’”<sup>i</sup>

---

<sup>i</sup> 见总会计弗里德里希（Generalprokurator P. Friedrich）1929年10月13日的信。

与世俗当局打交道时，主教也展示一种博得人心的人格魅力。在纪念韩宁镐主教晋铎50周年时，一位传教士在《斯泰尔传教通讯》中写道：“传教区的巨大进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主教与德国、中国的官员——高级别的和最高级别的官员——的良好关系甚至是友谊。”

达麟干神父在他的短小讣告中说：“他那种博得人心的热情使他在中华的高级和最高级的官员中赢得了很多朋友。我有一次看到，他去南部时与那个省的总督成了朋友。如果有机会，他还定期地去拜访各地的县官，但他都单独一个人去与他们谈话。如果一位官员来看他，他也一个人接待他们。他这样做大概是因为他想自由地与官员们谈话。

“一个地方的官员——他也许从来没有看到过外国人——不太客气地接待当地的传教士，而那位传教士也不太会打交道。然而，当这名官员见到韩宁镐时，他很惊讶。他与韩宁镐交谈了很长时间。因此，韩宁镐主教还错过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宴席。那个官员在衙门接待他。从那时起，官员也很客气地接待当地的传教士了。

“他也会在陌生人当中很巧妙地影响其他人。有一次，他请一些老官员和候补官员吃饭。他们一开始不太注意到主教，但后来他们都听他的叙述，因为他的话都很有道理和智慧，而且他对人们表现出极大的友情。在另一个地方，他与外国人在一起，而效果也是类似的。我赞扬了他，而他却说：‘我们都应该发挥自己的长处！’

“实际上，他在这些场合中始终是一位传教士。他巧妙地插一些很简短但充满意义的语句，而这些句子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它们来自一位年老的欧洲主教。当然，这些说法不会马上使得一个官员入教……这样，韩宁镐主教无论去哪里，都能有良好的气氛和对基督宗教有利的态度。有的传教士几十年后还因此获得好处。”韩宁镐这个传教士和教会代

表是如此对待高层人物的。

一位传教士说：“他首先是穷人和受压迫人之父。穷人始终可以来看他，无论他在哪里。他们甚至可以来到他个人的卧室。主教府中有的人不喜欢这种做法，但他不容许这方面的限制。在最后几年，院长神父以主教的名义接待穷人，因为主教已经完全失聪。

韩宁镐对每一个穷人和病人都有安慰的话，也给他们一点东西。他与他们谈话时就像一位仁慈的父亲与孩子们谈话。当他在外面旅行时，他也与路边的乞丐说话，表示他的同情。当他在外面进行视察时，偶尔会有一些孤儿来到兖州，手拿着主教的纸条。主教在外面接收了这些孤儿，让他们去兖州的孤儿院。他也同样接收一些患麻风病的人。有一次，他在路边见到了一个患病的乞丐，还亲自带他来主教府。在那里的人反对主教接纳这样的人，但是主教依然坚持他的意见。

当他辞职后（1935年后），麻风病院的护士安增华修女（Narzissa）<sup>i</sup> 求他接纳一个11岁的患麻风病的男孩入麻风院。主教已经交给潘院长接纳病人的权力，所以他给潘院长写信道：“尊敬的、可爱的院长神父！我要接纳这个孩子，这将是我最最后的恩爱行动之一。因此，我因上主的名求您，允许他进来吧。请您照顾他！请看最好用什么办法接待这个可怜的小孩！”

他认为，仅仅将孤儿和病人放在慈善机构里是不够的。当他视察完回到兖州时，他迅速去看这些新人。他认识麻风病院、老人院和孤儿院中所有的人，也知道他们的家庭背景，他的记忆力非常好。他特别喜欢去孤儿

---

<sup>i</sup> 译者注：安增华修女（1880—1957年），德国人，1905—1952年在山东传教，曾在坡里、戴家庄，1930年后在兖州东南冠庄堡的麻风病院中工作。她于1957年在斯泰尔去世。

院，而那里的孩子每次都兴高采烈地欢迎他。最好的孩子往往是被父母遗弃的婴儿，虽然修女们予以他们良好的照顾，但他们有时候仍不能很好地成长。这些孩子的健康已经不能完全恢复。韩宁镐主教劝修女们特别关注这样的孩子。

主教最关心的是病人。他每天去看兖州主教府中患病的司铎。如果他知道在外边有一位传教士生病了，他一般会派遣一个人送他一封信、一些罐头或者一点葡萄酒——为了让这个病人感到快乐。

当他已经71岁高龄时，他还去河南拜访那里的老法来维主教（P. Froewis）<sup>i</sup>，因为他也生病了。他自己向总会长神父写过报告：“万圣节前夕我从河南回来了。我们获知了法来维神父病重的消息，而且他单独一个人在那里。另外，他的死亡将会引起一些重大的并且需要迅速决定的问题。再加上，那里的新传教区这几个月里遭受了很大的打击，所以我认为我必须马上回复这封电报。我启程，去信阳州，并从那里去广州（潢川），又是15个小时的路程，因为病人就在那个地方。

“我到那里时，发现危机已经过去了，感谢上主。法神父在炎热的时期没有休息好，没有顾及自己的身体，而去视察许多周围的基督徒团体，这样他患上了严重的症疾，且几个星期不能消除这个病症。当我见到他时，他逐渐恢复起来了。您6月份写的信也让他感到很高兴。”<sup>ii</sup>

他在兖州时我也去拜访患病的修女们，甚至每天都去看望她们中间患重病的人。在外面的传教点工作的修女们如果患重病，他也写给她们安慰的

---

i 译者注：法来维（1865—1934年），奥地利人，1884年入圣言会，1893年被祝圣司铎，1894年来山东，曾在莒县、诸城、高密、胶州、日照传教，于1923年率领四位传教士到河南信阳，1928年任信阳教区的代牧，1934年11月11日在信阳去世。

ii 见1933年11月6日的信。

信并送给她们一些食物。

有一次，修女们叫韩宁镐主教来看望一位患伤寒症的修女。这位修女因病重而神志昏迷，产生了很多幻觉。当主教进去时，她认出他并大声说：“主教，主教！在德国的明斯特和曼海姆（Mannheim）爆发了起义，都是因为我的缘故！那里很混乱，我必须去，我必须去使那里恢复平静！”主教立即说：“什么？有起义？修女，您说得对，我们必须帮忙！我马上去，您在这里等等，我们要恢复秩序！”说着他就跑出病房了。下午他又来了，那位修女就殷切地等待他，而主教说：“修女，感谢上主！明斯特和曼海姆的情况已经完全平定下来了！”这个修女一听就放松了，她终于消除她的幻觉并能够入睡。

主教认为，修女们首先是慈善机构中的助手。为此，他支持她们，为她们的修院和团体做了很多事。

修女们报告说：“他对我们和对我们的女学生而言是一个好司铎：他很客气，又庄重冷静，不多说话。有时候他甚至非常淡薄。有一次，一位修女向他申请一些资助，也对为什么需要这笔钱作了详细说明。他只是说：‘这里是你们的钱，但不要马上再提出要求！’”

但是，他多次提醒修女们善待穷人、病人和乞丐。偶尔他会突然问：“修女，您刚刚给了这位穷妇人多少钱？”如果他认为所给的施舍不够，他就会批评这位修女。一位修女写道：“他好像认为，我们的棉衣是很多的，随时可以给穷人一套。我们听他的话时就能意识到，他非常同情人们的困难，他很悲伤，因为他不能提供足够的帮助。他多次说这句话：‘如果我们自己处于这些穷人的境况，我们将会有什么感受？’”

那些当副祭的司铎们报告，每年在圣周四晚上的大弥撒中，年迈的韩

主教都举行洗脚礼仪。他选出12位上了年纪的老大爷，并在弥撒中给他们洗脚——这是纪念基督的行动，因为他那天也给他的门徒洗脚了。<sup>i</sup>最后，韩宁镐主教也以最严肃最尊敬的态度亲吻老人们的脚，这个动作给在场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弥撒后，这12位老人来吃饭，主教亲自招呼他们。然后，主教便离开饭桌，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在场，那些人不敢吃很多。最后，主教又回来，很平易近人地与他们谈话。

当他最后一次完成这个仪式时，他给主教府中的司铎和修士们讲道理。他以动人的言辞谈论基督的爱，基督在其痛苦中的爱。他说，耶稣为灵魂们做了那么多事，所以，我们也必须有感恩之心，必须爱慕那些灵魂，必须为他们作牺牲，为他们接受痛苦。他的结论是：“是啊，我们要爱慕中国，也要爱慕中国人！”

在半个世纪内，奥古斯丁·韩宁镐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他以传教士和传教主教的身份在言语和行为上爱慕中国人，并为这种关爱耗尽他的全部精力和生命（sein Leben in dieser Liebe aufgerieben）<sup>ii</sup>。他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

“最大的却是爱！”（Maior autem horum est caritas!）<sup>iii</sup>

青岛的维昌禄主教——在兖州府的大修院并且在韩宁镐主教的指导下工作了20年，有机会全面观察韩主教——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这样写

---

i 译者注：见《圣经·若望福音》Jn 13: 5。

ii 译者注：德语原文的aufreiben难以译成汉语，其意义为“让自己粉粹”、“被磨破”、“被擦伤”、“消耗精力”。

iii 译者注：见《圣经·格林多前书》1 Cor 13: 13。

道：“一位虔诚的修士在我1930年去欧洲时对我道：‘韩宁镐主教是我们修会最神圣的人物之一。’我想，这个修士说对了。”



## 第二节 在上主内获得成全

奥古斯丁·韩宁镐原来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少年，当他被祝圣司铎时，他还是又矮又瘦。但是，传教生活后来强迫他多次外出，冒着严寒酷暑锻炼身体，还说他身体有“钢铁般的抵抗力”。

他的生活与其他传教士一样，只有在“睡觉”方面，他有自己的规律。他每天晚上八点三十分就去睡觉，睡七八个小时。他不会改变这个习惯。即使在特殊的日子，比如来了一些地位很高的客人（如教宗特使、主教或高级中国官员或德国官员），他也不会因此而改变他的就寝时间。他将于八点半告别那些谈话愉快的客人。传教士们认为，主教的身体就因为这个习惯而变得强壮。

他偶尔会在信中提到他的身体状况，但总体来看，这些章节不多。他在1923年向给的外甥写信说：“我现在61岁，当了传教士37年，当主教19年，仍感到很健康和强壮。我可以承受相当大的任务和重担，所以我们的年轻传教士们偶尔会说，我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然而，我原来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小男孩儿！我从来没有患过严重的病，只有一次患了疟疾。还有一些小小的疾病，但在这里的人都会有这些小问题。

“今年冬天我又和平时一样出去视察几个月，这次乘坐一辆中国式的车。真是一种辛苦的生活，不断有变化，有工作，有不平安的情况出现。

不过，我始终重视我晚上的睡眠，这样我第二天就又充满力量。”<sup>i</sup>

然而，伤寒症于1926年的秋天侵袭了主教，几乎杀死了他。他领受终傅圣事并向所有人说，如果他得罪了他们，请宽恕他。他也承诺说，如果上主保护他的性命，他将会更努力地工作，并更忠实地完成一切任务。他出乎意料地度过了这个危机。他私下告诉维昌禄主教，一个虔诚的信徒为他牺牲了生命，因此他能恢复健康。在那个时期他向总会长写信道：“我能再次写信，马上想给您写一封表示感恩的信。您的圣诞来信让我非常高兴……上主仁慈的天主还给我生命力，他大概还想让我改正我的过错，当我患病时，我也作了这样的许诺。患病真是一个获得恩宠的时期……这样的病也会表明人的心中有多少爱。当我接受终傅圣事时——这在我一生中是第一次——我因那些美好的恩宠和祈祷感到安慰。”<sup>ii</sup>

两年后他向他的外甥写信道：“人们说，我还有年轻人的精力。但是我的听力逐渐下降，而且在此之外还有别的现象表明我老了。在一些安静的时刻，我经常反省我的童年。我比以前更深地意识到，我从父母那里获得了很多！很多老人曾在晚年写他们青春的故事，现在我不再觉得奇怪。秋天的太阳有一种特殊的、升华的光芒。”<sup>iii</sup>

接下来的几年中他还在持续不懈地工作。三年后他向亲戚们写道：“圣诞节的前夕我回来了，我去视察了两个月。这次旅行比较难，因为我着凉了，由于腰痛，必须弯屈身子行走。但是这不是影响器官的疾病，所以我不管它，只继续做好我的工作。只不过我必须坐着讲道理，不能

---

i 见1923年2月8日的信。

ii 见1927年1月17日的信。

iii 见1928年10月29日的信。

站。”<sup>i</sup>

同年年底他写道：“我很清楚地感觉到我老了。今年夏天热得不得了，而在这里我们不能去避暑。工作和忧虑总不会停止。然而，如果我抱怨也是不公道的。上主赐给了我那么多，远超过别人：时间、健康、力量、才能和恩典。当我们的创始人——我有时称他为‘我灵魂的父亲’——达到70岁高龄时，他赞颂上主圣三。我也应该表达同样的赞颂，虽然我绝对不能与那位圣人相比。现在还需要一个东西，需要一切恩典的冠冕：一个幸福的回归！”<sup>ii</sup>

主教于1933年6月份讲了一次避静，我们还保存着他的手稿。通过这些话语，我们能窥视那位71岁司铎的灵修生活。他利用耶稣会会士勒夫勒神父（P. Loeffler）的《避静书》并写道：“默观耶稣的公开生活以及后来他抛弃自己的反思，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耶稣的公开生活是很辛苦的！你想想当时的沙土路，酷热的太阳，树木不多，夏天那么热，那么长，很多害虫，蚊子、苍蝇……群众不断围绕着耶稣，其中有穷人、乞丐、附魔的人，想一想那些疾病、臭味、人们的要求，耶稣的食品不丰富，他多次旅行、步行，不能睡觉，晚上祈祷，他的住宅破旧，没有成功，法利赛人的敌意，等等。这一切也应是我们的传教士们的经历！”

“说到全面否定自己：如果我不严肃地对待这一点，我的生活就是一场玩世不恭的游戏。我们‘玩’避静几天，但又有什么结果？”

“只有一样东西能救我：许多热心的祈祷，反省自己，特别重要的是认真地省察自己的罪行；这个省察必须按照一些具体的观点进行。去年

---

i 见1932年1月10日的信。

ii 见1932年10月16日的信。

已经讲到‘惭愧和悔改’的问题。因此，现在在避静结束后马上开始：吃饭—读书—简短祈祷，再加上手册中的祈祷。

“吃饭：早上，一块面包，不要加很多别的东西，或只吃面包；中午和晚上，不要两次拿菜，因为第二次几乎都太多了。下午，不吃，最多吃一点点；晚上，一碗汤，其他很少；星期五上午，不吃，守斋半天；星期一和星期六，早餐不吃肉，晚上也不吃或吃很少。关于这些都要作特殊省察！”

“阅读：不要看小说；报纸只看最重要的，我应该读15分钟，最多读30分就要结束；杂志仅看那些有价值的东西。

“善用时间：晨间祈祷后马上开始一天的工作，写信或阅读其他比较大的文献；如果还有时间，看一本严肃的书。

“来采访的人：客气地对待他们，不要失去耐心，花一点时间，特别对妈妈们，不要太快送她们出去；当乞丐打扰你时，不要生气，保持平静的心；不要先骂而后施舍。

“在说话方面：要特别强调自制，先思考再说，客气和蔼地说，注意对方的兴趣，同情他，承认所存在的困难，不要否认困难；不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不作粗俗无情的判断，不以严厉的言辞引起人们的反感，也不要引起陌生人、外教人、基督徒的反感——多花一些时间！这方面也必须作省察！如果犯了错误，要进行自我惩罚！”

“通过简短的祈祷与上主来往。上午至少去朝拜圣体一次，也许可以拜苦路。吃午餐后去一次，一点半再去一次，尽量念第二天的早祷；祈祷时必须要有端正的姿态。练习在上主面前行走！”<sup>i</sup>

“念日课：先准备，不要太快，不能敷衍了事，在‘愿光荣归于父’”

---

i 译者注：见《圣经·圣咏》Ps 56：14；《圣经·创世记》Gen 5：22、6：9、17：1等。

那里停一下！

“晚上：认真作省察。

“非常不好的表现是：我几乎接受我随便的态度，这样便不会有真正的改进。虽然我清楚地意识到：‘你如果不强迫自己，你就不会有进步！’但我又在某些方面很随便，我不追求高尚的，不追求最高尚的，我自满自足，我放弃了一些以前养成的好习惯。

“只有一个方法能真正荣耀上主：严肃地追求神圣，努力成为圣人。

“选择：辞职？重新分开传教区？在这些问题上，我个人的利益不可以成为决定因素。我应该追求那些对我自己而言更不舒服的、更不光荣的事。愿圣神让我们选择正确的时刻，不要让我们由于个人的问题而安于现状！

“努力：勇往直前！在我年老的时期不要休息，不要自满自足。我知道，作了自我否定和苦行后，我容易骄傲。但是，我必须往前走，必须实践这些。放弃肤浅的生活，放弃还未被净化的生活，无论是在食品、饮料、阅读、姿态、言谈、时间管理方面。再次省察自己！

“我希望，这些神圣的锻炼对我有好处，它们使我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人。救世主啊！求你垂允你老弱、无用仆人的这些祈求！

“我真是一个可怜的人，还是在开头，还是在第一个星期！我们的创始人很不一样！他完全投入耶稣圣心和圣三的旨意。我反而只是转来转去，没有进步；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来又停下来。现在我面临最后的时刻？上主，求你可怜我这个罪人吧！给我真正悔改的恩典，让我坚持到最后，赐我善终之恩！玛利亚，恩宠之母，保护我们免受敌人的攻击，在死亡的时候接受我们！”

在这次避静中，主教决定向罗马传信部那里请求辞职，因为他逐渐耳聋。对于这个请求，他向总会长这样写信：“关于我辞职的事，我在良心

上觉得，这对教区来说更好。在年老的时期有某一个期限，而过了这个期限，人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他的任务；那时，他就应该让年轻人来任职。人们很容易被自己所欺骗，认为自己还能继续，但实际上应该离开。我经常感到，这个时刻来到了，而一直没有提出申请的原因是我想上主很快就会结束我的生命。但是，他还在等着，所以我就必须作出这一步。”<sup>i</sup>

四个月后——1934年1月——他知道，传信部拒绝他的申请。再接再厉吧！复活节后，他给亲戚们写信：“我在圣周的三大节日举行一切礼仪：周四祝圣圣油，送圣体；圣周五我讲道；周六也有很长的礼仪。也还不错。”<sup>ii</sup>

他也告诉他的传教士们，他想退位。他们劝他先选一位副主教。他回答：“不要。我问过两位主教——他们都有副主教——但他们都劝我不要有副主教。”

他又重新提出辞职申请，而这次——1935年6月——传信部同意了。传信部显然想等到他的司铎金庆（1935年5月30日）过去。主教告诉总会长说：“我本来更希望以主教的身份去世。但是，因为上主给了我那么长的生命，我必须对传教区负责任，我不能继续阻挡更有力量的人的路。”<sup>iii</sup>

尽管如此，他还必须继续管理教区，因为他的接班人舒德禄蒙席于1937年1月4日才获得罗马的任命书。老主教马上让出了他自己的房间和他的权柄。

舒主教写道：“他全部都交给我，并不再干涉教区的指导工作，虽然他还将继续在主教府住两年。当人们咨询他时，他很乐意地回答他们，但

---

i 见1933年9月16日的信。

ii 见1934年5月15日的信。

iii 见1935年6月28日的信。

他不干涉事务，始终保持非常自制的态度。他也不判断某些与他无关或违反他意见的事。”

1937年4月4日，他祝圣了他的接班人。他自己向罗马提出了这个人选。这是他以主教身份进行的最后的职务行动。

他住在安治泰主教以前住过的两个房间里。另外，他有一间小小的个人圣堂，在那里也有圣体。他在这里进行了他个人的很多祈祷和宗教活动，但在主日和节日他都参加大教堂中的朝拜圣体礼。在弥撒时他需要一位副祭，因为他的记忆力减退了太多。他始终很担心那些细节和礼仪规则。

他还继续遵守一天的时间安排，也很努力地撰写《教理释义》的新版本。他还很喜欢去图书馆，并在他的桌子上放一些书。

他为他提供了一些资助而感到高兴。一位传教士说：“我必须在一个堂口修复一个小教堂。那里的教友不想捐钱，所以我面临困难。我想到我们的老主教那里去，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我运气很好；他马上送我50墨西哥银元（当时等于50马克）并写了一张纸条说，这钱来自他的弥撒金，这是他最后的钱，但他很乐意提供这些。当我告诉教友们老主教为他们的教堂给出了最后一分钱时，他们很感动，自己也纷纷资助。我们的工程很快就完成了。”

老主教比较孤独，他也曾多次思念他已亡的会士们。他曾多次去过戴家庄的坟墓，在会士们的墓前作默想。他在他司铎银庆后的《年度报告》中写道：“我做新主教后的第一个行动便是祝圣我们在戴家庄的坟墓，给那些原来暂且埋在别处的会士举行丧礼。我今天去我们坟墓的圣林探望了那么多人的墓，我思念这些会士们，也想到欧洲和本地的司铎和修士们为

传教区所做的一切，他们对我个人是多么重要的朋友，他们中有的人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和奉献。首先是难忘的福若瑟神父与其他的会长，还有德天神神父和齐恩来神父……每个墓都在述说着自己的故事、爱慕的言语，这都是充满痛苦和喜乐的回忆，也是感恩和祈祷的呼吁。

“我曾陪他们中很多人走到生命的终点。我曾为大多数人举行丧礼。他们都期待复活的日子。我们却在上主面前行走，我们仍是旅途中的朝圣者。”<sup>i</sup>

他也很喜欢去拜访病人，而他带给他们很多安慰和阳光。维昌禄主教写道：“我们的主教以前有点严格，但他现在变成了一个善良可爱的老父亲。”

1938年11月17日他在医院探访病人，在回去后中风了，但不是很严重。医生发现他血压有些高。在主教八年前去奥地利的圣佳伯尔修院时，人们已经提醒他注意他的血压，但他当时给亲戚们写信说：“我没有去找医生。科隆的舒尔特枢机说，这方面应该可以保持一种无忧无虑的天真，而不必太担心和挂虑一切小事。”<sup>ii</sup>

那天晚上，老主教接受了终傅圣事，但三天后他又能举行弥撒了。不过，他需要更多协助。因为他不喜欢修女们的照顾（当他患伤寒症时也是这样），护理修士李宝勤（Br. Linoldus）<sup>iii</sup>照顾了他八个月。他也帮助老主教举行弥撒，念日课，并通过他母亲般的悉心照料和乐观的精神带给主教很多温暖和光芒。

---

i 见《斯泰尔传教通讯》，1930年，第73页。

ii 见1930年9月26日的信。

iii 译者注：李宝勤（1894—1968年），德国人，1911年入圣言会，1921年来山东，在戴家庄任厨师、鞋匠、司机。1968年在斯泰尔去世。



1939年7月夏季的暑气击倒了这位病人，很快消耗了他的精力。1939年7月12日他举行了最后一台弥撒，从老勒泽神父手中再次接受了终傅圣事。

谭牧院长神父（P. Rektor Thamm）<sup>i</sup>第二天向他说：“主教，您要感谢上主，他给了您50多年在华传教的岁月！”主教一听这话就流泪了，慢慢站起来，走进他的小教堂——他最后一次去朝拜圣体中的救世主。他以动人的表情凝望着圣体柜。他说不出话，但人们听到他在呻吟：“耶稣啊！”

他去世前几天，教宗比约十二世的亲笔信也到达了兖州，同时也有传信部部长伏主教（Fumasoni-Biondi）的信。这里是教宗的信：“我们听说你55年里投身于在外教地区救人灵魂的工程中。当你任兖州府的主教时，你长期热情地照顾本地圣职人员，也成功地指导着本地的修女会。另外，你通过著书照顾人的灵魂，你的书一方面宣扬宗教的真理，另一方面也表明你对语言、文献和历史的认识。我们很尊敬你的这些努力和工作，祝贺你，并为你祈求天上的恩典、安慰以及长寿。我们给予你及你的亲戚朋友圣座的降福来表示感恩和我们的特殊关爱。罗马，1939年6月11日。教宗比约十二世。”

主教于1939年7月20日去世，这正是平安的睡眠。

韩宁镐主教的墓在戴家庄的圣林中。丧礼也表明主教深受敬重。几千人参与了丧礼，最高级的官员们也来了，也包括当地的日本将军。

五位主教主持举行丧礼。他们作了三次演讲：维昌禄主教在兖州大堂

---

i 译者注：谭牧（1895—1964年），德国人，1926年晋铎，同年来山东，1937年任兖州院长，1952年从兖州到德国，1964年在德国去世。

讲一次道理，舒德禄主教在戴家庄的教堂讲道，而济南的方济各会杨恩赉主教在坟墓那里作演讲。那位主教先对在场的传教士们说，韩宁镐主教是一个真正的司铎、修会会士和传教士，他是非常杰出的榜样；后来他又对中国基督徒们说，韩宁镐主教是一个伟大的主教和牧者。他要求所有的人实现韩宁镐主教的原则：“忠于圣教会，忠于公教信仰！”

### 第三节 最后的思考

奥古斯丁·韩宁镐打了一场漂亮仗，而这场赛跑，他已跑到终点。<sup>i</sup>然而，“我们还是人间的朝圣者，还在旅途中”。现在，我们应该让他在自己的坟墓里休息一会，让我们反思。

我们现在陪同他走完了他那77年的生命历程，我们目睹了他如何处理他的生活，如何利用他的精力。在他的书信中，他也让我们看到他的内在动力、他的意向、他的思想和希望。

这样，对我们来说，他成了一个我们认识的人，而我们应该也可以对他作出一个评价。这个评价会是什么样的？最简单地讲：“奥古斯丁·韩宁镐是一个彻底的人！”这句话也许能总结他通过工作、努力、刻苦、希望和追求所获得的、所完成的。他在各方面寻求一种彻底性：他想做一个彻底的人和基督徒，他想做一个彻底的修会会士和司铎，他想做一个彻底的传教士和主教。他讨厌一切不完整、庸俗的东西。但是，这种美德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从童年就造就的，不是在初学或晋铎时就有的；韩宁镐主教在他那种充满奉献和苦楚的生活中，在那两万五千个日子里为这些美德而进行奋斗。

这肯定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他的确面对许多外在的阻碍，也许超过其他的司铎和传教士所遭遇到的。他必须作出巨大的牺牲。他也感觉到这

---

<sup>i</sup> 译者注：见《圣经·弟茂德后书》2 Tim 4: 7。

一点并曾经几次在痛苦中呻吟：“上主啊，你为什么引导我走如此坎坷的路？”但是——这一点很伟大——他忠诚地、勇敢地、坚持不懈地继续追求生命的最后冠冕：他要做一个彻底的人。

这种意志力是他性格的骨骼。基于这个基础，他能在一切暴风骤雨中坚守他的理想，在每天、每个小时的工作中能坚持他的原则。

在此，我们看到，人们只能通过一个方法成为一个彻底的人，就是通过每天和每时每刻的责任感。人们经常发表一些庄重的诺言或给自己建立一些原则，但这些言辞和意向仍不是行动。人们都有好的意向，那些虔诚的人也每年从避静带回一大箱子好的意向；但是，每天的实践和行动才会显示出人的性格和人格。

这是一种英雄风格吗？我们应该考察奥古斯丁·韩宁镐，应该考察他的生活。

我们看到，他有工作的愿望，而通过他的工作意志他全力以赴并不懈地用尽了自己的才华、精力和时间。直到老年他还是主人的忠仆，是灵魂的使徒。他不敢休息，不考虑自己的益处。他的动机都是理想的动机，他的工作和关爱都是为了有益于别人的工作和关爱，他几十年担负起了他人的重担和劳苦。这是多么英雄式的刻苦和忠诚，多么坚强的意志力！

再看另一个细节！他每天——即使在冬天的视察旅行也不例外——都很早起来，按照修会规定作一个小时的早祷和默想。我们看到他在一个破旧土房子的草席上跪着，屋里没有暖气，只有一盏小小的油灯，我们也看到他在兖州大堂跪着，每天都是这样，50年如一日。这是多么伟大、多么动人的虔诚啊！他在一切司铎和修会会士的宗教任务方面都这样忠实，他在各方面都可靠、认真和谨慎。这难道不是最严肃的意志、最坚韧不拔的性格吗？

对奥古斯丁·韩宁镐来说，他在这些态度中看到“成为彻底的人”的方式。他没有别的方式。我们上面听到，他如何给他教区的司铎写了那封信。他劝他们成为不折不扣的司铎；但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只有这些：“努力工作；尊敬最重要的任务——日课和弥撒；每天忠实地默想；每天去朝拜圣体，念《圣经》，念玫瑰经，作良心省察；多次拜苦路；每周或每两个星期去办告解，每个月参加司铎们的退省，每年参加避静。”<sup>i</sup>

这是司铎和会士的神圣任务。在别的职业中有别的任务，但最重要的都是虔诚的心和认真的努力。这是关键。如果没有这些态度，剩下的只是庸俗，而这就意味着，一个人的生活不圆满。

对基督在人间的事业来说，那些庸俗的人就是不幸的，特别是那些庸俗的修道人。他们损害基督教的名声，因为他们被视为基督宗教的庸俗果实。

然而，基督的教训和榜样要求我们追求彻底性。“你要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sup>ii</sup>奥古斯丁·韩宁镐接受了这个召唤，他以坚强的、神圣的意志完成了这项使命。因此，他为那些严肃对待生命的人做了一个楷模。

不过，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发现他意志力的根源。维昌禄主教列出了他“性格最突出的特点”。他首先提到：“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的诚心。”

没错，这是人生一切道德价值中的泉源——诚心；因为我们的意志服从于我们的理解，更准确地说，服从于我们理智的观念。如果这些观念不

---

i 见1935年6月8日的通信。

ii 译者注：见《圣经·申命记》Dt 6: 5。

对，是错误的或自欺欺人的，那么我们的意志力在根本上就遭受挫折了。

因此，人需要结合理智和意志来实现诚心的美德。只有这样，人们才有人格和充分的道德价值。

如果一个人想做一个真正善良和正义的人，他必须拥有一颗很纯净的、坦荡的、直爽的心，对自己、对别人和对上主都必须是真诚的。如果一个人在这方面有罪并缺乏诚心，他就不能接近上主，因为上主是真理。

我们内心的声音、良心的声音都说：“就是如此！”但是那些真正纯净和诚心的人是多么罕见！在人间最常见的恶习就是谎言——谎言有很多表达方式！实际上，一切邪恶都来自谎言，但是谎言的力量统治着多少人的心，甚至影响着许多虔诚的人！我们面对那么多欺骗、伪善、虚幻、美妙的掩盖和装饰！我们很少彻底地跟随基督！

然而，如果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真实的人，我们会感到很舒服。我们也认识一个这样的人——奥古斯丁·韩宁镐。他整个性格，内在和外在，都是真实的，因此他获得了我们的钦佩。他那种强硬或乖僻的表达方式也是他性格的一部分，我们也应该接受。我编写韩宁镐主教的传记，若我不提到这些，他不会原谅我的。

## 附录一

### 韩宁镐主教在兖州大堂祝圣的山东司铎

1906年4月16日

伯多禄·张志一（张立贞），1879年生于临沂沂水，1907—1908年与韩宁镐主教一起去德国、美国，曾在寿张、郟城、胶州、高密传教，1944年2月10日于青岛去世。曾写过两本默想书、一本教理解释，也翻译过教宗的书。

1909年9月8日

道明·赵秀文，1878年生于巨野张家庄，曾在曹县、邹县、泗水、成武、东明等地传教，1932年后在济宁任总本堂神父，在教区拥有重要地位。

1910年10月4日

若望·赵鉴塘，1884年生于阳谷赵家台，曾在巨野、单县、曹县、定陶、宁阳、滕县、朝城等地传教，1946年去世。

1912年9月8日

奥古斯丁·李福诚，1886年生于微县赵家庄，曾在单县、曹县、诸城、胶州、张秋镇、郟城、嘉乡、邹县、曲阜等地传教，曾做翻译工作。

保禄·孙世楷，1885年生于安居镇吴家楼，曾在巨野、胶州、莒县、邹县、蒙阴等地传教，1934年3月16日在濮周去世。

### 1915年1月3日

达窠·张鸣峙，1886年生于慈阳（兖州县）西武寺（？），曾在鄆城、青固集、曹县、嘉乡、邹县、王家楼传教。

安博罗休·陈咸德，1885年生于菏泽县吴家庄，曾在红瓦屋屯（枣庄）、邹县、巨野等地传教。

伯多禄·郑秀亮，1890年生于宁阳县郑庄，曾在巨野、定陶、汶上、郓城、曲阜等地传教，后到陕西传教。

王玛窠，1886年生于日照县街头，于1898年因信仰受苦，后在观城传教，于1916年2月18日因病（大咯血）而去世。

类思·杨方盛，1887年生于巨野县杨家庄，曾在单县、莒县、高密传教，在高密小修院任教，后任即墨传教员学校的校长，1946年去世。

### 1917年6月3日

伍保禄，1890年生于曹县伍新楼，曾在汶上传教，1918年10月23日去世。

### 1918年6月9日

道明·姜德楨，1890年生于阳谷县范濮界，曾在峄县、景芝、临沂传教，1931年到甘肃，在武威、兰州、皋兰、西乡传教。

托马斯·田东来，1890年生于阳谷县张秋镇，曾在单县、王庄、巨野、诸城、范县、鱼台传教，1931年在戴家庄入圣言会并发初愿，1934年任阳谷教区代牧，后祝圣主教，1942年任青岛主教，1946年升为枢机主教和北京总主教，是亚洲第一位枢机主教，1948—1959年在香港和美国，1959年到台北，1967年7月24日在台湾嘉义去世。

### 1920年10月10日

若望·张睿川，1893年生于邹县，曾在单县、濮周、朝城、汶上、宁



阳、巨野传教，1947年去世。

伯多禄·郭隆庆，1893年生于曹县郭堂，曾在胶州、诸城、黄里、即墨传教，1947年(?)在青岛去世。

安德烈·董均禄，1892年生于菏泽县常乐集，曾在临沂、即墨传教，任即墨传教员学校校长，即默的总本堂，青岛大堂的本堂神父，1946年去世。

1920年，韩宁镐主教也祝圣两位美国来的圣言会传教士，即王金镜（Clifford King）和柯拉克（Robert Clark）神父。

#### 1921年10月23日

若瑟·张兴良，1894年生于临沂张家楼，曾在巨野、兖州、邹县、寿张等地传教，因患伤寒症而于1935年8月7日去世。

托马斯·徐相臣，1894年生于临沂郭家楼，曾在诸城、峰县、濮周、鄄城、单县、郭堂、曹县传教。

李嘉禄，1896年生于阳谷县辛庄，曾在濮周、定陶等地传教；1970年代去世。

#### 1923年9月30日

保禄·刘聿修，1892年生于成武刘家寺，曾在兖州、东明、观城、曹县、菏泽传教。

托马斯·牛会卿，1895年生于河北，后在坡里和兖州修道，曾在兖州、单县、范县传教，任阳谷教区田主教的代理，1943年任阳谷主教，1948年到福建，1952年任台湾嘉义的代牧。1973年2月28日在台湾去世。

若望·王聚祥，1893年生于曹县斗家堂，1931年入圣言会并发初愿，曾在峰县、涧头集传教，1949年后被捕。

1924年9月28日

若瑟·陈广义，1900年生于宁阳县，曾在寿张、单县、坡里庄传教。

类思·李学邈，1898年生于单县，曾在泗水、黄店、梁山、张秋镇等地传教。

安德烈·薛志让，1897年生于单县薛官楼，曾在曹县、大张庄、蒋店传教。

1925年10月11日

斐理伯·陈广韶，1898年生于郓城县，曾在曹县、单县终兴集，1933年后在坡里庄传教，1947年去世。

哥哈德·尚立身，1899年生于定陶县尚庙；曾在单县传教，1929年入圣言会并发初愿，后在鱼台、天宫庙、濮县、范县、戴家庄传教，1948年后任戴家庄院长。

斐理伯·王方襄（王子阳），1900年生于郓城，曾在单县传教，1929年入圣言会并发初愿，后在涧头集、方家道口、朝城、范县，1955年入狱，1990年去世。

1926年10月10日

若瑟·郭贵显，1899年生于曹县郭堂，曾在单县、巨野、梁山传教。

马尔谷·王宪芝，1896年生于泰安市满庄，曾在兖州、巨野、东明、坡里、梁山、寿张传教；1952年在福建去世。

保禄·刘廷寅，1895年生于汶上县，曾在冠庄堡、张秋镇、濮县等地传教。

加禄·王嵩亮，1900年生于菏泽县王里庄，曾在曹县、涧头集、黄店、郭家楼、金乡、曲阜、南村、薛城传教。

1927年10月18日

保禄·李本良，1900年生于嘉乡大庙里，曾在薛城、朝城、辛羊庙、梁山传教，在坡里庄修道院任教，1949年任临清主教。

西满·李善合，1896年生于济宁，曾在两下店、菏泽等地传教。

1930年3月16日

维笃·张作恒，1903年生于郓城县张家楼，1926年入圣言会并发初愿，曾在鱼台传教，后任兖州小修院副院长，1938年后在峄河嘉乡传教，1941年为河南信阳的主教，1949年后到菲律宾，1960年到德国科隆教区，1982年去世。

伯多禄·陈百瑞，1902年生于郓城县刘关屯，曾在兖州、鄄城、郭堂、枣庄、巨野传教。

若望·伏开鹏，1906年生于临沂市朱阳镇，1926年入圣言会并发初愿，曾在滕县、临沂等地传教，1931—1934年在罗马学教会法律，获得博士学位，1935—1948年在北京公教辅仁大学教书，1949年后在美国，他曾翻译过宗教书，2005年在美国去世。

安多尼·刘德雨，1902年生于曹县，在北京学习中国文学和历史一年半，后在兖州大修院任教，1937年放弃了圣召。

1930年9月30日（维昌禄主教在戴家庄举行祝圣典礼）

伯多禄·孙金声，1903年生于曹县孙庄，1927年入圣言会并发初愿，1931—1934年在罗马学习法律，获得博士学位，曾在定陶、菏泽传教；1945—1948年任兖州小修院院长，1945年到北京辅仁大学，1951年入狱，约于1973年去世。

1932年5月22日

加禄·侯京起，1903年生于郓城侯楼，曾在济宁、金乡、郭家楼、宁

阳、汶上方家道口、鱼台传教，1949年去世。

刘本笃，1905年生于滕县，曾在曹县、单县、菏泽、峰河、草桥口传教，1947年去世。

1935年5月19日

托马斯·贾怀信，1908年生于朝城县贾庄，1931年入圣言会并发初愿，曾在涧头集传教，1937年后在兖州小修院任教师和院长。

保禄·郭隆道，1908年生于曹县郭堂，1931年入圣言会并发初愿，曾在成武、鄄城、大张庄、滕县、鱼台、冠庄堡传教，1950年后在青岛。

若瑟·郭天锡，曾在河南驻马店等地传教。

若瑟·裴文俊，曾任河南驻马店小修院的院长。

1936年5月24日

路道夫·宋登文，1907年生于阳谷县，曾在涧头集、薛城、方家道口、菏泽等地传教。

保禄·袁意可，1910年生于临沂，1931年入圣言会并发初愿，曾在菏泽、张家庄、郟城等地传教，1949年后入狱。他曾翻译了很多宗教书籍，1985年去世。

## 附录二

### 韩宁镐主教的著作

#### 文章：

Neujahrgruss (an die Freunde und Wohltäuter der Mission von Südschantung年度报告), in: *Steyler Missionsbote* (《斯泰尔传教通讯》), 1905年、06、07、08、0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年(每年写2-3页关于山东南界教会发展的报告)。

Chinesische Toleranz- und Schulfragen (《中国的容忍问题和学校问题》), in: *Steyler Missionsbote* (《斯泰尔传教通讯》), 1908—1909, 107-109.

Zur Frage der Selbstunterhaltung der chinesischen Mission (论在华教会的自养问题), in: *Steyler Missionsbote*, 1908—1909, 135-136.

Notstand und Nothilfe in Sü d-Schantung (山东南部的灾难和救灾活动), in: *Steyler Missionsbote*, 1910—1911, 170-173.

Chinesische Revolution und katholische Mission in Sü d-Schantung (山东南部的政治革命和公教的传教事业), in: *SMB*, 1911—1912, 107-108.

Maedchenerziehung in China (中国女子教育问题), in: *SMB*, 1912—1913, 119-121.

Katholische Zeitungen in China ( 在华的公教报纸 ) , in: *SMB* 1913—1914, 23—24.

In Haenden der Raeuber ( 在强盗的手里 ) , in: *SMB* 1927—1928, 129—132.

Unser Aussaetzigenheim ( 我们的麻风病院 ) , in: *SMB* 1928/29, 257—258.

Die Hungersnoete und ihre Ursachen in China ( 中国的饥荒及其原因 ) , in: *Katholische Missionen* 1911/12, 25—29.

Die Konfuziusfrage in China ( 中国的孩子问题 ) , in: *Katholische Missionen*, 1912/13, 29—33.

Sü d-Schantung ( 山东南部 ) , in: *Kath. Missionen*, ( 《公教传教》 ) 1922/23, 91—93.

Die schriftstellerische Taetigkeit der Katholischen Missionen in China ( 公教在华的著作工作 ) , in: *Zeitschrift fuer Missionswissenschaft*, ( 《传教学杂志》 ) 1911, 201—213.

De novo Catechismo adhibendo ( 关于新的教理问答 ) , in: *Apostolicum* ( 《使徒杂志》 ) V, (Tsinanfu 1934), 351—352.

De conventu Commissionis pro uniformi catechismi et precum textu ( 主教会议关于统一教理的说法 ) , in: *Collectanea Comm. Synodalis*, II ( 《主教会议文献集》 ) (Peiping 1929), 523—524.

Introductio in Schema novi Catechismi ( 新教理问答的结构 ) , in: *Collectanea Comm. Synodalis*, V, (Peiping 1932), 1071—1074.

Litterae novum Catechismum concomitantes ( 与新教理问答有关的文献 ) , in: *Collectanea Comm. Synodalis*, VII, (Peiping 1934), 611—612.

Varia novi Catechismi stadia (新教理问答的不同阶段), in:  
*Collectanea Comm. Synodalis*, VII, 1023–1029.

#### 汉语的牧函:

《照关天主圣堂》, 1929年(第3版), 第26页。

《教皇亲立传教总汇》, 1934年(第3版), 第24页。

《守瞻礼主日的本分》, 1934年(第3版), 第42页。

《恭敬圣若瑟传记》, 1931年, 第32页。

《教训儿女》, 1931年, 第44页。

《论婚配圣事》, 1934年(第5版), 第30页。

#### 书籍:

*P. Joseph Freinademetz SVD, sein Leben und Wirken* 《圣言会福若瑟神父: 他的一生和他的成就》(德语), 共653页, 兖州, 1926年(第1版, 1920年)。

*Manuale in usum Missionarium Vicariatus Apostolici de Yenchowfu* 《兖州教区传教士们的手册》(拉丁文, 但也有中文), 共287页, 兖州, 1932年。<sup>i</sup>

*Deutsch-Chinesisches Hand-Woerterbuch mit besonderer Ber ücksichtigung der Shandong Sprache*, (韩宁镐主编) 《德华大辞典》(特别参照山东方言), 2卷, 共1171页, 兖州, 1907年; 第2版: 共1091

---

i 其中规定, 传教士们不可以说得罪人的话, 参见38页: “Cautissime devitent usum verborum, quae maledictionem, magnam contumeliam vel iniuriam continent, v. gr. 孱人, 你不是人, 是什么东西vel alia huiusmodi”。

页，兖州，1917年。

《坚振问答释义》，共274页，兖州，1918年。

《问答释义》，5卷，共1000多页，兖州，1934年（第11版），与福若瑟、赫德彰合著。

《要理问答》，共98页，兖州，1943年（第13版）。

《浅言要理》，共20页，兖州，1943年（第10版）。

### 关于韩宁镐主教及山东教会的主要著作

Schmidlin, “Zum silbernen Bischofsjubiläum des Ap. Vikars Msgr. Henninghaus S.V.D. (韩宁镐主教当主教25年回顾), in: *Stadt Gottes* no. 53 (1929—1930), 23—36.

In Memoriam Episcopi Henninghaus, in: *Apostolicum X* (Tsinanfu), 1939, 300—302.

“Ich weiss, wem ich mein Vertrauen geschenkt.” Zum Heimgang von Exzellenz Henninghaus S.V.D. (回忆韩宁镐主教), in: *Steyler Missionsbote* (《斯泰尔传教通讯》) 1939/40, 9—11, 46—48, 76—79, 95—97.

P. Hermann Fischer (费希尔), *Augustin Henninghaus, 53 Jahre Missionar und Missionsbischof*, (《奥古斯丁·韩宁镐：传教士53年，传教主教》) Steyl, Kaldenkirchen, 1940 (second ed.: 1946), 共409页。

K. J. Rivinius (利维尼), *Traditionalismus und Modernisierung: das Engagement von Bischof Augustin Henninghaus auf dem Gebiet des Bildungs- und Erziehungswesens in China (1904—1914)* (《传统主义与现代化：韩宁镐主教在中国教育领域中的努力，1904—1914年》)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共244页, 1994年。

Richard Hartwich (夏德威), *Steyler Missionare in China* (《在华的斯泰尔传教》), Steyler Verlag, St. Augustin, 共5卷, 每卷500页, 1983年等。

Bruno Hagspiel, *Along the Mission Trail* (《视察传教区》), Techny, Mission Press, 共392页, 1927年。

Thauren: *The Missions in Shantung, China* (《中国山东的传教事业》), Techny, Mission Press, 共100页, 1932年。

## 附录三

# 韩宁镐与孔子传人的相遇<sup>i</sup>

雷立柏 撰

### 提要

1900年到1920年间在孔子家乡进行传教的圣言会传教士们以积极的方式对待儒家传统。他们尊敬中国经典和孔子的道德教导，并且试图和儒家传统的正式代表人物孔令贻公保持友谊。天主教的韩宁镐主教在1907年去曲阜拜访孔公，而孔公不久后去兖州拜访传教士们的住院。儒家传统最高的代表人物和山东南部天主教的官方代表之间的友好拜访和会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们在基督宗教与孔子传统的漫长对话史上形成一个独特的高峰。本文旨在叙述和分析1907年和1908年双方拜访事件的历史背景。

### 一、导论

自从17世纪以来，在孔子的家乡就有天主教的传教活动，而根据一些无法证明的口头传说，这些传教活动早在孟高维诺（Monte Corvino，1274—1328年）的时代已经开始。19世纪来自意大利的方济各会传教士在山东北部

---

i 该文章发表在2010年的尼山会议上。

建立了一些基督徒团体，但在曲阜、兖州和济宁地区始终没有传教活动，一直到一个新的传教团体的到来，即圣言会（Divine Word Missionaries）。该修会1875年建立于荷兰，大部分的会士是德国人。1881年山东南部地区被交给这个新兴的传教团体。1879年他们派遣头一批传教士到远东（其中有安治泰神父和福若瑟神父）。这两个人在1882年来到山东阳谷的坡里，他们开始在整个山东南部地区进行传教，这个地区包括孔子和孟子的家乡。

在1903年山东南部有37名来自欧洲的圣言会司铎（大部分是德国人），还有11名中国本地的司铎、11名外国传教修士、3名圣母会修士在兖州，10名方济各玛利亚传教修女在青岛。<sup>i</sup>外国传教士的数目后来还在增加，而在1905年圣神传教修女会（“圣神会”）也来到山东。这些德国修女在一些孤儿院、医院服务，她们也为妇女和女孩子提供教育及宗教教育。在1880—1950年间圣言会派遣了五百多名传教士来到中国<sup>ii</sup>，而圣神会派遣了两百多名德国修女来到山东。他们一起建立了教堂、堂区、学校、修道院、医院，以及孤儿院。在这些机构当中最有名的大概是公教辅仁大学（1933年以来由圣言会管理）。本论文旨在澄清山东的圣言会会士与孔子或儒家的关系，而我所特别关注的是1900年到1920年这一阶段，即中国历史学家顾卫民称为“传教的黄金时代”的时期。<sup>iii</sup>

## 二、早期接触

在1882年到1900年这一时期，在山东南部的德国传教士使用了他们从

---

i R. Hartwich, *Steyler Missionare in China*, Steyler Verlag, vol. II, p. 25.

ii Leo Leeb, 《在华圣言会传教士列传》(*Biographies of SVDs in Chin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hinese, 2004. This text presents short biographies of more than 500 SVD missionaries on 144 pages.

iii 顾卫民：《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更早的耶稣会和方济各会传教士所继承的传教方法：他们学习汉语，出版教理书和其他的资料，翻译神学文献或其他有益的书籍并且创办了一些学校和修院，教孩子们汉语和拉丁语（在修道院）。值得注意的是，在坡里的小印刷厂印过孔孟的经典，因为很多传教士接受了利玛窦（1552—1610年）的观点，认为孔子的道德教导与基督信仰有某些共同之处，至少它比佛教和道教更接近基督信仰。实际上，在儒家的经典中可以找出很多类似于某些《圣经》语句的格言。<sup>i</sup>与比他们早300年的利玛窦一样，在山东的德国传教士倾向于区分“善良的”儒家道德教导和佛寺、道观中那种“邪恶的”偶像崇拜。<sup>ii</sup>值得注意的是，很多雇佣为“传教先生”的中国人在那时期来自文人阶级（“绅士”），因为只有他们有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这些人曾接受了传统的中国教育（儒家教育），而现在他们愿意教导别人学习基督信仰，虽然他们自己可能还没有接受洗礼。

山东南部的传教士努力适应中国文化，他们要“为中国人成为一个中国人”。圣福若瑟神父的一句名言是：“我爱中国人，而在天堂上我也愿意做一个中国人。”这种所谓的“本地化”过程意味着学习汉语及汉字，吃中国菜，穿中国服装。传教士们甚至扎上了辫子、剃了头，因为这是1911年以前的老习俗。<sup>iii</sup>

---

i 怀仁：《天道古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ii However, the destruction of Chinese temples also gave the missionaries cause for worries. Who would be able to protect church buildings in the future, if the Chinese were ready to demolish their own temples so fast? See Eduard Breitkopf SVD, (1885–1950), “Kampf gegen die Goetter” (“Struggle with the Gods”), in: *Steyler Missionsbote*, 1930, 184. This article describes how a crowd of Chinese people destroy a temple. The author expresses worries that Christian churches might disappear very soon in a similar way.

iii Compare the photo of Fr. Henninghaus, in H. Fischer, *Augustin Henninghaus, 53 Jahre Missionar und Missionsbischof*, Kaldenkirchen, 1940, p. 49.

无论传教士们花多大的工夫来“融入文化”，他们仍然是外国人，而他们的信息与传教工作很容易被一些怀疑他们的官员误解。毫无疑问，关于他们也有很多谣言，而本地的绅士们和官员很自然地会想孔子的故乡（山东）应该是一个“没有精神污染的”地区，不应该受外国宗教思想或宗教习俗的影响。这种早期接触的细节可以在夏德威（Hartwich，1912—2000年）的《圣言会传教士在中国》第1卷（500多页，描述1879年到1903年间的发展）里找到。

在1900年后整个情况改变了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日本回国，他们带回现代化和西学的新概念。慈禧太后颁发新的法律，其中也取消了传统的科举制度，这样才有深入改进教育制度的可能性。在这些气氛中兖州的官员们请德国传教士建立一些“华德学校”。1903—1904年的年度统计数字表明圣言会当时开办了三所“华德学校”，共有135名学生，还有13所汉语的小学（114名学生）以及一所德语的女子寄宿学校（51名学生）。<sup>i</sup>

### 三、与孔令贻公的友谊

在这种开放的氛围中，传教士们的教育工作被重视，而德国的韩宁鎬主教（他在1905年被祝圣）曾在1907年2月去曲阜拜访孔子的后裔。让我们看一看他自己的报告，因为这样就可以知道他如何接待儒家的正式代表人物<sup>ii</sup>：

---

i Hartwich, vol. II, p. 25.

ii The following report is my translation from the German original, an article by Henninghaus, “Bei den Nachkommen des Konfuzius”, *Michaelskalender* 1907, 81–89 (includes 3 photos), see also Hartwich, vol. II, 71–74.

前任的安主教始终渴望与孔子的传人孔公会谈，但他没有成功，只有一次在一个官员的家里偶然遇到了孔公。孔公是孔子的直系后裔，而他的家谱能上溯到公元前500年。如果还加上孔子的祖先，这个家谱还得加上几百年，所以总共要算3000年的历史。在公元1055年宋仁宗为孔子的46代后裔颁发“衍圣公”的头衔，这就是“圣人的继承人和公爵”的意思。这个头衔始终传给大儿子。

现在的孔公是孔令贻，他是孔子第76代的后裔，现在三十多岁，他的外貌很庄严。他的职务是保卫孔庙和祖先的墓，举行祭礼，即主持“圣人”的官方祭拜。孔公在整个帝国享受很高的尊敬，而他自己有很大的地产。因为他有权力颁发某些头衔和“品戴”，在他宫殿门口始终有很多谄媚者、送礼者和申请者。

很多旅游者来曲阜要看著名的孔庙，他们也曾送上了他们的拜访票，要求孔公接见他们，但孔公始终患了“外交症”，虽然他的身体实际上很好。甚至当青岛的总管Truppel先生来时，也是这样的。（后来孔公告诉了我，那时他真的生病了。）只有威海卫的大臣锥克哈德（James Lockhart, 1858—1937年）能够突破这种僵硬的防卫。他使用了英国人的（也是中国人的）外交手段并送给了孔公一些匾额，其中赞扬孔子圣人。这种措施确保了的成功，所以他是第一个被允许进入孔公府上的欧洲人。后来英国国王送给孔公他的图画。在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孔公将国王的画安放在自己旁边的一张椅子上。

对我们来说，与这位具有影响的人物保持友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被允许在他的府里拜见孔公在百姓的眼中是很大的荣誉。因此我想现在尝试接近他。我也用了外交官的手段。孔公经常来兖州

拜访一些官员（他们是他的亲密朋友）。这些官员也是我的朋友，因此我请他们敲孔公的门，请他们通知他我很想会见他。答复很快来到：没有什么问题，孔公也很愿意接见你。我就决定了日期并通知他我什么时候要来。在去那里的前一夜下了大雪（这是2月份），但我想我要实现我的承诺。雪花遮盖了整个大地。我想到那位老圣贤的影响力，因为我正要去他的地方朝圣。单独一个人能够影响几十代，甚至百代的后人！他的慧言仍然像一种雪布遮蔽着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这些格言保护着很多自然的道德的种子，但它们也仍旧阻碍着生命的发展和成长。

在曲阜的雪有三尺高。他们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会来。我们找到了一个下榻的地方，而我请那位陪同我的人向孔家宣告我的到来。现在他们开始活动了：本地的官员下令要用红布装饰我住的旅馆。一些保卫人员在我的门口站岗，以表示尊敬我。不久后人们送来一顿丰富的午餐。他们通知我，孔公仍在睡觉。这是早上11点的时候。当他们宣布我的到来时，他大概醒过来了，并且请我下午两点去他那儿。

当我去孔公的府中时，我深深地意识到我的拜访具有历史意义。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曲阜一样能使人们体验到孔子的广大影响力，因为在曲阜，他会在无数的纪念碑和圣所中面对我们，甚至在一些活人当中也可以遇到孔子。古老的柏树、辉煌的宙宇和宫殿，这一切都显示着孔子的光荣。而我，山东南部的天主教的正式代表可以会见这个巨大体系的代表人物。我向天主我们的主祈祷，希望他也会带领孔子的子孙走向基督的十字架。

根据中国习俗我必须在关上的门前等待，直到主人作好准备。

随后一声“请！”响亮地传过大厅，而门扉就开了。我被带入大厅。在两边站着显贵们，都穿着礼服。在最后面孔公等待着我，一群仆人围绕着他。我正式向他鞠躬，让他们带我到客厅。家具并不豪华，但都很高雅，表明这是一个贵族家庭。

公爵在开始时有点冷淡或不好意思，但他逐渐变得比较热心，非常客气和藹。在那些惯用的浮浅套语后，我想使我们的会话转向比较严肃的话题。首先我想谈论古老的祖先，我也想知道在他的图书馆里有什么样的古书。但是，他对这些几乎没有多少兴趣，所以我回到日常生活的普通话题中去。

最终我邀请孔公来兖州参观，他也答应了我。那些普遍被遵守的仪式还陪伴着我的离开。这次我没有去看孔庙，因为路太滑。我也已经很熟悉孔子的墓，它在北门外的一些古老的柏树的树影下。这样，我仅仅去拜访了县官，此后直接回到我的旅馆。我刚刚到的时候，孔公就已经来到，他穿着礼服来回访我。虽然雪很大，很多人聚集在我旅馆的门前，他们都想看看这种一般见不到的壮举。孔公劝我明天去参加他早上10点的早饭，而我必须接受这种邀请。在早饭后，孔公以那种典型的中国人的方式向我道歉说，他在他的茅屋里使我挨饿，而我当然不断地说他准备的菜太好吃。

几周后，我们很荣幸地第一次迎接孔公来我们兖州府的主教府。他来向我们拜年。我先是在一个官员的家里遇到了他，后来谨慎地邀请他和另一些官员第二天一起来我们那儿。

我们作了很全面的准备。装饰好餐厅，门上挂着红布。当那八个官员与孔公及其仆人一起进来时，他们形成了一支漂亮的游行队



伍。孔公看到了宏伟的教堂<sup>i</sup>，他显然很惊奇。他也看到了安主教建立的主教府的大门，很受感动。我很想带他进入教堂，但他没有作出任何这方面的表示。他告别并承诺说他不久后还要再来。

一年后，1908年4月28日，孔公来到济宁的天主教教堂。关于这次拜访恩博仁神父（1852—1917年）作了这样的记载：“这几天我们欢迎了‘中国教皇’（我们的高中生这样称呼了他）。孔公来到我们这里，待了一个半小时，与我们一起吃喝。他想听听留声机，去看教堂和我们所有的学校，并且说在欧洲的人肯定也为他的伟大祖先孔子建立了一些神庙，因为他实际上为人类带来了救恩和一切智慧的教导。我们非常小心地告诉了他真相。

后来布恩博神父（1856—1912年）说，奇怪的是，这样的伟人——他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皇帝——与我们外国人有如此亲密的来往。他仅仅来看我们和一个与他有亲戚关系的家庭。这次他没有去看政府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因为他想他比他们还要尊贵。而且没有人被允许觐见他，只有我们能回应他的探访。中国人都目瞪口呆。现在皇帝规定了孔公要监督整个中国的教育制度，而为这个职位孔公每年要领受1.2万元银钱。<sup>ii</sup>

古老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取消，但新式学校的学生被要求向孔子的像磕头，而且政府想强迫传教士们离开学校。政府没有承认教会办的学

---

i The famous Catholic church of Yanzhou which had windows of stained glass and an organ survived the attacks of the Boxers, because local mandarins protected the building, but it was destroy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ld photos give can only give a faint hint to its former beauty.

ii This is my translation of Erlemann's German report, see Hartwich, vol. II, p. 374.

校。<sup>i</sup>1913年蔡元培规定中小学中不要有任何儒家教育，但1913年年底一些人建立了“孔教会”，并想宣布孔教为国教。四川的省政府宣布孔教为国教，而孔子的生日（9月28日）被庆祝。当然，韩主教反对作为宗教的孔教，他向一名官员表达：（1）孔子从来没有建立一门宗教；（2）儒教不能充当一种名副其实的宗教；（3）官员们不能充当司祭，孔子不能成为崇拜的对象。<sup>ii</sup>

除了创办学校，一些传教士也建立了医院，比如卢德福修士（1872—1952年）。他1898年来到山东并于1900—1936年间在兖州和济宁的教会医院服务，1937—1946年间在蒙阴的诊所行医。他有“良大夫”的美名并且也曾治好了孔家一个人的病。<sup>iii</sup>当列强于1919年要求一切德国人必须离开中国时，孔家的一个人“以孔子家族的名义”说要在山东保留传教士们，而这种支持被归功于卢修士的医疗工作。<sup>iv</sup>卢修士也曾写过一篇关于“在孔家的婚礼”的文章。<sup>v</sup>

在1920年2月又发生了一件小事。当时孔令贻的正妻面临分娩，如果这个孩子是一个小男孩儿，他将成为孔子第77代的传人。然而，一些谣言说这个妇女不孕，而孔家已经准备了另一个小男孩当继承人。为了杜绝这些谣言，孔公邀请两名来自济南的基督新教的女传教医生和两名来自兖州的传教修女为小男孩的诞生作证。这些妇女必须在孔府等待分娩的时期，后

---

i See Hartwich, vol. II, p. 166, p. 284.

ii Hartwich, vol. III, p. 234.

iii Hartwich, vol. VI, p. 481.

iv Hartwich, vol. III, p. 537., vol. VI, p. 481.

v *Steyler Missionsbote*, June 1937, 246.

来她们需要签一些文件来证明这个孩子确实是孔公的儿子<sup>i</sup>。

#### 四、面对儒家的其他进路

另一些传教士写了关于儒家的学术著作。圣言会最伟大的汉学家在当时大概是鲍润生神父，他是《华裔学志》的创始人，而《华裔学志》堪为最优秀的汉学期刊之一。鲍在1928年出版了关于儒家的研究论文《孔子与对他的崇拜》（*Konfuzius und sein Kult*，北京，Leipzig，共138页，包括很多照片）。董师冕神父曾写了一本三语的（德、英、汉）旅游指南，书名为《泰山曲阜指南》。这部指南（共368页）包括三百多幅珍贵的老照片，都显示出泰山和曲阜的种种文物和圣所。另一项研究也值得注意，即郭若愚神父所写的《关于儒家世界观和圣托马斯·阿奎那思想中的“秩序”概念》（*Die Ordnung im Weltbild des Konfuzius und des hl. Thomas von Aquin*）<sup>ii</sup>。

毫无疑问，外国传教士都很佩服曲阜孔庙的建筑，因为在1924年他们要一些曲阜雕塑家按1:100的比例作整个孔庙的模型。这个模型1924年12月曾在罗马的“传教学展览会”上展出。<sup>iii</sup>

#### 五、结论

我们可以说1882—1950年间在孔子家乡进行传教的圣言会传教士很尊敬孔子的智慧，还与想与孔子后裔建立友谊。他们尽力与儒家传统进行对话，想理解这个传统，而且从基督宗教的角度作出一些解释。他们很早

---

i See the detailed report by one SSpS sister in Hartwich, vol. V, p. 36–37.

ii In: *Zeitschrift fuer Missionswissenschaft und Religionswissenschaft*, XXV, 1935, pp. 106–130.

iii Hartwich, vol. V, p. 385.

就怀着1965年“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我们的时代》文献所要求的对非基督教传统的尊敬态度。这种积极的态度的前提条件是孔教已不再是那种统治一切的思想主流，它不再对基督宗教这个少数派构成威胁。在此之外，历代的天主教传教士几乎都认为孔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也许可以与塞涅卡（Seneca）相提并论，而这样的贤人可以很容易融入基督宗教传统。韩主教的洞见也很有启发，因为他意识到儒家传统这个“雪布”的两面性及儒家传统的贡献在当时中国的局限性。